

Global Media Journal

全球传媒学刊(VIII)

《全球传媒学刊》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李希光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杰 尹 鸿 尹韵公 方延明 刘建明 孙有中

严文斌 吴予敏 李良荣 邵培仁 金兼斌 贾文山

高 钢 程曼丽 戴元光

总 主 编：郭镇之

副 主 编：周庆安 卢嘉

本辑特邀主编：尹鸿

执 行 编 委：曹书乐 李红霞

国际顾问委员会

主任: **Yahya R. Kamalipour** (美国普度大学卡拉美特分校传播与创意艺术系主任、教授)

委员:

Hamid Abdollahyan (伊朗德黑兰大学)

Hussein Amin (埃及开罗美国大学)

Lee Artz (美国普度大学卡拉美特分校)

Frank Aycock (美国阿帕拉契州立大学)

Bekir Azgin (塞浦路斯东地中海大学)

Mashoed Bailie (塞浦路斯东地中海大学)

Gabriel J. Botma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

Naren Chitty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

Vibert Cambridge (美国俄亥俄大学)

Hart Cohen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

Robbin D. Crabtree (美国费厄菲尔德大学)

Miyase Christensen (瑞典卡尔斯塔德大学)

Buroshiva Dasgupta (印度曼尼帕尔高等教育学院)

Alireza Dehghan (伊朗德黑兰大学)

David Demers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

Zhenzhi Guo (中国清华大学)

Kai Hafez (德国埃尔福特大学)

Cees Hamelink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Xiguang Li (中国清华大学)

Jose-Carlos Lozano (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学)

Arnold S de Beer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

Drew McDaniel (美国俄亥俄大学)

Jos é Marques de Melo (巴西圣保罗大学)

Robert McChesney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Vincent Mosco (加拿大女王大学)

Patrick Murphy (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爱德华兹维尔分校)

Kaarle Nordenstreng (芬兰坦佩雷大学)

Christine Ogan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

Allen W. Palmer (美国杨百翰大学)

Tomasz Pludowski (波兰华沙私立人文大学)

Manjunath Pendakur (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戴尔分校)

Lawrence Pintak (美国密歇根大学)

Kuldip Rampal (美国中央密苏里州立大学)

Marc Raboy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

Amit M. Schejter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Enrique E. Sánchez Ruiz (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大学)

Harmeet Sawhney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

Mehdi Semati (美国东伊利诺伊大学)

Hemant Shah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Nancy Snow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

Joseph D. Straubhaar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Majid Tehranian (美国夏威夷大学)

Daya Thussu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

Herman Wasserman (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

Dwayne Winseck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

ITO Youichi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全球传媒评论第八期

2011-6

目录

特邀主编 尹 鸿

编者的话

新闻与传播教育

- | | |
|--|---------|
| 1 范敬宜论新闻教育 | 范敬宜 |
| 2 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
——范敬宜与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 | 胡显章 |
| 3 居高自望远 放眼量风物
——范敬宜新闻思想述论 | 郭庆光 来向武 |
| 4 范敬宜与清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述略 | 李 彬 |

全球传播论坛

- | | |
|----------------------------|---------|
| 5 构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问题——避免成为他国的传声筒 | 吴 玫 |
| 6 中国问题、政治传播与学术研究 | 郑永年 郭镇之 |
| 7 针对所谓“持批判立场”的十六条半问题 | 张正平 |

影视研究专题

- | | |
|---------------------------|---------|
| 8 审查还是分级?——中国电影的管理困境与转型难题 | 詹庆生 |
| 9 美国政府的支持与好莱坞的全球扩张 | 彭 侃 |
| 10 好莱坞的全球化与其电影产业竞争力建构关系研究 | 张建珍 吴海清 |

新闻传播研究

- | | |
|--------------------------------|-----|
| 11 全球脑,中国心:网络时代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认同 | 陈熾如 |
| 12 对西方媒体上中国形象的文化解析 | 曹 青 |
| 13 劳动创造新闻——当代中国新闻生产中的劳动过程与劳动控制 | 王维佳 |
| 14 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的技术遮蔽 | 刘 阳 |
| 15 博客与个人媒体化 | 刘 永 |

书评

- | | |
|-----------------|-----|
| 16 问题本身比学科归属更重要 | 刘宪阁 |
|-----------------|-----|

学术信息

- 1 2010~2011年度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著作)
- 2 综合学术信息

CONTENTS

EDITOR'S NOTE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1. On Journalism Education (FAN Jingyi)
2. Quality and Practice Oriented, Educating Master-hand for Mainstream Media:
Fan Jingyi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HU Xianzhang)
3. Looking Far When Positioning High, Taking a Broad View of Scenery:
A Review of Fan Jingyi's Thoughts on Journalism (GUO Qingguang & LAI Xiangwu)
4. Fan Jingyi and Education of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at Tsinghua (LI Bin)

GLOBAL MEDIA FORUM

5. How to Avoid Becoming Transmitter for Others' Soft Power (WU Mei)
6. Chinese Issu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ZHENG Yongnian & GUO Zhenzhi)
7. Introduction: Sixteen and a Half Questions on "Being Critical" (Briankle G Chang)

FILM STUDIES

8. Censorship or Grading? The Predicament of Administration and Transition of Chinese Films
(ZHAN Qingsheng)
9. U.S. Government Support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Hollywood (PENG Kan)
10. Research on Hollywood's Globalization and Its Film Industry's Competitiveness
(ZHANG Jianzhen & WU Haiqing)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1. Global Mind, Chinese Heart: the Culture Identity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t Internet Age
(CHEN Yanru)
12.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Western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CAO Qing)
13. Toward a Labor Theory of Journalism: Labor Process and Labor Control in Chinese Media
Industry (WANG Weijia)
14. Covering of Technology in the Formation of Network Opinions (LIU Yang)
15. Bloggers and We Media (LIU Yong)

BOOK REVIEW

16. Question Itself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ich Discipline It Belongs To (LIU Xian'ge)

ACADEMIC INFORMATION

编者的话

《全球传媒学刊》第八期的电子版已经上传。本期封面主题是“**新闻与传播教育**”，特别纪念我们敬爱的院长范敬宜先生。范敬宜先生于2002年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至2010年11月13日逝世，在清华8年，贡献甚钜。范老生前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制订了“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方针，倡导并主持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课程。本刊特将范老的讲话稿精编为一篇《范敬宜论新闻教育》，以志纪念。胡显章教授、李彬教授曾与范老合作多年；郭庆光教授及来向武博士则总结了范敬宜的新闻思想，他们的文字与组成了本期封面栏目的纪念文章。

在本期的“**全球传播论坛**”部分，我们发表了澳门大学吴玫副教授对中国媒体在构建软实力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批评。吴玫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应有独立的立场、观点和信息，避免成为他国软实力的传声筒。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并予以克服的倾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博士近年来在大众传播媒介上不断发表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和建议，也推动了“中国模式”话题的传播。在郭镇之对郑永年先生的访谈中，他们讨论了中国现实、政治传播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郑永年先生主张认真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和问题。

本期特设一个“**影视研究专题**”，重点讨论电影市场的全球趋势。其中，有的文章讨论电影审查的管理困境，建议实行电影分级制度（詹庆生），有的比较仔细地介绍了美国好莱坞的全球扩张获得政府支持的背景（彭侃），还有对好莱坞电影的全球化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张建珍与吴海清）。

例行的“**新闻传播研究**”专栏收集了5篇文章。其中陈熾如教授对网络时代中国大学生文化认同的研究，提出了“全球脑、中国心”的概念；旅英高级讲师曹青则对西方媒介中呈现中国形象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文化解析。王维佳博士在“劳动创造新闻”中分析了当代中国新闻生产中的劳动过程与劳动控制，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王怡红、胡翼青主编的《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是2010年出版的一本值得注意的书，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进行了描述与总结。刘宪阁的书评点明了这本书的意义——“问题本身比学科归属更重要”。

最后，仍然是那句老话：热诚地希望国内外学者为我们提供富有创见的论文，共同浇灌这方青青的园地。

新闻与传播教育

范敬宜论新闻教育^①

On Journalism Education

范敬宜^②

(刘宪阁整理)

中文摘要：本文辑录了范敬宜 2002-2010 年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期间在多种访谈和讲话中关于新闻教育的看法和思考。本文分为六大部分，包括他对清华新闻学教育的方向性思考，他提出的“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和“实践教学”的理念，以及对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如何认识新闻与文化的关系的思考，和他对学院的国际化办学理念的总结。

关键词：新闻教学，范敬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教学

Abstract: This article compiles the speeches by and interviews with Fan Jingyi, the former dean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TSJC),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from 2002 to 2010. The article includes six parts: Fan's thought on the purpose and direction of the journalism education of TSJC, his ideal of "Educating Master-hand for Mainstream Media" and "Practice Training", his thoughts on how to carry out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how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of journalism and culture, as well as his summary of TSJC's ideal of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journalism education, Fan Jingyi, Tsinghua, the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practice teaching

① 本文辑录了范敬宜近年来在多种访谈和讲话中关于新闻教育的看法和思考，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刘宪阁整理。

② 范敬宜，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2002-2010 年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2010 年 11 月 13 日逝世。

清华园内谱新篇

到清华大学当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后来他们请我过去，我也挺高兴，过去从来没有教过书，也没有从事过新闻教学，但是新闻工作我没有做够，这也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不管怎么说，我有几十年的新闻生涯，有甘有苦，有些经历可以更多地向年轻一代传播，应该说也是一种贡献吧。所以就欣然接受了。这几年，我觉得生活特别充实，特别有意思。

人民网“传媒沙龙”访谈，2005年5月31日

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在向着创新型的国家转型，这不仅是经济创新、科技创新，还有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新闻与传播的事业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在下一个阶段，我们要组织好队伍，努力在中国新闻传播理论创新和新闻教育体系创新方面做出一点贡献。

在第二届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4月23日

面对新世纪的风云变幻和经济全球化的波涌浪翻，如何卓有成效地发展新闻与传播事业，如何使之成为国家长治久安、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幸福安康的一大“利器”，这些课题都十分现实又十分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面前。正是为了应对诸如此类的挑战，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的新闻与传播事业，清华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在已经具有一定影响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上组建了新闻与传播学院。

这所诞生于春天的学院，同样充满了生机、活力与欣欣向荣的气象，在办学思想、办学模式与办学精神上初步形成了一系列自己的特色，今天借此机会我想简单谈谈其中的一些关键内容。

——我们将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依托清华大学多学科的深厚背景，在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平台上构筑新的学科框架和学科体系。众所周知，随着新闻与传播活动的日趋活跃，随着新闻与传播事业的日趋发达以及它所涉及的方面和领域的日趋庞杂，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综合趋势也就越来越突出，越来越明显。为此，我们将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坚持和发扬一切优秀传统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整个学科的整合，从而开创新的综合性学科体系，开拓新的研究型办学模式，开辟新的开放式教育局面。

——我们将以立足主流的意识，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重要领域开展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大力加强基础学科、基础理论与基础研究，重视学术的规范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努力提升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针对新闻与传播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重大现实问题，积极开展战略性和对策性的研究。不管是基础性研究还是应用性研究，我们都将瞄准世界一流目标，按照高起点、高水准、高质量的精神锐意进取，在占领学术前沿之际，争取多出精益求精的原创性成果，其中尤以新闻、影视、新媒体及媒介经营等领域为主攻方向，在与国内外学术界广泛交流与多方合作的基础上做出我们的贡献。

——我们将始终遵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思想，积极推进新闻与传播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这里，我们固然需要吸取世界各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宝贵经验，特别是继承我国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优良传统；同时，我们更需要通过教育思想的解放、课程体系的创新、教学内容的调整、培养方式的改革等，探索一套新的、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对新闻与传播人才需求的培养模式，为新闻与传播行业造就一批以硕士研究生为主的高级人才：他们既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又具有广博的文化基础和娴熟的专业技能；既具有开放的世界眼光和通达的人类情怀，又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醒的批判意识；既具有高尚的精神情操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又具有百折不挠的拼搏意志和承担重

任的精力体力。

——我们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并发扬“行胜于言”的校风，与国内外主流媒体展开多方面、多层次、多形式的互动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大量吸取新闻与传播实践里的新鲜养分，并将其有机地融入教学与科研之中，又希望尽可能把新思想、新思路、新成果引入新闻与传播实践，为我国新闻与传播事业及其现代化提供各种有益的参考、咨询及培训，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能够成为决策部门、实际部门和教学科研部门进行良性沟通的一座桥梁。

——我们将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贯串于各个方面，特别在人才培养方面注重综合素质，强调严谨为人、诚信为学、务实求真、追求完美的精神。大家知道，梁启超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导师之一，他与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和赵元任先生共同建立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并开创了“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学术范式，他所倡导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早已成为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时，梁启超先生还是我国新闻事业的杰出先驱，他那些精彩纷呈的新闻实践与精义迭出的新闻思想，是我国新闻传播学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他那“笔端常带感情”的文体，至今仍是新闻工作者的学习典范。毫无疑问，我们将继承这些得天独厚的遗产，并努力将其发扬光大。

这里，需要特别表明一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还非常年轻，许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真诚地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特别是希望得到海内外影响卓著的新闻媒体和兄弟院校的支持。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2002年4月21日

“面向主流，培养高手”

为什么要“面向主流，培养高手”？这是清华大学的地位所决定的。现今新闻院校的数量如雨后春笋般地增长。2003年我们学院成立时，全国共有新闻院校200多个，现在已经超过500个。在林林总总的新闻院校中，清华大学作为全国一流学府，如果不能把对学生的培养方向放在为主流媒体服务上，那就没有必要在这样一个更加倾向于理工科建设的学校中设立新闻学院。

中国国情与新闻传播，2005年2月18日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责任便是如何把“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理念化为全体师生的共识，化为具体实践。……我原来以为，这样一个并不复杂的理念很容易被接受和认同，实际上并不如此简单。渐渐地我听到一些议论：“面向主流，究竟什么叫主流？是不是只有党报和国家主办的媒体才是主流？在媒体越来越趋于多元化的形势下，是否太过时了？”“培养高手，究竟什么样才算高手？高手的标准是什么？强调培养高手，会不会把学生都培养成没有个性的人物？”

提出这种对“主流”和“高手”的质疑，我并不感到意外。实质是反映了社会上对党领导下的新闻传媒的误解。……在与教师和同学的接触中，我感到产生这种误解，一是受当前某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二是对主流媒体（包括它的性质、地位、任务、要求、运行规律以至工作人员的素质）缺乏感性的了解。

能不能处理好这两个问题，是“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教学目标能否落到实处的关键。而这类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行政命令和生硬说教，必须依靠实践，包括课堂实践和社会实践，特别是直接与主流媒体接触和融合的实践。

面向主流 培养高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践教育的点滴体会，2005年

学生对我们中国新闻事业的特点、历史、现状了解得不多，同时又受很多社会思潮的影响，对主流媒体既不是很了解，又有某种排斥的心态。但我们的学生可塑性是非常强的，他们没有太多太深的成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就在于我们怎样引导。而这个引导不能靠说教，不能靠压力，而是需要正确的引导方式，要靠潜移默化，要在实践当中让他们转变观念，了解到底什么是主流，主流到底是什么样；什么是高手，高手是什么样的。……这不能靠一般的讲课，更不能靠生硬的手段，而要靠事实、靠实践、靠潜移默化，让学生在事实的教育当中心悦诚服地接受。

在第一届顾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2004年5月19日

我所强调的“面向主流”，主要分三个层面。第一是就办学的指导思想而言：一定要着力培养同学的主流意识、主流观念。具体地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统领新闻与传播的教学和研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强化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强化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导向意识，努力成为合格的、优秀的新闻与传播工作者。第二是就学生就业的方向而言：作为全国第一流的大学——清华大学的新闻与传播学院，应当把向国家的主流媒体和新闻出版机构以及相关的重要管理部门输送一流的人才作为自己的目标和职责，这是由清华大学的地位和优势所决定的。在全国新闻与传播院系已达600多个的形势下，如果清华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不能为主流媒体以及相关的部门服务，那就不如不办这个学院。这一点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并且为之努力。我们争取每年的毕业生能有70%左右进入这个层面工作。第三是就同学的心态而言：将来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门做什么工作，不论是在高层还是在基层，在首都还是在地方，都要争取做第一流的工作，做第一流的奉献，不但要像有的同学表达的那样，“上大舞台，干大事业”，也要能“上小舞台，干大事业”。因为“小舞台”同样也可以大显身手，干出大事业。所以，我完全赞成有的同学提出的“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在2006年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6年7月11日

“高手”的含义，其实就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这也是根据我院优秀的师资队伍这一硬件条件来确定的。学校的领导也非常重视，甚至国内的新闻宣传部门也对我们给予高度的重视，这也为我们“培养高手”创造了条件。一定会有同学问：“高手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这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解释。一般而言，业务应该很强，管理也应该很强，文笔也要很好……教科书上会标明很多。但是，我觉得在众多的因素当中，最重要的是把握大局。作为一个真正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文笔、外语、口才当然是重要的条件，但若要成为出类拔萃的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大局”。“把握大局”首先要“了解国情”。纵观新闻史，凡是成为大家的，都是对中国国情、世界时情了如指掌的新闻人，这样才能够纵横捭阖、居高临下，站得高、看得远。

中国国情与新闻传播，2005年2月18日

根据我的感受，不仅学生不很了解主流媒体，主流媒体同样不很了解学生。双方在思想感情上都存在误区。在主流媒体工作人员心目中，今天新闻院校的学生似乎多属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崇尚西方的“现代派”，要适应主流媒体工作必须重新“回炉”。在学生心目中，主流媒体的工作人员似乎多属思想僵化、作风刻板、文风八股的“顽固派”。双方的偏见，根源在于相互了解太少，互把对方“脸谱化”了。消除这种偏见和误解，从学校来说，就是要为拉近与主流媒体的距离创造条件，让学生了解主流媒体，也让主流媒体了解学生。

面向主流 培养高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践教育的点滴体会，2005年

总的指导思想就是拉近学生和主流媒体的距离，让学生了解主流媒体、喜欢主流媒体，感受到他们的可敬；同时也让主流媒体喜欢我们的学生，感觉到他们的可爱。两年来，我们围绕这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工作。

在第一屆顾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2004年5月19日

为了让清华学子多了解主流媒体，我们从建院之初就聘请不少主流媒体的主要负责人和国内著名新闻院校的专家、名师担任学院顾问，定期或不定期地向他们通报学院和学生的情况，就办学方向、学科设置和教学中遇到的难点等问题向他们请教，听取他们中肯的建设性意见。我们还邀请主流媒体的著名人物来学院作专题讲座和讲课，如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曾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给全院师生作过“记者的发现力”的精彩演讲；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李仁臣和评论部主任米博华曾向学生讲授过他们新闻评论写作的实践经验；经济日报总编辑冯并、副总编辑詹国枢和原副总编辑罗开富曾来讲过他们的新闻人生；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小川讲过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素养……米博华还实际上成了学生的校外导师，有时全班学生的评论作业，都送给他批改。学生写得比较好的评论，由他选登在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他写的点评，也被作为教学档案由学院保存。通过这些活动，同学们看到主流媒体工作人员非同一般的眼界和修养，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人格力量，逐步地改变了对主流媒体的偏见和误解，增强了亲近感与认同感。

为了让主流媒体多了解清华学子，我们每年都要分批组织学生到各家主流媒体去实习，让他们更加具体地认识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对这项工作特别重视，去年有十多名学生到人民日报实习，王晨社长和张研农总编辑亲自批示各有关业务部门指定专人负责学生的实习和生活。这次实习不但使学生进一步感受到了主流媒体对他们的重视和关爱，进一步懂得了主流媒体的性质、地位和工作特点，同时也使主流媒体对清华学子的基本素质有了新的认识，彼此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学生们在其他主流媒体的实习情况也类似。结果都使双方感到“出乎意料”：学生没有料到自己的表现能被主流媒体如此认同，主流媒体也没有料到自己的理念能被学生如此接受。感情上距离的缩短，带来的必然是对原有观念的重新审视和改变。应该说，这是实践教育最重要的收获。

面向主流 培养高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实践教育的点滴体会，2005年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新闻传播教育，并且在实践中勇于探索，积累经验，起到一定的带队作用。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对此，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只有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才能理解为什么要理直气壮地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必修课，而且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融汇到其它有关的学科中去。

在全院教师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7月7日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于新闻院校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培养人才的根本，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建院之初，我们提出了“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方针。但是，究竟什么是主流，培养什么样的高手，并没有想得很深。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新闻院校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合格的新闻传播人才。这对我们的思想有所触动，意识到这是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重

大战略决策，作为新闻院校，应当把它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落实到教学和科研中去，根据当时面临的客观形势和学生的思想状况，感到难度很大。正在感到困惑、迷惘之中，连续发生的几件事情引起了我们思想的震动……使我们不断地提高认识，明确方向，增强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教育改革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2007年1月18日

这四年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不断认识、再认识的过程。如果以阶段划分，大致上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有没有必要专门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并作为全院的必修课？（二）从师资力量看，具备不具备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的条件？（三）从学生的思想状况看，能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简而言之，是：学院是否必要，条件是否具备，学生能否接受。四年实践的结果证明，只要从实际出发，指导思想明确，态度坚定，举措得当，这些难点都是可以解决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一点粗浅体会，2009年

开始我有个想法：既然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那就需要首先制定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系统的、面面俱到的教学和科研规划，组建起一支队伍。后来考虑如果这样按部就班地做，按学院式的做法行事，一是容易把时间拖得很长，把人心拖散，时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二是可能搞得很沉闷，挫伤同学学习的积极性。在当前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习普遍不理解和存在偏见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没有兴趣，一切无从谈起。经过学院领导班子的再三研究，认为可以换个思维方式采取开放式的教学形式，走群众路线，把本院的师资力量和兄弟院校及媒体的力量结合起来，举办集体系列讲座，列为本科生、研究生的必修课，每周一次，三个学时，每次一个专题，每次讲课都是学界和业界的名师、大家，内容也是丰富多彩，各有特色。这个做法首先是由李彬老师建议的，他学识渊博，熟悉的专家学者也不少，点子也多。决定由他组织实施，两个学期下来，效果大大出乎意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成了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每次讲座总是座无虚席，上下互动，讲到精彩处往往掌声雷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准备了一些材料，包括课程的安排，主讲的专题，学生的作业，集体的总结等，可供参考。

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教育改革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2007年1月18日

当代大学生接触的新事物多，知识面广，思维敏捷，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思想观念比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复杂得多。在这种新情况下，沿袭习惯使用的灌输、说教那一套方式越来越不灵了。形势逼着我们必须去探索新途径，研究新方法。我最近两年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课，深切感到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在课堂上取得成效，必须放下架子，先当学生，陪着他们一起成长，了解他们的现实思想状况，了解他们困惑的来源，然后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新闻实践和人生经历，试着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说点新鲜话。

试着说点新鲜话——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我见，《人民日报》2004年10月26日

以前，我在课堂上讲党性、导向、喉舌等新闻传播理念，学生们会在下面笑。而当我们用年轻人能听得进去的方式和语言传输这些必要的理念后，他们不再笑了。因为无论中外，在宣传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有“框子”约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海再阔总有边，天再高也有度，鱼与鸟的自由总是有界限的。这就是“框子”。世间没有绝对自由，新闻工作也一样，总要在一定的“框子”内去充分地发挥能动性。一个演员的表演是离不开一个有限的舞台或场地的。著名的京剧艺术家盖叫天，在高龄时仍能在八仙桌下打一套漂亮的猴拳，

而不会碰到桌子腿一下。关键是如何做我们的文章。……我们的缺点是往往只强调理直气壮，不讲究委婉曲折；只强调大雨倾盆，不讲究细雨润物；只强调大开大合，不讲究以小见大；只强调浓墨重彩，不讲究轻描淡写……所以有些报道的效果往往事与愿违。

谈外宣人才的综合素质与教育培养，2005年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与时俱进的新闻观，所以我们不能一成不变，固步自封，而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问题。时代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共产党人也要让自己的思想跟上时代的变化，针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马克思不是神仙，不可能预测身后一两百年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一两百年间，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的思想观念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现今实行的政策。……对这种变化，新闻工作者要非常敏感，要能察觉到，并且能跟得上。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在重大问题上犯原则性的错误，会落后于时代。

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2006年

新闻工作者要做到审时度势、把握大局，从方法上说，既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又有历史学家的纵观古今，新闻史上出现的各种大师都是在政治和文化上有很好的修养。正如邓拓，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政治家，很容易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审时度势，对未来的发展做出预见……这些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什么联系呢？我想最根本的就是实事求是，必须了解自己所处的位置、所处的国情、所处的形势，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如何去把握好方向。你们还没有到社会上去，不工作不会有体会，做了之后会有想法。

中国国情与新闻传播，2005年2月18日

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岁，经历过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也经历过“左”的路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不幸，深知今天我们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局面来之不易！我并不否定目前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当前毕竟是一百多年来最安定、最有希望的黄金时期。正因为这样，我们新闻工作者更应该自觉地时时刻刻把维护社会稳定当作自己的生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像爱护自己的婴儿那样来爱护它，不使它因为自己的些微不慎而受到损伤。……那么，新闻工作者维护稳定的社会责任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主要体现在把握好舆论导向上。我自己总结了三条：一是要导之有责，二是要导之有方，三是要导之有术。

谈谈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2003年12月15日

现在整个媒体都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形势，在我的记者生涯中，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新闻工作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新闻工作者需要改变过去的一些什么，坚持过去的一些什么？《战国策》上有一句话，叫“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意思就是人家对我好的，有恩于我的，我是不能忘的；人家有负于我的，那是不可不忘的。我常常把这句话反过来说，事情是有不可不变者，有不可变者。什么是不可不变的？现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一体化的大形势，都对新闻工作提出了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可不变，要顺应这种时代的潮流。但是有没有不可变的呢？我觉得不可变的，主要就是社会责任。无论新闻情况有怎么样的变化，这种责任都不能变。……新闻工作者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应该负起责任。负责任主要就看是否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是起正面的作用还是负面的作用。

新华网访谈，2004年7月26日

党中央一再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统领新闻传播教学，这既是极端重要，又是难度很大的。一是没有比较权威的教材，二是缺乏比较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更重要的是思想阻力比较大。在当时学生的思想情况下，如果采用生硬、教条的方法，不但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而且会增加学生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因此我们除了要求在一些课程的教学环节中探索渗透融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之外，还在以往《名记者之路》课程的基础上，从2005学年开始，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一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这门课由我主持，学院主管教学的李彬教授负责组织教学。这门课不是照本宣科，在我结合自身五十多年新闻经历，讲了“总论”之后，我们邀请了许多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理论修养的大家、高手进行有计划的讲座，内容涉及总论、政治意识形态与舆论导向、党报模式与党性原则、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新闻自由与新闻真实、“三贴近”原则、市场经济与主流媒体、历史发展与时代意义等。同时，围绕这些主题，还设计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教育环节，包括编一本“经典文献”以及20余篇相关文章的参考资料，组织观看优秀电影，还邀请在《人民日报》、新华社工作的毕业生回来讲述自己的感受，同大家一起公开讨论和在网络学堂上展开丰富多样的讨论，每次都座无虚席，掌声不绝。

课程最后，我们要求每一个学生完成一篇课程感想。现在，课程已经结束，总体效果比较好，大多数学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思想启发和心灵触动，进一步明确了主流媒体的三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我自己也觉得收益很多。这次我们从中选出几篇有不同代表性的文卷，从中可以看出大家真实的思想变化状况。比如有一位同学，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态度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最大的收获是“有机会直面许多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用情绪而非理智作答的问题，当你能够沉静下来，思索起来，很多东西开始渐渐明朗”，其中对“舆论控制”的感悟相当深刻：“中国，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解决了衣食温饱之后，最怕的是什么？‘乱’。‘乱’是中国难承之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一旦放开舆论控制，这样的风险我们是否能够坦然面对？在思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涨程度的今天，放弃媒体的舆论堡垒，其代价我们是否可以负担得起？”“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或是一名普通记者，也许我们在为个人表达自由的受制而愤懑不平；但是作为决策者，只怕要站在制度的天平上掂量半天，稍有不慎，七上八下，所有天平上的老百姓都会跟着狠狠地摔到地上，这样的后果实在吓人。”我想这种真情实感的感悟，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追求的目的。

在第二届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4月23日

实践教学

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同志，在中央开会时几次讲到，现在新闻院校培养的学生到新华社以后都要重新“回炉”，否则无法适应工作。这个话他讲过好几次。新闻工作的源头在新闻院校，如果新闻院校这方面的思想基础没打好，等学生到新闻单位往往就会转不过弯来，甚至做不好工作。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想如何避免“回炉”，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如果我们在学校里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比较了解、能够认同，那么大家今后的发展就会一顺百顺了。其他很多专业课程都没有什么问题，唯独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

……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课堂与现实脱节，学与做两层皮。许多实际所需的东西学不到，而不需要的又学了很多，所以一到报社就得“回炉”。我当年曾经想过，如果有机会到新闻院校工作，一定设法探索一下如何减少回炉现象的问题。因为回炉容易夹生，我们应该把很多问题解决在出炉以前，应该缩小专业学习与新闻实践的距离。提出“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就是这一探索的开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学也是一个步骤。

理论与实际能够结合得更紧密一些。现在国内关于新闻传播方面的书很多，国外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书。这当中有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思想，不像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机会读书，这些都是现代社会的优势。但是学生到媒体去，学的这些知识往往用得上的不是很多，间接产生作用的可能有一些，但是应付我们每天的采访、写作的直接作用就比较少，特别是实务性的东西。……我觉得今后学校应该有这些实务性的内容，要多和媒体合作，进行融合。

人民网“传媒沙龙”访谈，2005年5月31日

新闻实践教学在传播系时代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这几年来已经有所创新，形成特色。李希光教授一直强调一种新闻教学的理念：真正有效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概念或理论，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对国情、民情有新的观察，使学生的认知、思想、行动有真正的转变。因此，他在教学中大力提倡深入社会底层，并且每年都要利用假期，带领学生到农村、到草原、到沙漠、到长征路上去采访，训练学生寻找故事的嗅觉、观察细节的眼睛、聆听语言和各种声音的耳朵、分析问题的大脑和写作的技巧。这是到基层去的实践，还有一种读书的实践。另一方面，李彬教授对学生提出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要求，并且开出一百本必读书的书目，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天下，把自己的理想与成才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两种理论途径不同，目的一致，都是引导学生怎样做一个真正的新闻人。受到温家宝总理写信表扬、写出《乡村八记》的那个大二学生李强，就是众多受到这种教育熏陶的学生中的一个代表，所以在回答记者访谈时，我总是说“李强是我们学生中突出的一个，而不是唯一的一个”。……

实践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有计划地、并且大批量地组织学生到主流媒体去实习。因为主流媒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体现者，只有到主流媒体去，才能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许多原来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抱有偏见成见的学生，在主流媒体实习一段时间以后判若两人……有的实习生还主动去为报社做发行调查，写出报告。通过这样的交流，拉近了学生和主流媒体的距离，使学生更加了解媒体，媒体更加了解学生。现在，到主流媒体去工作已经成为多数学生的愿望和选择。有一串数字很生动地说明了这种变化：2002年以前，主动要求到主流媒体去工作的不到20%，2002年上升到40%，2003年60%，2004-2005年达到70%以上。多数学生上岗后表现出了较强的适应性，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在第二届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4月23日

对于新闻传播专业来说，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为重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和养成中，学院通过6年的尝试和总结，深刻认识到只有引导学生深入社会，认识社会，了解国情，熟悉民情，才能够更好地学习和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为此，学院在教育教学中十分注重实践，为本科生安排了暑期社会实践和课程专业实践两个必修环节，并通过党团活动等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在寒假及双休日更多地主动参与实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年级的暑假，我们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到中国的农村参加社会实践。目的是希望他们到社会舞台去，到中国最基层的地方去，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国情，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验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这样的教育的带动下，不少同学以李强为榜样，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我院每年都组织社会实践分队下地方，前往老少边穷地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到2008年为止，我院在四川省黑水县、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山西得胜堡、河北省定县等十余个县市开展了50多次教学环节的实践和社会实践。通过实践，学生不但比较充分地了解了国情，而且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对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城市农民工、人口和计划生育、社会稳定等关系国家

发展大计的课题，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认识。在实践过程中，学生们选择党和人民关心的问题重点调研，包括《首都大学生“八荣八耻”荣辱观的接受和评价》、《建设和谐城市文化，实现农民工与市民文化生活“齐步走”——首都农民工的媒体接触情况》等多份调查报告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

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一点粗浅体会，2009年

新闻中的文化

“素质为本，实践为用”是办院开始就提出的，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并且已取得明显的成果。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素质”主要是指新闻、传播工作者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根据我的经验，新闻与传播工作者，拼这个，拼那个，最后拼的还是文化修养、文化积淀。缺乏文化修养、文化积淀，再刻苦努力也成不了大家、高手。这是一条被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经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从2005年开始设立“新闻中的文化”这门新生研讨课，比较受同学欢迎，不足的是受选课人数的限制，学生很少，影响不大，以后可以考虑改进，而且应该把这个指导思想渗透到各门学科中去。这是培养“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人才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全院教师会议上的讲话，2006年7月7日

希望大家重视文化的觉醒。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最近几个月里，各种报纸、刊物上出现了不少论述新闻传播与文化关系的文章，这是一种反思后的觉醒。前面讲到如果没有这次抗震救灾，我们的思想不会有这么大的解放。我们害怕这个害怕那个，这次的客观形势冲破了阻碍，客观效果证明了开放比封闭好，这比任何文章都有力得多。这是十几亿人民在给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做总结，这也推动了中央的认识。文化的觉醒是在经过一段反思以后的认识，是初步的觉醒。这是我们清理几十年来新闻宣传中“左”的影响，现在得到的一点成果。

如果说三年前，我们学院设置了“新闻与文化”课程的时候，人们对它还不太理解，甚至我们自己的理解也有些狭窄，不是十分重视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缺乏文化的新闻是没有力量的。胡锦涛同志讲到我们要增强舆论引导能力，反过来讲就是我们缺少这个能力。成天在那里说官话、套话、废话，表面上是正确的舆论在引导，如果根本起不到这个作用的话，那就是空话。所以现在要提高这个能力，就要学会说话，学会和人民群众来说话。

胡锦涛同志讲话的一个题眼，就是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进行深入研究。什么是舆论引导能力？就是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归根到底都是文化的力量，因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我们的文化不仅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文化，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我想这一点我们学院有优势，应该充分利用本院的师资在这方面的优势，扩大和世界新闻媒体界的交流。

学习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08年7月3日

有人问我，新闻工作者是什么“才”？我说是“通才”。也就是新闻界老前辈邓拓曾说的，我不是什么“专家”，或可以说是“杂家”。杂家也就是“通才”。……但现在许多高校培养的新闻工作者，营养过于单一，学到的知识往往只局限在新闻专业方面，很难做到“博古通今，学贯中西”。

谈外宣人才的综合素质与教育培养，2005年

新闻院校的学生应该知识面特别丰富，有很高的素质，全面的知识。以前有些新闻教学工作者偏重于新闻专业知识的传授，其他的综合性知识太少。我们有个想法，能不能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新闻人才，不能只靠吃“维生素丸”，维生素能维持生命，但是没有说靠吃维生素丸长成一个非常健壮、非常高大的人，他必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粗粮、细粮、肉食等各方面的营养。所以，这方面我们就提出要加强基础，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几个贯通：古今贯通，中西贯通，文理贯通。古今贯通，要求新闻工作者懂得历史，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未来的历史，没有历史的话，我们的报道会很单薄。学贯中西，随着国际化发展，应该培养有国际眼光的人才。文理贯通，不光懂文科，理科知识也要懂。新生入校以后，老师要给他们开读书单，一百本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什么都有，要求在大学期间读完。

人民网“传媒沙龙”访谈，2005年5月31日

当人们向我提问“为什么（做记者比较成功）”的时候，我也说不清所以然来，总是以“20年艰苦的基层生活没有白过”，“‘学费’没有白交”之类的话作答。这虽是我的由衷之言，但是人们并不满足。有一位记者说：“你说的只是一种‘共性’，我想知道的是你的‘个性’，也就是你的‘特殊规律’。”

这启发我从另一个角度去思索。我有什么“特殊规律”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年，直到最近为上海《解放日报》的“文化讲坛”讲演时，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忽然意识到“文化底蕴”对新闻工作者的作用。而这，恰恰曾是长期以来被别人、也包括自己认为的“沉重包袱”。其实，我并没有多深的“文化底蕴”，只是少年时代爱看书，读过一点古今中外的名著和杂书……现在看来，这些“垃圾”、“沉渣”虽然确实有属于糟粕的东西，但绝大多数对后来做新闻工作大有用处。它们像储存在大脑细胞中的某种信号，又像融化在血液中的某种基因，平时它们沉睡着，无所感觉，一旦与眼前的场景接火，立刻甦醒过来，迸发出意想不到的灵感。

新闻敏感与文化积累，2007年

《第九届“文化讲坛”实录》见报的当天，我正好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课。我就在课堂上用两节课的时间给大家读了《解放周末》这四个版的内容，引起了同学们极大的兴趣，互相争着看……几天后，助教给我开来了一张书目单，上面列了8篇中国古典名著篇目，说是同学们希望老师结合专业课程来讲一讲。我一看吃了一惊，这8篇是：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和“风骨”篇、陆机的《文赋》、王勃的《滕王阁序》、柳宗元的《封建论》、苏轼的《前后赤壁赋》、方苞的《狱中杂记》、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我问助教，同学们为什么对这些古文发生了兴趣？他说：看了“文化讲坛”的实录，大家都特别受触动，觉得相比之下自己的文化知识太贫乏了，文化积累太浅薄了。“老师，您以前不是也说过，学新闻的如果只是整天吃‘压缩饼干’，吃浓缩‘维生素丸’，不吃五谷杂粮，不吃蔬菜鱼肉，就肯定会得贫血症。如果只是就新闻讲新闻，就新闻学新闻的话，成就必然有限。”我听了很高兴，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2007年7月16日

新闻的业界和学界正在开始出现一种对文化的渴望和追求，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强烈。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想改变像刘长乐先生所概括的“我们的经济腾飞了，而文化却没有腾飞；荷包鼓了，而心灵却饥渴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依靠文化的回归、文化的复位和复兴。……媒体的改革和创新必须从文化上来突破。

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2007年7月16日

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间，有些人是浮躁的，但大部分还是很踏实的。很多人学习很努力，工作很勤奋，作风也很严谨，但是他们苦于长期写不出受读者欢迎、影响重大的优质作品。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归到文化上面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刚才说的这两种人，一种是急功近利的，一种并不急功近利，但这两种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文化修养的短缺。前者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后者反映在表达能力、工作能力上。最后归纳出一句话叫做，媒体的浮躁源于文化的缺失。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有点以偏概全，就姑妄言之吧。

文化的缺失是怎么造成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长期以来，在对新闻与文化关系的认识上存在误区。新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而且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新闻人本身就应该就是文化人，不论是被称为瞭望者，还是守望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是具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

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2007年7月16日

新闻工作者除了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以外，还要懂一点艺术。艺术归根到底是处理矛盾的手段。音乐也好，绘画也好，都要求处理好强与弱、深与浅、浓与淡、快与慢、高于低、刚与柔、轻与重等关系。现在我们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不大考虑新闻艺术处理的效果。通病就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懂得刚柔相济；只知道大开大合，不知道以小胜大；只知道浓墨重彩写英雄，不知道轻描淡写也可以写英雄；只知道浓眉大眼是美，不懂得眉清目秀也是一种美；只知道响鼓重锤，不懂得点到为止；只知道大雨倾盆，不知道润物无声。

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2007年7月16日

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曾经对我说，现在歌手的学养太差。拼长相，拼嗓子，最后拼来拼去要拼的是文化。一个歌手有没有文化，一张口就能听出来。文化是潜移默化融会在血液当中、灵性当中的，是装也装不出来的。

遗憾的是，新闻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关系最密切的部分，似乎还没有多少人来表达这样一种感悟。可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好在现在的情况正在变化，特别是我们年轻的一代正在逐步走出怪圈。只要经过正确的引导，走对路，走正路，他们一定会跨越时空造成的文化断层。我对此并不悲观。

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2007年7月16日

国际化办学

关于国际化问题，清华大学本身有条件在这方面做好。我们的老师和学生的英语都比较好，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应该在国际化的方面形成一点自己的特色。我们这几年加强了对外交流与合作，我们的很多学生都和国外一些学校进行过联系与合作，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的指导思想是，越多接触西方，越能够了解我们的国情。学生经过在外国的学习交流，回国以后再看我们的新闻理念，看法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有一个学生从日内瓦回来，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把她请去三个月，……回来以后滔滔不绝地向老师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她的感受就是，出国了之后，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了。

在第二届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06年4月23日

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参照世界一流新闻院系的做法，经学校校务委员会批准成立，为适应新闻传媒事业日益国际化、全球化发展需要，更好地借鉴世界一流新闻与传播院系的经验，不断缩小学院与国际顶尖同类学院办学水平的差距，使学院早日步入世界一

流新闻与传播学院行列。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宗旨和委员责任是：为学院跻身世界一流新闻与传播院系提供战略性指导，为学院国际化办学提供人力、智力和经济等全方位的支持，为学院师生国际化视野拓展提供帮助，为学院招生、学生实习和就业提供机会，为学院在国际上的宣传活动提供平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五年……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复合型、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上不断探索、不懈努力，短短几年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国际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国际办学水平不断提高。这一切离不开政府领导、国内外学界、业界的支持、关心和帮助，尤其得益于在座各位国际顾问委员的大力支持。

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成立仪式上的致辞 2007年10月28日

毕业寄语

我们的学院，不仅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所，而且是一个温暖和充满亲情的大家庭。我们都把你们视为自己可爱的孩子，今天，眼看你们像梁启超先生说的“乳虎啸谷，鹰隼试翼”，真有一种说不尽的高兴。前几天，我接到一封不具名的读者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院长先生：你把清华的学生看作是孩子，还能把新闻与传播学院办好吗？”我看了很惊讶，不知此话从何而来。想了半天，才想起我曾在《新民晚报》上写过一篇《和孩子们一起长大》，还有就是《人民日报》发表过记者李泓冰写的评论《从费孝通到大学生李强》，里面有一句话：“在清华，聪明孩子多如过江之鲫”。那位读者大概看到这两处用了“孩子”这个词而反感。我想，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不了解在清华大学，“孩子”是对学生的爱称；他也更不理解清华大学师生之间这种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感情。这种感情，正是我们学院的一种重要特色，也是我们学院在几年之内能够较快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希望同学们今后不论到哪里，都要把这种感情带到哪里；要把清华的这种团结、友爱、和谐的传统校风、院风带到哪里，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2005年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5年7月12日

千万不要产生“优越感”，不要沾沾自喜。我们虽然在清华园的环境里熏陶了好几年，也经历了多年寒窗苦读和一定的社会实践的锻炼，在当前社会迅速发展、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多看看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客观地说，我们的知识结构还是不够完备的，我们的知识积累还是不够丰富的，我们的实践经验也是比较肤浅的，我们对社会的了解更是不够深刻的。我们究竟是不是一颗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良种”，还要到社会实践中去经受检验和考验。

我们在学校的考试已经结束，社会的考试又将开始。在我们面前，将是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大书。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去迎接新的考试。能不能顺利通过这种考试的检验，最重要的是要看能不能和你的“土地”（环境、人们）结合起来并且结合得好。结合好的关键有三点：第一是要有“顽强性”，就是要不怕困难，不怕挫折，经得起风雨，经得起挫折，经得起委屈，在任何时候不能做脆弱的“易碎品”；第二是要有“适应性”，就是能够不择条件，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土壤、气候、温度，不能格格不入；第三是要有“包容性”，有承载一切的能力，就是我们学校校训说的“厚德载物”。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自强而不自大，自爱而不自赏，自律而不自外。这样，你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能为自己的成长、进步和发展营造一个和谐的环境，并且把清华的这种好的传统带到那里去……

在2006年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6年7月11日

浮躁的根源，在于文化的缺失。文化，是人类的灵魂。文化一旦被边缘化，一切道德、观念、信念、学问、操守就失去了依附。这是一种危害极大的社会病，人一旦被传染上这种病毒，无论为人、为事、为文，便成为无根无底的浮萍。所以，千万不要把“浮躁”当作一种戏言，一定要充分认识它的危害性。所以，我把“远离浮躁，追求文化”送给大家。希望你们走上社会以后，除了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外，再忙也千万不要忘了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继续加厚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文化积累，使自己永远做一个有远大理想，有高尚情操，有深厚内涵的人。

在2007年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7年7月13日

要不断地培养和充实自己的“底气”。什么是底气？底气就是一个人学、为事、为人的基本素养。你们虽然在大学毕业了，有了不少知识，但是底气需要不断充填。学业有阶段，底气无止境。我们的目标是成为“高手”，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只是走完了其中的一个阶段，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无论做什么都要有底气，底气不足就行而不远。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需要多方面的底气，但是最重要的底气是对国家、民情的了解，这是我们需要用毕生的努力去积累的。我们之所以肯定李强同学的乡村调查，原因也在这里。培养底气，不仅是今后工作的需要，也是走好人生道路的需要。在人生道路上，不仅有“春和景明，波澜不惊”的日子，也会有“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时刻；不仅有康庄大道，也会有崎岖曲折。不仅有大喜，也会有大悲。怎样走好这漫长的人生道路，同样要靠底气，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容应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挑战。

在2005年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5年7月12日

学习永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毕业”一词不很准确，中国的“毕业”一词不如西方“graduate”准确。“毕”就是终点、完点，不需要继续。而学习是无止境的，学海无涯。你们现在正处于人生中的黄金阶段……这个时段的头脑就好像一张宣纸，吸收能力最强。而40岁以后头脑就逐渐地退化，成为一张道林纸，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画出一个道道；到了我这个年龄，脑子已经成为一张滴水不透的蜡纸。虽然也可以有点进步，但是事倍功半。所以尽管你们在这个阶段要做的事情特别多，你们要学习、寻找工作、成家立业、恋爱结婚、买房赚钱等等，但是无论负担怎样繁重，都不要放弃继续学习。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日新月异的新知识不断地在向我们提出挑战，稍一放松，就会成为落伍者。我认识一位解剖学老教授，他深有感慨地告诉我，过去有一本经典的解剖学教材《The Great Anatomy》，他用它教了30多年，就靠那一本书。而现在这方面新的学术成就和实践如雨后春笋，自己原有的知识已经难以应付。自然科学日新月异，社会科学更是如此，特别是作为时代晴雨表的新闻传播事业。因此要在自己从事的领域站稳脚跟、跟上时代，不继续努力学习，很可能就会等闲白了少年头，追悔莫及。

我在2002年学院初创时来到这里，已经送走了好几届毕业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关注毕业生们在工作岗位上的情况，我看到绝大多数的同学都以出色的业绩和成就赢得了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并且很快成为了优秀的骨干。用人单位经常讲，清华毕业的同学就是不一般。然而，我也了解到有一些同学的工作情况比较一般，在学校的时候很勤奋，到了工作岗位，这种锐气一年一年逐渐地就减弱了。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重视到了工作岗位上的继续学习和继续提高，所以继续学习这个问题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今天之所以强调继续学习，就是希望大家在刚毕业的时候就给自己制定一个可行的继续学习的计划，并且持之以恒，不断进取，保持那么一股朝气，那么一股锐气，使我们的工作表现永远无愧于清华大学毕业生的光荣称号，在社会各个领域夺取一席之地。

在2010年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10年7月20日

新闻与传播教育

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

—— 范敬宜与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①

Quality and Practice Oriented, Educating Master-hand for

Mainstream Media:

Fan Jingyi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胡显章^②

中文摘要：本文总结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自2002年建院以来至2005年间，从世情、国情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以及取得的积极成效。其中特别阐释了范敬宜所提出的“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理念，反映了范敬宜在清华大学新闻教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新闻教学改革，范敬宜，清华大学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s up the journalism education reform carried out by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TSJC) from its foundation in 2002 to 2005. The series of reform are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world, the n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Fan Jingyi's ideal of "Quality and Practice Oriented, Educating Master-hand for Mainstream Media" and his efforts during the reform are highlighted in the article.

Key Words: Journalism education reform, Fan Jingyi, Tsinghua

^① 本文摘自《新闻战线》2005年第9期的《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一文，原文曾于2007年获清华大学高等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② 胡显章，教授，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常务副院长、清华大学文科领导小组成员，原文作于作者任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期间。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02年建院以来，从世情、国情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一、明确改革的针对性：

改革需要有明确的针对性。在建院之初调研的基础上，我们认识到，对于我国新闻与传播教育，这个针对性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新闻与传播的从业特点——带有较强的实务性与意识形态性，而过去新闻与传播教育对这一特点存在不同程度的不适应性。表现在某些脱离实际的经院式教育，使许多毕业生到了工作岗位后，需要下大力气再培养，一些业界人士称之为“回炉”；与之并存的现象是相当比例的学生由于不了解媒体的工作实际，由于没有确立正确的新闻观，而不愿意去主流媒体工作。据统计，在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之前，在1999年—2001年之间，我校传播系毕业的研究生只有大约20%到主流媒体和相关国家机关工作；二是，由于目标定位、课程体系、教学过程和教师素养的局限性，学生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传播全球化的要求。尽管1999年清华大学成立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时，就明确清华的新闻传播学科要在国际性的平台上培养人才，并确立自己的影响与地位。但是，在教师队伍建设与教学内容与过程上，还不能适应这一要求。三是，在教育理念上，长期以来习惯于教师为中心、书本为中心、课堂为中心的传承式教学模式，限制了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抑制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针对这样的问题，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之初，在范敬宜院长的主持下，明确了“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院理念。同时，通过加强教育思想研讨与实践教育，学院在促进单一的教师传承知识向师生共同研讨转变、单一的课堂讲授向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转变、单一的课内教学向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转变以及单一的固定教师队伍向专兼匹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师资队伍转变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且，在双语教学、英语授课、中外文化交流传播教学方面进行了积极尝试。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学院的教育教学呈现活跃的态势。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有所提高，精神面貌发生可喜变化，专业思想不断明确，专业素质训练比较扎实，国际化的视野比较开阔，国际交流能力也有较大提高。学生学习结束时，对学院的教学给予积极评价。由教务处组织的2003届、2004届毕业生教学问卷调查，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对教学的满意度名列全校第一。毕业生去主流媒体和相关国家机关工作热情高涨，其比例数逐年上升，2002年上升到40%，2003年为60%，2004年达到72%，多数学生上岗后表现了较强的适应性，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二、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改革的途径与方法

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育教学改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探索：

1、课堂教学努力贴近实际、贴近学生，以教育理念的转变推动教学改革

目前，清华大学本科教育所实行的是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我们在制定培养计划时，重视学生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必要的自然科学基础教育，也注意引导学生把握必要的新闻与传播史与论的知识与观念。还引导学生认真读书；同时，我们认识到，由于新闻与传播学科具有较强的实务性特点，作为育人主渠道的课堂教学做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体会，这个实际包括国情、民情、世情，包括我国新闻与传播的实际、全球传播的实际，还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有长期从事实践经历的范敬宜院长为大家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他承担了多门本科生、研究生的课程，利用课堂这个主渠道，向学生传授基本的新闻传播知识、技能，还讲解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新闻观，通过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专业积累，同学生一起探讨中国新闻人的经验与教训、光荣与梦想，使他们对国情民情以及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认识。SARS期间，他在《评论与专栏写作》课上组织学生围绕“奉献”展开讨论，并写出评论，有关内容被《人民日报》专栏刊载；穆青同志逝世消息传来后，又在课上讲解穆青平凡而不凡的一生，在学生中引起思想的激荡。后来，学生们的主题团日活动，即以“人民的好记者穆青”为题展开讨论，体现了思想性与专业性的有机结合，所整理的书面材料得到刘云山、陈至立同志的好评。由于他的课堂给学生展现的是包括国情、世情、自身丰富阅历和同学们的激情与困惑的全景式的画面，贴近社会生活，贴近学生实际，试着讲平易近人的新鲜话，与学生一起讨论，按照他自己的话是“放下架子，先当学生，陪着他们一起成长”。这样的教学很受学生欢迎，他的《评论与专栏写作》课程，在学校教务处组织的本科教学评估中，曾获得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最高分。

在这样的氛围下，一批走上教学岗位不久的青年教师在贴近学生、贴近实际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詹正茂副教授在讲授《媒介经营与管理》课前，调研了工作岗位所需的基本知识与能力，针对实践工作，设计教学内容；利用实践形式，开展教学活动；试探一种“学生当运动员，老师当教练”的教学模式。在刚开始时，学生感到负担过重而有意见，而在快毕业时，认为收效颇多，将他开设的这门课列为最有收获的课程之一。又如金兼斌副教授，在通过研究方法训练提高研究生的学术素养也取得较好的效果，《传播学研究方法》课程由于他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深入浅出的社会科学方法训练，使学生受益匪浅，在研究生课程教学评估中获得全院最高分。

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哲学的哲学观，教育理念的继承与创新，必定会带来教育教学过程的重大变革。李希光教授运用苏格拉底“老师是知识的助产婆”理念，同时吸纳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对传统的课堂教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从“教师”到“教练”；从“学而知之”到“惑而知之”；变“单调乏味的课堂”为“充满激情的战场”；积极尝试了对话式练习、作坊式教学、大篷车课堂、情景模拟教学、案例教学、新闻现场教学、双语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特别是在“新闻采访写作”课中，引进了“学在路上”这个教学理念，他邀请记者一起带领学生下煤矿、登太行、穿罗布泊、走长征路、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贫困地区等进行“大篷车”式的采访实践。这些环节使学生的思想素质和实践能力明显提高，有学生反映这种特殊的教学方式不仅帮助自己掌握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基本知识；引导自己注重对事物的观察与思考，培养了洞察力；而且激发了学习的激情与实践的激情；培养了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有的毕业生说，正是李老师

的别具风格的课程改变了自己对新闻事业的态度,影响了对人生态度。李希光的《新闻采访写作》2004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

2、着力架设课堂与媒体的桥梁

对于新闻与传播学科来说,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是架设好大学课堂与媒体现场的桥梁。学院一方面注意聘请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理论造诣的师资,包括聘请担任过《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的范敬宜出任院长,还允许部分教师在媒体适当兼职;同时,采取“请进来”的办法,通过组织“名记者研究”课和“传媒业界前沿讲座”,邀请业界高手前来讲学。形成一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使得学院的教学具有新鲜的活力;另一方面,在媒体单位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学院在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新华网、中国教育电视台等建立了“教学科研实习基地”,并与一批主流媒体保持紧密合作关系,着力精心安排好本科生四年级第一学期在媒体的专业实习。这一实习大多数学生都安排到主流媒体进行,无论是教师学生,或是媒体有关负责人,都十分重视这一环节。通过这种“准新闻人”的实践,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新闻业务水平,而且,通过亲身感受主流媒体的地位、作用、改革的历程和取得的进步以及广大记者编辑付出的艰辛,进一步改变了原有对主流媒体的偏见,增强了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精心安排的一个学期的实习,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专业训练与全面素质提高相结合、服务媒体献身社会与择业就业相结合,大大拉近了学生与媒体的距离,加速了学生个体社会化的过程,提高了就业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3、引导深入社会实际,长知识、知国情、增才干、做贡献

了解社会,了解国情,是新闻与传播工作者的基本素养,更是我们所希望培养的高手的基本素养。学院十分重视引导、鼓励和支持学生以多种途径与方式进行社会实践,在感情上关心社会底层生活实际,在方法上学习与提高把握和反映社会实际的能力。

学院将社会实践进行了规范化管理,以努力科学有效地将第二课堂的实践教育纳入教学体系之中。在大一小学期,安排了两周的认识社会的实践活动,帮助学生认识基层社会,了解国情;大二小学期,安排一个月的媒体实习,以帮助学生亲身体验和了解媒体的基本运作,对今后从事的事业获得感性认识;大三小学期,安排写学年论文,采取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式,深入研究本专业的一个学术问题;在大四上学期,安排16周的媒体实习,以准专业人员的身份参与媒体运作。在这一阶段,大多数学生表现了很高的热情与主动性,有的还突破了所在单位的发稿记录,包括发表高质量的头版文章。真正达到了深入社会实际,长知识、知国情、增才干、做贡献的目的。

4、立足中国国情、应对全球化挑战,积极开拓国际视野,努力提高国际交流能力

在传播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能力,已成为高层次新闻与传播人才的基本素养,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为提高学生这一素养,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包括:

1) 着力开设英语和双语课程。目前,学院已经开设16门;为了有步骤地开阔国际视野、提高中外文化交流能力,学院专门聘请了原外语系副系主任范红教授来主持阶梯式英语课程,努力使本科教育英语训练实践不断线,并能逐步提高。同时,聘请外籍教师开设专业课;

2) 积极编辑出版和选择使用英文原版教材;

3) 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外事活动,与国家首脑、国际新闻人、外国学者等进行面对

面交流。现在已成为清华大学与国外领导人、社会名流对话的重要参与者，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4) 鼓励学生参加为有关部门提供国际舆情的收集分析、筹备并参加国际会议以及参与教师的研究课题等工作，使他们在“让世界了解中国，促中国走向世界”的活动中，提升国家意识，开阔国际视野，增强国际交流能力。

在推进国际化教学过程中，我们注意坚持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统一，以做到既开拓国际视野，增强国际交流能力，又能坚守国家立场和民族意识。

三、 一点体会：要关注学校文化氛围的建设和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的提升

6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温家宝总理就新闻与传播学院学生李强的农村调查报告给范敬宜院长的信函，这件事不仅对清华、对学院的师生是很大的鼓舞，而且，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件事，促使我们对过去的教育实践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为什么会有李强的《乡村八记》，这是孤立的吗？是偶然的吗？我们认为不是。正如李强本人所说：这是因为“在清华有一种关注国情的传统，无论课上还是课下，甚至BBS上，教室的宣传栏上，随处都可以见到有关中国国情的探讨”，“这使我深刻地体会到清华的氛围对于塑造一个学生有多么大的作用。同时，学校积极倡导的社会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使我们受益匪浅。”李强这里说的清华的氛围或传统，就是学校的文化，而文化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所以，引导师生关注国情，深入实践，首先不是一个方法或形式问题，而是一种责任，一种精神文化建设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蕴育温总理指出的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的责任心。有了这种责任心，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作文章”。

同时，李强的事例还告诉我们，光有关心国情民情和贴近社会实际的愿望还是不够的。学生的这种主动意识，还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加强理性的启迪和必要的方法论的指导。就以李强为例，除了学校学院氛围的影响，有两门课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门是李彬教授的《中国新闻传播史》课。李彬教授在课堂上，除了传授专业知识，总是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天下，引导学生将自己的理想与成材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同时，还十分注意引导学生学习老报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把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斯诺的《西行漫记》等与专业相关的著作列为必读书，而且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曹锦清教授的《黄河边的中国》等也列入其中，要求学生写出读书笔记，并在课上讲评和讨论。这对学生起了重要的导引作用。正如李强在座谈会上所说：“我很庆幸自己学习生活在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样环境中，这里，有很多老师指导我们静下心来读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实在是难能可贵，我这次实践之所以成行，很大层面上是由于读过了《黄河边的中国》和《乡土中国》这两本书，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两本书，我的寒假实践无从谈起，因为即使我去了，我无法进行科学有效的调查，从而真正

受到教育。因此，现在静下心来读一些书，非常重要。”

对同学们包括李强影响较大的另一门课是李希光的《走在路上的叙事艺术》，李希光的新闻学教学遵循的是这样一种教学理念：真正有效的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概念或理论，真正的学习更意味着让学生能够对国情、民情有新的观察，在学习过程中使学生的认知、思想、行动上真正的转变。这需要学生的心、脑、体同时参与。为此，教师要通过教学实践，关注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思想、感情、行为各方面的全面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他在新闻学教学中大力提倡深入社会底层的真实情景的体验，把课堂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训练学生寻找故事的嗅觉、观察细节的眼睛、聆听语言和各种声音的耳朵、分析问题的大脑和写作的技巧。这种找故事的艺术，给予李强和同学们以新闻人深入的实际的激情与方法的启迪。

正是基于以上的启发，最近在学习落实温总理信件精神时，学院强调：为了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一手抓认真读书，一手抓深入实践。以使得我们的实践不是盲目的实践，使得我们学习的理论是能够用来指导实践，并受实践检验的理论。

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目的、功能、过程的哲学思考和理性认识，对教育教学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影响；而教育思想则涉及教师为何而教、怎样教，学生为何而学、怎样学，以及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我们不应就事论事地进行改革，而应努力以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的转变和提升，来指导、推动改革实践。

目前，我们国家制定了向创造性国家转型的战略，一个值得每个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问题是教育理念的现代转型的问题。过去，我们在向发达国家学习时，多在于物质层面，或制度层面，而在教育理念层面却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与思考。正如全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所说：“中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又历经磨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教育获得巨大成就，但目前与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比，在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方面仍然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关于大学发展中的一些基本理念问题迄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楚。”^①所以，认真分析发达国家的大学理念，吸取其先进的带有共性的内容，同时，认真继承我国传统教育理念中的合理内核，实现我国大学教育理念的现代转化，是我国在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方面实现赶超，完成向创造性国家转型，从而加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确立，应该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走古今中西融会之路，在综合中实现创新。如借鉴亚里士多德与纽曼的自由教育理念，营造学生自由地参与学习研究的氛围；借鉴苏格拉底“老师是知识的助产婆”理念，转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借鉴近十年在西方加速发展的“合作教育”理念，加速从传承式教育向研究式教育转变；同时，继承中华传统教育思想中关于“教学相长”、“和而不同”的理念、“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并进”的理念，以及努力引导学生“从知之、好之到乐之”的理念等等，从而实现教育理念的综合创新。这对我们实现教育的现代转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应当有所作为。

当前，高等教育开始重视实践教育是一个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实践教育教学从认识论哲学内涵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强调理论对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同时，从教育学角度看，实践教育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密切相关，实

^① 顾明远，施晓光《美国大学思想论纲》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践教育教学的推进，将有利于教育理念的转变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6月30日，学校党委书记陈希同志与毕业班新闻1同学座谈，同学们的发言，给以我们最大的鼓舞就是他们的精神面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著名教育学家叶澜教授说：21世纪，在教育思想上最终需要实现的核心转变是在对学生精神生命主动性发展的认识上。21世纪新型教育要自觉地追求把精神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要培养具有主动发展的需求、意识和能力的新人。为此，必须改变师生在校的生存方式。从注重面向过去、面向人类的已知领域转变为注重面向未来、面向需要发现和创造、探索的领域。这就要求教师转变自己的教育观念以至教育角色，把自己的职业本质定位为创造人的精神生命。^①当然，长期形成的教育思想观念的深入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正如未来学家埃德加·富尔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提到：“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这种个人同他自己关系的根本转变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②我们一定要高瞻远瞩地来认识这一课题，同时，又脚踏实地地实践这一课题。我们前一阶段的探索，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无论从新闻与传播学院来看，还是从清华大学来看，认识与实践都不平衡。我们的教师和干部应当关注教育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关注教育理念与教育思想的发展与提升。一流大学的建设，应当有一流的教育理论的引导，一流大学应当肩负起学习、总结、创新和传播先进的教育理论的任务。

^① 叶澜：“把个体精神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生”，《面向 21 世纪 我的教育观》综合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334—336 页。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学会生存》，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年，200 页。

新闻与传播教育

居高自望远 放眼量风物

——范敬宜新闻思想述论

Looking Far when Positioning High, Taking a Broad View of
Scenery: A Review of Fan Jingyi's Thoughts on Journalism

郭庆光^① 来向武^②

中文摘要: 本文认为范敬宜已然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个符号,从他身上透视出很多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和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和前瞻新闻事业的未来。因此本文探讨了范敬宜新闻思想形成的文化图景,总结了新闻思想的六个要点,并将其精髓概括为八个字:责任为先、文化为体。本文随后阐释了范敬宜在新闻教育思想上的创新,最后对其新闻思想进行了评述。

关键词: 新闻思想, 新闻教学, 范敬宜

Abstract: The authors believe that Fan Jingyi as a symbol of Chinese press, reflects the histo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Chinese journalism, which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construct the future of Chinese journalism.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cultural context for the formation of Fan's thoughts on journalism, concludes the six major points of his thoughts, and summerizes it as "responsibility priority and culture carrier". Then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innovation of Fan's thoughts on journalism educa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reviews Fan's overall thoughts on journalism.

Key Words: thoughts on journalism, journalism education, Fan Jingyi

^① 郭庆光, 教授,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② 来向武,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博士,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思想史研究的开拓者柯林武德有一句著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①无论对该观点有何争论理解，思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任何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新闻思想的指导。^②当我们拨开历史的枝枝蔓蔓，寻找那些对后来者产生重要影响的东西时，总是要进入前人思索的问题和由此形成的观念。^③范敬宜已然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个符号，从他身上我们可以透视出很多中国新闻事业的历史和时代特征，他曾经思索的问题和思索所得的思想观点，不但对理解我国新闻事业的历史，而且对我们前瞻和建构新闻事业的未来，也有着深远的意蕴。

一、范敬宜新闻思想形成的文化图景

在历史主义看来，所有文化都孕育、发展于特定的、独一无二的自然、社会和历史条件之下，它们所具有的价值就在于其不可与其他文化通约的独特性。^④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作为文化内涵一部分的思想，不仅可以看清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也可以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这种思想文化的独特性之所在。纵观范敬宜的人生经历，其新闻思想的产生，从总体上来说，是他先后所掌握的各种理论，与其自身特质和曲折经历相结合，共同作用，逐步形成的。这些文化渊源，包括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家学和西方文化。

在我国现当代的文化领域，无锡国专可谓群星璀璨，钱穆、吴其昌、钱伟长、周振甫、王力等等，形成了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颗颗耀眼的明珠。范敬宜身处其中，可谓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接受了最顶尖水平的系统国学教育。当年的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研究院被认为是一南一北，国内两个最重要的国学教育基地。进入新世纪，范敬宜先生出任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首任院长，也称得上接续文脉、两水合流的一段佳话。在这样的国学背景基础上，范敬宜所开掘出的新闻思想理论就更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延续。在范敬宜的文章思想中，随处可见传统国学文史哲的印迹濡染。此外，书、画两艺，也成为先生精绝的才学，并由此相通到很多地方。正如他在很多场合下所说的“物艺相通”，这是一种化到血脉骨子里的修养和境界。梁衡先生认为，人民日报十多位总编，自邓拓之后，其才学堪与其比者唯范敬宜一人，并慨叹道“看其随手举诗、词、书、画、古籍、掌故，总想起瞿秋白的一句话：以后这样的文人是没有了。”^⑤

更为特别的是，这种受教经历，是与其特殊的家学紧密相连的。范敬宜自己曾说，“对我一生影响最深的，一是家庭环境特别是母亲的熏陶，一是二十年“右派”生涯的磨练”^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蔡佩秋女士晚年，范敬宜还与母亲互相吟咏唱和，几十年前的诗文都还可以大段诵出，从中我们亦可看到蔡女士清丽、古朴、隽美的文辞。在范敬宜先生的文章

^①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李秀云：《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1页。

^③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第1页。

^④ 彭刚：《思想史研究》（第一卷），丁耘、陈新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125页。

^⑤ 梁衡：《饱学与忧心——读范敬宜》，人民网，见
<http://su.people.com.cn/GB/channel1237/275/200804/03/12051.html>

^⑥ 范敬宜：《敬宜笔记续编》，文汇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016页。

中，还多次追记起曾任中学校长、桃李天下的外祖父蔡晋镛，外祖父的诗文、人品、才学在他的成长经历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传统的诗书道德家学，成为他文人本色的精神皈依之所。使得他能在二十多年的曲折经历中有所守、有所为，在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中，有所思、有所得，出文人之本分，成一家之绝唱。

不仅于此，范敬宜在这些传统国学的学养基础上，又融汇西学，集为一家。正如季羨林先生曾经说过的，别人是诗、书、画三绝，而范敬宜又通西学，所以可称为“四绝”。^①范敬宜的西学基础，来自于旧上海的文化氛围，来自于圣约翰大学的学习。80年代中期，先生又在国家外文出版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身处各种领导职位，先生又频频参加众多外事、出访活动。这些人生的片段连缀起来，就显示出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使得他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理解、思考各种问题。如他在工作中，多次注意到中西方在交流中需要注意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对接。

在先生大学毕业前夕，即1952年，国家开始实行大学生的统一分配，并在大学生毕业前夕举办培训班，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可以说，先生从那时候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自此之后，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丰富自己，使之成为他整个思想文化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早在1948年，刘少奇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首要的即是马列主义的修养。^②并且明确，要通过学习来达到这些条件。在解放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各级各类干部重要的学习内容。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大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之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导。范敬宜大学毕业即进入报社，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工作者”，并不断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种理论的指导作用在范敬宜先生后来走上新闻工作的领导岗位时表现得更加明显。无论是在《辽宁日报》，还是在《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无论是对工作的指导，还是他自己的文章，都可以看到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运用。如果说，国学、家学、西学给范敬宜提供了更多的知识基础和人格境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为他提供了更为成熟的政治信念和思想方法，并成为他理解社会、理解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

二、范敬宜新闻思想要点

在以上这四方面理论渊源的基础之上，范敬宜在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其新闻思想，大致在1997年前后，这些思想基本臻于成熟。

歌德说过，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力图重新思考而已。^③范敬宜的这些新闻思想，涉及到新闻理论的众多方面，虽然前人或已有过思考，但范敬宜的新闻思想，具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和结晶。从范敬宜的新闻活动实践和论述来观察，其主要的思想观点可总结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创新思想。在范敬宜的新闻实践和理论思考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创新思想。这不仅表现在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新闻业务的各个环节，也表现在这些环节的众多方面，如

^① 季羨林：《读〈敬宜笔记〉有感》，《敬宜笔记续编》，文汇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002页。

^② 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第380页。

^③ 转引自彭刚：《思想史研究》（第一卷），丁耘、陈新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125页。

采访方式、新闻的表现形式、报道领域等。概要而言，下面这些方面可以作为他创新思想的代表：以“十三大手记”为代表的会议新闻报道的创新；经济新闻要写活；经济报道要“人性化”；提出“在不违反宣传纪律的条件下，只要找到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内容，恰当的角度，恰当的语言，没有不可报道的东西”^①；“无中生有”写新闻；对写编者按进行创新；提出“评论三要素：思想、激情、文采。”等。

二、文化观点。季羨林先生曾评价范敬宜的文章“灵气内溢”^②。范敬宜自己常常提到的一句话是“物艺相通”，强调艺术对人的熏陶和启迪作用。他深得其中之妙，并在日常的新闻工作当中，把文化的功用贯彻到众多方面。如他提倡经济新闻要写经济中的文化；强调要注意“经济中的文化，文化中的经济”，多从文化的角度思考经济问题。他提出，记者要于“无”处发现新闻，就必须了解历史，否则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③了解历史，正是一种具体的贯彻文化因素的实际工作。他有专文论述“追求新闻中的文化味儿”；他明确提出“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新闻报道要有‘意蕴’”。在他自己的文章中，诗词文赋随手拈来，东西文化兼容并蓄，有强烈的文化感染力。这种从文化角度思考理解新闻的思想观点，是范敬宜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大局观点。范敬宜在人民日报工作期间，对于大局观有多次论述。这在其他的新闻理论当中鲜有论及。比如，他要求记者要有全局观念，要思考那些带有全局性质的大问题，要“时时不忘考虑大局”。不仅记者，编辑也要有大局意识。他认为，“对全局了然于胸，就能在采访中不断地发现新情况、新题目”，提高把握全局的能力，时时不忘考虑大局。“胸中没有大局就做不出大文章”。^④他自己第一篇“引起轰动”的稿件《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就是一篇胸怀大局，出手不凡的佳作。

四、精品追求。从要求人民日报社全社要树立“精品意识”，到提出1996年是人民日报的“精品年”，一直到从标题、文章、编辑工作、工作作风等更方面入手创造精品，形成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范敬宜的这种追求精品的思想，和他一贯追求境界、深度、高度的观点主张相一致，成为其整个新闻思想中重要的一部分。

五、群众路线。范敬宜身上所体现出的群众路线，不仅是一种采访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思想方式，在他的新闻实践和理论总结中，对群众路线给予了很高的重视。从他1979年重新开始新闻工作之初，就认识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在以后不断强化这种思想。如他自己所说，“‘三辩’的写作过程，使我转变了对新闻评论写作的观念。群众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鲜活的思想。”^⑤这种思想，一直体现在范敬宜的新闻工作中，并成为他指导新闻工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许是出于某种隐喻的考虑，范敬宜在其2009版的文集前面只选择使用了两张照片，其中一张即是他与最基层的农民在一起的合影。

六、世界视野。范敬宜在人民日报时曾提出要“增加本报的国际意识”^⑥，突出人民日报是“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大报”的地位。他的很多文章、思考，都具备很广阔的视野，常对东西文化做出对比，注意到其中观念、国情、传统、礼仪等等的差别，并将这种差别和日

^① 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099页。

^② 季羨林：《读〈敬宜笔记〉有感》，《敬宜笔记续编》，文汇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004页。

^③ 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239页。

^④ 范敬宜：《总编辑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分别见第6、13、11、41、27页。

^⑤ 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011页。

^⑥ 范敬宜：《总编辑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

常的实际工作相结合。重要的是，范敬宜的这种思考方式和思考角度，使其整个的新闻思想具有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适用背景，而不仅仅是提高了对外交流和对外传播的水平。

三、范敬宜新闻思想的精髓

在以上这些思想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更进一步的总结，即范敬宜新闻思想的精髓在哪里？这种思考的结果是，我们可以将其精髓概括为八个字：责任为先、文化为体。

范敬宜对于新闻责任的论述，是一个越来越深入的过程，越是在晚近的作品中，他越是对责任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阐述。他说：“对记者素质的要求尽管可以列出许许多多，最重要的还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感。有了这种责任感，才能时刻不忘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自觉自愿地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才能精益求精去提高业务水平。”^①他还说：新闻敏感+责任心，才能构成一个优秀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回顾自己的过去，他说：“过去对记者的荣誉想得太多，对记者的责任想得太少。将来如果还有重返新闻工作岗位的一天，一定要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去当这个名副其实的人民的好记者。”^②

范敬宜对于新闻责任的理解，在他的新闻思想中，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对于新闻工作及工作者的责任，有很多人进行过论述，但是，像范敬宜这样把责任上升到如此重要位置的观点，应该是他整个新闻思想的一个基石。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要给新闻系的学生讲新闻工作者的责任，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责任的重要性。

有人评价范敬宜说，“他是真正在用心地做一件事，仔细听，认真记，他是以全身心投入地做一个有心人，还在于他博古通今，文化渊博，经历丰富，往往居高识全局，于细微处见大义，于平常处听惊雷。”^③这段话可以说是将他的两个方面的精髓结合在了一起。正是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之下，结合自己渊博的文化涵养，才取得了范敬宜在新闻工作中一些列的成就。

范敬宜做过一个总结，“从近百年的新闻史来看，凡是杰出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这种体悟是和他的日常修为连接在一切的。他强调“艺术是沟通人民心灵的桥梁。”文化修养会带来对事物和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正如范敬宜所反复强调的“居高识全局，放眼量风物”^④他强调记者要关注“带有全局性的、活蹦乱跳的思想认识问题。”他认为，文化的缺失是当前媒体浮躁之风的重要根源之一。^⑤再比如，范敬宜曾在工作中批示：“先秦没有‘得意忘形’之说”。赵元任先生曾有言“言有易，言无难”，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如何能说出这样的断语。

有学者将“思想”的根本特性分为四个方面，首先就是及道，即不管它思考什么，它首先应该有一种内在的境界。^⑥对范敬宜而言，一方面是责任，一方面是文化，构成了他全部新闻思想的精髓之所在。这两方面，都明显地影响到其内在的境界，也成为我们理解范敬宜

^① 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324页。

^② 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324页。

^③ 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260页。

^④ 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209页。

^⑤ 范敬宜：《敬宜笔记续编》，文汇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189页。

^⑥ 张汝伦主编：《大学思想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3页。

新闻思想的钥匙。范敬宜的这种特点，实际上也形成他将政治家办报和文人办报结合起来的实践特点，成为我国现代新闻实践领域中独特的一个现象。

四、范敬宜新闻教育思想的创新

在成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后，范敬宜在新闻教育领域中也产生了很多思想成果。总结范敬宜的新闻教育思想，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他为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所确定的“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指导思想。二是确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思想。

范敬宜的新闻教育思想是其整个新闻思想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具有相当的创造性，实际是对其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的总结提升，是在更开阔的视野下、更深入的思考下对新闻人才培养的总结。

关于“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思想，范敬宜曾有多次阐述，并将其拓展开、具体化，贯彻到了很多方面。2002年4月21日，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大会上，范敬宜曾致词说，要秉持的办学指导原则是“立足主流，融贯中西”，教育思想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要使培养的学生“既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又具有广博的文化基础和娴熟的专业技能；既具有开放的世界眼光和通达的人类情怀，又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清晰的批判意识；既具有高尚的精神情操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又具有百折不挠的拼搏意志和承担重任的精力和体力。”^①

他还主持给研究生上《媒介与社会研究》这门课程，给学生讲授媒体人员的社会责任。他结合新闻实践，讲述“我们培养的高手，主要是为主流媒体服务的”，“这高手，主要应该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方面的高手，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高手，掌握新闻报道艺术的高手，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高手”^②

在教育实践中，范敬宜把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他曾明确说道“读书，可以开阔记者的视野，活跃记者的思维，于无新闻处发现新闻。”^③同样是强调这种基本素质，他还说“缺少学养，即使有很好的采访题目、采访对象，也未必能引爆出灵感的火花来。”^④

2006年底，清华大学成立了以范敬宜为主任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他身体力行，组织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培养他们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的课程的精要之处还在于，他不是寻章摘句地考究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新闻的论述，而是结合新闻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化在了日常的具体新闻活动当中。他曾对学生说：“从一开始学新闻、做新闻时，就要开始研究大局，审时度势，要懂得政治，了解政治。要知道我们的国际环境、外交政策和对策。”^⑤

^① 李彬、王君超主编：《媒介25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2页。

^② 范敬宜：《媒体人员的社会责任》，载《媒介25讲》，第97页。

^③ 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242页。

^④ 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250页。

^⑤ 范敬宜：《中国国情与新闻传播》，载《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第5页。

值得注意的是，范敬宜还在很多方面对新闻教育有所贡献，提出了很多重要观点，比如，他曾说“古往今来，凡是‘大家’几乎都是由博入精的。”这在一个侧面为我们指出了一种成才的路径。再如，关于“于无新闻处发现新闻”，曾经有很多种论述，梁衡先生曾有《没有新闻的角落》一书。而如何在没有新闻的地方发现新闻，有人从新闻敏感角度，有人从新闻采访作风角度等等进行论述，范敬宜却将其方法归为“读书”。

五、对范敬宜新闻思想的评述

丁柏铨在对我国的新闻理论体系进行回顾分析后，曾得出结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基本精神光彩依旧，仍然是我们须臾不可偏离的准则；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体系不断地增添着新的时代内容。”^①“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汇集了众多思想江河而形成的真理的海洋。”^②

创新的思想总是建立在对过去思想的回顾坚持上。自李大钊开始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新闻现象，到上世纪40年代，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进入全面形成与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些新闻思想的基础上，我们来考察范敬宜的新闻思想，可以做出如下的总体评述：范敬宜的新闻思想是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丰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理论的探索，对新的时代环境下新闻人才观的历史总结。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以下各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前面说过，梁衡曾将范敬宜与邓拓相比。对邓拓，曾有这样的评价：“邓拓一生笔耕不辍，坚决不做‘新闻官’，亲自撰写了很多社论、通讯和诗词，数量达数百万之多，是我国新闻战线上的多面手。更重要的是，作为我国新闻工作的领导者他历来重视钻研和掌握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自觉运用无产阶级新闻理论来指导新闻工作，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自觉实践者。”^③范敬宜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实践方面，也堪比邓拓。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5日，国家新闻总署主持召开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改进报纸工作、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成为该次会议的首要议题，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被认为是改进报纸工作的三个主要方面。^④此后，经历多年政治运动，这些正确思想的贯彻受到影响。而范敬宜却根据自身的经验、思考，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明确地提出要走群众路线，要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在我国新闻史上，刘少奇提出，“记者应当当人民的代言人”。江泽民在1996年9月26日视察人民日报时提出了新闻工作者要打好“五个根底”，其中之一就是“群众观点根底”^⑤范长江也多次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点。他说：“记者应该活动在群众中，他是人民群众中间的一个活动家，了解广大群众的动态，思想感情，熟悉群众的生活和问题……”^⑥穆青强调要扎根于人民，穆青在《记者应当

^① 丁柏铨主编：《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4页。

^② 丁柏铨、丁和根、董秦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新华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272页。

^③ 郭小霞：《邓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自觉实践者》，载《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98页。

^④ 刘海贵：《中国现当代新闻业务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第69页。

^⑤ 转引自丁柏铨主编：《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32页，原文载《新闻战线》1996年第11期。

^⑥ 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085页。

建立调查研究的“生活基地”》一文中谈到，“前不久，一家地区报的一位记者问我：‘记者怎样才能成才？’我告诉他，记者不能整天想着成才。成才没有捷径，也没有秘诀。我为他题写了‘勿忘人民’四个大字，勉励他把根扎在人民群众之中”。^①范敬宜的群众路线，这正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的丰富。

再比如，有学者在研究江泽民关于新闻出版工作重要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七个重大命题，即：新闻观、政治论、党性论、导向论、大局论、服务论、根底论。^②而范敬宜的新闻思想中的大局意识，正是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延伸和在实际应用中的具体思考。

现代中国，职业新闻人从事新闻学研究与新闻教育是成为一种普遍现象，^③当代以来，亦有诸多身跨新闻实践工作和新闻教育的人，如安岗、罗列等。在我国新闻史上，同时具有新闻实践思想成果和新闻教育思想成果的人，范敬宜是一个代表，一座丰碑。

^① 穆青：《穆青论新闻》，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16页。

^② 李凌沙：《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四个基本观点》，《求索》2004年第6期，第59页，转引自丁柏铨《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综述》，载《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第89页。

^③ 李秀云：《中国现代新闻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一版，第16页。

新闻与传播教育

范敬宜与清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述略

Fan Jingyi and Education of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at Tsinghua

李彬^①

中文摘要：范敬宜在任期间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主导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向，创办“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并出任中心主任。本文简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历程，其重要意义、采取形式、成果、社会影响和给学生的启发。本文还着重阐述了在范敬宜的引导下，清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大”、“深”、“实”的特色。

关键词：新闻教学，范敬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Abstract: During his term of office in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TSJC), Fan Jingyi establishes the education philosophy and orientation of TSJC as led by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He establishes "Marxist Journalism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Reform Research Cente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takes the post of center director. This article gives a sketch of how the course of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is built and developed, and it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 forms, outcomes, social impact and inspiration for students. The article explains in detail the three features of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led by Fan, which are "have the whole world in view", "close to reality" and "to be realistic".

Key Words: journalism education, Fan Jingyi, Tsinghua, the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① 李彬，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2002年春末，范敬宜从清华王大中校长手里接过新闻与传播学院（简称新闻学院）首任院长的聘书。至2010年初冬辞世，他在院长任上为清华的新闻教育、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奉献了余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间，尤为突出的是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主导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向，包括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教学和创办“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和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并出任中心主任。本文即简要谈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教学以及有关情况。

“生命工程”

2005年秋季学期，为了落实党和国家的“生命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由范敬宜院长提议和推动，清华在全国新闻院系率先开设了面向全体新生的必修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由他与我担任主讲教师（现为周庆安副教授与我负责）。课程的立意既在于旗帜鲜明地推进“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方针，又在于立足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的鲜活灵魂、科学精神和时代要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索现实问题，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教学同广阔的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情景中，培育和造就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服务人民的新闻传播“高手”，探索和开辟一代新闻学家甘惜分先生念兹在兹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

①

毋庸讳言，由于邓小平批评的“一手软，一手硬”问题，尤其是前些年对文化领导权的忽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都一度面临“尴尬”处境：一方面，宪法、党章、文件等无不宣示马克思主义为立国之本，一如毛泽东所言“指导我们思想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又似乎越来越呈边缘化态势，而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则以“多元化”畅行，俨然成为某种新潮或主流。在这种态势下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教学，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难免会遭遇种种不解、质疑、抵触、冷嘲热讽等。有位新闻界闻人就曾用心良苦地劝告范敬宜：你们的课程能不能不打“马克思”旗号，而改用“学术化”的名称。学生的反应起初也是满心不解，一脸不屑。一次，有同学问范敬宜开什么课，当听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时，顿以夸张的语气调侃道“好恐怖啊”。

正因如此，清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一开始就采用新的教学理念和模式，摒弃照本宣科，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使人敬而远之、拒人千里之外的路数，而着力于调动学生的兴趣，围绕问题及问题意识展开教学，一步步激发学习与探索的热情。结果，就像许多同学后来纷纷谈到的：“出乎意料”，感到“惊喜”，“如同发现一片宝藏”；“启发我用和以前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和审视与新闻相关的一些现象”；“达到一种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拿得稳的素质状态”；“带进了一个新天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空洞的、教条的，而是

① 2008年，清华举办“甘惜分新闻思想座谈会”，范敬宜为此赋诗题赠，其中有“舆论多少擎旗手，都是程门立雪人”之句，其称赏如此。

鲜活的、有灵魂的；它不是玄虚的，而是实在的；它不是远离我们的，而是每时每刻我们都能触摸到的”；“明白了今天我们怎样做记者，怎样做好中国的新闻工作者”……

专题讲座

具体说来，这门课程包括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教学环节：专题讲座、课堂讨论、网络学堂、读书笔记、课程心得、电影观摩等。其中，每周一次的专题讲座是课程的主干。这些讲座均围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题，邀请各方权威人士，联系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的新情况、新发展，以及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的重大问题，生动活泼地讲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原理，涉及党性与人民性、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实事求是、新闻自由、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三贴近、党八股等诸多话题。粗略统计，2005年开课至今，我们已经组织了约一百场专题讲座，主讲人包括：

杨正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

何平：新华社总编辑、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张严平：新华社高级记者、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

郑保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新闻学论集》主编

梁衡：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童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

赵启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

吴建民：原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驻法国大使

张西明：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教授

赵月枝：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西蒙雷泽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

朱夏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社长、党组书记、高级编辑

翟惠生：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韬奋新闻奖获得者

胡正荣：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副校长

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俞可平：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

这些讲座既深入、透辟、全面，又生动、具体、鲜活。如郑保卫、童兵、俞可平等专家，从理论角度和思想体系上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翟惠生、杨正泉、何平以及学院毕业生、新华社记者王芳和人民日报记者曹树林，从新闻实践层面讨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意义；赵启正、梁衡、张西明、朱夏炎等，从管理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我国新闻传播中的统领地位，以及新闻管理体制中落实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思路。其间，每一轮课程往往都由范敬宜亲自开讲，由于他的亲和、睿智、饱学以及丰富多彩的新闻人生与社会阅历，他的讲座自然赢得青年学子的兴趣和认同。聆听他的讲座，真是纵横驰骋，谈笑风生，娓娓道来，可亲可信。

如今，这种别开生面的教育教学方式不仅在清华新闻学院已经渐成特色，而且也开始推广开来，如2009年教育部、中宣部在五所新闻院系开设的“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就吸取了这种经验。

教学相长

围绕这些讲座展开的配套活动同样别开生面。比如在网络学堂上，师生们常常围绕有关话题畅所欲言，交流心得，既提高了学习兴趣，又消化和丰富了学习内容。根据2005年第一轮课程的期末统计，在全校近1700门网络课程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网络学堂的发文量名列第三。再如，后来加强了研究生的个人参与、深入研讨、细读文献等环节，将数十位研究生和博士生按教学周分成十余组，每组负责一个专题，课前进行研究，课上组织讨论。这些专题讨论不仅理论联系实际，而且气氛热烈，思想活跃。

在这些教育教学活动的基础上，还形成三项教学相长的成果：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五讲》，约30万字，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二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拓展读本》，约60万字，也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三是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心得体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学生读本》，总计383篇。“十五讲”主要精选名家讲座，包括范敬宜的《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溯源》、郑保卫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梁衡的《新闻与政治的四个话题》、何平的《如何成为一名好记者》、翟惠生的《大记者与大视野》，等等。一位山东大学的学生在图书馆偶然发现这本书，阅读之后发来一封邮件：“《十五讲》彻底改变了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看法。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估计又是陈词滥调’，但经过一线记者现身说法，学者的严密表述，在我面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突然有了鲜活的面孔……”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拓展读本》包括四十余篇新闻传播及相关学科的名家名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情、专业、社会、思潮、国际等领域，不仅思想深刻，分析透辟，而且大多文风清新，语言晓畅，深得学生青睐。博士生吴丰军和硕士生张梓轩读后写下感言：

这些文章包罗万象，堪称关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思辨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深刻的思想和精妙的文笔每每让我叹服不已，广阔纵横的视野也令我大开眼界。很多内容贴近实际，贴近国情，对于增进我对国情的了解，对世界局势，时代潮流的把握，启发颇大。每晚睡觉前，我总会挤出一点时间阅读一篇，其中一些篇目虽经反复细读揣摩，仍感意犹未尽。（吴丰军）

这些文章，特别是“中国篇”、“思潮篇”、“国情篇”的很多文章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它们叙述的内容、阐释的思想以及揭示的问题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从来不知道我们的世界、我所在的国家还有如此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有如此的视角去解读。那种行走在历史语境与现实视野之间的感触，延伸着我的感官和思考神经。我知道，新闻传播从业者看取和报道现实的态度，与他对政治、国情、人性和历史等形态的认识、理解以及据此建立起来的历史观和现实观密切相关。所以，我很庆幸，能在这一学期里接触到这样一种语境，走出以往陶醉其中的专业主义圈，开始放眼看世界，它教我以一种远近适中的关照距离，冷静而不失热情的关照态度，以及澄明而细微的视境，去看专业外围一幅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图景，去看专业内

部一串各种思想交流和碰撞的精彩。(张梓轩)

精品课程

通过一系列高水平、高层次的专业讲座，以及多方面的教学活动，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既破除了成见与误解，又产生了兴趣与好奇，同时对新闻理论、新闻实践、新闻管理等领域秉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了一些初步了解，对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政治家办报以及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等有了感性体悟和理性认识。2008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被评为清华大学精品课。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教学的影响下，学院毕业生进入主流媒体和相关领域工作的比例逐年上升，2007年已经达到80%。如英语专业出身的研究生裴广江，毕业时放弃优厚待遇选择了人民日报，不久被派往南非记者站，2011年年初的一篇报道被《新华文摘》转载。

为此，中央有关主要领导专门约见范敬宜院长，探讨新闻教育，肯定了清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教学，并希望推广这一经验。中宣部、教育部2006年以1号文件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调研报告”的通知》；2007年教育部高教司又向全国新闻传播院校转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经验报告》。2008年教育部部长周济专程来学院调研，与师生座谈，指出学院建院以来成就突出，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作为办学方向，为全国高校树立了榜样，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他希望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执著的努力，加快推进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建设。同年，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来新闻学院考察，并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学科建设发表了讲话。

三个特色

为了在清华新闻教育以及学科建设中确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导地位，范敬宜院长付出“毕生”心血，大略说来有三个方面和三个特点。所谓三个方面，一是在学院领导层和全体师生中宣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结合一生的经验和阅历，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使大家逐渐领会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新闻教育和新闻实践的首要意义。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建设和筹办“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为邀请有水平、有经验、有资望的新闻大家，他还同各方面人士一个个联系，邀请他们为清华学子传经送宝，有时还赶来主持晚上的讲座（为了方便主讲人，讲座一直安排在晚上）。我还清楚记得他主持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等人的讲座，这些讲座不待多言，而他的主持和点评同样精彩，如他总结何平的讲座是不拿片纸而一气呵成。三是推进“开放式办学”，打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专业课程、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校内新闻教育与校外新闻实践、中国发展道路与世界文明传统的关联等。

所谓三个特色，可以归结为“大”“深”“实”三个字。大是引领和塑造一种博大的情怀和境界，用他的口头禅来说，把眼光投向“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不是仅仅局限

于“天安门”“清华园”。可以说，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格局，也是他一生际遇和追求的心结。如今，“国际化”如雷贯耳，而真正将天下纳入胸怀的国际化当属马克思主义，包括世人耳熟能详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国际歌》里的“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等，无不体现着这种天下情怀或国际化意识。范敬宜以及清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首要目的正在于培育新闻人的家国天下的意识，亦即其先祖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缺乏“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意识，而一味沉溺于小情小调、小悲小喜、小打小闹等，显然不仅无法顺应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也无法践行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职业荣誉感”。所以，打开心胸、拓展视野是范敬宜推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第一步。

所谓“深”，是力求通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将学生的思想、感情和关注点从“高高在上”转向“深入民间”。早在《辽宁日报》做记者并写下名篇“莫把开头当过头”时，他已经深切认识到“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道理。后来在《经济日报》任总编辑时，又提倡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即如今广为人知的“三贴近”原则。2002年就任清华新闻学院院长，他同样倡导“接地气”、“理论联系实际”等。2005年，他将大二学生李强同学的寒假调查报告《乡村八记》送交温家宝总理，温总理在回信里写下一段动情的话：“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这段如今镌刻在学院门厅的良言，犹如诗人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满泪水……”既是对新闻人的期许，也是对清华新闻教育及其人才培养的称道，如今看来又何尝不是对范敬宜新闻人生的盖棺定论。

所谓“实”，乃指实际、实在、实效、实打实、实事求是等。清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教学无论内容还是方式都着力突出一个“实”字。客观讲，以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敬而远之，有时也归因于不切实际的“空谈”，归因于滔滔不绝、言不及义的“空话”，弄得人们一提马克思主义，仿佛就是19世纪、《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巴黎公社。其实，如今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更多同当下中国的社会实践与新闻实践息息相关，之所以称为“马克思”是因为这种实践在思想渊源和历史脉络上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一脉相承，而“立场、观点、方法”正是范敬宜在新闻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上的着力点。不妨说，“立场、观点、方法”才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的生命与灵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及其新闻观，才能避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

如上三个方面和三个特色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体现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性。中国是个新闻大国，如今又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一系列新局面既与新闻传播有关，更与国际国内的社会背景交集。为了把握和应对这些新事物、新情况和新问题，显然不能满足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也不能局限于新闻传播的专业领域——其实新闻传播从来都与广阔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而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此展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将日新月异的新闻传播与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只有多角度、多层次透视新闻与社会领域的新发展，才能认识和认同当下的社会实践与新闻实践，自觉确立自己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与职业荣誉感，从而成为无愧历史与时代、不负国家与人民的新闻“高手”。

总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熔铸鲜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具有鲜活的生命

和广博的实践内涵，心仪“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追求“普遍原理”与“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一如毛泽东建立新中国、邓小平开启新时期所树立的典范，也如范敬宜在清华开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教学传统。

全球传播论坛

构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问题 ——避免成为他国的传声筒

How to Avoid Becoming Transmitter for Others' Soft Power

吴玫^①

中文摘要：在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打造自己的传媒事业，构筑中国软实力的时候，一个尚未引起重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日渐强大的中国传媒机器如何避免成为别国软实力的传声筒。澳门大学硕士生的一篇文章，概括了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外国信息“以我为主”的核心原则。作者反观中国媒体上的外国信息报道，却缺乏这种意识，甚至盲目地跟随国外主流媒体的议题设置，转播别人的消息，照搬别人的话语，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别人软实力的代言人。作者指出了中国主流媒体对内外国报道方面的三个弱点：基本依赖国外媒体；正面报道为主；对西方软广告新闻缺乏认识。

关键词：中国，媒体，软实力，国外报道

Abstract: When Chinese government is putting much efforts on building her own media industry and the soft power, an important but yet to be noticed question is, how to avoid becoming the transmitter for other countries' soft power. A M.A. thesis concludes the major principle of the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of American mainstream media as "taking our side as the dominant factor".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of Chinese media not only doesn't have that awareness, but also follows the agenda-setting of foreign media blindly, transferring the others' information, copying the others' discourse, and finally becoming the mouthpiece of the others' soft power. The author also points out three weaknesses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① 吴玫，博士，澳门大学传播系副教授，署理系主任。

news reporting: basically relying on foreign media, positive reports mainly, and lacking the awareness of the soft advertisement news.

Key Words: China, media,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ing

在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打造自己的传媒航空母舰，构筑国家软实力的时候，一个尚未引起重视但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日渐强大的中国传媒机器如何避免成为别国软实力的传声筒或吹鼓手。

一个国家的传媒机器是该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该国软实力的宣传平台。一个资源丰富、财力充裕、专业队伍庞大、设备技术先进、受众市场广阔的传媒机器是一个杰出的宣传平台。然而如果没有对传媒机器如何在资讯全球化时代如何宣传自己的原则和战略有清醒的认识，自己精心打造的宣传平台却很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为别国软实力的传播和推销作嫁衣裳。

一个国家的传媒机器在传播内容的种类上可以分为以下几大部分：

对国内受众的宣传 (对内报道)		对外国受众的宣传 (对外报道)		广告	
本国信息	外国信息	本国信息	外国信息	本国产品广告	外国产品广告

本国信息部分是构筑自己软实力、宣传自己软实力的关键部分。用黄色标出的部分为涉及国外信息的部分，如何处理这部分内容，也与构建提高自己软实力休戚相关。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认识不清，处理不好，就很有可能把自己的宣传平台做成了别人软实力的宣传工具。在这一方面，了解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传媒机器是如何运作和处理的，是很有必要的。

今年，澳门大学硕士研究生王迪做了一篇论文，是分析美国时代周刊1992-2008年有关中国报道的内容分析。^①她用四个话语框架——种族中心主义、人权观、自由市场观、冲突观——来测量这16年来时代周刊对中国报道中的框架变化。她的研究发现对我们了解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外国新闻的原则和操作理念很有启发。在她的研究基础上，我概括出了以下几个原则：

原则之一就是“以我为中心”，或称种族中心主义。他们的外国新闻报道是以“我”（美国、西方价值观）为中心的，外国是一个“他”者。首先是以“我”的价值观作为观察判断的基础，来报道外国的。从这一价值体系可以延伸出一系列“以我为中心”的报道议题：人权议题、民主议题、市场经济议题、新闻自由议题等等。

原则之二是“以我划线”，“我”的利益是核心，报道的关注点是别国对“我”的友好或敌视程度，并依据这程度来判断远近亲疏、是敌是友，是否对“我”的领导权有威胁，威胁程度有多大等。

原则之三是“以我为权威”，“我”代表了普世真理、道德权威、客观标准、甚至历史前进方向。“我”对“他者”的说教、评价、审判都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

由此看出，在美国媒体这个自身软实力的宣传平台上，在国外信息报道方面，它们遵循的是与国内信息报道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原则，我称之为“以我为主”的国外信息报道原则。在这套原则下，外国的信息是有选择地报道的，首先是以“我”的利益来衡量，其次是用“我”的价值观来评判，然后是根据“他者”对“我”的态度、利益需要等诸多因素来权衡考量报道的角度——是赞扬、是中立、是批评、是谴责、甚至是制造假新闻来抹黑等等。也就是说从消息的选择、议题的设置、访谈人物的挑选、话语框架的建构、到遣词造句都是服务于这个大原则，其本质就是在国际软实力（话语权）的竞争中巩固和维护提高自己的道德权威的

^① 王迪：“How the China Image Changing in US Media: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Reports in Time Magazine (1992-2008)”（《中国国家形象在美国主流媒体报导中的变迁：1992-2008年〈时代〉周刊对华报导的框架分析》）。澳门大学硕士论文。2009。

地位。用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当然处理的手段是异常精致的，宣传的意图是诱导和暗示性的，运作的时间是持续和重复性的。

反观中国传媒在外国信息的报道方面，却缺乏这种“以我为主”的立场和原则。甚至有一种天真的倾向，认为打造中国的 CNN 就是 CNN 报道什么，中国也要跟着报道什么，甚至要直接转播、实况转播。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电视台实时直播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总统就职仪式。美国政府在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刻，不惜花费数十亿经费打造这个“宏大”的官方仪式，其国内国际公关意图非常明显，是刻意制造展示一种民族和谐人民团结的“新美国”形象。央视的实时转播，无论意图如何，客观上就是把自己的宣传平台给别国的软实力做了一个大大的免费广告。相比而言，美国 NBC 的“以我为主”的意识就坚定多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这个全世界收视率最高的庆典上，它都能顶住上亿国内观众的压力，坚持不实况转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尽管它公开称是因为时差原因会影响观众人数等，但这样做的效果却是避免了用自己的宣传平台给中国做实时的世纪公关大广告。^①

下面的图表是我总结的中国和美国的主流传媒在本国信息和外国信息报道方针上的差异。如果说美国传媒在营造美国软实力方面有什么诀窍或成功经验值得学习的话，这张表或许可以为中国传媒界的同行提供些启示。

	对国内受众的宣传 (对内报道)		对外国受众的宣传 (对外报道)		广告	
	本国信息	外国信息	本国信息	外国信息	本国产品广告	外国产品广告
美国	相对多元，精致表达的倾向性	“以我为中心”，意识形态挂帅，以负面报道为主	正面报道为主，宣传性较强，对内报道强	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宣传战心理战的前沿阵地	大量	很少
中国	倾向性强，较少不同声音	友谊第一，较少价值判断，以正面报道为主	正面报道为主，宣传性较弱，对内报道弱	大量依赖和转播别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报道	不多	铺天盖地

在中国主流媒体对内外国信息报道上有三个特点：基本依赖国外媒体；正面报道为主；对西方软广告新闻缺乏认识。如果对此种做法会导致的后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就有可能在有意无意之中把自己的宣传机器为别人的软实力服务。

在外国信息报道上跟着别人新闻跑的做法，最大的要害是复制和移植了别人的主流议题设置和话语框架，而放弃了自己对别国事务设置议题和构建话语框架的权利，没有从“中国”的立场、角度、价值观来分析判断这类别人制造的议题和话语后面的意图背景，是否对中国的利益有损害，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从而不成为别国软实力的免费广告等。这些年来，我们的主流媒体习惯从西方媒体上照搬和复制众多的关于华尔街的神话，从格林斯潘到巴菲特到雷曼兄弟。一场不期而至的世纪金融风暴才把这个神话捅破了，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已经受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害。如那个雷曼“迷你债券”事件，就是专门为美国之外的外国储户设计的。^② 在香港是面向普通个人储户推销的，总共涉及 120 亿港币。在大中华圈、在亚洲、在世界，雷曼公司破产的后面是无数普通老百姓的积蓄一夜之间血本无归

^① 在 NBC 奥运开幕式转播历史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是它唯一一次没有实况转播。它自称的时差和观众人数的理由是占不住脚的，因为汉城奥运会开幕式它就是实况转播的。汉城的时间与北京时间只相差一小时。我认为 NBC 不过是用这种理由来掩饰它背后的真实意图。

^② 根据本人搜集的资料，雷曼“迷你债券”没有被推销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的凄惨故事。但直至今日，却鲜有媒体从“人权”、“公平契约”等的主流视角把这个世纪金融案的来龙去脉跟踪报道的。^① 因为我们的媒体在美国报道上早已习惯单纯转播、翻译美国主流媒体的东西，而很少想到要去验证这些美国的报道，要去自己找新闻议题，要去挖掘西方主流媒体之外的自己的西方新闻。^②

中国主流媒体与美国媒体外国信息报道另一个不同的特点是很少批评和负面报道，基本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原则。西方社会文明先进、科技发达、社会公正、人民彬彬有礼、助人为乐，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各国人民，包括西方人民都非常喜爱中国，喜爱中国文化。中国的华人在世界各地都融洽地和当地人民生活在一起，受到很高的尊重。这种报道原则可能是出于“和谐世界”的大计方针的考量，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严重的误导，粉饰了别国、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复杂问题和激烈的矛盾冲突，掩盖了国外社会对中国的非友好和对华人的歧视。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自己国民面前抬高别国的威望和道德水准，为别国的软实力抬轿子吹喇叭。

国家的传媒机器在全球化竞争时代的另一特殊作用，是本国产业的免费宣传平台，本国新闻很大部分是本国产业的软广告，战争新闻可以是本国军火的软广告，甲型流感新闻可以是制药公司的软广告，熄灯一小时活动后面是一个节能产业链的软广告，各式各样的文化体育新闻更是公开的广告。在“以我为主”的原则下，美国外国新闻报道中罕有为别国做软广告的例子。而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和新闻媒体很多的时候几乎成了美国和欧洲文化体育软广告新闻的转播站。奥斯卡颁奖仪式、好莱坞最新大片、哈利波特最新续集、NBA 大赛、世界小姐选美、巴黎米兰时装秀……，这类为外国软广告免费宣传的例子不胜枚举。央视《新闻联播》最近开始介绍国内影视新闻，还受到观众垢病，孰不知央视在珍贵的时间段介绍外国大片的新闻很多。哈利波特最新续集的新闻就用了几分钟！！特别是体育节目，什么 NBA、英超、意甲、世界杯等，西方的体育大赛本质就是商品，是一系列商品的产业链，观众就是体育产业链上的消费者。西方大国都精心培养自己的体育赛事品牌。电视转播也是很有选择的。中国国家电视台十几年的辛勤工作，为西方体育节目和相关商品培养了上亿的消费，而我们的媒体又花了多少时间打造推广自己的特色体育赛事品牌呢？

中国主流媒体对内外国报道方面上述的三个特点（基本依赖国外媒体；正面报道为主；对西方软广告新闻缺乏认识）的做法，对本国人民清楚认识外部世界危害甚大。因为本国人民对于远离自己生活之外的外国信息是没有亲身实践来验证的，基本是依靠媒体信息来构建“外国现实”的。大量传播学的研究证明，媒介的作用是构建“现实”。人们对外部社会的认识来源于三部分：自己的亲身实践；周围社会圈子提供的知识；从媒介上得到的知识。在涉及国内信息部分，中国的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周围小圈子的知识来验证“媒体现实”，从而对客观环境有一个多维的判断。然而在国际认知方面，因为没有亲身经历和周围的人际信息，在相持大的程度上，媒体上的“外国现实”就是中国一般受众的认为的“外国现实”。当 CCTV 大量地转播非常友好有趣有观众的西方新闻时，它不过是在自己的宣传平台上，免费地为西方做着软广告，传播并复制着西方的神话，承认并赋予他们君临天下的道德权威。

^① 香港的主流媒体倒有关于雷曼“迷你债券”的大幅报道，但有意思的是镜头多是雷曼受害人在中国银行门前的示威，主题都是政客和群众对香港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批判和控诉。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雷曼公司反而在公众传媒上消失了，没有任何提及和报道。

^② 相比中国主流媒体对美国媒体的信赖，美国舆情机构皮尤（PEW）最新一项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不信任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63%的美国人认为他们从媒体获得的信息经常是大错特错的。这是自1985年皮尤首次调查公众对媒体的看法以来，美国民众对媒体可信度所持最高怀疑态度。

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financial_information_show.aspx?id=3275。

全球传播论坛

中国问题、政治传播与学术研究^①

Chinese Issu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被访人：郑永年^②

访问人：郭镇之^③

中文摘要：这是一次学术访谈的记录稿。访谈双发就中外教育的差异、对社会现实的研究、引进概念与中国实践、渐进民主与制度建设、西方理念与中国改革、新加坡经验、中国改革的动力和路径、“走出去”与软实力、道德与理性、思想与工具等诸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中国问题，政治传播

Abstract: This is a transcript of an academic interview. During the interview, the interviewer and interviewee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higher educations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e imported concepts and Chinese practice, gradual democracy and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Western ideal and Chinese reform, Singapore experience, the motive and route of Chinese reform, stepping-out and soft-power, morality and rationality, thoughts and tools, etc.

Key Words: Chinese issue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① 访谈时间：2010年8月27日、31日；访谈地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② 郑永年，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

^③ 郭镇之，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一、关于中外教育

郭：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之前又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工作了9年。您认为影响了您政治学研究生涯的因素主要得自于普林斯顿呢，还是北大？

郑：这些影响应该说是从北大开始的，很多的政治学知识是从北大获得的。中国的教育体制给人很多知识。在北大的学习使我接触到许多西方的知识。到普林斯顿后有个转型。美国的教育体制不是给你灌输多少知识，而是培养你的思维方法，美国引导你去创造知识。美国同学只顾自己感兴趣的東西。

郭：那是不是说美国学生的知识面比较窄呢？

郑：大概不能一律用“宽”“窄”的概念来说。美国人的入口是比较小的，它鼓励你从小处入手，再拓宽领域。进去的角度小，不见得里面的知识就窄。

二、关于社会现实的研究

郭：您是从政治学出发的。但我看，您现在也研究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

郑：我自己的感悟是，政治学也好，经济学也好，社会学也好，它实际上只给了你一个观察问题的切入点，很多研究方法是相通的。进去之后，观察的还是整个现象，政治的层面、经济的层面、文化的层面。我比较欣赏十八、十九、二十世纪那样一种整体的社会科学，而不是现在这种很窄的某一种社会科学。

郭：您还曾提到，研究问题要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既定的知识和学科出发。

郑：是的。我觉得古今中外的学问家都是从观察现实出发的，如孔子的《论语》是从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入手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是对城邦国家的考察。所以我特别相信毛泽东的一句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

郭：您主要从现实出发，从对现状的观察、描述和分析入手，进行研究，还提出一些对策。

郑：我觉得好的社会科学家都必须关心社会。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我刚到普林斯顿的时候是想学政治理论的，后来改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就是为了离现实近一些。

三、引进概念与中国实践

郭：我在读《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有很多同感。例如您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对国际国内新环境的反应，因为人家那么样，所以中国就这么样了。这种观察非常到位。

郑：这也是一种历史的观察。中国以前没有民族主义。中国当然有族群的概念，分中国人和夷狄等等。但中国没有把这些东西提炼出来，作为建设国家的一个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有教无类，人是有文明和不文明之分的，但只要通过教育，就能改变，变成文明人。中国没有西方种族主义那种严格的界限。

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用来组织和建设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国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民族主义，这种思想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针对西方的。鸦片战争是对侵略的反应。中国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接受中华文化了，可以当皇帝，统治中国。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文化像中华文化一样，强大到能够包容任何文化。

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一个种族的观念，还有宗教的观念。这种民族主义是排他性的，例如德国的种族主义，就是认为自己比其他民族人种优越。血统高贵。中国强调的是受教育和不受教育的区别。孙中山先生从日本那里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概念，但他也只是工具性地使用民族主义这个概念，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满清王朝一旦推翻，他马上就要五族共和了。西方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在中国则是工具。

郭：从西方产生的民族国家概念具有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两个方面含义的。这样，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就联系起来。但在后发国家接受这个概念的时候，一些方面被忽视了。对国家主权单一的民族主义理解就影响到人民主权，也就是自由主义的发展。这样理解对吗？

郑：对了，对了。一种思想到了别的国家总是会被重新解释，根据当地社会的历史条件，根据国情，做不同的解读与接纳。中国自由主义的词句来自西方，但中国的自由主义不同于西方，也不能照抄照搬国外的经验。西方式的自由主义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大家照抄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结果。自由主义必须当地化。现在中国自由主义的因素也不少，但没有整合起来形成好的制度，没有中国化，也不能成为建设性的力量。

四、渐进民主与制度建设

郭：您还说到，国家在民主化和民主政治中都是有作用的。国家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不会成为争论的焦点；但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就让人觉得有些出乎意外。因为通常认为，国家权力是需要限制的，民主化就是对国家的权力进行制约和平衡。国家怎么会做一种对自己不太有利的事情，或者说，自己“革”自己的“命”呢？

郑：英国霍布斯写《利维坦》提出要建立专制国家，为什么这本书反而成为自由主义的经典，而不是专制主义的经典呢？自由不是无政府主义，英国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制度下的自由。这个制度由谁来建立？当然只能由国家来建立。霍布斯就论证了，强大的国家权力对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国家统一是多么重要。后来洛克才论证，国家权力虽然重要，但也需要有个边界，这个思想也非常重要。所以，自由主义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中国人把权力、权威和自由完全对立起来了，其实，光是强调限制国家权力，没有看到国家权力的作用，是不对的。因为革命、造反建立不起制度来，任何制度都是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来的，好多国家制度在民主化之前不建立，就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拉丁美洲、非洲，包括许多亚洲国家，民主政治为什么那么弱呢？就是因为他们在国家制度建设之前已经民主化了，过早地民主化了，于是，好多制度就再也建立不起来了。所以我强调，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没有国家制度的自由就是无政府主义，人民无法生存。

郭：您这儿讲的制度建设主要是指金融方面、税收方面、社会政策方面的制度吗？

郑：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社会制度跟民主化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德国的社会福利政策是在俾斯麦那个铁血宰相时期建立起来的。美国是民主的大本营，这个民主建立了什么制度呢？上个世纪1929年大危机的时候才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这次到了现在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才开始建立医疗保障制度。西方很多国家的制度建设和民主毫不相关！西方的民主是有阶段性的。我们现在一上来就要大众民主了，一人一票。

当然，大众民主是有很积极作用的。任何统治集团，如果没有社会压力，是不会改革的。但大众民主本身并不是制度建设，这个互动掌握得不好，大众民主就是摧毁性的力量。非洲就是这样。没有一个制度框架的民主，就是中国的文革啰。英国式的自由、民主只是制度下一种可预计的行为。西方民主就是在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之间的一个平衡。

郭：关于权力制衡的这个传统，您在书里讲到，实际上民主实现的过程，有民主革命的方法，也有协商妥协的方法，英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郑：我觉得中国有这个可能——肯定会有，在这方面我是非常乐观的。和谐社会就是要阶级妥协。

为什么需要妥协？因为社会是等级性的，社会利益是多元的。多元的利益之间就要妥协。暴力，革命，是不能妥协的结果。但暴力之后，革命之后，还是要妥协。很多妥协是被迫的，资本的本性是不妥协的，它是被迫妥协的。妥协就是权力制衡。一个社会，财富分配太不公平了，就要出问题。

五、西方理念与中国改革

郭：您讲到革命党、行政党、政治党的区别，您说的“政治党”中的“政治”，可能和大陆理解的有点不一样。国内的读者可能会有一点理解上的困难。

郑：政治和行政是不一样的，行政是决策，执行，贯彻。政治是制订政策。在所有的国家，党管政治，党是产生政府的。政府管行政，是分开的。现在中国呢，党在管行政，没有精力管政治。

郭：您这里的政治是指什么呢？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问题？

郑：就是这些。西方的政党就是只管政治。一旦政府产生，政党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这就像中国古代王权和相权之间的关系。相权就是政府，执行的。皇权就是管皇帝怎么产生的。我们现在有点泛政治化，什么都是政治。政治方面我就强调人民性，人民性是合法性的基础。

郭：我们新闻界在讨论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时，认为是一个统一体，至于谁先谁后的问题，官方的意见是党性优于人民性，先于人民性。

郑：“党”这个概念也是外来的，中国过去没有现在这种政党的概念，古代“朋党”是贬义。按照西方的概念，党是人民的一部分。党是作为人民的代表在活动的，他代表的是人民。

郭：我非常赞赏您说的：市场转型是国家的策划，市场转型带来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给人民利益带来的损害，政府不能不管。

郑：对了。国家不能对社会政策带来的问题一推了之。进入市场是你决定的，后面的效果你要负责嘛。好处你拿了，坏处你推给社会了，这样的社会哪会和谐嘛。国家本身是抽象的，是由代理人组成的，像那些国企的老总，他们代表国家，结果利益都跑到他们手里去了。

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领域要区分，社会政策不应当市场化的，市场化过分了；经济领域应当市场化的，市场化不足。国企变相垄断，是歪曲的市场。新自由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在经济领域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却跑到社会领域去了。结果医疗、教育些领域，本来是西方社会制度保护的一块，倒市场化了。

郭：您说过，经济改革相对来说是最容易的，是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在经济改革中是不是也有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涉及利益分配的政策。

郑：我觉得，应该把“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把蛋糕做大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不改革很难可持续发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确实是通过经济改革达到了经济发展，从而社会稳定。这个逻辑很明确：是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蛋糕做大了，老百姓都获益了。

但是，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体制改革停滞不前，发展加快。为什么体制没有充分改革，发展却加快了？一方面是以前改革的成果，现在体现出来了；另一方面它的发展效益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破坏社会嘛。社会领域在西方好多发达国家，也包括新加坡，都是受到保护的。而中国的社会领域呢，却高度商品化，高度的产业化了。医疗、教育、房地产，这些是社会性很强的领域，却都成了中国的暴富行业。所以经济增长的根源来自对社会的破坏。所以社会越来越不稳定了。这个逻辑关系也是很明显的。

社会改革主要有三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还债，就是以前的经济改革牺牲了很多社会的利益，社会改革就是还债，就是解决在经济巨大增长过程中对社会巨大的破坏，否则，社会不会稳定。第二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找到一个新的资源。现在经济要转型，从出口导向变成一个国内消费的社会。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以后还要进行政治改革。社会政策是民主化的制度基础。凡是那些社会政策比较好，保护人民比较好的社会，有中产阶级，有消费社会的地方，民主化的质量是比较高的。社会制度建设好之后，社会不会激进，就能产生比较优质的民主。

六、新加坡经验

郭：谈谈新加坡经验？

郑：新加坡经验，我觉得就是三块。一个国家的治理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大块。新加坡典型的是经济与社会分开来。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高度市场化，在社会领域实行保护。它不像社会主义，也不像福利社会，但是居者有其屋，是从中国传统中来的。在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消费者物价指数，只要这几块保护了，社会差距再大，社会是稳定的。新加坡的基尼系数比中国还高，为什么大家感到中国很不稳定，而新加坡却很稳定呢？就是社会保障机制存在，人民的基本生活有保障了。一个基本的体面生活保护了，老百姓就不会造反了嘛。

政治方面，新加坡是列宁主义的精英党，给老百姓办事。国会议员每周都固定地要和老百姓见面，最有效地解决了人民性的问题。

“优秀分子的代表”这是列宁主义的思想。新加坡的PAP（人民行动党）是世界上唯一的列宁主义政党。新加坡的精英体制是人民培养精英。像吴作栋，包括李显龙，以前并不是PAP的党员，你在一个领域成功了，我就请你加入党。这个党是要被邀请才能入党。它的党总部建在一个很破烂的地方。因为是行政主导体制，党是隐含在政府里面的。

七、中国改革的动力和路径

郭：社会改革也好，政治改革也好，您刚才说的还只是应该这么做，具体能够怎么做呢？

郑：实际已经在做了。但它改不动。既得利益在阻挠。为什么社会领域被冲垮？因为社会上主要是弱势群体。改革是需要既得利益做些妥协的。

要动员改革的力量。改革的力量也在那里，社会呼声很大，但是没有人去动员改革的力量。邓小平当时的改革，是从体制外动员力量。城市改革比较难，就从农村开始。城市改革开始后，国有企业这块动不了，就从体制外长出一块民营企业来。中国的事情很难，就开放，让外国人进来。新的力量培养起来，对旧的利益是个制约。这是策略的问题。

如果中国一直不改革，底层的破坏性力量就可能释放。那就不是改革，更可能是革命了。NGO，工会，有组织的東西比较好控制一些，没有组织的不可控嘛。

郭：讲到自上而下的改革，我想到《焦点访谈》。《焦点访谈》其实当时是中宣部让办的，目的主要是调查下面的情况。中央领导觉得自己不能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于是把记者派下去，他们实际上是去给领导当耳目的。

郑：对执政党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和社会脱节。维稳就是弄一个个城墙，把自己和社会隔离开。这是非常大的危机。唯一的希望是中国共产党重新成为改革的主体。除了共产党，谁来领导改革？NGO可以作为一个倡议者，但不会成为改革的主体。

但是，任何一个政权，没有压力，本身是不会改革的，不会有动力的。非政府组织的成长，民营企业的成长，这些社会改革的成果会产生正面的压力。一定要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民主化。互动，参与，协商。如NGO，不是破坏的力量。一方面对政府有压力，另一方面可以充当政府的帮手。

八、“走出去”与软实力

郭：您说到中国既强大又脆弱。也有人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很可能马上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但是否能够变成、怎样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一个问题。

郑：要强大，就要把制度做好。要伟大的话，你的制度需要对其他国家有吸引力。GDP的大，并不是制度强。

美国1890年代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大的国家，但那个时候它也没有成为伟大的国家，它对世界上的事务不关心，孤立主义。像英国，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怎么成了大英帝国了呢，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先进的制度。英国的殖民地现在都留下很好的制度传统，包括新加坡。葡萄牙、西班牙，虽然到处扩张，但没有带给人们一个好的制度。所以，所谓伟大的国家，就是有一种好的制度，对全球有价值方面的吸引力。像中国的唐代，没有到外国去推广啊，日本它们都来学嘛。这就是真正的吸引力。

郭：您说到这里，就涉及到我们正在做的一个课题，中国电视走出去，建立积极的国家形象。许多人不看好。您怎么看？

郑：“走出去”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说是大有必要的，非常必要的。但走出去的方式也非常重要。如果由政府出面强力地推出去，这种方式其实不好。美国的教训应该接受，它到处用国家的力量去推行民主，动不动就把人家的政府推翻了，谁都害怕它，也都恨它。美国动用国家力量，花了多少钱，培养了无数的敌人，没用的。这种东西不是软实力。

郭：不要做得那么咄咄逼人的。

郑：对了，对了，做得自然一些。走出去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搞什么国家公关，人家就想起希特勒来了。走出去的方法基本上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成功。动用国家力量走出去效果不好。尤其是要向西方走出去的话，人家对国家力量和行为本身就非常怀疑的。包括非洲，受西方影响多少年，你动用国家力量走出去，那大家就吓坏了。像欧洲那种好的做法，文化的做法，它通过民间的部门，志愿者，效果就很好。民间的、非政府方式的交流才是可持续的。

九、道德与理性，思想与工具

郭：好，咱们说最后一个问题，谈谈政治学的道德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在东亚研究所做研究，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政治学不是以道德标准判断问题的，而是以经验理性，甚至实用主义为目标的。我发现政治学把阶级啊，主义啊，都看作工具，考虑的只是行不行的问题，而不是对不对的问题。我觉得有些困惑。

郑：中国的政治学和西方的政治学完全是两码事。中国政治学教你什么对，什么错，非常主观。从中国的《论语》开始，就是一种道德的说教。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是对希腊城邦的经验描述，不是这个社会应当怎么运作，而是它实际上怎么在运作。经验的，理性的。所以，中西是两个传统，中国是道学的，说教的，西方是经验的，理性的。我们在国内

受的教育也是标准式的，不是实证主义的。没有把实证主义方法运用起来，也是中国社会科学落后的一个原因，最大的一个原因。

因为总是看应当怎么样，对社会理想化，就容易发生革命。西方也发生革命，在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发生。但大多数的情况是渐进主义，理性主义。

马克思·韦伯说，价值观是多元的。你很难说哪个价值比哪个价值好。你相信你的上帝，他相信他的上帝。但是，哪个价值好，要通过工具去验证。不能通过工具去验证的，没有工具可以实现的，就是乌托邦。

郭：那是不是您到了普林斯顿以后开始这样思考问题？

郑：对。我们中国出来的学生规范性的东西太多了。国外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经验，一个理性，一个经验，然后分析。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就要找很多的经验来借鉴，特别是历史经验。

郭：我们新闻传播学现在引进了很多社会科学的方法，测量啊，内容分析啊，调查啊，政治学也都在使用的吧。

郑：关键是思想，方法是工具。关键是要客观地去描述、解释这个社会。西方对东方社会不懂，就要你去描述、解释。台湾、香港、大陆，三个社会也不相同嘛。传播要讲效果，要把社会的运作啊，制度啊，所有的这些问题解释清楚，分析透彻。

工具性的东西不难。做调查啊，抽样啊，都比较好学的。但关键是思维方式解决好。怎么来把握这个社会非常重要。如果对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准确判断的话，那些方法就没有多大用，不会产生新的知识，甚至会产生错误的知识。这些方法是为思想服务的，现在有的年轻人变成这些方法的奴隶了，动用很多图表，计算，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现在这个问题非常突出。要有了新的思想，才需要论证这个思想对不对。工具是为思想服务的，是为知识创新服务的。现在很多中国人到海外都是学习方法，如果光学方法的话，永远不会成功。

全球传播论坛

针对所谓“持批判立场”的十六条半问题^①

Introduction: Sixteen and a Half Questions on "Being Critical"

张正平^②

石琳^③ 译

中文摘要：作者认为，现如今，似乎再没有比“持批判立场”更了无新意和更容易的事了。作者通过一些简单的问题和对我们的一些经验的讨论，开始阐释他的观点。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所谓“现代意识”，归根结底就是批判意识。作者认为，一言蔽之，我们是“自觉”的“愤世嫉俗者”——对一系列意识形态愤世嫉俗。但对所谓“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正是意识形态所怂恿的。也因此，我们的批判分析本身可能不仅是症候，而更糟糕的是我们抨击对象的构成部分。作者希望通过此文，引发我们对“持批判立场”的新的思考。

关键词：批判立场，文化研究

Abstract: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being critical is banal and easy. By raising a few simple questions and going back to our experiences, the author approaches his point. Since many agree that modern consciousness is fundamentally critical consciousness, the author regards ourselves as self-consciously cynical-cynical of the ideologies. However the self-doubling cynical consciousness might exactly be what ideology produces. Therefore, the author asks if our critical analyses themselves are part of what these analyses purport to criticize. By discussing these questions, the author hopes us to think more about "being critical".

Key Words: being critical, culture studies

^① 本文以英文发表于 *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Cultural Studies*, 2011年, 第8卷, 第1期, 第85—87页。

^② 张正平 (Brian G. Chang),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传播系副教授, 著有《解构传播: 主体、再现与交换经济》(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1996年), 译有德里达的《他者的单语主义》(台北桂冠出版社, 2001年), 主编《传播哲学文选》(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③ 石琳, 马萨诸塞大学传播系博士候选人。

现如今，似乎再没有比“持批判立场”更了无新意和更容易的事了。这个论断我是冲口而出的，然后我迅速补充说，验证我说的话太过仓促正是今日批判中的终极关键部分。

我开篇已冲口而出说，如今我们作为批判者的工作了无新意和容易。我这么说是把握的，正如我这么说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鉴于篇幅有限，与其全面展开以证明我的观点，不如通过提出一些简单问题来向这一观点靠近。比如说，我们中可有人曾遇到过任何一位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非批判性”的同事？或者是坦承自己持反对批判的立场的同事？有没有任何人会创办和运营一本杂志，宣扬它的使命是“不批判的”，或甚至是断然“反批判的”？确实，如果一本期刊将自己定名为“非批判的媒体研究”或者是“传播及非批判的文化研究”^①，它可能行得通吗？你觉得它能收到多少稿件？谈到“文化研究”这个我们很多人自诩的专长和志业，根据这个领域的起源，特别是根据它众所周知的成形过程，我们可以说，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毫不妥协的批判姿态登上舞台的。因此当我们说“批判的文化研究”时，“批判”这个字，难道不是多余的吗？

再就我们的经验来谈，我想知道我们中有多少人，在听到有人——比方说一位年轻有潜力的学者——在将他（她）的研究工作描述为对X、Y、Z的批判分析时，不会迅速地猜到、或者预计将被迅速告知：X、Y、Z代表“种族”、“性别”、“阶级”等等，而且每一个都被解析成一套“表征”系统（system of representation）。另外，我们的年轻批评家们所提供的大部分关于X、Y、Z的批判性分析，这些合理地、意料之中地以发掘媒介“文本”中的隐含意义为动机的分析，却在实质上很少超越主流的、以内容分析为基础的媒介效果研究的发现，这难道不让人感到好奇？（我们在此或可追问：为何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媒体产品都能够被恒定地“解读”成“文本”？这是如何做到的？）更令人感到好奇的是，这些研究最终是对读者们能够轻易预测的结果进行重复言说，也许是因为这些结果几乎总是从作者选择的论题和表达方式中流露出来——作者也是籍此将自己定位和投射为一位“批判”思考者。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的作者总是不断热情地叩问那些看起来对他们的发现并非不可或缺的理论、理论家或“主义”，这难道不令人好奇吗？

我想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不会否认所谓的“现代意识”，正如很多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归根结底就是批判意识。^②简单来说，我们都认为自己能充分认识并因此批判地认识到不同社会文化和政治机制都屈从于它的不利力量。更进一步地说，我们不仅都自认为是具有批判精神的个体，我们还都认为拥有这样的知识储备以支持我们批判的智识以及由此选择的立场；这个知识储备进而给予我们一个让我们得以在我们的批判性知识、我们对自己拥有这种知识的信念，以及我们所批判的现象三者之间保持某种距离的可能。一言蔽之，我们是“自觉”的“愤世嫉俗者”（cynical）——对一系列我们自反性地承认既是、也不是我们造成的意识形态愤世嫉俗。

谈到意识形态，因它恒常的存在突显我们众多的批判作品中各种指涉的昙花一现。在这里，这自我倍增的怀疑意识难道不正是被意识形态促成的？也就是说，对所谓“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不正就是意识形态所怂恿的、同时也是它期望我们作为被依照某种原型逐个设计好（individuated）的个人之所为？^③如果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将个人“建构”为“主体”

^① 译者注：“Critical Media Studies”和“Communication and Critical Cultural Studies”都是常见的期刊或文集名。

^② 请参阅 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众所周知的还有 Slavoj Žižek 反复在其反对文化研究的辩论中阐述这一点。

^③ Individualization / Individuation 是一组很难分割的概念，我要强调的是，一个人在他或她被 individualized 之前必须先被 individuated。“Individuation”可说是“个体化”，而“individualization”是“个人化”。Individuation 和 individualization 是个体形成过程中两个相关、但又不同的步骤。

(subjects)——正如我的学生不断向我重复的那样，那么对意识形态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有没有可能正是各个自主的个体被设计好的思路？并且，反映到相应的思考和行事作为上，这有没有可能正是个体在意识形态指使下、履行意识形态顺民的功能？换句话说，这个必须对意识形态保持批判立场的信念，有没有可能正是意识形态设计好的“常识”（其本质就是不断怀疑）在背后指挥？再想一想那些汗牛充栋的、就“种族”“性别”“阶级”以及其他许多表征系统进行批判的文献（我从中学到了许多关于“社会（或话语）建构主义”的含意），说实话我很好奇，我们当中是否真的有人相信“民众”——那些总是想象中的他者、我们从不承认他（她）就是他（她）自己或者是我们中的一员——真的这么头脑简单、以至于认识不到上述类目是由“社会”以及“话语”建构的？如果不是如此，我们又为什么持续鼓吹、宣讲如上种种？我们到底是在向谁鼓吹宣讲？目的又是什么？

顺着这一线思路下来：我们的批判分析本身有没有可能不仅是症候，而更糟糕的——就是我们大声抨击的对象的构成部分？说得更具体一些，既然我们的学术产出中某些特定的题目在不同的时期要比另外一些题目更加受欢迎，我不禁好奇：题目的选择，不管是否是明确为之还是策略使然，难道不是特定时空的产物吗？（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如此？）也就是说，它反映的是一个对特定时期所谓学术风气或潮流不加批判的接受——在这里不管这风气或潮流的渊源有多复杂深邃。我就此停止追问。因为意识到，不停地就意识形态追问本身可能就是一个人变得“意识形态化”的显著信号。也就是说，当我声称我对自己个人观察到的某些表象持批判立场时，我可能正是自己最意识形态化的时候。

一个人可以、或者说可以试图，比其他人具有更多或更少的批判性；但对一件事物的批判分析，很可能会比针对另一件的分析更有批判意义。如果批判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有目的的、在最终极层面上语言性的行为，那么它必须明确安置 (posit) 自己的目标对象，并且把自身置于这个目标对象所处的可能条件下。一个批判者如果忘记了这一点，那么他（她）不仅是忘记了批判的主旨究竟是什么，更会因为这份遗忘令自身变得锐角尽失，或者就像我说的，非批判。如果说“持批判的立场”在最揭示本质的那一刻指向的是质询 (questioning) ——尤其是对批判行为本身的质询，那么我刚刚提出系列问题的这一幕或可被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批判。我并不盲目乐观地认定我问题背后的那些种种足够搭建出某种坚实的平台，以供我的这些问题追索明确的答案。我心存盼望，如我相信很多读者可能也会这样认为——我在这里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可以很容易便被回答的，仿佛它们追根究底的只是无甚实际意义的自问自答，更甚，可能就是一些虚假的问题；但是，这个我实在不确定。希望这份“不确定”，成为我们新阅读与思索的起点。

这一点 Bernard Stiegler 在他的著作 *Acting Ou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有所强调，详见第 76—78 页。

影视研究专题

审查还是分级？

——中国电影的管理困境与转型难题

Censorship or Grading? The Predicament of Administration and
Transition of Chinese Films

詹庆生^①

中文摘要：以审查制度为焦点的中国电影监管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并获得持续高度关注的公共话题。主张放宽对电影内容的审查，实行电影分级制度的社会舆论也一直很强烈。作者回顾了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现状及特点，认为中国电影审查制度总的来说，是在国家层面通过行政管理方式来完成的一种意识形态管理，这导致了目前的管理困境。作者认为，中国目前从审查制转为分级制还存在较大的难度，西方模式也非可以一蹴而就的效仿捷径。作者相信随着中国电影总体上朝良性发展轨道的运行，电影管理会取得新的进步。

关键词：中国，电影，审查，分级

Abstract： The censorship towards the films as the center of Chinese film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a quite controversial public topic that attracts great attention. The public opinion suggests that the censorship of the film contents should be loosen and the film grad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stead. The author reviewed the history, current situation and features of Chinese film censorship system, and believes the system is overall an ideological management implemented by administrative methods, which leads to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The author believes it's no easy for the film censorship system in China to transform into film grading system, and the Western model of film

^① 詹庆生，博士，解放军艺术学院老师。

administration is not a perfect shortcut to follow. Since the Chinese films are heading along a benign pathway, the authors believes things will become better gradually.

Key Words: China, film, censorship, grading

一、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悖论境遇

在文化与传媒领域，以审查制度为焦点的中国电影监管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并获得持续高度关注的公共话题。在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日益全球化，思想与道德观念日趋多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电影进入“大片时代”之后，电影内容管理所激发的种种矛盾越发凸显——

《满城尽带黄金甲》（2006）、《夜宴》（2006）、《门徒》（2007）、《让子弹飞》（2011）等影片中涉及裸露、暴力、毒品的内容屡屡引发争议，《色戒》（2007）经删减后得以公映，却依然引发激烈争议。《苹果》（2007）因“违规行为”被广电总局追加处罚，《新宿事件》（2009）由于表现海外华人“黑社会”而未能通过审查，《无人区》（2010）同样陷于审查困境导致上映日期一再推迟。不仅电影业内人士多年一直呼吁电影分级制，每年“两会”期间，代表们有关建立电影分级制度，要求加快电影立法的发言或提案也屡屡成为传媒热点，但多年前就已开始着手起草的《电影促进法》却始终未能出台。

电影的内容控制常常面临着矛盾对立的悖论情境。一方面，要求加强电影内容审查与监管的呼声仍然很高，甚至在整体社会文化氛围中还存在泛化的审查心态。这种泛化的审查心态使得自我审查成为一种常态，甚至连电影洗印厂工人都可能成为影片内容的自觉“把关人”。由于目前中国在电影管理领域还没有一部相关的法律出台，因而相应的管理多少具有人治化的色彩。有时候，几名大学生就某部影片发出的公开信，或一名行为艺术家的街头抗议，都可能对广电部门的现实监管产生压力。所有压力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和反馈到电影管理部门，对内容监管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电影管理部门不断强化、日益频繁的管理措施也常常引起文化精英和部分民众的批评和反弹，电影管理部门以及审查制度本身经常成为被批评、讽刺或调侃的对象。主张放宽对电影内容的审查，实行电影分级制度的社会舆论也一直很强烈。

要求强化审查，与要求弱化甚至取消审查的两种立场同时并存，而矛盾则共同对准了电影管理部门。作为政府行政机构的行业管理部门，国家广电总局一方面要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与指令，另一方面又需设法调动行业积极性，尽量保护行业利益，促进产业发展。意识形态长期延续的思维惯性，经济与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舆论的无形压力，多元文化与价值不断形成的客观现实，种种复杂因素使这个角色特殊的主管部门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国家—社会—行业的不同要求之间求取平衡。然而，对具体电影内容的管或不管，管理严格或管理宽松，都可能导致各方相应的批评。“管”哪些、如何“管”、“管”到何种程度？种种矛盾让电影主管部门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在许多人看来，从电影审查到电影分级只是广电总局的一个政策变更，然而，在审查与分级两种控制模式的背后包含着更为深刻的内容，二者是不同的传媒体制、法律体系、政治制度、社会与文化环境的直接产物。从审查到分级的转换，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

二、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现状及特点

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出现的“电影审查”通常指的是电影成片审查，即拍摄完成的影片送交审查以获取公映许可证。但是严格来说，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并不仅仅指内容审查。中国电影实行的是全面的许可制度，而许可制度在实质上也是一种审查制度。

我国电影业的行政许可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全面的许可制度。所谓全面，是指既包括针对企业的准入许可，也包括针对内容的审查许可。西方国家传统上很少针对电影企业的准

入许可，主要是对电影产品内容的审查许可，而中国同时包括了这两者。自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电影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大大降低，但电影企业仍然需要事先得到行政部门的准入许可才能合法从事电影产业活动。第二，细分化的许可制度。即将完整的电影传播活动分阶段、分类型地拆分为若干具体的环节，每种稍具独立性和特殊性的传播行为都设置单独的许可。除了企业从事制作、发行、放映的准入许可外，对于每一部影片，还包括剧本许可（备案或审查）、公映许可（内容审查）、进口许可、出口许可、涉外合作拍摄许可、参赛参展许可等等。正是通过这种全面囊括、事事许可的管理形式，国家得以掌握了对于整个电影传播活动的全面而完整的控制权。

在全面和细分化的电影许可制度当中，针对内容的许可即内容审查处于核心地位。当前中国电影的内容审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第一，在国家层面实行审查。《电影管理条例》（1996年颁布，2001年修订）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电影审查制度。”这使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少有的明确规定对电影实行国家审查制度的国家。此后我国颁布的所有涉及电影管理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都强调是“国家实行”审查。针对电影内容的控制在国家层面实施，执行的主体是政府的专门职能机构，在控制类型上属于行政管理的范畴。

第二，以审查为基本手段，拥有对于影片内容的禁止功能。审查遵循的是“是一否”的过滤机制，它最终必然表现为授权—禁止、批准—不批准、通过—不通过的二元结果。所谓过滤机制，意味着被审查机构认可的内容可以获得通过，那些不被认可的内容或者被“完整拦截”（整部影片被禁止），或者进行删减之后影片才能得以通过（部分删剪）。审查制度最严厉的手段是禁止功能，那些被认为不当或有害的内容将被全面禁止/过滤。审查是一种事先限制手段，被事先禁止/过滤的内容将完全失去与观众见面的机会。出于对审查的规避，许多内容在创意和生产阶段也将被生产者自动提前过滤。

第三，中国电影审查的根本属性是一种意识形态管理，以意识形态、价值观与道德观等软标准为核心，兼顾硬标准的要求。所谓软标准，即以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为标准，强调的是影片主题、人物行为背后的动机是否合乎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以思想与精神层面“不可见”的“善/恶”、“是/非”、“对/错”作为判断标准。所谓硬标准，即以“可见”的影像与“可闻”的声音为考察目标，以其对视听感官的刺激程度为判断标准。这些内容同样是道德判断的延伸，但因其可以量化和客观操作，并不涉及直接的是非判断，遵循的是“露不露”、“说没说”的“有/无”原则，所以称之为硬标准。

与其它国家的电影内容控制主要以道德为焦点（性与暴力）不同，中国所实行的国家电影审查制度，其基本属性首先是一种建立在行政管理手段基础上的意识形态管理，它的首要功能是确保主导意识形态和主导伦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和核心地位，在此前提和基础上，同时兼顾维护社会稳定、传承民族文化、促进社会公益等其它功能。这种控制模式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

目前中国电影审查标准分为禁止条款和删剪修改条款两大类。《电影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二十五条规定：“电影片禁止载有下列内容：（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五）宣扬邪教、迷信的；（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七）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这里列举的十种情况被称为“禁载十条”，凡电影的主旨、主题和主要内容违反此列禁止规定，则整部影片都要被禁止。“禁载十条”的内容涉及国家性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思想道德、文化传统等等，虽然并非都直接与意识形态相关，但在中国语境中，从广义角度看它们大多或直接或间接具有某种政治意义，因而可以说具有泛政治化的特点。

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部门规章《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是对于《电影管理条例》电影审查部分的具体执行文件，其第三章第十三条完整采用了《电影管理条例》“禁载十条”的全部内容，作为电影审查时的禁止条款。此外，第三章第十四条还进一步规定了电影审查的九条删剪条款：“（一）曲解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严重违背历史事实；曲解他国历史，不尊重他国文明和风俗习惯；贬损革命领袖、英雄人物、重要历史人物形象；篡改中外名著及名著中重要人物形象的；（二）恶意贬损人民军队、武装警察、公安和司法形象的；（三）夹杂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内容，展现淫乱、强奸、卖淫、嫖娼、性行为、性变态等情节及男女性器官等其他隐秘部位；夹杂肮脏低俗的台词、歌曲、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等；（四）夹杂凶杀、暴力、恐怖内容，颠倒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取向，混淆正义与非正义的基本性质；刻意表现违法犯罪嚣张气焰，具体展示犯罪行为细节，暴露特殊侦查手段；有强烈刺激性的凶杀、血腥、暴力、吸毒、赌博等情节；有虐待俘虏、刑讯逼供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等情节；有过度惊吓恐怖的画面、台词、背景音乐及声音效果；（五）宣扬消极、颓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刻意渲染、夸大民族愚昧落后或社会阴暗面的；（六）鼓吹宗教极端主义，挑起各宗教、教派之间，信教与不信教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伤害群众感情的；（七）宣扬破坏生态环境，虐待动物，捕杀、食用国家保护类动物的；（八）过分表现酗酒、吸烟及其他陋习的；（九）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精神的。”

如果影片仅有个别情节、画面、台词、背景音乐、音响效果等含有上述禁止内容，需要作出相应的删剪。相比于“禁载十条”，删剪条款不仅包含宏观的政治意义上的审查内容，同时增加了道德审查的内容。涉嫌违反基本政治原则的影片可能被完全禁止，而涉嫌违反道德原则的内容在通常情况下，在进行必要的删剪之后仍有通过的可能。

以前述软标准和硬标准的分类方式来看，意识形态判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等软标准在删剪条款中有着核心和基础性的地位。这一点从具体条文的说明和措辞中可以明显看出。在某种意义上说，删剪条款是主导意识形态为电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与道德观制定的基于“是/非”、“对/错”原则的基本规范。除了软标准之外，删剪条款中也有基于“有/无”原则的硬标准的内容。二者作为审查的基本标准是共同存在的。

第四，中国电影审查具有泛政治化的特点。在中国的特定政治体制中，政治与道德历来有着密切的关联。主导意识形态与主导伦理之间存在高度的统一性和整合性，道德内容相应地也具有了政治意义，电影审查中对道德的审查有可能成为一种泛政治化的审查。

审查制的泛政治化主要表现在，高度强调影像与现实之间的对应性。被审查的对象不仅是政治和道德，那些有可能影响现实社会秩序及其思想基础的内容都将被禁止。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叙述应与主导文化的规范基本保持一致，在意识形态、道德观与价值观方面不能与主导文化发生内在冲突。许多假定性与游戏性更强，与主导规范文化在价值观与道德观之间存在冲突的娱乐电影类型，如灾难片、恐怖片、鬼怪片、犯罪片、黑帮片等等，往往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泛政治化还体现在审查标准的双重性上。涉及当下和本土的禁忌内容（如血腥暴力、黑帮犯罪等）往往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而对于非当下、非本土的相同禁忌内容则较为宽容。可见审查体制关注的不仅是影像内容的道德判断本身，同时更为关注的是影像内容与社会现实的对应关系，及其可能产生的对社会稳定、政府形象的负面影响。这种审查的考量与其说是道德性的，不如说是政治性的。

总的来看，中国电影审查是在国家层面，通过行政管理方式来完成的一种意识形态管理。它以禁止/过滤机制为前提，以事先限制为手段，以意识形态、价值观与道德观等软标准为核心，兼顾性与暴力的视听呈现等硬标准要求，具有泛政治化的特征。当前中国的电影控制，

不论是国家审查的主体特征，还是审查形式的手段特征，都相当清晰地表明了我国对于电影内容的高度重视程度，这也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在意识形态及文化中的定位相一致的。

三、当前电影审查制度的困境及转型障碍

当前中国电影在内容管理方面所引发的争议，电影行政管理部门遭遇的进退失据的尴尬困境，其实都与前述中国电影审查的特征直接相关。

首先，我国的电影审查是一种行政控制而非法律控制，审查标准以软标准为核心。行政管理具有与法律控制相似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但是也存在行政管理的一些缺点，比如管理当中的人治倾向，以及标准适用当中的主观化和模糊化。从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部门规章《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中的审查标准来看，不论是作为禁止条款的“禁载十条”，还是作为删剪条款的九条要求，都以软标准即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道德评判为核心，在审查时的标准适用上往往很难准确把握其边界，难以避免出现过度扩展、过度适用或限制面过宽等情况。许多标准的具体意涵本来就相对模糊，为相关部门在进行内容监管时留下了较为充足的解释和适用空间，这多少也使目前的行政管理带有较为明显的人治色彩，在面对具体内容时，审查者对标准的解释和适用还难以完全避免主观性过大、随意性过强的情况。多年来，电影业内人士一直抱怨的审查标准模糊、审查要求难以把握等问题^①，其实都与此直接相关。

其次，在控制手段上，审查形式意味着它主要是一种禁止手段而非疏导手段，依据既定的标准，对那些违反标准的“越轨行为”进行相应的事先限制以及事后惩罚。由于规范化文化中的控制之“度”是单一和固定的，并未针对不同传播媒介、传播渠道和传播对象而弹性变化，这就使得当前的中国电影监管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同一个控制模式却可能同时产生“过度控制”与“欠度控制”并存的现象。

比如近年来的商业大片如《英雄》、《霍元甲》、《无极》在美国都被MPAA定为PG-13级，《功夫》、《满城尽带黄金甲》、《投名状》等更被定为R级，但在中国这些影片连低龄儿童都可以随便观看，没有任何限制。从此意义上说，这对于儿童来说无疑是一种“欠度控制”。但是，对于成年观众来说，一些原本可以增加娱乐性与探索性的内容因迁就儿童而被删除，甚至在创作阶段就因自我审查而被提前过滤。有的影片类型，如恐怖片、灾难片、犯罪片、灵异片等常因保护儿童的理由而被否定，但它们对于成年观众而言却并不必然构成负面影响，这些对于成年观众而言却是一种“过度控制”。

审查制度追求的是“老少皆宜”，即对成人与儿童普遍适用的内容，但在实际操作当中，成人的合法权利常被“保护儿童”的名义侵犯，而儿童也因审查中的“拉平效应”而接触到超过其承受力的内容，其结果是反而同时侵犯和损害了两个群体各自的权利和利益。

在目前的规范文化格局下，要求加强控制的吁求通常比要求适当放宽的呼吁更容易得到实现。在单向性地强化社会控制的同时，艺术创作的空间，以及消费者的文化权利相对而言有可能被缩减和削弱。从权利平衡的角度看，当前的电影控制模式在保护儿童利益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却有可能在客观上限制生产环节的创作自由，损害消费环节成年观众的个体权利。

近些年来，社会上对于实行电影分级制的呼声一直很高，《电影促进法》的起草，中国特色的电影分级办法的制定也一直是民众关注的焦点，但是二者的出台一再被延期。在许多人看来从审查到分级只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变动，但其实它背后包含着许多复杂的考量。电影审查制度与分级制度在内在理念、制度支撑、生存土壤等方面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由于还

^① 《中国电影：左手给希望，右手给绝望？》，《南方周末》2006年11月9日。

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等制度与现实因素的影响，中国目前从审查制转为分级制还存在较大的难度。

首先，从我国电影审查制度的意识形态属性来看，放弃禁止功能的可能性不大。以美国为代表的电影分级制完全放弃了禁止功能，理论上讲，没有任何一部影片会因其内容被禁止上映，分级委员会甚至连删剪的权力也已放弃，它所做的只是给影片贴上不同级别的警示标签。那些实行审查与分级并行制的国家和地区，其审查/禁止功能或者只剩下象征意义，或者也已经相当微弱（如英国、澳大利亚、韩国、中国香港等）。从审查到分级，意味着基本上要放弃对影片的禁止功能，而中国所实行的国家电影审查制度，其基本属性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管理，它的首要功能是确保主导意识形态和主导伦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和核心地位，这与西方电影内容控制以道德为焦点存在本质区别。禁止手段是审查制度的核心功能，从此意义上看，目前我国转而施行完全放弃禁止功能的分级制的可能性并不大。

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点是，中国的电影管理体制其实是整体的传媒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西方国家传媒大多实行登记备案，对媒介内容主要以事后惩罚为主的管理不同，我国一直以来对大众传播媒介实行的是许可制度，对媒介内容也有一整套的事先监控体系，电影的许可制度仅是全面的媒介许可（包括新闻出版许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以意识形态管理为核心的目标体系当中，中国电影不可能单独脱离目前的传媒体制，完全放弃对于媒介内容的审查/禁止功能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其次，从法律角度看，电影分级结果可能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相冲突。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可以实行审查与分级并行制，即先通过审查，再进行分级，这样可以分别照顾到成人与儿童各自的利益。近两年也曾经有类似的消息传出，^①但迄今为止未有下文。事实上，不论是“二级”电影还是“三级”电影，都可能与我国的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冲突。

所谓“二级”或“三级”电影，意味着除了可供儿童观看的低分级影片之外，可以存在主要面向成人的高分级内容，具体来说，通常指更多的、更具刺激性的性、暴力以及神鬼灵异等内容。在分级体系下，这些内容至少应该得到比目前的审查标准更宽容的对待。然而事实是，按照我国的现行法律，这些内容即使是以成年人为目标进行生产和传播也是要受到严格控制的。在我国的传播法体系中，不论是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或是由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决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及其它关于音像制品、电影、出版物、广播电视等内容的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系列部门规章当中，与“三级片”内容相似的出版材料都属于应被严厉查禁的淫秽、色情出版物，其生产与传播都属于要受到法律制裁的违法行为。那么，在可能的“二级”或“三级”分类办法中，如何将那些包含更多性、暴力以及神鬼灵异内容的专供成人观看的影片与法律禁止的淫秽色情出版物相区别？在操作层面，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

在法律层面，“二级”或“三级”分类办法极有可能与中国现行各类法律法规直接冲突。这一点，单靠作为一级行政管理部门的广电总局本身是无法独立解决的。或许正因如此，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一再声明：“我们要进行的分级和社会上一些人对分级的认识有所不同。必须强调，分级绝不是说要在电影中允许对色情和暴力不恰当的渲染，更不允许三级片的存在。”^②然而，如果在未来可能的分级办法当中，面向成人的影片并不包含比现在更多的禁忌性内容，那么分级又有何意义呢？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中国电影分级办法为什么这么难以出台，恐怕就不难理解了。

① 2009年初，电影学者郑洞天透露，国家广电总局已经将最后定稿的《电影促进法》报送国务院，其中就包括电影分级相关内容。虽然没有按照国外惯例分为“三级”，但如果此法通过，内地电影起码可以分为“二级”。《东方早报》，2009年1月13日。

② 《童刚：电影分级不允许三级片存在》，《北京商报》，2009年2月2日。

此外，电影审查制与分级制的文化特征存在极大差异，在当前的规范文化中，可能暂时还缺少分级制的土壤。审查制是规范文化的产物，其内在文化逻辑是集体本位、伦理中心，强调的是等级性、权威性，对媒介与现实的关系持反映论和决定性态度，而分级制是多元文化的产物，其内在文化逻辑是个体本体、快感中心，对大众性、犯禁性持宽容态度，强调娱乐媒介与现实之间的假定性和游戏性。支撑分级制生存的基本元素大多与规范文化之间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在本土电影制作中，具有明显犯禁性倾向的类型片，如灾难片、黑帮片、恐怖片、灵异片等类型片往往受到抑制。由于对现实与历史的阐释须遵循规范文化的基本要求，因而电影娱乐的游戏性、假定性和虚拟性也不太可能得到充分发挥。中国电影暂时还不太可能出现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天马行空的纵横想像，不太可能出现对规范与权威的嘲弄和颠覆，不太可能出现百无禁忌的欲望宣泄与快感满足。这是由两种文化的内在矛盾决定的。

审查制与分级制背后的哲学基础也存在本质性的不同。审查制度认同“善优先于权利”，以代表着“善”的特定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道德为中心，并以此为绝对标尺来对所有内容进行衡量和筛选，而分级制度认同“权利优先于善”，以个体权利为中心，主张国家的道德中立和个体的道德独立，尊重个体进行道德选择的权利，肯定多元化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道德的合理性，对某种作为规范的“善”保持警惕，基本放弃对内容进行过滤和筛选，针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的弹性标准，以维护不同群体各自的权利。审查制遵循的是“积极自由”原则，即“追求……的自由”（free for……），为了维护作为规范的“善”原则，国家可以通过强制的手段改造个体并使其遵从“善”原则，强调的是个体服从“善”原则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电影审查制度背后的观念基础。而分级制遵循的则是“消极自由”原则，即“免于……的自由”（free from……），强调的是尊重个体的独立选择，使其免于某种外部干预的权利。这也是分级制主动放弃审查权力的观念基础。显然，当前中国的制度与观念文化基本上以前者为基础，后者还并不具备充分的合法性。

不论是审查制还是分级制，它们都是特定制度与文化的产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制度和与文化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审查制到分级制的转变，远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当前中国电影监管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既是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复杂问题构成的客观现实，但另一方面，也是基于规范文化的电影控制模式与日益分化和多元化的思想与道德状况之间存在矛盾的现实反映。总的来说，中国电影娱乐的监管目前暂时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在个体需求与社会需要之间，在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在规范性文化与多元化现实之间取得有效平衡的控制模式。同时，中国电影所实行的国家审查制度决定了，电影监管模式的任何重大选择与变革，都不可能由具体监管或执行部门独立做出，而是必须在国家层面根据具体的现实国情进行综合判断和整体衡量后才能决定，这无疑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四、西方电影内容控制模式转型的启示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曾长期实行电影审查制度，但是从1960年代末开始，西方国家在电影管理方面出现了一个普遍的解管制浪潮，具体表现为：在控制形式上，从严厉的内容审查制度，转向内容分级制度；在控制手段上，从事先限制转向事后惩罚，从行政与行业控制，转向法律控制；在控制的功能上，从内容截流和过滤功能，转向内容疏导和分流功能；在控制尺度上，从对禁忌内容的面向所有观众的绝对禁止，转向放宽甚至取消禁忌要求，针对不同受众群体实行差异化控制；在控制标准上，从“不可见”的思想与道德的软标准转向“可见的”的视听层面的硬标准，从单一标准和绝对标尺，转向多元和弹性的标尺，寻求在不同主体的权利与利益之间的相对平衡。

新的控制模式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一个基础/核心，两条底线/必要条件”，即以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以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为核心，以不能侵犯儿童和不同意的成

年人的权利为大众(娱乐)传播的底线,以侵犯了儿童和不同意的成年人的权利为对大众(娱乐)传播进行干预的必要条件。西方新的电影内容控制模式以保护个体权利为中心,兼顾维护社会秩序的要求,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从近四十年来世界电影内容控制的趋势来看,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同这样的观点:在不侵犯他人权利和并未对社会构成严重和实际危害的前提下,尊重每个公民自己的道德选择权利。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保护公民个体自由这两种利益之间,应尽量取得相对的平衡。

电影内容控制模式的转型首先从西方开始,自1980、1990年代后逐渐得到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包括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和采纳。从世界范围来看,就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电影内容控制模式的转型,从电影审查制到电影分级制的转变,总是与社会政治的变革和转型有着密切关联,前者通常是后者的直接产物。在完成社会政治变革与转型之前,在缺乏现实的社会政治与文化体制支撑的情况下,这套控制模式被自上而下主动采纳并推行的可能性很小。

从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和地区电影控制模式转型的实践来看,电影分级制度的选择与运行,通常以几个必要的政治与文化前提作为基础:在文化层面,对个体快感及媒介娱乐的观念认同和合法性保障;在伦理层面,国家在道德上保持中立,从私领域的个人生活中退场,法律与道德相分离,不再介入对个体生活的道德判断,保障个体的道德独立及多样化道德的选择权利;在政治体制方面,国家与政府的权力得到有效制衡,社会不同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道德倾向有合法和通畅的表达渠道;在社会层面,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社会秩序基本稳定,法制体系健全并能得到良好执行。

从这个角度上看,在西方社会运转良好的控制模式未必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是“立服见效”的“灵丹妙药”,恐怕亦非在一夜之间便可以一蹴而就的效仿捷径。在尚未具备前述现实政治、文化与社会条件的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作为管理者的政府本身就缺乏相应的变革动力和制度支撑,另一方面,如果简单盲目照搬这套控制方案,可能未必定然会起到良好的社会效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以上结论可以引发我们对于中国电影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它向我们揭示了世界范围内电影内容控制的基本发展趋势,这些趋势对于未来中国电影管理体制的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电影内容的控制模式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和环境的支持,不同控制模式的选择总是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与相应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因此,就中国电影管理的相关改革来说,或许还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以后,中国电影的管理体制一直在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与西方类似的是,中国的电影管理改革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解管制的特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弱化管理的特征。与西方主要表现为内容上的解管制不同(其体制本来就是私营的,不存在市场管制问题),中国电影主要是体制上的弱化管理,兼顾内容上的弱化管理,即一方面不断降低电影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另一方面,适当放宽电影内容的审查尺度。单就内容审查而言,近几年一些体制内作品(比如《孔雀》、《青红》、《红颜》、《盲山》、《观音山》等)在风格与内容上与前几年的独立制作已经比较接近,虽然有时候可能仍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个案事件,但管理部门的控制整体来讲还是在趋向宽松。^①

随着近几年产业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电影已经越来越像一个“产业”。多主体投资、多元化融资、多样化经营已经开始成为电影产业的基本模式,社会资本、民营资本、海外资本对电影业的投资继续增长。近几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取得的巨大进步已经为社会所瞩目,

^① 詹庆生、尹鸿:《中国独立影像发展备忘》,载《文艺争鸣》,2007(5)。

甚至已经引起国际范围的高度关注，中国电影市场已被誉为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钻石矿”。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百亿大关。产业化改革8年以来，全国城市票房增长了10倍，年均增幅超过35%。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电影票房增幅最高、增长最快的市场。

回头来看，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固然是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大力推进文化产业、民众文化需求旺盛等因素为前提和基础，但另一方面，这与电影行业管理部门所推动的产业化改革，在市场准入、内容审查等方面的弱化管理也有直接的关系。

近几年来，社会上要求实行电影分级制度的呼声一直比较强烈，但分级制的出台时间却一再被推迟，“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相关决策者对外所作的说明也多年如一日的相似，这些都引发了许多不满和争议。但是，至少有一点，相关管理机构并没有完全否定分级制度的合理性，而只是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实行分级制的时机还并不成熟，条件并不充分。这一解释或许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是应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合理性。

即使从西方角度看，西方社会的电影控制转型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和发展过程，在具备了相应的种种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才得以实施，它并不是某个行政机构或行业部门一厢情愿的变革结果，而是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综合社会条件作用下的一个“水到渠成”的制度与文化的产物，是与西方当代社会基本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一种控制机制。

作为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有着六十多年政治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有自己具体而特殊的现实国情。而且，中国还处在一个巨大的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问题还非常复杂甚至相当尖锐，并不像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成熟和定型的社会发展阶段。在维护国家利益，坚持政治原则，传承民族文化，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文化繁荣，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等各种不同的社会目标之间，国家需要进行综合的考量和谨慎的平衡。

2006年9月13日，中国公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纲要》特别指出“十一五”期间将加强文化立法步伐，《电影促进法》被明确列入需要抓紧研究制定的文化立法项目之一。尽管该法的出台因种种原因再次被延期，但它至少表明，国家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决策者已经清楚认识到了电影立法对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性。虽然目前中国电影的管理仍以行政管理为主，但是，相信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未来通过法律来对大众传媒进行管理将逐渐取代目前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

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家第一次从战略高度对振兴文化产业作出整体规划和重大部署，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10年1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推动我国电影产业跨越式发展，实现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的历史性转变。这些法规文件，充分显示出了国家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所寄予的高度重视。尽管还存在各种问题，但中国电影总体上是在朝着一个良性发展轨道在运行。

毋庸置疑的是，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加强对个体权利的保护，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和保护公民个体自由两种不同利益之间应尽量取得相对的平衡，在基本保证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个体和社会群体的自由。对于电影艺术而言，保障艺术创造的自由和艺术接受的多样化选择，这也应该是未来中国电影管理的发展方向。正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所证明的那样，不论未来的电影管理以何种具体形态呈现，它都应该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影视研究专题

美国政府的支持与好莱坞的全球扩张

U.S. Government Support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Hollywood

彭侃^①

中文摘要：本文试图从具体的史实出发，梳理美国政府在好莱坞全球扩张的历程所提供的支持，并分析这些支持背后的原因。从191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便以内外有别的法律体系为依托，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通过外交手段、税收杠杆、资金和设施服务等方式扶持好莱坞电影业的海外扩张。其中的史实证明，好莱坞之所以能不断地推进其全球化的脚步，主导全球的电影工业，并不单纯是依靠其自身的产业力量和电影产品本身的魅力，也离不开美国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而美国政府对好莱坞全方位的帮助，则是基于好莱坞电影所能发挥的重要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价值。

关键词：好莱坞，美国政府，海外扩张，电影产业

Abstract: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historical facts that how U.S. Government supports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Hollywood and analyses the reasons behind. Ever since 1910, U.S. Government relying on the law system that treats the domestic and the overseas differently, and depending on its enorm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supports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Hollywood by diplomatic methods, tax leverage, funding and facility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the successful globalization of Hollywood and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global film industry,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its industry and the charm of its products, but also because of the role played by U.S.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U.S. Government's support to Hollywood, bases on Hollywood's significant econom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values.

Key Words: Hollywood, U.S. Government, overseas expansion, film industry

^① 彭侃，香港浸会大学博士候选人。

从1920年代以来，好莱坞便一直主导着世界电影市场，在其冲击下，很多国家、地区的本土电影业几乎陷入崩溃的境地，而因为电影所蕴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好莱坞更被视为美国推行文化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好莱坞的主导性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学者们从多个方面进行过分析，但这些分析多集中于好莱坞产业机制的内部优越性，而较少去挖掘好莱坞的外部支持机制，尤其对好莱坞与美国政府之间关系缺乏剖析。而事实上，美国政府在帮助好莱坞抢占海外市场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将从基本史实出发，力图梳理美国政府帮助好莱坞开拓海外市场的举措，并尝试分析其背后蕴含的逻辑。对于希望推动中国电影“走出去”以提振文化软实力的中国政府而言，从本文所分析的美国政府扶持好莱坞的策略中，应该也能得到一些有益启示。

一、美国政府如何支持好莱坞走向世界？

尽管在美国国内市场，好莱坞和华盛顿在对电影业进行控制的问题上曾斗得如火如荼。但面对海外市场，美国政府和电影业之间则表现出了紧密一致的配合，这种配合为好莱坞电影的全球扩张提供了重要助推力。具体而言，美国政府为好莱坞所提供的帮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颁布法律支持好莱坞面向海外市场的联合和垄断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优胜劣汰中胜出的少数大企业，往往互相协定或联合，垄断一些商品的生产、销售和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利润。垄断是一种排除或限制竞争的现象，但一定的市场竞争被认为是有益的。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用立法等手段牵制垄断。美国也早在1890年便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该法案规定任何公司“垄断，或试图垄断，或与其它的个人或公司抑或外国组织联合或共谋，以求垄断贸易和各州范围内的商业”均属非法。^①1914年美国又通过了《克莱顿法案》(*Clayton Antitrust Act*)，厘清了一些典型的反竞争行为，如合谋定价，盲目投标和捆绑销售等，^②并采取措施对其进行打击。这些反竞争行为也普遍存在于美国电影业中，因此美国法院曾多次对国内电影企业进行垄断调查，如于1918年判决爱迪生等建立的托拉斯组织电影专利公司(*The 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违法，要求其解散，1948年针对八大制片厂垄断行为作出的“派拉蒙判决”更对美国电影业产生了巨大影响。^③而这些判决的初衷都是为了防止好莱坞大制片厂对国内市场的过分垄断。

尽管美国一直对国内贸易施行反垄断的法律和政策，但针对国外情况则截然相反了。美国政府声称“由于美国公司面对全球范围的竞争，对手常常是外国的卡特尔，而这些国家并没有限制这些垄断组织的法律。”“在国际贸易中卡特尔普遍化的情况下，为对外国购买联盟形成压力，或为抵制外国卡特尔的竞争威胁，或为实现规模经济，有必要对出口联盟实施反垄断豁免。”^④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国会先后制定了三部法律，对美国企业对外贸易活动中的垄断行为给予法律豁免，容许、鼓励与扶持对外贸易联盟到国外从事垄断经营。其中最

^① 引自维基百科相关词条：http://en.wikipedia.org/wiki/Sherman_Antitrust_Act.

^② Manjunath Pendakue, "Hollywood and the State: The American Film Industry Cartel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Paul McDonald and Janet Wasko, Eds., *The Contemporary Hollywood Film Industry*, (Malden, MA;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p.185.

^③ 参见[美]巴里·利特曼：《大电影产业》，尹鸿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7页。

^④ E. Thomas Sullivan and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Policy and Procedure: Cases, Materials, Problems*, (Charlottesville, Va.: Lexis Law Pub, 1999). 转引自吴玉岭，赵耀：《论美国垄断法的豁免制度及其适用限制》，《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27页。

重要的是1918年通过的韦伯-波莫雷内出口法（*Webb-Pomerene Export Act*），该法规定，只要联盟的唯一目的是增加出口，且(1)联盟的行为不限制美国国内的贸易或不限制国内竞争者的外贸出口；(2)不在美国国内“人为地或故意提高或压低价格”，或“实质地减少竞争或限制贸易”，就对联盟免于采取反垄断措施。^①这部法案在1982年被修订为《出口贸易公司法案》（*Export Trading Company Act*）并一直沿用至今。它在美国电影业征战海外的过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80年，时任美国电影协会主席的杰克·瓦伦蒂（Jack Valenti）在参加国会关于修订该法举行的听证会时如此阐述这部法案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该法案，那么美国的电影、电视业很可能，甚至是绝对无法像现在这样得到国外观众的尊重和欣赏，美国电影将难以输入到世界上120个国家。如果没有这个法案，美国电影业将无法每年为美国贡献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事实上，在现存的受韦伯-波莫雷内出口法保护的36个协会中，电影业的收入占其中47%。^②

事实上，几大好莱坞制片厂组成的美国电影制片和发行商协会（后于1945年更名为美国电影协会，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缩写为MPAA），^③这一卡特尔组织正是在这一法案的庇护下才得以存活，也是受益最多的协会。它成立于1922年，几大制片厂每年都按照其利润支付一定的比例给协会以维持其运作。而它则作为“传声筒和代言人”为大制片厂争取利益。1945年，美国电影协会又成立了专门的国际业务部门美国电影出口协会（Motion Pictures Export Association），目的是“在世界市场上重建美国电影，并应对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避免其设置障碍，限制进口美国电影。”它自称为“小国务院”，在布鲁塞尔、新德里、里约热内卢、新加坡、墨西哥城、多伦多和雅加达等地均建立了分支机构，担任驻外代表的往往是有深厚政治背景的人物，如在1946-1949年间担任驻巴黎代表的弗兰克·麦卡锡曾是马歇尔将军的前助理，并担任过助理国务卿。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电影出口协会是在二战之后，美国电影出口遭遇困难情况下，政府安排各大制片厂首脑前往欧洲考察一番后成立的。^④1994年，这一协会又更名为电影协会（Motion Pictures Association，缩写为MPA），反映出其尽量淡化美国身份以更好地在全球市场上为美国电影开疆拓土的企图。

如前所述，美国对出口联盟实行反垄断豁免的理由是对抗国外的卡特尔组织，但事实上世界其它国家的电影业大多处在相对分散经营的状况，缺乏像好莱坞大制片厂这样垂直整合的大企业，无力形成垄断组织与好莱坞对抗。而原本实力雄厚的好莱坞各大制片厂联合后更产生了压倒性优势，势如破竹地抢占着海外市场。有趣的是，MPA往往在美国之外的地方开会，例如法国戛纳，以防止美国国内的独立电影公司控告其共谋定价影响了国内的电影交易。^⑤这些美国政府在国内严厉打击的垄断行为，在面向国外市场却为政府所大力提倡推动，反映出美国“内外有别”的双重法律标准。而依靠这些法律，好莱坞的电影巨头实现了紧密联合，赋予了美国电影对外输出时强大的竞争力。

2、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版权保护机制帮助好莱坞应对侵权威胁

对于母拷贝制作成本非常高昂，但复制成本却非常低廉的好莱坞电影来说，盗版等侵权

^① E. Thomas Sullivan and Herbert Hovenkamp, *Antitrust Law, Policy and Procedure: Cases, Materials, Problems*, (Charlottesville, Va.: Lexis Law Pub, 1999). 转引自吴玉岭，赵耀：《论美国垄断法的豁免制度及其适用限制》，《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27页。

^② Jack Valenti, "Webb-Pomerene: The Great U.S Ally in the Battle for World Trade,"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vol.47, no.1, 1980, p.26.

^③ 美国电影协会最初的成员公司包括华纳兄弟、派拉蒙影业、二十世纪福克斯、米高梅、雷电华、哥伦比亚影业、环球公司和联艺，而经过一番整合和所有权变动，目前协会的成员公司包括派拉蒙影业，索尼娱乐有限公司，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NBC环球，沃特·迪士尼影业公司和华纳兄弟娱乐有限公司。

^④ Paul Swan, "The Little State Department: Hollywood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in the Postwar World,"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vol. 29, issue.1 (Apr, 1991).

^⑤ 同上。

行为是对其利益的极大威胁。而1960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面临的侵权威胁和保护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好莱坞对国外市场越来越倚重,然而即便是实力雄厚的好莱坞大制片厂要跨国打击盗版也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随着电视、录像带、DVD和互联网等新媒介的不断浮现,电影盗版变得越来越简便和多样化,也越来越容易传播。正因为如此,好莱坞日益强调版权保护议题,不断通过美国电影协会等组织的游说向政府施加影响,希望借助美国政府的力量来打击盗版,维护其经济利益。而美国政府也很早就认识到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将技术和知识创新视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最大财源。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已构建了一套完善的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致力于维护好莱坞电影等创意经济产业的全球利益。

面向国内,美国构建了一整套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规体系,并设立了众多的知识产权保护部门。其中与电影业关系最为密切的法案就有《版权法》(Copyright Law, 1976)、《视觉艺术家权利法案》(Visual Art Right Act, 1990)、《电子盗版禁止法》(No Electronic Theft Act, 1997)、《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案》(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1998)等。国会还会适时地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对这些法规进行修改,如1998年对《版权法》进行了修改,将个人版权期限和法人版权期限分别延长20年。^①这对于片库中有数以千计老电影的好莱坞大制片厂来说无疑意味着更多盈利空间。为了将这些法规落到实处,美国政府设立了诸多职能部门,其中国会图书馆下属的版权办公室负责版权的登记、申请、审核等工作;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负责涉及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谈判;海关主要负责进出口产品的知识产权稽查,并于2003年联合其它10多个政府部门成立了全美知识产权协调中心,专门负责处理在进出口贸易中涉及知识产权的事宜。^②为了协调各部门之间工作,近年来历届总统往往还会在白宫设立专门的办公室,如奥巴马内阁成立了美国知识产权执行协调办公室^③领导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这些部门各司其职又紧密合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网络体系。

面向国外,美国政府不断积极促进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缔结,并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其它国家加强对美国知识产品的保护。美国于1989年成为了《伯尔尼公约》(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的第80个缔约国。该公约是1886年签署于瑞士伯尔尼的关于著作权保护的条约。有趣的是美国虽然最初派代表参加了缔约大会,但却拒绝签署合约。据学者的研究,这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美国认为其出版业远不如英法等欧洲国家发达,参加公约对自身不利。而美国加入《伯尔尼公约》的原因则在于1980年代之后,其技术、经济上的世界领先地位日益稳固,且又面临着其它国家日益严重的知识产权威胁,亟需国际性协定的保护。^④签署《伯尔尼公约》后,美国认为其过于简略,且主要针对的是著作权,为了应对国际贸易中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问题并保证自身的主导地位,美国牵头发起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这项协议于1995年成为了WTO协定的附属协议之一,任何要加入WTO的国家都必须签署这项协议,保证本国符合其所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⑤这些标准是基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状况建立的,要求较高,而发展中国家在加入WTO时就不不得不对本国的法律进行修订以满足标准。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美国得以强迫其它国家采用美国主导制定的标准,虽然一直以来围绕这些标准的争议从未平息。

^① 参见王军:《美国通过版权保护立法扶持影视产业》,新华网洛杉矶7月13日电, <http://news.163.com/10/0714/14/6BIDMFDH000146BC.html>。

^② 详细介绍可参加该机构的官方网站: <http://www.ice.gov/iprcenter/>。

^③ 关于美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具体职能部门介绍,可参见美国知识产权执行协调办公室制定的: *2010 Joint Strategic Pla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itehouse.gov/omb/intellectualproperty/>。

^④ Copycense Editorial, *Foreign Affairs As The New Copyright Law*, Part 1 of 3, May 28,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pycense.com/2009/05/foreign_affairs_as_the_new_copyright_law_part_1_of_3.html。

^⑤ Copycense Editorial, *Foreign Affairs As The New Copyright Law*, Part 2 of 3, June 2,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pycense.com/2009/06/foreign_affairs_as_the_new_copyright_law_part_2_of_3.html。

美国不仅通过国际性协议要求其它国家增强版权保护，还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监视其它国家版权保护的执行情况，并发布专门报告。在1988年前，主要是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发起针对外国侵犯版权现象的调查，其中包括成立于1984年的美国国际知识产权联盟（*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lliance*，缩写为IIPA），美国电影业的两大组织美国电影协会和独立电影电视联盟都是这一联盟的成员。联盟成立后便代表其成员协会的利益调查世界各国的版权保护状况，发布调查报告，此类报告因其法律依据是美国修订后的《贸易法》第301部分，故均名为301报告。1985年，IIPA发布报告指责韩国的盗版书、音乐、电影和软件给美国造成了1.5亿美元的损失，在其推动下，隶属于总统执行办公室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缩写为USTR）要求韩国修改其版权保护法律。韩国辩称基于其国家发展程度不适用于立即修改版权法律。美国便威胁要撤销给予韩国的关税普惠制待遇。最终韩国政府妥协，于1986年7月和美国达成协议，承诺修改版权法，并加入了国际版权条约。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成功利用301报告逼迫外国政府加强版权保护。^①为了防止个别企业或行业发起的301调查会引来外国政府对该企业或行业的报复。美国国会又于1988年修订《综合贸易和竞争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规定由USTR统一发布关于外国版权保护情况的调查报告，IIPA等组织则向其提供资料和数据。从1989年起，USTR每年发布《特别301报告》（*Special 301 Report*），从美国利益出发调查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并在报告中将一些其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堪忧的国家列为“重点观察名单”和“观察名单”，供政府参考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②一个与好莱坞有关的例子是，USTR的《特别301报告》长期将中国列为“重点观察名单”，指责中国的版权保护状况，促成了美国政府2007年向WTO就中国境内对好莱坞电影的发行问题提起诉讼。^③正如美国政府自己所总结的，其面向国外维护知识产权的策略是“借助贸易对话和问题解决机制，通过《特别301报告》这样的报告表达美国的关切，敦促贸易伙伴依据国际性的贸易协议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当必要的时候，会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主张我们的权利。”^④可以说，这种策略在美国政府的强力推进下，正日益有效地维护着好莱坞电影等美国知识产品的全球利益。

3、运用外交手段帮助好莱坞消除海外贸易壁垒

美国电影出口并不是一路畅通的，需要突破其它国家的关税和税收壁垒，配额制以及其它保护民族电影业的措施。为了突破这些障碍，长期以来，好莱坞电影业一直与美国的贸易与外交部门保持紧密的协作，商业部，美国贸易代表、美国大使馆乃至美国总统都为美国电影进军海外提供了很多外交帮助。

最基本的外交帮助体现在搜集市场信息上，早在1926年，美国商务部便专门成立了电影分部，其职责包括派遣代理到国外充任整个电影业的“眼睛”，依托使领馆等外交机构搜集当地的市场信息，以促进对外贸易。该部门从1927年1月开始定期发表有关世界各国电影市场的调查报告，而它的第一份报告便是关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在其发刊宗旨中，明确宣布这是美国政府旨在帮助美国电影业开辟海外市场的举措，该报告对中国电影市场调查非常细致，从中国电影银幕、电影观众的数量和分布，到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从中国电影法规和媒体方面的状况到中国人的观影习惯及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都有深入的分析。

^① Copycense Editorial, *Foreign Affairs As The New Copyright Law*, Part 2 of 3, June 2,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www.copycense.com/2009/06/foreign_affairs_as_the_new_copyright_law_part_2_of_3.html.

^② 同上。

^③ 关于这一诉讼的详情，可参见《电影艺术》2010年第3期的系列文章。

^④ *2010 Joint Strategic Pla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Enforc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www.whitehouse.gov/omb/intellectualproperty/>.

①这样的市场报告对好莱坞制片厂了解国外的市场状况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还会基于调查针对外国市场的限制制定相应的对策。

1920、30年代，面对好莱坞电影的猛烈攻势，很多欧洲国家实行了电影配额制度，如法国实行了按1比4的比例放映法国和美国电影的配额制度，对此美国政府威胁要收回法国的债务，并对所有的法国商品增收关税，美国电影协会则威胁要发起对所有法国电影的抵制行动。经过一番讨价还价，1936年两国最终达成协议，法国同意减少对电影进口的限制，以换取更大范围的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关税减免。^②又如二战之后，欧洲各国正处于一种货币脆弱不堪、汇兑问题严重的状态，因此各国政府针对进口美国电影从而导致宝贵的美元大量流失的状况采取了限制措施。如何将英镑、法郎和马克等形式的票房收入兑换成美元汇到美国，成了美国电影出口商的一大难题，于是1948年9月，美国协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中的经济复兴部门开始实行一项国际媒介担保计划，其中的任务之一便是帮助美国出口海外的电影回款。^③

美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强大实力，使其可以在贸易谈判中对它国施加压力，用资本和技术捆绑好莱坞电影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加拿大是这方面的突出案例，长期以来，美国电影协会旗下的大电影公司直接向加拿大发行电影，直接拥有电影院，并在渥太华和华盛顿展开积极的游说以防止加拿大通过对抗性政策。结果，二战以来，加拿大实际成了美国本土电影市场的一部分，加拿大本土电影如果不通过美国大公司，往往在其本国市场都得不到发行。加拿大也曾试图采取措施扭转这种局面，但终究无力回天。其中最激烈的一次行动是1987年，加拿大起草了《联邦发行法案》，试图用法律的方式重构市场，但议会最终没有通过此项法案，因为杰克·瓦伦蒂直接通过美国总统里根游说加拿大总理穆罗尼，美国参议院也向穆罗尼寄信表达“强烈的反对”。美国参议院此时正在审议考虑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借势在此法案上大做文章，指责这是一种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导致美加两国无法达成自由贸易协议。^④在这种威胁下，加拿大政府不得不舍弃对电影业的保护。

在更广泛的国际条约谈判中，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等，美国政府也尽力保护美国电影业。二战之后，在美国倡导下，23个国家签订了“关贸总协定”，旨在取消关税、税收等阻碍国际贸易的壁垒，在其后几十年里，围绕这个协议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贸易谈判，而从谈判开始，美国便企图把电影和电视引进“关贸总协定”的范畴，这样电影就可以跟其它产品一样在全世界自由贸易，这引起了很多欧洲国家的激烈反对。他们辩称电影的独特文化本质使其有别于一般国际贸易中的货物和服务，坚持有权通过一整套补贴和配额制度来保护本国电影和电视业。而美国则宣称电影只是一种文化商品。在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谈判中，将影视业引入“关贸总协定”成为事关谈判成败的最后议题，杰克·瓦伦蒂四处游说，欧洲和美国的电影人在报纸上展开了口诛笔伐，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亲自出面干预，一再与欧洲领导人进行会晤。最后在谈判面临破产的情况下，美国方面才做出让步，这一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但时至今日，关于影视业贸易争端的战火仍一次次在美国电影协会的策动下重新燃起。^⑤

4、适时推出减税政策推动国内外资本对美国电影业的投资

① 参见尹鸿，萧志伟：“好莱坞的全球化策略与中国电影的发展”，《尹鸿自选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4页。

② Jens Ulf-Moller, *Hollywood's Film Wars with France*, (Rochester, NY: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1), p.47.

③ 参见 Paul Swan, *The little State Department*, 1991.

④ Manjunath Pendakur, *Canadian Dreams and American Contro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nadian Film Industr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⑤ 参见[英]大卫·普特南：《不宣而战——好莱坞VS全世界》，李欣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税收政策是国家推动或控制某个行业发展的重要杠杆。而在美国政府的税收政策中,电影业一直是被优惠扶持的对象,尤其当电影业遭遇低潮时,美国政府更会推出大幅的税收减免政策。如1960年代末好莱坞在电视业的冲击下遭遇了观众下降、市场萎缩的窘境时,美国1971年的《收入法》(Revenue Act of 1971)便将电影电视业的投资纳入了投资税收优惠的范围,根据该法律,美国公司对美国境内的任何有形资产(包括电影电视节目)投资可以获得7%的减税。例如一家公司投资5000万美元在电影制作上,那么这一年度该公司便能减免350万美元的收入税。个人对电影的投资也可获得免税(该项条款到1976年废除)。^①这些减税政策一直维持到1980年代中期,对美国电影业的融资起到了很强的促进作用,尤其激发了个人投资电影的热情。减税政策也变相降低了好莱坞大制片厂的运营成本,据统计,仅1983年迪士尼公司就从减税政策中节省1000万美元成本,MCA节省了2760万美元,华纳兄弟更节省了4250万美元成本。^②

1980年代以来,随着好莱坞从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生产和国际分配网模式”进化为“跨国生产和分配网模式”,^③变得越来越倚重于海外市场,而且一些国家如加拿大、俄罗斯、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提供了丰厚的税收优惠和扶持政策以吸引好莱坞大制片厂到当地拍片,好莱坞出现了明显的“外逃制片”的趋势。^④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片在海外拍摄,利用外国廉价人力和技术资源进行后期制作等,相应地造成美国国内电影从业人员的就业问题。为了应对这种现象,美国政府对电影业采取了诸多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吸引资本投资国内电影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如在2004年颁布的《美国工作机会创造法案》(The American Jobs Creation Act of 2004)中有一条专门针对电影的税收优惠政策,规定任何成本在1500万美元以下的,且其75%以上的成本用以支付制片人、导演、演员和工作人员工资的电影制作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而在一些工资较低的地区,如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伊利诺伊州等,可将享受税收减免的投资上限提高至2000万美元。而后在电影界的要求下,购买剧本和其它创意性道具的花费也被纳入工资成本中,使享受税收优惠更加容易。^⑤而在各州,为了吸引电影在本州拍摄和制作以创造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更是常见,如表1所示,各州给予电影业的税收政策可谓涵盖了电影从前期准备到后期制作的各个环节,而这对于降低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成本,提高各类资本投资电影业的热情,从而增强好莱坞电影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表1 美国一些州对电影制作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⑥

加州	2009年通过了一项新的税收政策,于2011年生效,政策规定电影制作时的“线下成本”(技术人员的工资、技术设备和剧组的酬劳)可享受20%的减税,而成本在1百万到1千万美元之间的电影可享受25%的减税。但该计划每年的额度为1亿美元,且税收优惠只给予成本在7500万美元以下的影片。
佛罗里达州	2001年1月1日起,销售或租赁电影、电视和录音设备不征税;出租不动产用于电影的拍摄不征税。2007年一项新的税收政策规定,任何符合条件的成本在62.5万美元以上的电影制作可享受15-22%的减税。而成本在10万到62.5

^① Thomas H. Guback, Government Support to the Film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Film: Audiences, Economics and Law Vol.3*, Bruce A. Austin, Ed., (Norwood: Ablex, 1987), pp.98-99.

^② 数据源自这些公司的年报。转引自 Thomas H. Guback, Government Support to the Film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p.100.

^③ 参见何建平:《好莱坞电影机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4页。

^④ Greg Elmer and Mike Gasher, Eds., *Contracting Out Hollywood: Runaway Productions and Foreign Location Shooting*,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⑤ *The American Jobs Creation Act Of 2004*, http://www.usa-investment-tax.com/AJCA_2004.asp.

^⑥ 整理自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 Tax Site: Legislative Support for Film Production*, http://www.usa-investment-tax.com/legislative_support_film.asp.

	万之间的电影或纪录片（且超过70分钟），可获得15-17%的减税。
伊利诺伊州	2006年5月1日起，在伊利诺伊州拍摄和后期制作的电影，可获20%的减税。
路易斯安那州	从2002年起，该州对电影制作实行了三项主要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一项规定该州的电影公司可享受销售与使用税豁免（要求公司支出在25万以上）；在该州拍摄电影使用当地劳动力的成本，制片成本超过30万美元但低于100万美元的，可享受10%的减税，而成本超过100万美元，可享受20%；总部设在该州的电影公司，且拍摄电影的支出超过30万美元，可享受25%的减税，2009年，这项额度提高到了30%。
密歇根州	2008年4月起该州实行的税收政策规定：在该州制作电影（成本5万美元以上）可享受40%的减税，在103个核心地区拍摄的更可享受42%减税。
新墨西哥州	在该州的电影制作可享受25%的减税；可向电影提供贷款投资，每个项目最高可贷1500万，并不设贷款在预算中的上限，但影片成本须在200万以上。
纽约	2002年12月开始，凡是直接用于影视制作（包括后期）的商品和服务，纽约州和纽约市征收的零售税（8%左右）全部免除；2005年3月开始，在纽约州摄制电影可获10%的减税，如果在纽约市摄制，可额外增加5%的减税。

5、直接提供资金和设施帮助好莱坞搭建市场平台，提高制作水准。

美国政府对好莱坞的帮助不仅体现在法律、政策和外交这样的宏观层面，还落实到了电影的实际运作中。例如美国政府会通过其控制的半官方性机构向电影业提供资金支持，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国家艺术捐赠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这是一家由美国国会成立于1965年的机构，负责向全美的艺术性事业提供资金资助，其中也包括电影。据统计，仅在2008年，艺术捐赠基金会向电影界提供的资助就近100万美元，^①主要资助对象是全美数十家国际性电影节，在如此多电影节所搭建的平台上，美国电影能够得到充分的宣传和展示，吸引全球媒体的注意力，电影出品方更可借助电影节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片商洽谈生意。美国政府的资助可谓花在了提高美国电影全球影响力的刀刃上。除了全国性基金会外，美国各州也有政府支持的艺术基金会，用来支持本州艺术事业包括电影业的发展。这些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在为电影业搭建交流和销售平台、培养新生电影人才等方面，同样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很多政府部门，如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防部、航空航天管理局以及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等都乐于为电影业提供帮助，这些部门都设有专门负责与好莱坞联系的官员，他们会审核各个电影项目递交的剧本，这些剧本的剧情设置跟相应的部门职能有关，而剧本一经通过，这些部门便会提供各种支持，包括剧本咨询、设备和人员等。每个部门所协助的电影大多与其职能有关，其中美国军方与好莱坞合作由来最久，每个兵种都在洛杉矶设立了专门办公室负责与好莱坞联络。早在1927年，他们就协助拍摄了首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翼》。很多大家熟知的战争电影都离不开军方的帮助，如《真实的谎言》（1994）、《空军一号》（1997）、《巴顿将军》（1970）、《世界大战》（2005）^②等。航空航天管理局协助的多是以太空为背景的科幻电影，包括《阿波罗13号》（1995）、《绝世天劫天地大冲撞》（1998）、《太空牛仔》（2000）等。国土安全部则主要帮助以反恐为题材的电影，如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幸福终点站》（2004）。^③比起这些机构，中央情报局与好莱坞

^① 参见美国国家艺术捐赠基金会2008年年报：<http://arts.endow.gov/about/08Annual/index.php>.

^② 参见 Mimi Hall, "Hollywood, Pentagon share rich past", *USA Today*, Mar 7, 2005, http://www.usatoday.com/life/2005-03-07-hollywood-pentagon_x.htm.

^③ Mimi Hall, "Homeland Security guides the stars", *USA Today*, Mar 8, 2005, http://www.usatoday.com/life/2005-03-07-hollywood-pentagon_x.htm.

之间的联系则更为隐秘。尽管他们在漫长的冷战过程中开展了多项合作，但往往都是秘密进行的。直到1991年中情局开始提高开放度，一些与娱乐业合作的消息才浮出水面。1996年，中情局建立了公开的媒介联络办公室，其职责包括审核申请协助的好莱坞电影。据媒体报道，中情局近几年来协助过《国家公敌》（2001）、《临时特工》（2002）、《特务风云》（2006），以及《韦氏风云》（2007）等，^①这些电影无一例外都是描写特工行动的大片，中情局不仅会在剧本方面运用其专业背景为影片提供丰富细节，还允许电影剧组赴其总部基地取景拍摄，并可能提供真正的特工出演。

除了这些全国性的政府部门，在各个州的地方政府，也大多建有电影部门，为在当地拍摄电影提供便利，如出动警察维持拍摄时的交通、治安，利用公共设施等，有的还提供经济上的激励政策。如加州政府成立了影院艺术资源合伙公司（Theatrical Arts Resources Partnership），通过该公司向电影制作者提供特殊的公有设施服务（比如健康机构、闲置的办公场所，监狱等等），只收取少量费用或免费，从而帮助制片公司降低了线上成本。甚至凡是在加州公共土地上拍摄电影，需要出动的警察、消防员和其它公共服务，都由政府来支付这些公务员的额外工资。^②

6、小结

从以上五方面的梳理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好莱坞电影业的扶持是全方位又行之有效的。从国内到国外，从制作到发行，美国政府以内外有别的法律体系为依托，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通过外交手段、税收杠杆、资金和设施服务等方式帮助好莱坞在全球市场上开疆拓土。而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美国政府为何要如此全方位地帮助好莱坞呢？

二、美国政府为何要全方位地帮助好莱坞？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作为国家管理机构，扶持、推动本国各行各业的发展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但面对纷繁复杂的行业门类，政府很难做到均衡用力，往往会有所侧重。而在强调让市场优胜劣汰发挥作用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政府出手相助的往往是较难产生经济效益，但有益于公众利益的行业，比如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而上文所总结的好莱坞受到的美国政府的各种扶持则显然有悖于这一原则。一方面，好莱坞电影业原本属于美国政府应尽量减少干预的私营经济范畴，另一方面，好莱坞电影业的经济状况也在世界电影业中首屈一指，并不属于弱势的一方。因此美国政府为好莱坞的海外扩张提供的帮助，不是一种“扶弱济贫”，而是一种“强强联合”，促成这种联合的，则是好莱坞所具有的重要经济、文化和政治价值。

首先，美国电影业对美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出口市场上，以影视产品为主力军的娱乐行业是美国排在航空业之后的第二大出口行业。根据美国电影协会2010年公布的《影视产业对美国的经济影响》报告，2008年，影视业为美国提供了240万个就业岗位，157亿美元的销售税和收入税，创造了136亿美元的贸易额，贸易顺差高达117亿美元。^③而且电影业作为一种“雨点小，雷声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其它行业和就业也有明显拉动作用，美国各地政府之所以纷纷推出吸引电影制作的优惠政策，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电影能为当地创造就业、带动旅游等消费。而美国电影对美国经济更重要的贡献在于，在世界范围内帮助推销美国商品。如美国学者托比·米勒所记叙的，专家们早在1912年就发现，好莱坞

^① 参见 Matthew Alford and Robbie Graham, *Covert Action: The Deep Politics of Hollywood*, http://www.mathaba.net/0_index.shtml?x=616034.

^② 周黎明：《好莱坞启示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③ MPAA,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Motion Picture & Television Industry on the United States*, Apr, 2010.

电影所到之处，对美国其它商品的需求也会增加。比如，一部关于美国工厂状况的好莱坞影片促使美国缝纫机的销售在爪哇的市场大获全胜。而反面的例子如克拉克·盖博在1934年的《一夜风流》中，脱掉衬衣，里面没穿内衣的镜头所引发的模仿风潮，最终导致这种内衣滞销，蒙受损失的阿根廷商团因此向美国使馆提出强烈抗议。^①好莱坞电影对大众消费所能产生的这种魔力使美国政府自然而然地视其为促销其它美国消费品的工具，各国的大使甚至被专门要求报告哪些电影对当地的消费行为产生了影响。^②1920年代，美国国务院向驻世界各国公使馆发出通报称：“电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最高宣传媒介，不但可以通过电影进行政治性宣传，更能有效促进美国消费品(比如汽车和家庭用品等)的海外销售。”^③美国电影协会前主席威尔·海斯则在1930年代骄傲地宣称，世界范围内，每英尺胶片的美国电影带动了一美元的美国其它商品销售。贸易已经不再紧随美国国旗，而是紧随“电影”了。^④

其次，美国电影既是美国出口的文化商品，也堪称美国的文化大使。它用其光影魅力为美国创造了一种独特“形象”，弘扬着美国的生活方式、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如大卫·普特南所指出的，美国电影所创造的美国形象极其有效又极其易于辨认，是一种富足的、充满机会的、令人激动的、科技发达的、而且至少在大多数时间都开放自由民主的，这种形象对于推销美国价值和推销美国商品同样成功。^⑤美国领导人很早就认识到了电影在宣扬美国价值观时的巨大能量，如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写给全美电影业协会主席威廉·布莱迪的一封信中说：“电影已逐渐成为传播大众知识的非常重要的媒介，而且，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通用的语言，对于展示美国的计划与意图能起到重要作用。”^⑥

当然，不是每部好莱坞电影都会向世人展现正面的美国形象，也不是每位好莱坞电影人都乐于充当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者，这时美国政府对整个好莱坞及具体影片的帮助便成为其影响乃至控制电影内容的砝码。例如威尔逊政府1917年成立的克里尔公共信息委员会下属的电影分部在推动美国电影出口的同时也规定，每次出口运输好莱坞的商业性产品时，其中必须包括百分之二十的“教育性材料”。^⑦而二战后美国在欧洲推行的马歇尔计划中，经济复兴部门实行的国际媒介担保计划，则只帮助那些“展现真实而丰富多彩的美国生活图景”的电影。该部门成立了专门的咨询委员会来确定哪些电影可以得到担保，其标准包括“(电影)提供的关于美国的信息要客观准确，或者在制作、导向和表演上能够充分地反映美国文化多样性的特点。”黑帮片、惊悚片、恐怖片都被排除在这一名单之外。^⑧为了能得到政府部门的协助，电影出品方往往需要投其所好甚至根据政府的要求进行修改。例如美国军方在提供协助前都会要求审阅电影剧本，其中被认为不利于军方形象的情节会被要求调整，007电影《明日帝国》(1997)一句“越南丢了”的台词，《风语者》中美国海军士兵从日本战俘尸体拔下金牙的镜头，^⑨就都在军方要求下删去，否则便无法得到协助。为了争取运用军方资源，一些电影从剧本阶段就开始筹划，据《综艺》杂志的报道，《变形金刚》就专门聘请了一位退休的海军军官担当剧本顾问，以使剧本显得更加真实、更有利用军队资源的可行

^① [美]托比·米勒：《好莱坞与世界》，蔡如一译，《世界电影》，第115页。

^② John Trumbour, *Selling Hollywood to the World: U.S. and European Struggles for Mastery of the Global Film Industry, 1920-19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66.

^③ 山田合夫：《日本电影产业能够自立和再生吗？——迫近“危机”的实态》，《世界电影》，2001年第2期，第167页。

^④ 转引自[澳]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1891年以来的美国电影工业发展史》，吴菁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16页。

^⑤ 参见[英]大卫·普特南：《不宣而战——好莱坞VS全世界》，李欣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327页。

^⑥ 转引自 Leslie Midkiff DeBeuche, *Reel Patriotism: The Movies and World War I*, (Madison,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7), p.109.

^⑦ 同上，第81-82页。

^⑧ Paul Swan, *The little State Department*.

^⑨ 参见 Matthew Alford and Robbie Graham, *Covert Action: The Deep Politics of Hollywood*, http://www.mathaba.net/0_index.shtml?x=616034.

性。在这番仔细的谋划后，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等美军四大军种悉数在《变形金刚》中亮相。电影变得更加壮观和惊心动魄，也省下大量的外景、人力成本，而美国军队也得到了向全世界观众展示其装备、管理和战争观念的机会，甚至还可以帮助军队招募到士兵。^①政府部门的帮助，既提高了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水准，也有利于提升本部门的公众形象，还能宣扬美国式的价值观，可谓达到了一石三鸟的效果。

最后，对好莱坞的帮助除了促进经济、宣传美国形象这些国家利益方面的原因，可能也包含着美国政治家们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个有趣的线索是历届的总统选举中总统候选人往往都将好莱坞列为必争之地。好莱坞这个不断供给亿万观众以娱乐的地方，也成为了美国政治活剧上演的中心地带之一。好莱坞不但能为候选人提供丰厚的献金，其明星效应对于候选人而言更有重要的意义。有学者指出，总统候选人一般说来在公众眼里只是一个政治符号，枯燥乏味的符号，而一旦他们与电影明星产生瓜葛，则明星们身上所洋溢的智慧、勇敢、富有同情心、人情味儿和魅力等就会自然而然地映射到总统候选人身上，从而为自己的竞选平添筹码。^②在当代这个娱乐、信息和消费组成的符号世界，媒介不遗余力地营造着奇观景象，这些奇观已深深影响了大众生活，为大众提供着幻想、行为、思维模式和身份认同的原材料。^③在这种环境中，政治也需要通过奇观化来拉近其与大众的距离。而作为造梦工厂的好莱坞所具有的奇观魅力自不待言，正因如此，总统候选人才会热衷于邀请好莱坞明星、大老板们参加宴会，请明星们为自己的选举站台，乃至参加自家私人的活动。而作为回报，华盛顿的政治家们也不断为好莱坞的利益抛头露面。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是美国电影协会与美国政府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它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第一任领导人威尔·海斯曾担任美国的邮政部长，也曾是时任美国总统的沃伦·哈定竞选团队的领袖，并在制定美国经济、外交政策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如此资深的政治身份并非巧合，美国电影协会成立80多年来的历任领导人都曾是重要政治人物。1945年海斯卸任后，继任的埃里克·约翰斯顿曾担任美国商会会长，并在1950年代初担任总统的近东地区特使。而执掌美国电影协会达38年的杰克·瓦伦蒂曾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新一任主席丹·葛力克曼曾在克林顿政府的农业部任职，并在2004年担任MPAA主席之前担任哈佛大学政治学院院长。^④这些领导人的政治身份帮助美国电影协会与权力中心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每每可以在有关美国电影对外贸易的议题上有效地开展游说活动。美国政府与好莱坞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促成了美国政府对好莱坞不遗余力的帮助。

三、结语

本文从具体的史实出发，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美国政府在好莱坞扩张全球市场的历程中所提供的帮助，并分析了这些帮助背后的深层原因。这些史实证明，好莱坞之所以能不断地推进其全球化的脚步，主导全球的电影工业，并不单纯是依靠其自身的产业力量和电影产品本身的魅力，也离不开美国政府所发挥的作用。在以往国内对外国电影政策的研究中，往往聚焦于法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为保护本土电影所采取的措施，而较少关注美国政府对好莱坞的作为。此外，这些研究也大多聚焦于各国对电影业所采取的经济津贴措施，但

^① Peter Debruge, "Film Biz, Military Unite for Mutual Gain", *Variety*, June 19, 2009, <http://www.variety.com/article/VR1118005186.html?categoryid=1019&cs=1>.

^② Ronald Brownstein, *The Power and the Glitter: the Hollywood-Washington Connecti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0).

^③ 参考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一书，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Manjunath Pendakue, *Hollywood and the State*, p.185.

事实上除了津贴外，国家对电影等文化产业的调节还有立法控制、制度性管理等方式，^①从本文对美国电影业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好莱坞所提供的直接经济帮助并不多，而主要是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和管理激发市场的活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尽管以往“防御性”的研究可能是基于中国电影在国内市场仍面临进口好莱坞大片强烈冲击的现状，有其现实价值。但随着近年来中国电影业取得飞速发展，国内市场已逐渐“站起来”，“走出去”参与国际电影市场和文化竞争日益被提上日程的背景下，研究者也有必要聚焦于外国政府帮助电影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政策，尤其需要加强对“法律和管理”制度的研究。

在当今世界各国展开文化软实力竞争的格局下，电影被视为一股非常重要的文化力量。因为电影较之其它文化产品有更强的穿透疆界的能力，一部成功的电影常常能产生世界性的影响，甚至能型塑一个国家的形象，也正是出于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考虑，我国政府提出了中国电影的“走出去”的战略，但在“走出去”的门槛前，中国电影业的力量还非常弱小，亟需仍主导着中国电影业整合和发展的政府的帮助，而如何为中国电影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更切实有效的帮助，中国政府或许能从美国政府对好莱坞电影业的帮助中找到一些有益的借鉴。

^① David Hesmondhalgh,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Los Angel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7, p.106.

影视研究专题

好莱坞的全球化与其电影产业竞争力建构关系研究

Research on Hollywood's Globalization and Its

Film Industry's Competitiveness

张建珍^① 吴海清^②

中文摘要：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新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好莱坞电影全球化的历史语境，好莱坞也因而成为吸引并整合全球电影的资金、人力、技术、文化等电影资源而建构其竞争力的存在者。好莱坞通过全球电影资源的整合，形成了其具有全球性的电影生产与传播的竞争力和超过50%以上全球电影市场份额。中国电影面对好莱坞电影所建构的全球电影市场和产业竞争力，不能只通过电影产业的民族化来提升其竞争力，而是要通过更广泛地参与到全球电影资源和全球电影产业链的整合之中，从资金再到市场再到创意等环节全面地吸收海外资源，以扩大自己的产业竞争力。

关键词：好莱坞，全球化，电影产业，竞争力

Abstract: Since 1980s,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and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s have create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Hollywood's globalization. Hollywood has thus become the presence of build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film industry as it attracts and integrates global financial, human, technological, cultural resources etc. Through integrating global film resources, it ha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Hollywood's global film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ompetitiveness. Hollywood's market share in the film industry is above 50%. Facing the global film market and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created by Hollywood, Chinese films cannot improve its competitiveness only through nationalization of the film industry. Instead they should

^①张建珍，博士，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

^②吴海清，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

participate widely in the integration of global film resources and global film industry chain. Fully absorb overseas resources from capital to markets and then to creative sectors within the market, in order to expand the industry's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Hollywood, Globalization, film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美国电影的电影全球化有一个历史过程。早期的美国电影想通过电影技术垄断国际、尤其是北美市场，因此，即使1910年代前后好莱坞逐渐成为美国电影中心时，美国每年从欧洲进口的电影要远远高于其出口到欧洲的电影，加拿大此时进口的法国影片也远远多于来自好莱坞的^①。一战期间，因战争的影响和欧洲电影商业特征不明确等，好莱坞逐渐取代欧洲电影成为全球重要的电影供应者，好莱坞开始演变成全球好莱坞。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好莱坞更是通过吸收了大量的法国、意大利、英国、德国、瑞典等国家的优秀导演与演员，^②而成为世界电影市场的最重要供应商，在众多地区的电影市场中都超过本土电影的放映数量和票房。但1980年代之前的好莱坞电影受制于各民族国家在战后所采取的发展民族电影产业政策的限制，以及冷战格局和战后不少国家采取偏重于社会福利的经济政策等原因的影响，还不能充分地实现全球电影资源的整合，只是在资金、制作和市场占有率等部分方面在一些地区实现了整合。^③198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新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好莱坞电影全球化的历史语境，好莱坞也因而成为吸引全球的资金、人力、技术、文化等电影资源而建构其竞争力的存在者。由此好莱坞也就比其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地、真正地成为全球的好莱坞。^④我们可以从资本、人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等三个方面分析好莱坞的全球整合。

第一章一、好莱坞全球资本整合与投融资竞争力建构

从电影投融资来看，1980年代以来的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多地吸收全球资本以降低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电影资本聚集地。投资好莱坞电影的资本在传统的法国、英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或者地区之外，更有来自印度、中国、中东、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的资本进入好莱坞体系之中。

进入好莱坞的资金规模达到了几千万、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远远超过此前好莱坞电影海外融资的规模。索尼、新闻集团、维旺迪等来自美国之外大型跨国集团在好莱坞的投资都已经超过百亿美元，而来自印度的信实、中东的阿布扎比等新兴国家的资本在好莱坞的投资也达到数十亿美元。这些大规模资金既有来自电影产业内，更有大量的来自于工业资本、私募基金、风险投资、主权基金等非电影产业的资本。如《阿凡达》《哈里·波特》《007量子危机》等影片投资中就有众多私募基金的身影。

进入好莱坞的海外资本中既有一些资本直接购买了好莱坞各类电影公司，成为这些电影公司的最大股东，并将这些公司整合到更大的媒介产业、甚至工业产业集团之中，也有一些资本成为好莱坞电影公司的战略性投资者和重要股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好莱坞电影公司的运作。

1985-1991 投资好莱坞的外国投资者

外国投资者	公司名称	年代	金额（亿美元）	占所有权比例	营业项目
-------	------	----	---------	--------	------

^① Ian Jarvie. *Hollywood's Overseas Campaign: The North Atlantic Movie Trade, 1920-195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让-鲁普布盖：《好莱坞：欧洲电影人之梦》，严敏、朱震芸译，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Nolwenn Mingant. *Hollywood's Global Outlook: Economic Expansionism and Production Strategy*. <http://lisa.revues.org/1615>.

^④ Ceesj Hamelink, 见 *The Media Glob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ss Media*. Lee Artz and Yahyar Kamalipour edited 第 VII-VIII 页, <http://www.google.com/books>.

Matsushita	MCA Inc.	1991	66.00	100%	
Pathe Communications	MGM/UA	1990	33.00	100%	
Pioneer	Carolco	1990	0.6	10%	
Canal	Carolco	1990	0.3	5%	
GaGa Communication	Fox/Lorber	1990	0.3	58%	
Thames TV	Reeves Comm	1989	0.89	100%	
Sony	Columbia picture	1989	34.00	100%	
Australian Investment	Barris Industries	1989	0.35	24%	
Sony	CBS Records	1987	20.00	100%	
News Group	20 th Century Fox	1985	5.75	100%	

新兴国家资本对好莱坞电影的兴趣更是在不断增长。媒体分析称“迪斯尼 (Walt Disney Co; DIS-US) 日前宣布将以 40 亿美元 (约新台币 1320 亿元) 现金与股票收购惊奇娱乐 (Marvel Entertainment Inc; MVL-US), 经典漫画角色蜘蛛人 (Spider Man)、钢铁人 (Iron Man)、X 战警 (X-Men) 等都将成为米老鼠和唐老鸭的家人。迪斯尼此举, 证明了传媒产业整合是股必然的潮流趋势。不过, 交易需要的资金可能将来自中国或印度, 而不是好莱坞或华尔街。在迪斯尼宣布这个消息前, 好莱坞观察家便已根据名导史蒂芬史匹柏 (Steven Spielberg) 旗下制片公司梦工厂 (DreamWorks Studios; DWA-US) 与印度大企业信实集团 (Reliance ADA Group) 的 8 亿 2500 万美元交易一事, 直指类似的收购案将继续出现。……专家指出, 好莱坞需要海外资金, 以继续在增长强劲的全球市场扩大事业版图。……研究咨询机构 Media Valuation Partners 负责人 Larry Gerbrandt 说, 现在大概都可以谈成相当划算的交易。‘当前一干印度和中国企业都握有超额的资本, 而好莱坞吸引投资者的特殊魅力将令今后出现许多有趣的交易。’ 处理信实集团与梦工厂融资案的律师 Sky Moore 更指出, 未来 2 年内可能酝酿出一笔规模更大的交易。‘我认为有人会买下整间制片厂。虽然不确定买主将是印度或中国的公司, 但应该会是这样。’ Moore 说。同时, 梦工厂的姊妹公司, 也就是制作《史瑞克 (Shrek)》系列的梦工厂动画 (DreamWorks Animation SKG Inc) 也在可能的收购名单里, 因该公司在业界地位稳固, 且家庭市场相当有利可图。此外, 虽 Moore 和 Gerbrandt 没有任何具体的信息, 但他们认为米高梅集团 (Metro-Goldwyn-Mayer Inc; MGM-US) 也是潜在的收购目标。有关米高梅将被收购的市场传闻由来已久。……另一方面, 中国制片厂也积极与美国伙伴合作。被摩根士丹利 (Morgan Stanley; MS-US) 称为‘中国未来的华纳兄弟 (Warner Bros)’的华谊兄弟传媒集团曾表示, 正在寻求资金以扩大发展, 且已经与好莱坞电影巨头如索尼集团 (Sony; JP-6758) 旗下娱乐事业 Sony Pictures 合作。据悉, 华谊的最大对手中国电影集团也相当重视在美国的发展项目。印度投资者也扩展到好莱坞, 像信实集团除了完成与梦工厂的交易外, 还买下约 50 间电影院。Moore 表示, 印度娱乐公司 UTV 更过去 3 年内砸下几千美元, 投资《破·天·慌 (The Happening)》、《同名之城 (The Namesake)》等电影。”^① 《华尔街日报》称中国对好莱坞电影公司和片库的兴趣

^① 谢淑娟:《传媒产业整合为必然趋势 好莱坞资金来源: 中国、印度》, <http://news.cts.com.tw>。

在不断增长，上海电影集团正在美国寻找投资机会。^①报道称“洛杉矶的一家小公司国际电影金融联合公司本周正在莫斯科说服银行和私人投资者，帮助它筹措5000万美元以完成打包的六个好莱坞项目——包括一些一线演员——它们的资金在经济危机中都已经枯竭了。……公司也将在印度和中国寻找投资者列为B计划。”^② Nishith Desai Associates and Assocham 的联合调查显示“90%的印度国内E&M领域的公司都倾向于将来投资好莱坞，而不是宝莱坞，因为好莱坞能提供巨大回报电影的成功率超过90%。”^③ “‘海湾正在成为全球电影产业关键的资本来源，区域投资者正在提高关于投资电影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赚钱行业的认识’一位地区媒介公司的高层官员说。……‘这些地区的投资者传统上总是投资实体资产和银行领域。然而，最近的信用危机使得他们许多人怀疑这些投资工具，因为回报大大低于他们的预期。所以他们正在撤出并寻找投资电影等其它投资领域。于是，好莱坞现在比较前两三年更加受到来自于世界各地投资者的青睐，’ Alnoor Holdings 正在投资一部1亿5000万美元预算的英语电影。……除了部分资金来自Alnoor Holdings之外，其他投资者大多数是正在投资电影领域的区域投资者，……有大量的投资者想要参与这部电影投资，我们受到了来自近东和西方回应占压倒性多数。”^④中国香港的橙天嘉禾投资2500万美元收购好莱坞传奇影业3.33%左右股权，就有借好莱坞出海和提高自己电影发行竞争力的目的。“橙天娱乐集团CEO、橙天嘉禾娱乐集团联席CEO陈晓薇介绍，此次入股传奇影业，是因为看重了他们精良的制作实力和在全球强大的票房号召力。尤其是最近由传奇影业制作的《盗梦空间》，不仅口碑极佳，也在全球席卷了7.53亿美元的票房，这在商业上也成为一个很好的范例。而传奇影业也看重了橙天嘉禾在中国电影行业的影响力与国际化的明确方针，以及橙天嘉禾在中国市场上拥有强大的实力背景。陈晓薇表示，希望凭借橙天嘉禾多年来在西方的市场影响力，减少西方对中国电影的误解和偏见；植入好莱坞影片的中国元素；也有机会寻求好莱坞电影来中国合拍，促进中国电影产业技术及理念的革新。”^⑤

虽然上述关于新兴国家资本收购好莱坞电影材料只是新闻媒体的一些分析或者猜测，并没有成为现实，尽管好莱坞海外融资计划或者因为金融危机而暂时停止，或者只是一些意向而还没有真正实施，但它们都共同显示了好莱坞的全球融资能力及全球资本对好莱坞电影的兴趣与信心，也显示了好莱坞电影已经完全进入依靠全球资本而不单纯是美国资本发展的年代。全球性资本进入好莱坞不仅极大地扩充了好莱坞电影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为好莱坞电影以资本密集型方式建构全球产业竞争力提供的资金支持，如近年来好莱坞高概念电影跨速发展，也为好莱坞通过高概念电影占有全球电影市场、促进好莱坞电影全球范围内扩张奠定了坚实的资本基础，使好莱坞拥有其它任何地区电影无法比拟的雄厚的资金和投融资信誉。全球资本也为好莱坞电影整合或者被整合到更大的资本和产业结构之中、以利用新的传播技术和人才来建构产业竞争优势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好莱坞来自全球的资本也为好莱坞进入全球电影市场创造了条件。好莱坞可以通过雄厚资本支持的全球发行与营销力量来主导全球电影市场，而且好莱坞还可以通过全球资本的本土性特点影响当地的电影管理，或者以共同投资的合拍方式等获得本土电影的身份，从而避开各国电影进口限制。

^① Alison Tudor .Overseas M&A Strategy Turns to Consumer Firms. <http://online.wsj.com>.

^② Strapped for cash, Hollywood is turning to Russia for help. <http://allequityfunds.com>.

^③ 90% Indian E&M Corps Will Prefer Hollywood To Bollywood For Investments. <http://www.assochem.org>.

^④ Hollywood more receptive to regional film investors. www.zawya.com.

^⑤ 田婉婷：《橙天嘉禾入股传奇影业 中国电影资本联姻好莱坞》，<http://indus.chinafilm.com>。

二、好莱坞全球电影人力资源整合与人才竞争力建构

根据《大电影产业》作者的观点，影响电影市场的各种因素中，明星的影响力是非常重要的。好莱坞创造全球电影市场中积聚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的明星能力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形成了其独特的、完整的明星制造体系。如同上文所论述的，好莱坞产生之日起就开始吸引与培养来自全球、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明星，但比较1980年代以前，好莱坞1980年代以来吸引全球电影明星的规模、范围以及对海外明星的重视等有了很大的变化，日渐形成了好莱坞明星全球化机制。

我们先看看近年来在好莱坞拍电影的外国导演，就可以知道好莱坞电影1980年代以来如何演变成全球电影中心。这里不仅聚集着全球各地区最具市场影响力的导演，创作了近些年来好莱坞一部部创造了票房奇迹的电影，而且也聚集着那些极具创造性的电影导演，他们不仅多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提名或者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他们中许多人的作品也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而且他们不少都是曾经在嘎纳、威尼斯、柏林电影节上获得大奖的导演。英国导演：丹尼·鲍耶导演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克里斯托弗·诺兰拍摄了《蝙蝠侠：侠影之谜》、《魔道争锋》、雷德利·斯科特拍摄了《黑鹰坠落》《银翼杀手》《天国王朝》、泰瑞·乔治拍摄了《卢旺达旅店》等、马修·沃恩拍摄了《夹心蛋糕》《星尘》等、乔·怀特拍摄了《傲慢与偏见》《赎罪》、保罗·格林格拉斯拍摄了《航班93》《谍影重重》、迈克·纽维尔拍摄了《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大卫·叶慈拍摄了《哈利·波特与凤凰社》、安东尼·明格拉拍摄了《冷山》、盖伊·里奇拍摄了《两杆大烟枪》等。法国导演吕克·贝松拍摄了《这个杀手不太冷》《第五元素》、让-皮埃尔-热内拍摄了《异形4》、帕特里克·塔特普洛斯拍摄了《星际之门》《独立日》《噩梦缠身》《虎胆龙威4》。俄国导演提摩尔·贝克福姆贝托夫拍摄了《通缉令》。德国导演罗兰德·艾默里奇导演了《魔鬼命令》《星际奇兵》、《ID4 星际终结者》《决战时刻》《史前一万年》、《2012》、沃尔夫冈·彼得森导演了《海神号》《特洛伊》《完美风暴》、荷兰导演保罗·范霍文导演了《机器战警》《星河战队》《本能》，意大利导演赛尔乔·莱翁拍摄了《美国往事》《义薄云天》等，加拿大的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了《泰坦尼克号》《阿凡达》、贾森·雷特曼导演了《朱诺》等，新西兰的彼得·杰克逊导演了《指环王》《金刚》《澳洲乱世情》等，澳大利亚的彼得·威尔导演了《楚门的世界》、巴兹·鲁赫曼导演了《红磨坊》、罗杰·唐纳森导演了《叛逆巡航》《异形》《天崩地裂》《惊爆十三天》《谍海计中计》《银行大劫案》、简·坎皮恩拍摄了《钢琴别恋》等，吴宇森导演了《断箭》《变脸》等、李安导演了《绿巨人》《断臂山》《卧虎藏龙》等，印度导演M·奈特·夏马兰拍摄了《第六感》《生死劫》、谢加·凯普尔拍摄了《伊丽莎白》《四根羽毛》《伊丽莎白：黄金年代》等。

各民族获得成功的导演纷纷前往好莱坞发展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本国电影体制、电影市场缺乏导演创造力实现的空间以及好莱坞所具有的全球电影市场控制能力及其完整的电影生产体制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媒体总结好莱坞全球化战略时指出了好莱坞不仅争先恐后地在全球大量寻觅有市场价值的新导演，而且也改变了过去常常视外国导演所拍电影为独立电影的观念，而将这些导演视为商业潜力的导演，尤其是会考虑这些导演对好莱坞开拓海外市场影响力。“像《通天塔》的导演阿加多·冈萨雷斯·伊纳里多（Alejandro Gonzalez Inarritu）、《黑帮暴徒》的导演加文·胡德（Gavin Hood）这样的奥斯卡奖得主，在举起小金人的同时，也收获了进入好莱坞的机会。……用经纪人的话说，必须更周全更广泛地在全球范围搜寻新人。在国际市场，柏林、戛纳和多伦多是美国五大演艺经纪公司搜寻新人的重要地点。UTA公司的里奇·克鲁贝克（Rich Klubeck）认为，先下手为强。他代理的客户包括2004年曾以《勇往直前》拿下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德国导演法提赫·阿金（Fatih Akin）”

和2008年以《大牌明星》拿下戛纳金棕榈奖的意大利导演保罗·索伦蒂诺(Paolo Sorrentino):‘我们会同国外发行公司、国际制作人和电影节导演们进行接触,与他们越早接触,越有利合作。’ICM公司的经纪人罗伯特·拉泽……前不久刚刚在多伦多电影节签下了新晋以色列导演、拍摄《黎巴嫩》的塞缪尔·毛茨(Samuel Maoz),……除了经纪人们在电影节上争先恐后寻找海外新生力量以外,各大好莱坞经纪公司也开始互挖墙角。2007年凭借《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德国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Florian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去年就将代理经纪公司从CAA换成了UTA。WME公司旗下一位代理经纪人也承认,最近几年经纪公司对外国电影人的热衷程度越来越高:‘以前,这些非美国本土电影人制作出的电影,多被归为独立电影,并不赚钱,也不算商业片。’但现在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比如最近的一部电影《旅行者》(The Tourist)就是很好的例证。这部电影由多纳斯马执导,翻拍自法国电影《逃之夭夭》,不但得到了法国Studio Canal影片公司的资金支持,还网罗了世界最炙手可热的两大影星,‘这么大的阵势,绝对不能说是独立影片了。’”^①

演员方面,好莱坞自然也聚集着全球最具市场影响力的一大批演员,这些演员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印度、中国、韩国、日本等,成为好莱坞电影主导全球电影市场的关键因素。人们说,“奥斯卡历史上,欧洲或大洋洲演员经常获得表演奖项,但是美国本土演员全军覆没,80年来就是1966年发生过一次。这次4个表演奖项全部被欧洲演员夺走,出乎很多人意料,却在情理之中——最近几年的影帝人选都没有什么悬念,英国演员丹尼尔·戴-刘易斯在《血色黑金》中近乎疯狂的表演获得了一致认可。获得最佳男配角的西班牙演员贾维尔·巴尔登以绝对优势胜出。然而,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爆出冷门,之前被看好的茱莉·克里斯蒂意外落选,法国演员玛丽昂·科蒂亚尔凭借《玫瑰人生》摘走影后桂冠。……获得最佳女配角荣誉的英国演员蒂尔达·斯温顿之前也不被看好,这次能得到小金人,不仅是对她的肯定,也是对影片《迈克尔·克雷顿》的一点安慰。”^②而亚洲明星1980年代以来引起好莱坞的广泛关注,可以看作好莱坞电影明星机制全球的重要标志。

由于好莱坞近年来不断增加的翻拍其它地区电影的趋势,人们也抱怨好莱坞翻拍电影“主题不像原创电影一样深刻或者丰富,角色发展有时被忽视,情节点被弱化,电影的文化特征也经常翻译中失去。为了处理这些批评,好莱坞制片厂一直雇用外国导演和编剧以控制美国翻拍电影。事实上,《咒怨》原创的导演清水崇被选来负责美国版,导演日本版《午夜凶铃》的中田秀夫负责翻拍《午夜凶铃2》。香港因武术喜剧和危险技巧而成名的超级明星成龙甚至曾获得自由处理他后期好莱坞电影表演,如《尖峰时刻》系列、《上海正午》和《上海骑士》等。为了从其它国家工业中挖来流行明星和导演,好莱坞主管不仅提高对亚洲人才的全球意识,而且建立亚洲电影中心以同各国合作,从而使继续生存在各种对好莱坞电影产业统治地位的攻击中。”^③“无论是评论界的赞同还是票房的成功,李安、吴宇森、杨紫琼和其他来自亚洲的人正在美国创造他们的成就。过去十年里又比以前更多的亚洲人在好莱坞工作。仅仅香港电影工业就贡献了成龙、李连杰、周润发等演员,徐克、黄志祥、林岭东等导演,以及袁和平、袁祥仁、元奎等动作艺术指导,然而,这些在好莱坞的亚洲人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④

英国电影理事会根据2001到2006年间发行的200部最成功影片总结出好莱坞最有影响力英国电影明星和最成功导演名单。从所创造全球票房的角度来说,英国演员奥兰多·布

^① 《“千里马”海外闯荡好莱坞》, <http://www.admaimai.com>。

^② 《外籍演员横扫奥斯卡〈老无所依〉成最大赢家》, <http://ent.sina.com.cn>。

^③ Diana Lee. *Hollywood's Interest in Asian Films Leads to Globalization*, <http://uniorb.com/ATREND/movie.htm>。

^④ Christina Klein. *The Asia Factor in Global Hollywood: Breaking down the notion of a distinctly American cinema*. <http://lit.mit.edu>。

鲁姆 26.4 亿英镑、伊恩·麦凯伦 23.3 亿英镑、克里斯托弗·李 18.6 英镑、丹尼尔·雷德克里夫/艾玛·沃特森/鲁珀特·格林特 17.5 亿英镑、伯纳德·希尔 11.6 亿英镑、伊万·麦奎格 11.2 亿英镑、凯拉·奈特利 10.7 亿英镑、肖恩·宾 9.56 亿英镑、布莱恩·考克斯 8.13 亿英镑、拉尔夫·费因斯 8.13 亿英镑,英国导演迈克·内威尔 4.42 亿英镑、雷德利·斯科特 3.56 亿英镑、克里斯托弗·诺兰 1.84 亿英镑、保罗·格林格拉斯 1.42 亿英镑、比班·基德龙 1.29 亿英镑。由此可见英国电影在全球电影产业链的创意和制作环节的竞争力。

因此,人们认为“一个个来自异域的电影演员在好莱坞的包装之下迅速成长成为‘明星’,‘巨星’,而他们也确实为好莱坞带来了不小的市场。桑德拉·希洛克精通德语,极受德语市场的观众和媒体的欢迎,佩妮洛普·克鲁兹接拍的美国电影越来越多,因为她在西班牙语系国家有很大的号召力,而来自于澳洲的拉塞尔·克洛则借《角斗士》的出色表演而成为澳洲人心目中的英雄;华人影星李连杰、成龙、杨紫琼、周润发等加盟好莱坞,则为其带来了更广阔的华人电影市场。与‘电影明星’们的好莱坞之路相似,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制作精英在好莱坞早期就为它的繁荣贡献着智慧与才华。好莱坞以其巨大的号召力和强烈的吸引力,不断从世界各国网罗着电影人才,从法国导演莱昂斯·彼雷,斯尼埃,让·雷诺阿到卓别林,约翰·福特,西区柯克,他们的加入,使好莱坞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王国’。”^①

由此可知,好莱坞通过吸收与整合全球电影人才所形成的产业竞争力是其它任何地区或者民族电影所无法比拟的,这些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明星们所具有的创意能力和市场影响力,不仅保证了好莱坞电影全球市场开拓的成功,而且保证了好莱坞拥有无比强大的创意能力和创意竞争力,也因此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它地区或者民族电影的创意竞争力。尹鸿将好莱坞的人才战略与民族电影的关系称为“抽血战略”,“当好莱坞把某地作为电影出口的重点市场时,它采取的措施是吸引这个市场中的优秀电影创作人才进入好莱坞,为的是将他们的作品重新输入到这个市场……以前对拉美,对欧洲,好莱坞都运用过这样的策略,而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②

三、好莱坞电影全球文化资源整合和创意竞争力建构

好莱坞电影内容创意方面也越来越注重吸收全球文化中具有市场潜力的资源,以好莱坞文化模式改造来自全球的多元文化和电影文化资源,成为建构了好莱坞电影文化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之一。严敏指出“好莱坞贪婪地通过招揽、翻拍等手段,吸纳外国电影的精英和精华,加以‘杂交’式本土化,或者出资金和技术同他国合作拍片(多数为国际性题材),然后用这种“世界电影”风格的娱乐产品来满足全球‘消费者’的需求。而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东欧和中亚是好莱坞要重点开拓的目标市场。为了与这种趋势相配合,奥斯卡奖越来越呈现出国际化的特点,比如提名或获奖影片的跨国题材和多民族文化内容越来越多,非美国籍的编导演摄影等越来越多。”^③

如果暂不考虑严敏这段论述中的文化批判的立场,应该说她确实敏锐地指出了好莱坞电影文化日益呈现出全球化和好莱坞化共存的特点。

我们这里将重点介绍好莱坞翻拍海外电影的情况,以此透视好莱坞通过整合其它民族文化资源以形成自己在电影内容方面的全球竞争优势,“对好莱坞而言,市场全球化绝不是一个空头口号,他们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资源的开采与利用,更进一步扩大自

^① 胡辉:《好莱坞的狼性——好莱坞全球化策略分析》,《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2期。

^② 钱亦蕉:《东方好莱坞何时绝地反击》,《新民周刊》2002年第10期。

^③ 严敏:《奥斯卡奖八十年》, <http://www.china.com.cn>。

己的市场占有率。……也正是通过这种购买版权重新洗牌的全球战略，好莱坞不仅仅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品牌占有率，推广了美国主流的文化与道德。”^①

好莱坞翻拍欧洲电影历史中，自然对法国电影情有独钟。20世纪20年代开始好莱坞就开始翻拍法国影片，而《筋疲力尽》、尤其是近年来法国电影商业化快速发展之后创作了一系列创造了票房奇迹的电影，更是令好莱坞对翻拍法国电影的市场效益充满信心。人们论述好莱坞翻拍法国电影时指出，这些“翻拍版拥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具有很强的票房潜力。它们遵循一个简单而令人无法割舍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赚钱’。《欢迎来到北方来》是法国的年度最卖座影片。……有消息说，好莱坞著名黑人影星威尔·史密斯计划对《欢迎来到北方来》进行翻拍，翻拍版名为‘欢迎来北方’，由史蒂夫·卡瑞尔领衔主演，拍摄地点位于达科他州。《一切为了她》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惊悚片，故事围绕一名教师展开。他的妻子因谋杀老板被送进监狱。为了营救妻子，这位教师密谋进行劫狱。《一切为了她》的翻拍版《三日危情》将于10月开拍，由保罗·哈吉斯执导，拉塞尔·克劳和伊丽莎白·班克斯领衔主演。另一部也将于10月开机的影片为《笨人晚宴》，翻拍自《晚餐游戏》。《晚餐游戏》是1998年的热门喜剧之作。……《笨人晚宴》将于未来几周投入拍摄，由曾执导过《拜见岳父大人》和《王牌大间谍》的杰伊·罗奇主刀。2005年影片《逃之夭夭》在票房较量中大败而归，但好莱坞还是决定将这部失败之作进行翻拍。翻拍版名为‘游客’，由著名女星查理兹·塞隆领衔。……2009年春季，米拉麦克斯影业公司将翻拍2007年惊悚片《不可告人》，……第53届英国电影节(由《泰晤士报》和英国电影协会联合主办)法国参赛影片顾问乔纳森·罗姆尼表示：‘所有这些影片均非经典之作，但它们都拥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在票房上取得成功。这些影片类型多样，情节非常能够吸引观众，因此拥有称雄票房的巨大潜力。’”^②其它好莱坞翻拍自法国影片的《穿一只红鞋的男人》、《三个亡命徒》、《过关斩将》、《女杀手》、《开怀大笑》、《假凤虚凰》、《真实的谎言》、《难兄难弟》、《密西西比美人鱼》、《谜情公寓》、《时光隧道》、《鸟笼》、《神秘失踪》、《孽迷宫》、《怀胎九月》、《天才雷普利》、《不忠》、《似是故人来》、《尼基卡》、《12只猴子》、《三个奶爸一个娃》等也大多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汇报。

好莱坞也翻拍了不少其它欧洲国家的电影，其中因为英国与美国文化的同源和英语优势自然是好莱坞翻拍海外影片的主要来源，如《天生一对》《青春珊瑚礁》《四根羽毛》《刺杀希特勒》《葬礼上的死亡》、翻拍自意大利的《闻香识女人》《踩过界》《九》《天伦之旅》《手风琴》、翻拍西班牙的《死亡录像》《香草的天空》《隔离区》、翻拍北欧导演埃里克·斯柯比约格的名作《失眠症》、翻拍丹麦恐怖片《守夜》、翻拍瑞典的影片《生人勿近》、翻拍德国《趣味游戏》《天使之城》《美味情缘》《窃听风暴》《高度怀疑》《死亡试验》《坏中尉》、翻拍自苏联或者俄国的《飞向太空》。其它欧洲和好莱坞相互翻拍、并有多版本、1990年带有被好莱坞翻拍的电影《德古拉》、《科学怪人》等。

虽然好莱坞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具有绝对的地位，但在一个地区却遭遇到当地商业电影的有力抵抗，那就是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亚洲的印度、中国、日本、韩国以及香港等国家或地区，都在好莱坞电影的强大攻势下于近年纷纷探索建构本国电影的竞争力，而在电影创意环节所形成既具民族特色、又具市场影响力的电影类型无疑是亚洲电影保护本土电影市场并影响世界电影的重要基础。如日本的恐怖片、心理片，韩国的青春爱情片，香港的黑帮片和动作片，以及中国大陆日渐成熟、丰富的商业电影类型，都在近些年来以东方文化特有的传统和电影市场需要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创造了不同于好莱坞的电影创意文化和市场竞争力。亚洲电影本土的成功、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其类型艺术自然吸引了具有全球战略眼光的好莱坞的巨大兴趣。“近年好莱坞‘翻拍’的眼光更多地投向了亚洲地区。日本、韩国、

^① 汪献平、王平：《对亚洲电影的翻拍与好莱坞的全球战略》，《电影艺术》2007年第04期。

^② 杨孝文：《法国影片再次征服好莱坞 多部翻拍片正在筹划》，<http://news.chinafilm.com>。

香港，甚至泰国电影，都有多次被翻拍的记录。不同国家和地区翻拍的题材也不尽相同，日式恐怖片在美国很有市场，美版《午夜凶铃》和《咒怨》也同样票房火爆；爱情片方面，好莱坞比较钟情‘韩流’。全智贤的几部‘野蛮’系列均被好莱坞买走翻拍版权。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触不到的恋人》也是华纳从韩国购得的同名电影版权。香港和泰国则以招牌式的警匪片和动作片为主。《无间道风云》能够获奥斯卡大奖，虽然与奥斯卡评委对马丁·斯科塞斯的‘补偿心理’有关，不过港版剧本能让华纳斥巨资翻拍，其优秀程度也可见一斑。预计今年上映的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杀戮时刻》，则是由泰国片翻拍而来。”^①媒体分析好莱坞新世纪以来翻拍亚洲电影的现象时指出：

日本电影在亚洲的实力数一数二，半个多世纪前，以黑泽明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导演在世界影坛横扫奖项与票房，那时黑泽明的多部代表如《七武士》、《用心棒》、《罗生门》都被翻拍成西部片在美国上映，……当进入90年代的世纪之交，好莱坞……众多编剧空中阁楼式的自我挥洒才华，导致很多剧本无法保证好的市场前景，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美国翻拍日本恐怖片首先就拿《午夜凶铃》下手了，没想到该片居然赢得大满贯式的票房胜利，2002年美版《午夜凶铃》公映之后，光是在北美就有1.29亿美元的票房入账，整整是影片投资的3倍！《午夜凶铃》重新烧热了亚洲电影的好莱坞温度，除了制片方梦工厂抓紧赶制续集之外，一系列亚洲恐怖片也进入好莱坞片商的视野，《咒怨》、《鬼来电》、《鬼水怪谈》、《见鬼》等等都成为翻拍题材的香饽饽，被片商们争抢。……亚洲电影受到青睐的题材也绝非仅仅是恐怖片那么简单，爱情文艺片也是片商们追逐的热点。……亚洲爱情片中同样也有不少感人的爱情故事可以跨越东西方的鸿沟，《谈谈情，跳跳舞》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原版以国标舞为切入点，还配上了好莱坞经典影片《国王与我》的原声音乐，让这部日本歌舞片超越了国界和语言的障碍，翻拍成美版之后，里察·吉尔和詹尼弗·洛佩兹的巧妙组合，让美版《谈谈情，跳跳舞》同样获得票房分手，这部影片也是极少数原版与翻拍片取得双赢的作品。……改编自全智贤的韩国爱情电影的《触不到的恋人》，美版由基奴·里维斯和桑德拉·布洛克主演，……影片反响甚至盖过了韩国原版，在世界范围内劲收1亿美元的票房。……虽然

^① 王海：《好莱坞翻拍片 好的不多》，《环球时报》2007年3月1日。

《无间道》未能让香港电影整体复苏，但是让美国片商注意到这部港产大片，由好莱坞大明星布拉德·皮特的制作公司买走《无间道》拍摄版权之后，剧本经历过几年时间的酝酿，影片最终于2006年10月顺利上映，美版《无间道》更名为《无间行者》，由美国殿堂级大导演马丁·西科塞斯执导，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杰克·尼克森、马丁·辛、马特·达蒙、马克·沃尔伯格等众多明星倾力加盟，这是亚洲翻拍电影中最受重视的一次，所有加盟的电影人都是好莱坞超一流的大明星，《无间行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大功告成的命运。……在翌年举行的第79届奥斯卡大典中夺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剪辑四项奥斯卡大奖……2008年9月，美国暑期档刚刚结束，一部由香港彭氏兄弟导演翻拍自己的旧作而成的《曼谷杀手》也悄然上映，影片以780万美元的单周成绩拿下票房周末冠军，再次为亚洲电影在好莱坞的第二次淘金赢得了掌声。虽然动作片目前还不是翻拍作品中的热门之选，但相信会有更多的优秀的亚洲动作片会逐步走入好莱坞片商的视野之中。^①

利益冲动而非文化交流自然是好莱坞翻拍亚洲电影的第一原因，分析称“《华尔街日报》就曾在名为《好莱坞未来十大趋势》的文章中预言：出于令巨额投资回报更有保障的理由，话题性十足的翻拍电影和对票房有强烈刺激作用的恐怖片将大行其道。……瞄准低成本高回报的日本经典灵异片是好莱坞大规模翻拍亚洲电影的发端：就在高科技制作的异形僵尸和吸血大战场面渐渐让西方观众丧失视听兴趣之际，日本导演营造恐怖心理之炉火纯青，令西方观众耳目一新。商业嗅觉最灵敏的梦工场以100万美元的低价购买了《午夜凶铃》的翻拍权后，于2002年以4800万美元重铸西洋版《午夜凶铃》，在全球斩获2.49亿美元票房。食髓知味的梦工场于2005年跟进拍了续集《午夜凶铃2》，全球票房也达到1.61亿美元。……紧接着，在亚洲电影格局中异军突起的韩国电影夺走了好莱坞的注意。韩国影片以其出色的企划能力和独特的电影概念受到好莱坞高度关注，《我的老婆是大佬》、《我的野蛮女友》、《家门荣耀》、《光复节特赦》、《太极旗飘扬》、《金奉斗老师》和《中毒》等题材风格各异的影片横行亚洲的声势就是最好证明。于是近年来好莱坞不断将手伸向韩国，贯彻本小利大的‘拿来主义’：歌星兼演员奎恩·拉蒂法的下一部影片就是翻拍《我的老婆是大佬》；麦当娜的小牛制片公司正在重拍韩国的恐怖片《鬼铃》；梦工场花200万美元买断了韩国惊悚片《蔷花红莲》的重拍权，《我的野蛮女友》也已列入其重拍计划；20世纪福克斯则开始着手筹拍《爱的肢解》，而一下子‘拿来’最多的无疑是华纳兄弟公司，他们近期的计划是改编韩国的三部影片：《嫁给黑手党》、《触不到的恋人》和《终极刺客》。从日本灵异片到韩式爱情片、港产黑帮片，好莱坞的‘翻拍视野’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开阔。亚洲电影俨然成了好莱坞的灵感库，两者之间曾经的学习与被学习的关系，一下子全盘反转。……如

^① 《无间行者，东方取经——好莱坞翻拍亚洲电影淘金》，<http://www.insun.com.cn>。

果说，1960年好莱坞翻拍日本电影《七武士》是出于向黑泽明这样杰出的作者型导演致敬的动机，而如今对亚洲电影重度上瘾，则是源于更直接的利益驱动：选择已被市场证明成功的亚洲电影剧本，注入重金。”^①

好莱坞翻拍其它民族电影大多是因为这些电影已经取得较好的票房，甚至是在该电影放映多年以后，也就是这些电影已经实现了最大可能性的本土或者国际传播效果之后，即使现在好莱坞翻拍其它民族的电影的速度加快，常常在一部电影取得重要的票房成功之后就开始购买翻拍的版权，但好莱坞也没有因此在任何程度上造成了原创电影传播效果减弱。一来好莱坞购买的只是将要翻拍电影的英语翻拍版权、并将利用好莱坞全球网络传播翻拍电影，既不会抑制、影响该原创电影本土语言版本的任何国际传播，也不影响该电影本土语言、其它语言甚至英语的翻拍形式的。只要其他电影制作者具有市场竞争能力都可以参与到任何原创电影的翻拍大潮之中。更何况好莱坞翻拍其它民族电影虽然不是出于文化交流和促进原创电影国际传播的目的，但客观上却有利于该电影的国际传播。如姜文的《让子弹飞》如果真的还在上映期间就被好莱坞以千万美元的高价购买了翻拍的版权，那就一定会有利于这部电影华语电影市场的更广泛的传播，也将有利于这部原创电影国际传播。而好莱坞将来翻拍的《让子弹飞》也将更进一步有助于国际电影市场了解中国电影。也许翻拍德国电影《窃听风暴》的好莱坞导演波拉克在接受《多彩世界日报》采访时所说的话更能准确表达翻拍对原创电影及其本土文化的意义，“我们就是非常喜欢这部影片，并且希望(通过重拍)使其面向更多观众。这项计划还没有最后敲定，不过我们正竭尽全力让计划实现。”^②确实，翻拍会染一部本土电影为更多的观众所知道。至于全球具有市场影响力或者潜力的导演和演员纷纷去好莱坞发展，是否削弱了本土电影的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也是无法定性的问题，因为导演和明星去好莱坞发展并非是一个零与和的博弈游戏，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

总之，单纯指责好莱坞如同黑洞一样抽空了全球电影产业的资本、人才和文化资源是无济于事的，更具可行性的方法应当是如何突破一些文化或者意识形态以及政治限制，培养如同好莱坞一样可以吸收全球电影资源的机制，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个地区电影在全球化电影格局中的竞争力。如欧洲电影虽然目前还难以同好莱坞抗争，但如果欧洲电影真的能如同欧盟所希望的那样突破制约其发展的一些问题，或许就真的可以通过培养一个同好莱坞电影差不多的电影市场而形成自己整合全球电影资源的能力。中国电影、尤其是商业电影的快速发展也为中国电影创造了某种可能性，而中国电影能否整合全球电影资源则是实现这些可能性的根本路径。中国电影市场、尤其是电影院线的超常规发展确实为中国电影产业链的形成和产业竞争力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但中国电影创意人才的匮乏已经造成了中国电影的瓶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电影如果不能以开放的态度吸收全球电影人才和电影文化资源，连本土电影市场份额都会出现危机，更遑论国际传播。而要实现中国电影全球电影文化资源的整合，则意味着中国电影观念要发生质的变化。换句话说，中国电影要转变成全球化的中国电影，而不能如同众多论者所强调的民族化的中国电影，而这是中国电影已经开始在做的事。媒体报道，“最近，好莱坞导演受邀执导中方主导影片的消息频频传来，道格·李曼、安东尼·福奎都有了‘东游’计划，而刚刚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30亿元的成交项目中，有80%为中外合拍。……把洋导演‘请进来’，正是希望借助他们将优秀的中国故事，以适合国际电影市场的方式讲述出来，从而帮助中国电影‘走出去。’”^③由此，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在经历引进海外电影到引进海外资本再到引进海外文化创意人才，这或许意味着中国电影一次更深入的全球化战略的开始。

^① 《东风劲吹好莱坞》，<http://www.modernweekly.com>。

^② 洋洋：《好莱坞遍地找剧本 环球购得〈汉江怪物〉改编权》。

^③ 《好莱坞洋导演东游记：中外搭配卖片不累》，<http://ent.sina.com.cn>。

新闻传播研究

全球脑，中国心：网络时代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认同^①

Global Mind, Chinese Heart: the Culture Identity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t Internet Age

陈熾如^②

中文摘要：互联网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生对传统的中国文化的认同？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和研究生普遍反映他们将网络作为他们获取新闻和外部世界其他信息的主要渠道。大多数女生都有痴迷于韩剧而不能自拔的经历，而男生大都喜欢看美剧。许多中国学生其实清醒地意识到韩剧乃至日剧的唯美情节和内容与生活现实有着遥远的距离，如果在个人感情生活中面临抉择，还是会遵从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中国家庭、学校、媒体灌输的准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迷失在网络信息的海洋里，而是经常动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如书、报、刊反复查证重要观点和信息的可信性。本土文化就像植根于他们心灵土壤的一棵常青树，二十多年的教育所奠定的根基难以动摇。简言之，当代中国大学生具有“全球脑，中国心”。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学生，文化认同

Abstract: Has the Internet at some extent changed the Chinese students' identity wi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research conducted by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that college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udents generally rely on Internet to acquire news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uter world. Most female students are fascinated with Korean

^① 本文为共青团中央 2008-2009 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立项规划课题成果。

^② 陈熾如，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TV dramas, and male students with American TV dramas, while many of them realize that Korean and Japanese dramas have a distance with the reality and they will abide by the Chinese value and the norms instilled by the family, school and media when facing personal decisions. Many of them often use new media such as mobile phone and traditional media such as books and magazines to verify opinions and information acquired from the Internet. Local culture is like an evergreen tree rooted deep inside their hearts, and the education they have received for the last 20 years is not easy to be shaken. In brie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has "global mind and Chinese heart".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hinese students, culture identity

问题的提出

传播学的经典理论指出：在外部的“客观世界”和我们“头脑中的世界”之间，还有一个“世界”，主要是通过媒体营造的(Lippmann, 1991)。在当今传媒大发展、大普及的年代，我们不由得关心以下问题：这“三个世界”的关系如何？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大学生头脑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一图景从何而来，又如何影响他们的文化认同？当互联网上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西方，青年学子对“全球化”和“西化”的影响做何反应？“八零后”大学生是否像许多批评家和观察家所认定的那样“西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双重影响下，他们的文化认同倾向如何？他们是否挣扎摇摆于不同的文化身份之间？

文献综述

文献检索结果表明，一些外国学者早已注意到新媒体（早期研究包括电视）时代的文化认同问题(Hall & Du Gay, 1996; Jones, 1997; Barker, 1999)，虽然早期研究仅是点到即止，未做深入探讨。Jones 认为网上人际交往既丰富了“爱”，也更易于使“爱”枯竭。Turkle (1995)在后现代主义的框架内审视网络时代的个人身份认同。对于直接关涉某一特定人群如中国人的文化认同，Zhong & Gong (2008)通过分发电子问卷，展开调查，分析结果后，制作了一份量表，用以比较网络时代不同年龄的两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认同。但这只是一项初步的研究，更大范围的可靠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网上海外华人组织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也进入了学者的视野(Chiu, 2005)。这一领域的有限研究主要考察网络在海外华人组织/社团的延续、演变和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得出的结论比较浅显。Wong (2006)对硅谷华人的调查发现：当人们移民到另一个国家、生活于另一种文化环境之后，他们对故国文化的认同感反而加强了。其实，这是一个在研究中得到印证的常识。Xie (2005)则将目光投向散居海外的华人通过网上虚拟社区形成的文化认同。他的结论是：网络是海外华人与中国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使他们在遵行西方行为规范的同时，不断给自己强化的暗示“我们是中国人”。

曾在中国顶尖大学任教数年的外国专家 Bell (2008)基于同中国学生的日常接触，发现他们的文化认同往往容易被诸如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风波之类的事件强化为民族主义意识。同时，有过出国经历的中国学生回国后往往比其他同龄人具有更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的明证之一是他们更努力地学习中国的传统哲学，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虽然许多中国学生仍然有强烈的出国深造的愿望，但他们对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只是有条件地接受，认为一个稳定合理的中国政治格局应该建立在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的基础上。Bell 进而得出以下结论：虽然网络不像传统媒体那么受限，虽然全球化将世界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但中国学生并不曾被这些外来的“浪潮”冲昏头脑，失去中国立场，盲目拥抱西式民主。他们对来自外界的信息将信将疑。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结论与国内学者近年来对网民的调查结果（如谢新洲，2008）相符合：超过一半的网民对各种网上新闻持怀疑态度。但同时，《中国青年报》2009年的报道表明：对许多中国大学生、研究生而言，网络的重要性就像“空气和海水”一样（周凯莉，2009）。

方法与程序

除了文献分析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访谈对象自述的方法。本文作者已发表了先期研究论文 (Chen, 2009)，随后又在更大范围内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访谈，积累了超过 100 份的访谈报告和自述，可供定性分析。我们确定的访谈对象是有过四年以上“网龄”的大学生或研究生。他们的年龄普遍在 20-24 岁，既年轻又成熟。“年轻”，因而接受了足够的网络影响，同时，他们又成熟到具有一定的反思能力的程度。

研究结果

1、中国学生依赖网络，但对网上信息持保留和怀疑的态度

调查结果表明：不论来自偏远的农村还是出身于大城市，大学生和研究生普遍反映他们对互联网颇有依赖，并将网络作为他们获取新闻和外部世界其他信息的主要渠道。以下自述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每当我在课业中遇到问题，我就上网用搜索引擎。当我想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新闻，我上网。当我想用娱乐放松自己，我观看从网上下载的外国电视剧。当我想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心事，我上网写博客。”

大多数女生都有痴迷于韩剧而不能自拔的经历，而男生大都喜欢看美剧、玩网络游戏。甚至有人这么说，“电脑是女生的影碟机，男生的游戏机。”一名女生说，“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和周末，我和所有的室友聚在电脑屏幕前，沉迷于大洋彼岸的人们生活故事。”相较于美剧，迷恋韩剧的女生更多，甚至有好几个女生表示她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到韩国去旅游，见识一下那里“精致的饮食、服装、化妆品和社交礼仪。”许多人通过网络收看流行的外国电视剧，部分地是缘于需要找到能和同龄人谈论的共同话题。男生则宁可熬夜也要看欧洲足球赛和美国职业篮球赛。

让我们引用处于两个极端的两段自述。一个说：“我对所有的主义都失去了信仰。网络就是我的一切。它构成了我的生活的全部。失去网络，我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另一个说：“不论我多么频繁地使用网络，我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网络对我的思想影响甚微。”其他大多数人的态度处于这两极之间。他们承认自己对网络的全方位依赖，并且不讨厌这种依赖，但对网上的外国内容保持着应有的怀疑态度。

部分中国学生对网络的依赖程度在以下自述中可见一斑：“我们宿舍四个人。每天下课后，我们各自面对自己的电脑，在网上冲浪。到吃饭时间了，其中一个人通过 QQ 给其他三个人发信息：吃饭去吧？其他人回复道：好吧，吃饭去。”她们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电脑屏幕，一起出去吃饭。

2、中国学生对网上外国文化影响的态度：抗拒—接受—反思

超过一半的访谈对象来自中国农村，在乡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接触网络媒体之前，就培养文化认同感而言，他们已经接受了家庭教育、学校灌输和传统媒体的宣传影响。我们也认为，网络媒体不可能是任何人文化认同的唯一来源，甚至不是主要决定因素。但以下问题随之而来：学生对网络深度依赖，长期置身于外国文化影响之下，是否会因此改变了他们原有的中国文化认同？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考察他们对外国文化的态度。

总体上看，中国学生对由来已久的“韩流”并不排斥。女生尤其欣赏韩剧中的俊男靓女，打扮时尚，举止得体，言谈入时，擅长烹饪，而且总有谈不完的恋爱。虽然她们意识到这些只是虚构的故事，但观看韩剧不啻给她们提供了一个心灵的港湾，一个避难所，让她们暂时逃离沉重而乏味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喜欢韩剧的学生大都指出：她们在心灵和情感上与

剧中人产生认同，原因是韩剧的文化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似。在此，传播学理论得到了印证：人们总是更愿意接受与自己原有知识和价值相契合的外来观念。

那么，日剧呢？许多学生表示：基于从小所受的教育，他们原先排斥一切“美化”日本人的文化产品，但网络使他们“发现了另一个日本”，与教科书上写的不同，与他们脑子里的图像也大相径庭。“既宁静又热闹，既朴实又繁华，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情趣。”一些学生喜欢日剧对“细腻感情的雅致表达”，沉醉于日式生活哲学不能自拔。一些女生甚至表示：日剧中经常出现家庭主妇精心烹制美味佳肴，并不厌其烦地擦拭地板，诸如此类的生活细节使她们渐渐地接受了“女人就应该是全职太太”的生活哲学。当然，这些都是二十多岁的高年级大学生或研究生，有着清醒的头脑和较强的反思能力。观剧之余，她们也上网查找历史资料，或翻阅学术专著，核对日本影视剧中的相关情节是否真实。

学生对美剧的反应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先前的教育赋予他们强烈的中国文化认同，但他们无法抗拒网络的诱惑，特别是周围的人都在看美剧、谈美剧，他们觉得自己也应该看看。有个女生说：“美剧占据了我电脑硬盘六分之一的空间，但我舍不得删除，还经常调出来看一看以学习英语的名义。”

与外国电视剧如此频繁的接触产生了什么后果呢？剧中人对友谊、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引起了中国学生的普遍共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剧中的一些情节与他们习惯的中国文化元素相悖，不符合他们的心理期待，如粗言野语，性的滥交，剧中男女主人公更换约会对象的频率，等等。许多女生在观看美剧之前，对美国社会的刻板印象是“充满暴力，过度自由，放纵私欲”，对美国文化极端排斥，但看了许多美剧之后，她们的观念发生微妙的变化。接受美剧描绘的美国，但不一定欣赏。在某种程度上，她们认为“疯狂的美国人”追求的不过是个人的幸福，而在中国的“八零后”眼里，这无可非议。

同时，西方的重大节日，如感恩节、圣诞节、情人节等，已渐渐被未必明了其来源的中国学生所接受，主要原因是其“浪漫气质”暗合中国“八零后”与“九零后”的“小资”情调。这与网络有何关系？且看一许多学生将这些节日视为通过消费挥洒个性的契机，而其购物行为通常是网购。

走笔至此，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中国的“八零后”通常被视为崇尚个人主义的一代，甚至有点以自我为中心，重视个人幸福。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他们能够认同美国价值观念，同时又不曾将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连根拔除。

互联网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学生对传统的中国文化的认同？许多中国学生其实清醒地意识到韩剧乃至日剧的唯美情节和内容与生活现实有着遥远的距离，不能作为生活教科书，如果在个人感情生活中面临抉择，还是会遵从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中国家庭、学校、媒体灌输的准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迷失在网络信息的海洋里，而是经常动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如书、报、刊反复查证重要观点和信息的可信性。这一现象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年轻的中国学生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认同通过传媒习得的一些美国文化价值观念，如尊重个人自由，保持人际距离，同时又保留中国价值观念。本土文化就像植根于他们心灵土壤的一棵常青树，二十多年的教育所奠定的根基难以动摇。简言之，当代中国大学生具有“全球脑，中国心”。

3、中国学生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热爱—迷失—眷恋

与许多其他学科学者的结论相反，本研究发现我们的访谈对象并未失去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他们无一例外地怀着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成长。其中，大多数人读过中国文学的“四大古典名著”，熟悉部分“红色经典”，甚至爱唱“红歌”。但就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他们遭遇了网络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影响，其心情正像一位男生所概括的：“我脑海里所有的理想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网络这一科技进步催生出来的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横空出

世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可以供奉的精神土壤。网络就是横亘在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路上的分水岭：没有网络的我们是计划经济时代残留的产物，随后我们就沦为网络时代的奴隶。”还有的学生写道：“有时我会问自己：不要电脑，不要QQ和MSN，我能生存吗？如果没了网络呢？我还是我自己吗？我什么也不是了！”

相较于那些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上网的同学，进大学以后才成为网民的学生感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心智已经相对较为成熟。但所有的访谈对象都承认网络“重新组织”了他们的外在生活与内在世界，并帮助他们“重新发现”了一个与传统媒体描述的世界迥异其趣的“美丽新世界”。许多人感慨、哀叹自己似乎在曾经深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网络带来的异域文化之间无所适从。幸运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曾让自己在这一“精神迷宫”里摸索太久。有的通过有意识地遵守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纪念中国的传统节日等行为方式，重新找到了内心的平衡；更多的人则在一度痴迷网络之后，意识到其实网络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眷恋。重大事件如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和2010年的玉树地震，在一定程度上震醒了他们的“中国意识”：“当那么多的同胞在受苦受难，其他的人悲痛欲绝，我能无动于衷吗？我真想大喊，‘我是中国人！我们是中国人！’”重要的是，他们获知这些重大灾难事件的信息，参与讨论，采取行动，主要是通过手机、网络等新媒体。也许，后续研究应当关注的是这些重大事件的“传播冲击力”能持续多久，是否从根本上让年轻学子重返他们的中国文化认同。

据多数访谈对象说，他们对中国文化难以割舍的眷恋主要来自于中华文化传统自身的魅力和感召。虽然他们天天上网，享受着电脑和网络带来的快速写作和即时沟通的便利与乐趣，但与此同时，他们怀念过去那些手写的信件和手绘的贺卡，有书法和绘画特长的学生更是觉得电脑和网络剥夺了他们展示自己才艺送给友人温馨的机会。两位工书法、擅丹青的学生甚至感叹道：如今的中国人，连国画都画得少了，因为网上各种图画漫天飞，而且电脑也有绘画功能。

“选择性注意”原理在此得到了印证。他们有意无意地选择那些能够固化自己的中国文化认同的网站和信息，也能从各种外国电视剧中迅速地发现与中国文化相契合相呼应的元素。更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访谈对象众口一词地谴责“全盘西化”倾向，认为这对中国青年有百弊而无一利。不同的学生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乐观者建议中国政府和媒体加大“文化出口”力度，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而悲观者则一味地哀叹某些人“失去”了文化认同感。但总体来看，多数人对复活和复兴青年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仍然怀有模糊的期望和想往，提出我们可以做“地球村里的中国人”。一种“地球人”的意识正在形成。

4、多元文化认同：碰撞—冲突—融合

尽管不同的访谈对象依赖网络的程度和方式各有不同，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网络对他们的生活日程、生活方式、闲暇时间、文化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影响的走向与多数社会观察家和文化批评者的结论相反。

评论界常见的论调是互联网使年轻一代变得浅薄、浮躁、虚荣，等等，而我们发现许多学生通过网络了解到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比他们过得更“惨”，从而帮助他们减少了自卑和自怜情绪。

关于全球化时代新媒体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有访谈对象做了以下描述：“我们也许不看报，但我们不能不上网。我们可能不看电视，但我们不能没有宽带。我们可以不打太多的电话，但不能没有手机。我们或许不听广播，但我们必须拥有MP3。我们可能不用纸写信，但我们得有QQ和MSN。这一切都证明新媒体以多么巨大的力量重构我们的生活。但如果没有全球化，新媒体无法如此‘发威’。”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虽然访谈对象从各个侧面反复强调新媒体如何带着一个全球化的世

界影响他们的生活，几乎所有人都否认这一切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身份认同。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承认从西方发达国家涌入的价值观念与他们头脑中既有的中国价值观念发生过激烈的冲突，甚至引起了心灵的痛苦，但中国文化在他们的心中根基是如此牢固以至没有任何一种外来力量可以将其拔除。最终，面对多元文化影响，多数人的态度是以自己的标准，吸收外国文化中“合理”和“先进”的元素，但保留精神上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种选择本身就合乎常情常理，因为人天生有一种倾向，即通过化解头脑中的矛盾冲突以重新达到内心的平衡。

这种冲突中求平衡的心态在以下自述中得到了生动具体的表现：“游戏、动漫、创意汇聚的日本，就连在这些文化娱乐产品中都渗透出菊花与刀的武士道精神，我爱；时尚、奢侈、浪漫的法兰西，我爱；艺术、音乐、舞蹈在世界崭露头角的俄罗斯，我爱；人与人之间自由、开放、坦诚但并不深交的美国，我爱。如此种种，都是我在接触各国在新媒体中的文化产品时获得的信息。新媒体在书本和想象之外，展现了一个相对生动形象可考的世界。”但同一位学生和她的许多同伴表示：这种热爱并不意味着她们失却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她们看重中华文化的中庸之道，仰慕中华文明拥抱世界各国文化的襟怀，而这种根深蒂固的归属感给予她们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换句话说：对当今的许多中国学生而言，他们的头脑可以驰骋于赛博空间的信息高速公路，但心灵仍然栖息于中国传统的红砖碧瓦之下。

“心灵可以分为许多房间，每个房间安置着一种有别于他的文化因素。但所有房间的门都通向一个最隐秘的房间，那儿珍藏着与生俱来或曰伴随我们成长的中国文化认同。”

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感情，但同时也质疑一个人是否真的只能拥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文化认同。借用流行歌曲的一句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显然，网络的存在使世界变得更快。舆论引发舆论，事件催生事件。置身于地球村一隅的中国学生面对如此变局，在不放弃原有本土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对世界多元文化产生各种程度上的认同，无可厚非。

那么，我们调查的中国学生自己如何界定“文化认同”呢？他们说，文化认同就是“在文化意义上，我是谁”。只有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他们才能意识到这种自我身份认同。他们在接触外国文化之前，头脑里已经有了某些先入为主的成见，这些成见又影响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的反应。他们对外国文化产品的态度并不像一些批评家说的那样，是“盲目的崇拜”，而只是带着一种对异域风情的猎奇心态。

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也渗入了中国学生的头脑，但据我们所知，并未引起他们心理上的负罪感。与他们那节俭成性的父辈和祖辈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坦承心理上曾为是否买一件外国广告展示的奢侈品而挣扎，但结果总是妥协：“偶尔享受一下生活并没有错。我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要剥夺自己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的权力？”

如此看来，不同的文化认同之间的碰撞产生冲突，最后趋向融合。正像许多访谈对象所说的，网络使得许多过去被中国人视为不合理、不正常的事物合理化、正常化了，比如让老人住养老院。当被问及他们是否视之为有悖于中国文化的伦理观念，他们说这与文化背景无关，只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也许，网络不是让外在的世界变小了，而是让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变大了。或多或少，访谈对象都表示了一种复杂的愿望：同时享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好处，比如既保留个性又享受家庭的温暖，与他人分享信息而又不泄露个人隐私，使用快速便捷的网络通讯而又不接受技术的摆布。这不啻既要独居的益处又求社交的满足。有十来个学生提及他们喜欢网络的理由之一在于他们不仅能了解别人在做什么，而且可以通过网络，让自己也做出即时反应。

呼应本文文献综述中提到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们调查了这些“八零后”的相关看法。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多数时候只是作为压抑的沮丧感和失望感的出口，而这种压抑和沮丧经常源自他们从网络、传统媒体和学校教育中感知的不同“现实”之间的

矛盾。

讨论与结论

通过近三年的调查，我们发现访谈对象并不像许多专家担忧的那样，受到“全盘西化”的严重威胁。他们使用网络游戏、娱乐、沟通、交友、观剧、购物，但网络对他们的影响未曾颠覆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不论是来自学校、家庭、社会还是传统媒体。

通过网络，许多中国学生重新发现、重新评估外在世界，但也意识到诸如“美国梦”和“韩国奇境”都只不过是人为的幻境，不能当真。这种清醒源于将网上世界获知的信息与人际交流了解的实情进行对比，也部分地归功于传统媒体如书籍报刊。总的来说，中国学生能分清事实和虚构，理想和虚幻。

对网络的严重依赖不曾将中国的年轻学子转化为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者。虽然许多西方节日习俗在他们当中颇为流行，但据我们了解，这只是由于中国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置身于相对繁华的城市，优裕富足的都市生活催生了对浪漫情调的向往，而身心均比前辈自由的“八零后”追求和表达浪漫的方式也比前人更趋于开放外向。西方节庆活动方式恰好暗合这些期望。

这是一个多元文化认同的时代。但正像拼盘里的菜花色再多，也得共用一个盘子，中国大学生头脑中的多元文化认同有一个基础和前提，那就是他们将中华文化作为心灵的港湾，精神的家园。诸如汶川大地震那样影响全国乃至震惊世界的灾难，使他们重新意识到自己可能具有“全球脑”，但不失“中国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访谈对象提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们经常听到看到包括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士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言论，令他们担忧。

笔者在十多年前曾提出“主义真空”时代的一种新的“主义”Identity-Strength-Mission (ISM). (Chen, 1999; Chen, 2002) 其中，Identity 就是身份/认同。文化冲突固然引起文化认同的危机，但文化冲突的结果又总是强化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更加明确，“我”与“我们”的范围更加重合。“我”、“我们”和“他们”——这不又是三个不同的“世界”？

参考文献

- Barker, C. (1999). *Television,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Buckingham; Philadelphia, Penn.: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ell, D. A. (2008, August 8). Chinese students' constructive nationalism.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B20.
- Chen, Y. R. (2009). *Between Three Worlds: The Internet and Chinese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ie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hina Media Research*, 5(4): 31-40.
- Chen, Y. R. (2002). *Reviving the national soul: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hina's market economy era*.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Chen, Y. R. (1999). *Reviving the national sou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hina's market economy era*.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 Chiu, Ann Shu-ju. (2005). The Chinese overseas organizations on the Internet, with a note on the sociocultural phenomena beyond the webscape. *Information Society Research*, 9: 343-380.
- Hall, S., & Du Gay, P. (Eds.). (1996).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London: Sage.

Jones, S. G. (Ed.). (1997). *Virtual culture: Identity & communication in cybersociety*. London: Sage.

Lippmann, W. (1991). *Public opinio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Michael Curtis.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1. Originally published: New York : Macmillan, 1922.

Turkle, S. (1995).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Wong, B. P. (2006). *The Chinese in Silicon Valley: Globaliza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ethnic identity*.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Xie, W. J. (2005). Virtual space, real identity: Exploring cultural identity of Chinese diaspora in virtual community.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2 (4): 395-404.

谢新洲 (2008年7月10日). 从虚拟走向现实—互联网影响力调查. 《光明日报》第5版。

Zhong, M., & Gong, Li. (2008).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values in the Internet age between two age groups of Chine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NCA annual convention, San Diego.

周凯莉 (2009年1月16日). 校园新人类疯狂追潮健康靠边. 《中国青年报》第11版。

新闻传播研究

对西方媒体上中国形象的文化解析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Western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曹青^①

中文摘要：众所周知，数十年来西方媒体对华报导负面形象居主导地位，对此学术界已有较多研究。然而，对华报导深层形式结构问题却较少得到学术界关注。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对西方传媒中国形象的文化根源问题进行初步梳理与分析，旨在通过对西方近代崛起所生发出特有价值观及其话语体系的透视，探讨西方中国形象的本质与表现形式，并在文明间权力关系大框架下，分析西方传媒中国形象的政治及文化功能。

本文认为，西方报导中国的“宏观结构”深植于其现代性观念及其价值观之中。西方传媒在批评“他文化”种种“非自由”行为之时，用的是现代性观念中自由人文主义视角，而其国际事务报导则服从于西方政治、经济、及战略利益，折射出现代性观念中工业主义的特点。这种现代性观念的内在分裂性，及由此产生的双重标准，构成西方传媒对华报导根本性缺陷。

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探讨现代性观念与传媒的关系，重点分析现代性观念中理想化的“人文主义”及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的“工业主义”在传媒报导中的形式与作用。第二部分简要回顾西方中国形象及对华报导的历史轨迹，解析不同历史时期两种现代性观念以国家利

^① 曹青，英国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 的高级讲师。

益为核心的不同组合。第三部分讨论西方传媒话语叙事结构及分析模式。第四部分提出一个分析中国报导的初步模型。

关键词：西方对华报导，中国形象，现代性观念，自由人文主义，工业主义，传媒叙事结构，传媒话语

Abstract: It is well documented that negative images have dominated Western reporting of China in recent decades. However, there is insufficient study on structural features of how media images of China are generated in the mass media.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Western image of China, focusing on a modernity discourse that provides the cultural repertoire for China reporting. In particular, it seeks to understand cultural as well as political functions of Western reporting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t argues that the 'macrostructure' of China reporting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While the Western media have predominantly applied the liberal humanist version of modernity in criticizing 'non-liberal' practice by the 'other', their broad patterns of reporting follow largely Western material (political/strategic and economic/military) interests in the tradition of *realpolitik* industrialist version of modernity. This internal split of modernity discourse - liberal humanism as applied in domestic politics and *realpolitik* industrialis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onstitutes the fundamental flaw in Western coverage of China.

The article falls into four parts. Part one examin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discourse and media practice, focusing on different configurations of liberal humanism and industrialism as the grand narrative in representing China. Part Two trace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Western images and reporting of China, highlighting different mix of the two versions of modernity in line with Western interests at crucial historical junctures. Part three discusses narrative approaches to decoding Western media reporting. Part four presents a preliminary model of analyzing media portrayals of China.

Key Words: Western reporting of China, China's image, modernity, liberal humanism, industrialism, media narrative, media discourse

引言

在世界现代史上，西方曾为人类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极大地提高了整个西方及世界许多地方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在处理与“他文化”关系时，自由主义的西方常常变成了为唯利是图的西方。这种嬗变在西方传媒对“非西方”报导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西方传媒有种怪异的特征：强权政治的躯体上挂着自由主义的面孔。在报导国际事务时，西方传媒常以道义代言人身份出现。他们所宣扬的自由主义理念或许是真诚的，然而当现实利益受到影响时，西方传媒则投身于物质利益（国家利益）怀抱之中。以“现代化”观念为借口将西方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劫掠行为合法化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本文认为，西方现代性观念中以人文主义为根基的自由主义与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工业主义之间的内生性、结构性矛盾是西方现代性观念中致命的缺陷，也是西方传媒对“他文化”尤其是对华报导的最根本的特征。这一特征已经演化成西方传媒体制性的运行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方传媒对华报导的深层逻辑关系，或者说文化价值根基。然而这种逻辑关系及价值根基完全以西方物质利益为导向，而不纯然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简单的表述。

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简析现代性观念的构成，重点阐明作为“宏大叙事” (grand narrative) 结构的自由主义及工业主义的基本特征。第二部分考察西方中国形象及对华报导的历史轨迹，特别是在重大历史时刻两种现代性观念之间巧妙的交叉与结合。第三部分探讨西方对华报导研究中的概念及方法论问题。第四部分借鉴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剖析西方报导中国的初步分析模型。本文提出，解析西方对华报导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揭示其叙事方式内在的“神秘结构” (mythic structure)，即其报导中不同价值观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双重标准的叙事结构。换言之，西方传媒中国话语深植于现代性观念之中，而现代性观念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对华报导“双重标准”的可能性。

一、现代性观念与传媒“宏大叙事”

自十五世纪以降，西方不断地将世界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改造。在数千年人类历史长河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地域能对整个世界产生规模如此之大、如此持久、如此深刻之大变革，而这种变革仍在持续着，并随着全球化及信息技术革命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席卷全球。曾经拥有高度文明及多样价值观的非西方世界越来越承受着“现代化”及以“现代化”为名义的力量所带来的持久性挤压。“现代性”作为一种观念，无论对之如何定义，代表着西方在过去五个世纪中所走过的历程及经历的一切。它不仅反映了西方社会本质性特征，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方感知、了解及再现非西方世界的方式与方法。这种以现代性观念为视角，对整个世界进行概念化理解与概括的方式对当今世界产生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对这种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批判。例如，泰勒 (Taylor, 2002: 92) 就现代性是如何演变成社会科学中核心观念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现代性”已成为西方社会思维中不可或缺的本体性特征：

西方现代性观念之核心是对社会道德秩序全新之解读……现代性观念已经制约了

社会主要阶层的思维方式，并最终制约了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对我们而言，现代性观

念现在已是如此之显而易见，我们很难将其看作是许许多多诸观念中之一种而已。

这种社会思维定势的普遍性在对“他文化”报导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西方总是通过“发展”水平或“现代化”水平观察、描述、评判及对待非西方世界的。现代性观念发轫于西方，现代性观念的本身就赋予了西方现实及表象世界中极大的话语权。西方自诩是非西方世界应效仿之终极模式。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1978）指出，西方对“东方”所谓无力自我实现现代化的断言构成了欧洲帝国主义控制中东地区的最佳借口。自十九世纪以来，从黑格尔、马克思到福山（Fukuyama, 1989）都把非西方世界描绘成技术落后，精神萎靡，社会停滞的部落，一百多年来这种种族主义态度鲜有改变。

两种现代性观念

西方对华报导中，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现代性观念一直用来当做价值判断的基础，一是资本主义的工业主义制度，二是自由人文主义的精神。前者常用于科技及经济发展等问题报导上，如中国科技史、中西交往史及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等。后者则用于报导一系列与人权有关的问题，如阿里斯泰尔·米奇（Alistair Michie, 2007: 55）所称的三个“T”，即西藏、台湾和天安门事件（Tibet, Taiwan and Tiananmen）。这两种现代性观念构成了西方传媒对华报导的内在逻辑价值关系，各种报导事件也由此逻辑价值结构演绎出来。尽管历史上西方中国形象从来都是游移不定、左摇右摆，对中国的理解及阐释上也千差万别，但在各历史时期，西方看中国的基本思路是极其相似的。西方总是依据自身的历史经验及价值观，以现代性观念之尺码“测量”中国。

然而现代性观念中的工业主义是以物质主义为终极导向的，而自由主义则以人之价值为最高追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表明现代性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价值体系，它既有唯利是图的铁血冷酷，也有深刻温情的人性关怀。这一现代性观念矛盾复合体正是西方自十五世纪崛起以来自我演绎的内在逻辑构架。在对外关系上，从最初原始资本积累到后冷战时期对世界战略要地的军事化控制，西方所奉行的是不折不扣的实力主义原则；而在对内关系上，资本对劳工的奴役逐渐得到以人文及自由主义为理念的社会思潮的调节，使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社会主义因素的补充而得以修正与改善。纵观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发展，我们可以观察到一条清晰的轨迹：生发于工业主义价值观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及强权政治在西方对外关系上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人权等以人之尊严为终极价值的理念则通过法制及民主制度逐渐在西方国家内部得到建立、完善、巩固与发展，最终使西方国家内部实现了物质与精神比较协调的发展。

这种对外实行强权政治，对内实行法制与民主的双重行为模式是西方面临的重大结构性矛盾。实力主义、国家利益至上的外交理念决定了对外关系的最终导向是西方物质利益；而对内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又决定了西方话语系统的人文道义的精神追求，并以此占据国际话语的道德制高点。作为社会文化机构的西方传媒，虽然政治上独立于政府，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的理解上与政府的理念大同小异。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外交政策是实用主义的，其话语系统也多以现实主义辞令为主导；而西方传媒则不需顾及外交的直接效果，可以高调宣扬只有在国内才真正推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然而在需要时，西方传媒并不回避使用赤裸裸强权政治的殖民话语，不过这种强权话语往往披上“工业主义”现代性观念的外衣。毕竟，重商主义、海外贸易、技术进步、富国强兵均是西方国家立国的不折不扣的价值观，曾引领西方国家在过去五百年中励志图强、跨洋过海、开疆扩土、殖民屯兵、缔造帝国，造就出无数令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民族英雄”。

西方崛起是建立在对全球资源军事化、工业化的劫掠基础之上的，物质主义、实力至上的理念深深根植于西方现代性观念价值系统中。作为西方文化喉舌的传媒机构，比政府更有资格充当西方价值观念代言人，他们没有维护与其他国家良好外交关系的直接包袱，可以随心

所欲地表达他们所思所想。在报导国际事务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中，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为实，人文主义、自由主义为虚；前者隐而后者显；前者就事论事，平铺直叙，后者鼓动煽情，占领道德高地；前者晓之以理（国家利益），后者动之以情（人之尊严）；前者诉诸于民族情感，后者诉诸于道德优越感。

电视片实例分析

这种现代性观念的内在分裂充分体现在西方传媒的国际话语体系中。现以英国电视文献片对于“技术”这一概念的不同建构为例，加以说明。在英国对华报导主要纪录片中，“技术”这一概念构成了观察中国的重要视角。这些电视片认为“技术”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原动力，因而中国历史事件常被置于西方科技发展及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中。“技术”在人类历史发展上被赋予了主导性地位。例如，英国广播公司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系列片《千禧：千年之史》¹中，对鸦片战争就以实力主义、技术论进行解释：

在十九世纪，一个机器的、西方技术……统治世界的世纪。蒸汽机延伸了人类的力矩，数百万的人们被匆匆载离大陆，跨越大洋……贸易和鸦片引发了中国之战，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均势。工厂和机器改变了世界各地的景观及生活。

在此片叙述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被描绘成按自身逻辑运行的主体，而这一“主体”的行为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后果：

西方的火力和机动性变得势不可挡……欧洲的工业化力量在适者生存斗争中胜出……世界被机器所改变。

“技术”被赋予了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引导观众将西方殖民扩张看成是（工业）现代性的必然结果。“技术”因而充当了推动历史的角色，其作用也被道德化了，被殖民的悲剧变成了现代化的副产品，而强权政治的工业主义在“技术即进步”话语体系中被合理化。此外，“技术”还与“社会”链接起来，将“进步与落后”、“开放与封闭”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建构出二元对立、僵化单一的关系。这一特征在另一纪录片系列《东方是红色的》（BBC2,1985）表现得更加突出：

慈禧太后虽死，旧中国仍存，但它无法适应现代化时代要求，也未能从行政、军事、技术，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和心理上做好准备，以应对西方之挑战。^①

在对文化（封闭及传统的）、技术和军事（落后与传统的）诸概念的整合中，两种不同版本的现代性观念差别不见了，被统一成一个泛泛的“进步”概念。“现代化时代要求”这种模糊措辞将技术与现代性以道德化方式联系起来。将非西方国家被殖民归因于其不能满足“现代化时代要求”正是殖民主义“合理性”论调的核心。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 1978）早已指出，殖民主义者总是打着将世界“文明化”的旗号，把技术与贸易，进步与

^① 1999年英国广播电视台（BBC2）播出的一部记录过去一千年的十集历史文献片。这段文字摘自《机器的世纪》（第九章，十九世纪）。

文化种种不相干的概念连接起来，将殖民活动合法化。《中国崛起》（约克电视台，1992）纪录片将历史上强加于中国的贸易与当代中国繁荣巧妙联系起来：

在广州的欧洲贸易基地，文化冲突继续着。无论有怎样技术上的优越，欧洲贸易商只能用金银在中国购买商品，而中国人根本无意购买任何东西作为交换，……外贸是1842年上海沦陷于英军舰炮之下时以武力强加给这座城市的。清朝皇帝告别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妄自尊大的闭关锁国政策。上海最终变成了现在的模样，成为亚洲大陆最辉煌的都市，成为殖民主义之纪念碑。很多中国人发达了，他们在与西方贸易中过上了好日子。时至今日，上海港运送着中国总出口的一半货物。

于是，“进步的”贸易同殖民主义衔接起来，殖民的血腥消失在被殖民者的“繁荣”之中。“技术”与“贸易”在工业主义现代性话语中被描绘成现代化之先声。这种西方推动中国进步的说法一直占据传媒话语主导地位，很少受到挑战。唯一的例外是一九九一年英国独立电视台文献片《天命》。《天命》对西方自诩的“进步”及“企业精神”提出了质疑，对“技术即进步”观念进行了批评，对西方引以为傲的工业主义提出了罕见的否定性评价：“西方还需向东方学习：在一个日益变得狭小的世界中应效仿东方，在自己家园内修身养性，节制欲望，接受空间之有限”。在中国伦理框架下，“技术”不再是主导角色。“无论社会变得多么复杂，无论技术多么先进，人只能通过内心之教化及对永恒之思考实现自我超越”。

如同《通往乐土之途》（英国广播公司，1990）文献片所示那样，以“技术”视角看社会主要用于对过去历史的陈述。即是说，用于对传统中国及1949年前西方在华活动的论述。而在处理当代中国话题上，自由人文主义观念则成为主要视角，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段时间出现了诸如《劳改：中国的古拉格内幕》（约克电视台，1993），《死亡之屋》（第四频道，1995）等一系列备受瞩目的新闻调查片。1989年天安门事件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世界政局戏剧性变化引发了中国形象的突变，而1997年香港政权交接前棘手的中英关系更使英国传媒中国形象雪上加霜。天安门事件不久，在西方媒体声讨声中，一个极其负面对华报导时代随之开启，直至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才渐趋平息。在此期间，人权问题成为西方媒体聚焦点，服刑劳工、虐待儿童、死刑、堕胎、天安门事件、台湾问题及西藏问题备受传媒关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在西方媒体中变成了世界“贱民”。

这十年中，“现代性”观念被界定在人文主义及自由主义范畴内，并以“人权”、“自由”、“民主”及“法治”之类概念作为话语支撑点。“技术”、“贸易”、“经济发展”及“资本主义”等工业主义现代性观念则变得不那么相干了，因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接纳了这些现代观念，并在实践上大力推行，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业主义现代性观念在报导1949年前中国时被用作最重要视角，被看做是时代“进步”象征，而在报导二十世纪末中国时常包含负面意义。这一点在彭定康主持的新闻纪录片《东方和西方》（英国广播公司BBC2，1998）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该片在描绘中西关系时用“财神（贸易）”与“上帝（人权）”的二元对立借喻中西关系：与中国做贸易违反了西方自由人文主义的原则，因为中国践踏人权；与中国做生意意味着奖励对人权的亵渎。这种牵强逻辑是西方自由主义现代性观念道德化表现出的极端形式。这种卫道士姿态与“技术即进步”工业主义现代性论调形成鲜明对比。

毫无疑问，报导当代中国时自由人文主义被标榜成现代性之“真正标准”。《巨人觉醒》（英国广播公司BBC2,1998）文献片援引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辩护对华政策的讲话突出了“贸易”与“人权”间的矛盾：

我阐明了人权政策，也阐明了贸易及核不扩散政策，这些问题我们明年延长最惠国待遇时会继续讨论……我们已经是他们的商业伙伴了，我们也应该是他们的商业伙伴，我不后悔这样做，但我们必须在这三个方面都取得进展。

这三方面问题：贸易、技术（核不扩散）及人权代表了两种现代性观性间的冲突。“技术”概念在报导西方殖民扩张时被描绘成“进步”的代表，而在突出“核不扩散”问题上，“技术”显然含有负面意义。

二、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轨迹

艾萨克（Isaacs 1980:71）和莫舍（Mosher, 1990:21）在考察西方历史上对华态度时得出这样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呈现出钟摆式的大起大落：

- 艾萨克模型：
- (1) 敬重期（18世纪）
 - (2) 蔑视期（1840-1905）
 - (3) 仁慈期（1905-1937）
 - (4) 赞赏期（1937-1944）
 - (5) 失望期（1944-1949）
 - (6) 敌意期（1949-）

莫舍对艾萨克的补充模型：

- (6) 敌意期（1949-1972）
- (7) 第二赞赏期（1972-1977）
- (8) 第二失望期（1977-1980）
- (9) 第二仁慈期（1980-1989）

本文作者的补充模型：

- (10) 第三失望期（1989-2001）
- (11) 失去尺度期（2001-目前）

表1：西方中国形象历史轨迹

很多人认为，这种周期性摆动很大程度取决于中西关系结构性变化，因为中国形象摆动大致与西方对华政治态度同步（Jespersen,1996）。例如，中西关系的“赞赏期”（1937-1944）及“敌对期”（1949-1972）恰好分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期间。二战时中国是同盟国成员；而冷战时中西敌对。“赞赏”及“敌对”完全由中西政治关系而定。尽管如此，正反面形象周期摇摆还遵循着另一种规律，即当中国接受西方影响时，西方中国形象较为正面；反之负面形象产生。具体报导中，中国正面形象常与西方所谓“进步的”、“像我们一样的”生

活方式相联；而负面形象则与各种非西方的“落后”观念及行为相联。这种“我类”与“异类”二分法式狭隘单向的思维构成了西方对非西方世界主要感知方式。

理解西方政治利益与文化视角的交叉点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正面形象往往出现在中西政治经济利益的融合期。但政治利益与传媒话语也可能出现某种分野。作为西方重要文化机构，传媒可能产生与政府外交政策不同的声音。这一点在2008年初中国奥运火炬国际传递时可见一斑，西方传媒批评中国之际恰好是中西政治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之时。这种逆差可用传媒与政府的不同功能来解释，传媒作为文化喉舌，在报导“他文化”时，往往表达理想化、道义化的价值观，而政府则实行最合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采用的是实用主义态度。于是，在特定时期传媒以道德主义制高点批评政府政策道义缺失也不足为奇。尽管如此，传媒不同的声音常在上述“中国形象期”的转型期间出现，即当旧式报导变得陈腐，而新报导尺度尚未成型前，传媒往往以自身对国家利益的理解进行报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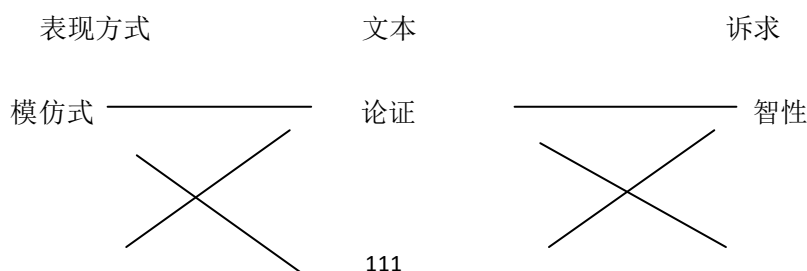
三、研究对华报导的概念及方法

理解西方传媒中国形象的话语结构需要有新的概念及分析框架，以解释传媒报导如何演变成中国话语的内在机制。换言之，仅仅勾勒出传媒中国形象是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解读这些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它们的语言特征是什么，叙事结构是什么，价值观结构是什么，有哪些固定话语模式，及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然而最重要的是，“有形”报导是如何同“无形”现代性观念联系起来的。为此，本节探讨对华报导的一些理论问题。

传媒报导依赖于讲故事，日常事件常被“包装”成可售的故事“卖给”消费者，传媒需要把报导的事件组装成易于领悟的固定故事模式，以利于受众消理解。为便于“解构”对华报导各层次结构，本文借鉴结构主义分析框架，特别是西尔弗斯通的理论，提出一个具体分析模型。西尔弗斯通（Silverstone, 1983, 1984, 1986）以普罗普（Propp, 1968）及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 1976）理论为模型，独创一种传媒话语叙事分析法，并将叙事结构分成“神话式”及“模仿式”两类，这两种叙事方式对读解中国报导尤其有效。

“神话式”与“模仿式”叙事结构

“神话式”指传媒报导中的符号结构，功能是以“再现真实”方式肯定社会主导价值观。传媒总是报导社会认可，至少能够容忍的价值观。“模仿式”指的是传媒叙事的方式特征，它以形象逼真说服观众，通过感性方式使观众认同传媒报导的真实性。“神话式”以戏剧化、故事化、娱乐化为特征；“模仿式”则以论点、论据、信息为重点。依照西尔弗斯通的观点，神话式叙事从两个层面发挥作用：（1）事件发生之情节及（2）解释事件之逻辑。这两个层面恰好整合了普罗普的语段分析和列维·斯特劳斯的范式分析方法。前者是历时型的，表现事件发生的始末，与民间故事结构相似；后者是共时型的，以抽象价值观而非故事情节为主导，反映出神话的结构特征。神话式叙事以故事引导情感；模仿式叙事以思辨进行推理。而两者的共同功能是以浅显易懂之叙事公式，将陌生且有些威胁性的“他文化”事件转化成一种既熟悉又让人放心的“我文化”范畴中可以轻松消解的事件。表2表达了神话式和模仿式叙事之间的关系。



神话式 ————— 故事 ————— 情感

表2：“神话式”及“模仿式”叙事结构关系

表2中不同元素间互动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辩证关系。神话式和模仿式叙事方式将普罗普（Propp）的时间顺序和列维-斯特劳森（Lévi-Strauss）的逻辑维度整合在统一结构中。下表表示不同概念间的关系及这种分析法运作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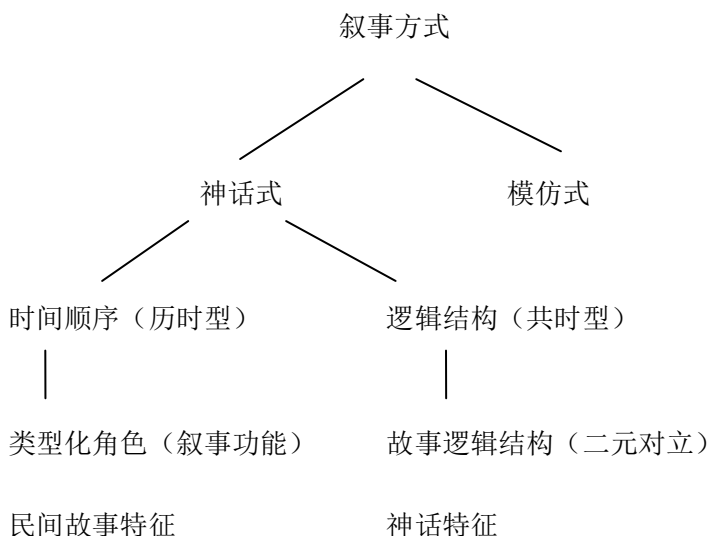


图3：传媒报导的叙事结构

以西尔弗斯通叙事视角观之，对华报导可看作是西方对异国文化的符号处理。虽然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及价值体系极不相同，其意识形态也令西方担心，但西方传媒以现代性价值逻辑及国家利益为坐标将对华报导通过“神话式”叙事的逻辑处理，在“模仿式”叙事结构障蔽下被演绎成类型化、格式化的中国话语。因而，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是决定传媒中国形象的最终根源。需要注意的是，神话式叙事逻辑并非指报导本身的逻辑，而是现代性观念之整体逻辑体系，传媒报导本身只是演绎现代性观念的一个载体而已。在传媒叙事中，神话式叙事将受众带到神话般的想象世界（中国故事）中，而模仿式叙事则将他们拉回到现实世界（中国命题）中来。

传媒报导与文化价值观的关系

然而，神话式叙事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而是以形象塑造之形式，读解他文化之“现实”，是以传媒报导之途径确认、巩固、弘扬、并“再生产”其文化主导价值观。因而，对华报导是西方强化自身价值的一种重要手段。要深入理解西方对华报导，必须将传媒报导置放于西方文化再生产的大背景中，因为这一大背景是中国形象产生的根源。以此而论，中国形象的塑造不是个人之作，也不完全是传媒机构之作，而是西方文化逻辑演绎出的必然文化产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有“同化”“他文化”才有文化安全感也是其逻辑必然。若现代性观念主导价值再生产是中国形象产生的横轴，那么西方国家利益则是其纵轴。当今世界以民族国家主权为最高利益的国际关系格局决定了一切行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以理想

主义价值观为核心的横轴与以现实主义利益观为尺度的纵轴必然会产生结构性矛盾，而这一矛盾是西方传媒对华报导不可逾越的障碍，也是西方报导国际事务双重标准的根源。

费尔克拉夫 (Fairclough, 1989) 关于传媒话语三层次：情境 (传媒人)、体制 (传媒组织) 及社会 (文化价值观) 层次的概说，为分析传媒中国形象提供了具体的话语分析框架。就中国形象而言，有一个倒金字塔型结构，即社会文化价值观决定传媒运作机制，传媒运作机制决定传媒人报导行为。传媒人只能服从社会文化共识，否则不是报导在编辑过程中消失，就是该传媒人被传媒组织所淘汰。所以，在个体新闻记者眼中，中国是多元的，每个传媒人对中国都有不同理解及个性化的认识，而在特定历史阶段西方国家却形成一种同质化、类型化、简单化、甚至是标签化的中国形象。原因并不复杂，任何对华报导都要服从现代性话语的神话式表述，都在“模仿式”传媒话语中表达西方社会文化所认可的“合理”观点。正是基于这一点，菲斯克与哈特利 (Fiske and Hartley, 1978) 将电视称为“现代游吟诗人”。西方电视如同古时游街走巷的“游吟诗人”，他们以动人之颜容，职业之虔诚，诉说着古老而感人的故事，令人欢欣但更令人感慨哀叹。无人告诉“游吟诗人们”该如何讲故事，然而他们诉说的故事代代相传，秉承着先人的忠告与智慧，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文化血脉相传的新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则对华报导并不是简单讲述中国事件。传媒是一台巨型文化母机，一架强悍的价值模具，一柄国家利益之利器，它以无以匹敌之威力不断打造着关于中国的话语。西方受众对国内事件报导常心存保留，但对国际事务报导则往往深信不疑。毕竟，对国内事件，受众有第一手体验，也是西方社会“我们内部”之事；对国际事件，观众没有第一手体验，更将其看成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事情，感受与结果不可同日而语。

将西方对华报导看作是建构中国话语的手段，有助于认清对华报导的本质特征。从传媒叙事结构分析转向文化价值话语分析，意味着分析重点从语言内部意义关系转向外部文明的权力关系。质言之，西方对华报导是一段独白，而非文明的对话；它诉说的是自己是谁，而不是中国是什么，它解释的是自己而非中国。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西方对中国的认知会随着中西关系之改变而改变。因而中国形象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在西方，而不在中国；在中西关系之扭转，而不在中国本身之变化。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发生的事件不会影响西方对中国的印象，而仅仅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除非中国发生的事件对中西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否则它们不可能引发西方对中国认知的重大变化。因此，2008年初北京奥运火炬国际传递期间，西方传媒对中国的谴责不可能持久，同样对中国政府处理四川地震的正面报导也不可能持久，因为两起事件 (西藏骚乱及四川赈灾) 都不足以导致中西关系结构性变化，因而两起事件的报导都是稍纵即逝的。

如今中西关系以经济互相依存及中国在全球新经济、金融秩序中的地位为基本特征，西方国家利益决定了经济上的考量重于其他因素的权衡。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尤其是奥巴马执政以来，曾占主导地位的人权观念已不再是西方看中国的主要视角。在可预见的将来，贸易问题上西方传媒焦点将在“财神”与“上帝”二元对立关系中继续转向“财神”，除非发生撼动中西关系的突发事件。在大众传媒的符号世界里，对华报导的“真实性”取决于其说服力，即通过语言及画面叙事功能令人信以为真。然而令人信服并非只由“真实性”抑或“事实”所决定，概念性的价值观更为重要。霍尔 (Hall, 1977) 认为，理解“他文化”是极其困难的，因为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殊的“概念图谱”(conceptual map)，这一“概念图谱”决定了某一文明感知、理解、进而与外部世界互动的方式与方法。在感知“他文化”时，人们只能以自身“概念图谱”理解他人，只能“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更何况国家利益将世界上的人们分化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因而对华报导中，西方只能以自己的“概念图谱”说中国的事儿。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文明都是自身概念图谱之囚徒，很难跳出自身文化圈的局限“以他人之心，度他人之腹”。

四、中国报导的叙事分析模型

对华报导分析模型

基于上述讨论，本节提出分析西方对华报导的叙事分析模型。模型以两类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为主线，讨论对华报导话语结构的分析方法。这两种叙事方式代表了两种极端的报导风格：一种是普罗普式经典模型，报导的事件依循明确的因果关系（图4中左侧一类）；另一类方式恰好相反，完全切割事件因果关系（右侧一类）。若以左侧规则统领报导的事件，便出现“好”与“坏”、“善”与“恶”的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的景象。其结果便如同传统俄罗斯民间传说，世界上只有英雄战恶魔的冲突。若按右侧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好”与“坏”，“善”与“恶”的绝对界限则模糊了，呈现“灰色”中国的图景，很难以道德化方式将中国事件升华为“善”与“恶”的博弈。在实际报导中，中国故事处于两种极端叙事形式的中间地带，虽然多数更靠近左侧叙事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如整体中国形象负面（或正面），传媒报导就偏向于左侧普罗普式叙事结构；如中国形象趋于中性化，则右侧叙事结构就可能被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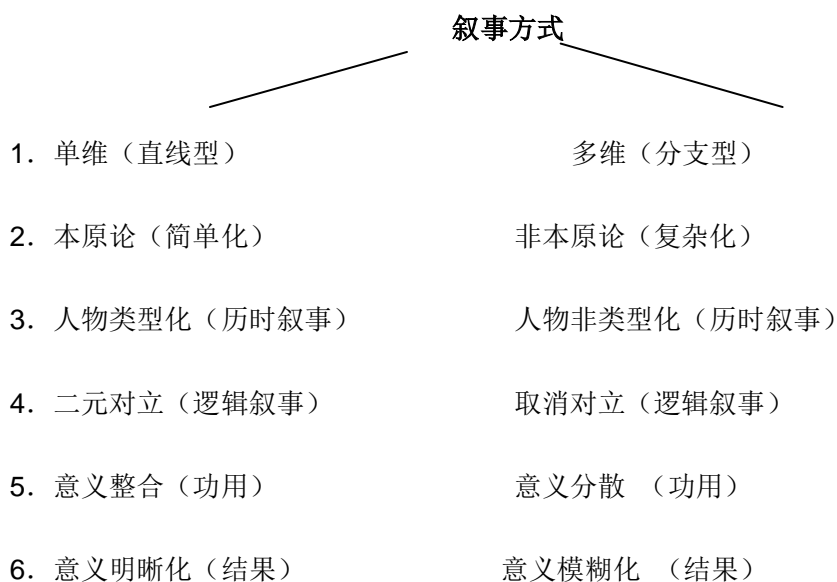


图4：对华报导分析模型

单维及多维

单维指的是经典普罗普式“非黑即白”叙事方式，类型化、脸谱化的人物活动贯穿于整个报导之中。通常情况下，报导开头就明确了价值主题，普罗普称之为“开篇”。“开篇”作用在于展示现实世界的平衡被破坏，肇事者是某种“恶”的势力；“恶”势力的出现呼唤“英雄”（人或进步的观念）的介入。虽然这种简单化叙事结构多用于好莱坞式电影，但以“再现真实”为己任的新闻时事节目中，这种普罗普式报导风格并不鲜见。单维报导常以“史诗般”英雄主题为引领，将“善恶之争”贯穿于整个事件报导中，并在单维逻辑结构中演绎事件道德冲突及最终结局，整个过程吸纳了“宏大叙事”各要素。若依此结构报导，传媒将建构一个黑白分明的中国，抑或正面，但多为反面。这类报导样式在上述各“中国形象期”高潮时段出现，如冷战时“敌意期”、八十年代“第二仁慈期”、及九十年代的“第三失望期”。

多维型报导则处于传媒叙事类型的另一端：因果关系在报导中被割裂成互不相关的片段，无法形成“宏大叙事”故事形态。被切分成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亚故事”及“亚逻辑关系”以细节引人，因而报导产生不同的理解，其意义也变成多元。这类报导以一种松散的、非线性关系的方式组合在一个题目之下。多维型报导多见于西方国内时事新闻，因为现代社会里“宏大叙事”体在新闻类节目中基本消失，单维的“善恶之争”只出现于国际新闻报导及虚构的影视节目中。这类节目的“善恶之争”也多弘扬西方“英雄”，抑或西方“进步”理念。与单维简单化叙事方式不同，多维报导向复杂化方向发展，常包含模棱两可矛盾性因素。这类报导出现于“中国形象期”过渡阶段。就是说，此时西方中国形象既非明显负面，亦非明显正面，它提供了多元的因素及多元的解读。这类偏于“灰色”的形象往往带有探索性、实验性、甚或前瞻性，意味着某种板刻、类型化的中国形象即将或已经过时，而新的形象类型尚未确立，或尚不稳定。

本原论及非本原论

西方报导“他文化”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文化身份构建问题。“本原论”指文化身份界定中将“他文化”某种特征本原化、固定化、模式化、种族化。“非本原论”指文化身份界定时侧重“他文化”特征的复杂性、流动性、及可塑性（Woodward, 1997:11）。图4左侧的单维叙事方式趋向于使用本原论叙事手法。本原论叙事风格否定了文化的普遍性，即文明间的共性。如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东方和西方》（英国广播公司,1998）称中国是“东方专制主义”；而文献纪录片《天命》（独立电视台，1991）则认为中国是“东方仁治主义”。“本原论”方法将人物简单化、类型化，并将叙事过程中出现的人物与事件赋予抽象的意义。“非本原论”将人物复杂化、个性化、背景化，而不使人物被约束在一个狭隘的概念空间，仅充当类型化的戏剧人物。

分解化，模糊化，碎片化及模棱两可叙事方式

这些特征指传媒叙事结构中，线性因果关系被瓦解的情形。“分解化”指“类型化人物”在叙事功能上由于引进与其不相容的因素而分解消失。例如，在冷战背景下以意识形态术语来界定类型化人物及事件非常有效，如使用“共产者”、“独裁者”或“暴君”等。这些意识形态意义浓厚的词语在西方语义背景下构建“恶”之角色很有帮助。消除这些标签式用语有助于类型化人物的瓦解，从而破坏其线性因果关系，使报导事件的意义“模糊化”、“碎片化”。类型化人物的瓦解也意味着报导语境转入相对陌生的领域，使报导意义多元，或“模棱两可”。淡化意识形态也意味着中国形象去政治化，不再以“本原论”方式建构中国。

结语

西方对华报导最重要的功能是构建、强化及延续自身文化价值观，而其价值观之根基是西方五百年来走向现代之路经验之结晶：现代性的理念。然而西方中国形象周期性变化的根基则是中西政治关系的结构性变迁。当前中西关系处于重要变更期，中西力量对比关系也发生着较快的变化。就西方传媒中国形象而言，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可以称之为“不可预见的时代”，这个时代发端于二十一世纪之初，具体地说始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此后西方传媒构建中国话语时出现了“失去了尺度”的现象，他们发现世界格局变幻如此迅速，中国发展速度如此惊人，未来又如此诡异莫测，他们失去了报导中国现成明确的参照标准，世界开始变得眼花缭乱，难以琢磨。冷战时代意识形态视角显然过时，冷战后期中西政治同盟关系也已告终，而我们可以暂称为“后后冷战”时代才又刚刚拉开帷幕。在中西关系中，政治

上非敌非友，经济上相互依存，文化上难褒难贬，唯有意识形态泾渭分明。而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去意识形态化又是大势所趋。

在西方，九十年代“历史终结”的兴奋已被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威胁感”所取代。自十五世纪西方崛起以来，第一次出现非西方国家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可能。这一切冲击着西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神经。传媒作为西方文化的“游吟诗人”必然寻求读解中国之新尺度，然而中西力量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的变局仍在继续，新型、稳定的政治关系有待形成，于是传媒报导呈现出某种多元化的趋势，其走势是上述图 4 模型向右侧方向移动，中国形象也趋于中性化、模糊化，相当程度上缓和了现代性观念的“宏大叙事”。近来西方传媒对中国弱势群体的关注便是一个例子。这类消息重于事件本身的报导，而没有过分夸大高压统治集团与受害民众间普罗普式的抗争。然而，对华报导将仍局限于现代性观念窠臼中，中国形象脱离这个“概念图谱”几乎不可能。然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潜在的全球性大国，中国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持久的影响，以长远观点看，这种影响势必转化成中国形象的新模式。

参考文献

- Fairclough, Norma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 New York: Longman.
- Fiske, John and Hartley, John (1978) *Reading television*, London: Routledge
- Fukuyama, Francis (1989)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Vol. 16, pp. 3-18.
- Hall, Stuart (1997)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Isaacs, Harold (1980)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M. E. Sharp
- Jespersen, T. Christopher (1996).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évi-Strauss, Claude (1976)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London: Jonathan Cape
- Michie, Alistair (2007). 'British myopia about China', *China Media Research* Vol.3, No.1, 50-60
- Mosher, Steven W. (1990).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USA: BasicBooks.
- Propp, Vladimir (1968).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2nd ed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Said, Edward W. (1978) *Orientalism: Western conceptions of the orient*. London: Penguin Books.
- Silverstone, Roger (1983) 'The right to speak: on a poetic for television documentar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5, pp. 137-154
- Silverstone, Roger (1984)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television science—a case stud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6 (1984), pp. 377-410.
- Silverstone, Roger (1986). The agnostic narratives of television science. In James Corner (ed), *Documentary and the mass media* (pp. 81-106). London: Edward Arnold.
- Taylor, Charles (2002) 'Modern social imaginaries', *Public Culture*, Vol. 14, No. 1, pp. 91-124
- Woodward, Kathryn (ed.). (1997).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新闻传播研究

劳动创造新闻

——当代中国新闻生产中的劳动过程与劳动控制^①

Toward a Labor Theory of Journalism:

Labor Process and Labor Control in Chinese Media Industry

王维佳^②

中文摘要：在反思中国记者研究的方法论和中国媒介生产关系变革历程的基础上，本文对当代中国商品化新闻生产中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控制进行分析。文章从新闻职业教育、新闻劳工的聘用制度和媒介机构内部的劳动控制机制三个方面展示当代中国新闻生产的基本状况。

关键词：新闻记者，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劳动控制

Abstract: Most of the studies on Chinese journalists tend to start from a premise that journalism is an independent profession, which has its own rules and should be isolated from any authoritative power, especially the Chinese state. This liberal framework effectively confined the academic resources to such issues as how state power, or market power, interferes journalists' work. Therefore, a lot of more fundamental questions about the labor relations and labor process of news production always left untouched.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is underlying area as how news production is organized and controlled in Chinese media industry, What are the labor process

^① 本文由作者的专著《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中的部分内容改写而成。参见，王维佳著，《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 王维佳，博士，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Chinese news workers.

Key Words: Chinese journalist, labor relations, labor process, labor control

引言：历史与方法论的反思

近代以来，新闻业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与中国知识分子探寻本国独特现代化路径的政治努力密不可分。从清末开始的漫长社会转型中，新闻从业者常常兼具记者编辑的自由职业身份、儒家传统的文人身份与改良者或革命者的政治身份。从殖民口岸中倡导帝国新政的近代文人，到“五四运动”中批旧立新的年轻学子，从抗战边区中践行“群众路线”的新闻战士，到国家体制内承担“思想工作”的文化干部。在百余年的历史中，新闻实践向来与一种整体性的政治目标和集体性的文化意识密不可分。然而，在当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却习惯抹去文化政治的历史脉络，用普遍主义观念来理解新闻。他们或者将新闻业视为现代市场经济中一个天然的专业分工领域和创造利润的信息服务行业；或者从权力制衡这一基本的自由主义逻辑出发，将新闻业视为独立于国家或政府，又承担社会守望功能，并有自己独特运行规律的特殊职业。这两种常常彼此重合的观念都从某种理想的新闻业模型出发，用现代社会分工下的职业规范标准衡量中国的新闻实践。

然而，回到新闻观念变迁的历程中来看，将“商品化的”或“政治上独立的”新闻操作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正轨”和新闻业“曲折发展”后的“归宿”，这本身就是“八十年代”特定历史背景下知识分子的集体政治诉求。在“放权让利”的国家政策和“告别革命”的文化意识推动下，新闻的商业价值与守望社会的理想最初成功地耦合。十余年后，当传媒业慢慢畸变为追逐利润的商业机器和另类的威权力量时，商业逻辑与专业逻辑之间自然出现了矛盾。然而在新闻学的讨论中，这一矛盾或者被无意识地悬置，或者被规避严肃历史分析的新自由主义声音解释为“尚未建立完善的市场体制”。新闻学者们或者热衷于为文化产业的制度变革或利润增长出谋划策，或者习惯用“威权/自由”的抽象原则敲打桎梏专业主义的“政治铁笼”，又或者在伦理上哀叹和质问新闻行业的种种“失范”现象。各个学术分支领域都用普遍的发展主义或自由主义观念来认识当代中国传媒业，彼此间却又难以展开对话，只是少见着眼于现实生产关系变革和文化意识转型的历史性反思。

新的研究路径的开拓，往往与新问题的发现联系在一起，而新问题的发现恰恰在于将已有的认识框架和价值理念问题化，而不是普遍化。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范式转换”往往并不是结构功能意义上理论模型自我更新，而是开始于一种对历史的“价值无涉”的重新讨论和追问。回顾近30年的中国新闻业改革历程，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和劳动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早在1978年，财政部就批准了《人民日报》和其他一些北京的报社采用包括成本分析，利润导向和政府税收等商业性管理机制。之后的几年里，“创收”成为传媒业者提及最多的词汇，“两个轮子（采编和创收）一齐转”、“一手抓编辑质量，一手抓创收”、“不懂赚钱的总编辑不是好总编辑”等口号广为流传，媒体开始尝试多种办法获取利润。此时，一些新闻单位已经推行了合同制、聘用制等人事管理方式。到了1990年代，中国社会开始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并加快了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步伐。在新闻传播领域，一方面国家逐步退出对新闻单位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文化消费市场和广告业渐趋成熟，媒介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与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规模相适应，全国各地的媒介机构开始了大规模的用人制度改革。在保留原有职工事业单位编制和待遇不变的情况下，聘用制员工、合同制员工、甚至不取任何酬劳的实习生开始成为生产新闻商品的主力军。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新闻劳动力开始转变为一种生产要素符号。同时，这一职业群体的内部构成也经历着明显的变化。在媒介管理者巨额贪污事件不断被揭发，明星记者和主持人的高收入成为百姓谈资的同时，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和各种“科学激励机制”逐渐建立的同时，生产新闻却成了越来越多既没有稳定工作岗位，又缺少基本社会保障的年轻记者疲于奔命的一种生存状态。

从明确自身政治立场的“启蒙者”、“革命家”、“新闻战士”和“文化干部”到以“客

观”、“专业”和“新闻价值”作为职业准则的雇用劳动力和都市文化精英。新闻工作者社会角色、新闻实践和主体意识的变化究竟在何种权力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发生？当代新闻工作者的劳动过程、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又如何特定生产关系中被不断地再生产？他们如何把自己每日身处其中的生产关系网络和社会经济地位与自己追求专业主义的职业意识协调在一起？如果这些涉及传媒业发展和新闻生产的基本问题确实有着重要意义的话，那么它们为什么长期地处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之外？

要发掘和分析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对前面提到的知识症候进行反思。由于新闻传播研究习惯将现代社会分工下的职业规范当做衡量新闻实践的核心标准，因此，有关中国记者和新闻生产的研究几乎都限制在行业操作的“具体劳动过程”中^①。学者们更多地关注经典的“把关过程”、审查问题和职业伦理，却很少从商品生产的经济权力角度考察媒介市场如何按照资本逻辑来控制记者的新闻实践^②。新闻记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者，其政治经济地位、劳动关系和劳动过程处于何种状况？从“抽象劳动”的角度来看，新闻生产如何经由劳动力的再生产机制、聘用机制和媒介机构内部的管理机制、奖惩机制组织完成？对劳动力的控制（labor control）和适应性培养（habituation）如何实现？其背后又有何种政治意义？这些学术视野上的盲点实际上揭示了“构建一个平行于政治的独立新闻业”这种规范式思路本身就具有明确的政治排他性。

本文从新闻工作这种职业的劳动本质出发，规避抽象的政治判断与职业道德诉求，试图通过对记者和媒介管理者的访谈和媒介机构内部的实地调查，初步认识中国新闻生产的劳动过程。我们重点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在新闻生产领域之外，商品化新闻生产的劳动关系如何被以职业教育为代表的劳动力再生产机制和以聘用制为代表，以弹性用工方式特点的劳动力征用制度所维系？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如何在劳动力再生产和征用的过程中实现？

第二，在新闻生产领域之内，商品化新闻生产的劳动关系如何通过组织机构的设置和调整、劳动者内部的管理层级和权力分配、以及以传导创收压力为主要功能的薪酬体系和奖惩机制得以维系？劳动控制的逻辑如何在日常的新闻实践中实现？

一、新闻教育与劳动力的再生产

在劳工研究的传统中，人们通常关注的是生产领域中的权力关系。然而，正如戈登、爱德华兹和瑞克（Gordon, Edwards and Reich）所言，资本争取对劳动力更多控制的过程早在劳工进入生产场所之前的劳动力市场中就已经开始^③。因此，增加劳动力控制的资本逻辑不仅仅局限在实际的生产领域，而是积极地参与到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劳动力市场当中。

对于新闻传播业来说，新闻职业教育是再生产劳动力的重要手段。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媒介机构需要大量熟悉业务操作和商品化实践范式的劳动力储备（labor pool），而主要在高等院校中开展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则承担起不断为媒介补充劳动力的功能。很多学者都

^① 在方法论上，本文涉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一对概念范畴。马克思称他“第一个批判地指出和验证了存在于商品中的劳动的两重性”。他认为具体劳动是“社会分工意义上的劳动”，是使用价值得以呈现的中介物，它可以使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实物在规格、式样、种类上的区别表现出来。而“缝纫和编织，虽然从质的角度来说是不同的生产活动，但是它们都是人类大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性耗费，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都是人类的劳动”，这种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是所谓抽象劳动。参见 Marx, Karl.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en Fowkes. Harmondsworth, [M], Eng.: Pengui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New Left review, 1976, p. 132-134.

^② 相关文献分析请参见《作为劳动的传播》，第7至16页。此处不再列举。

^③ Gordon, David. M.; Edwards, Richard; Reich, Michael, *Segmented Work, Divided workers: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曾经强调过新闻教育在新闻业实践中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新闻教育“锻造了”^①、“重新锻造了”^②和“规范了”^③未来的新闻工作者。

首先,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储备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无法忽视。中国新闻教育的规模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体制改革和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而不断扩大。1982年,中国高等学校新闻专业点仅有16个,在校生1685人^④。到1996年底,经国家批准设有新闻类本科专业的普通高校达到了55所,在校生达到9000人(本科生)^⑤。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很多原来带有公共服务职能的行业开始进一步推动产业化发展。增设专业、收费改革和扩大招生规模成为教育业的新气象。从2000年到2004年,新闻专业高等教育居然在5年内增加了335个专业点,平均每年增加近70个。而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提供的数据,截至2005年,中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已达661个,在校生高达13万人^⑥。除了全日制大学中的新闻专业教育,自学考试、成人教育和媒介机构自办的各种函授和培训项目等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出新的专业人才。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06年中国城镇单位中的媒介从业者总数是65万多人,其中包括25万多的新闻出版业从业者和40万的广播电影电视从业者^⑦。在几十万人的媒介从业者队伍中,低龄化和高学历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特点。这表明媒介机构短期内大量补充劳动力的需求并不大。而且,补充劳动力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接收应届毕业生只是其中一种而已。然而根据粗略估算,目前每年高校新闻专业仅本科毕业生就达到3万人^⑧,加上大量非新闻专业的应届本科、硕士毕业生也纷纷寻求记者和编辑的工作,新闻业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明显的供大于求的状况,学生就业压力迅速加大。这种状况大幅度降低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bargain power),从而为新闻生产的劳动控制创造了重要前提。

其次,新闻教育的商品化改革还有助于顺利地将学生转变为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未来劳动力。尹齐平(Yin Qiping,音译)和怀特(G White)的研究发现,市场化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四个不同的领域:学生付费教育的出现,高校与产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课程设置更加倾向实用性的压力和管理体系的多样化^⑨。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这四个领域的问题都与劳动力再生产和劳动控制相关。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由国家负责培养的建设人才转变为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大量扩招和自主择业的压力使得高校新闻教育的目标不再是培养高素质的栋梁精英,而是适应媒介市场的需求变化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和劳动适应性。不仅如此,随着高校由国家支援的公共机构向市场主体的角色转换,它们与产业之间的关系越发亲密,这使得科研与教学明显地向服务市场的方向发展,由此也带来高校内部管理体系和评估标准的变化。

为了调查新闻教育对未来劳动力的适应性培养,我们对北京两所高校新闻院系的师生进行了访问。其中,新闻学院B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的新闻学院,而新闻系C则是一所有着新闻传播特色的专业院校的新闻系。在访问的过程中,日常教学内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的特点、实习经历和对新闻工作者的主观认识是我们考察的重点问题。我们一共访问了18名在校学生和2名专业教师。其中学生主要以本科四年级的应届生为主(还包括一名研究

^① Gaunt, Philip. *Making the Newsmaker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Journalism Training*, [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2.

^② Becker, Lee B.; Jeffrey, W.; Caudill, SL. *The training and hiring of journalists*, [J], Norwood, NJ: Ablex, 1987.

^③ Splichal, S.; Sparks, C. *Journalists for the 21st Century*. Norwood, [M], NJ: Ablex, 1994.

^④ 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页。

^⑤ 赵玉明、郭镇之:《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80年(下)》,《现代传播》,1999年第3期,第107页。

^⑥ 潘志贤、朱世欣、袁瑞清:《新闻教育本科膨胀研究生‘扎堆’》,《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27日。转引自段勃,《中国新闻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第65-67页。

^⑦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和劳动报酬》,《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7》,第190页。

^⑧ 段勃:《中国新闻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当代传播》,2007年2期,第66页。

^⑨ Yin, Qiping & White, Gordon. “The ‘Marketization’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J], *Comparative Education*, 1994, Volume 30 No 3: 217.

生)。从调查的结果来看,顺应媒介市场需求变化的思路几乎体现在职业教育的各个方面。在课程设置上,新闻采编的基本技术和常识自然成为职业教育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而涉及社会调查分析的基础理论知识和社会问题的深入讨论则被普遍排斥。当“媒介融合”和数字化媒体操作成为一种趋势的条件下,新闻院系纷纷跟踪这一风潮,提出培养能够操作各种设备和符号的“超级记者”的口号。近来,一所大学的新闻学院甚至将学生开设“微博”,吸引“粉丝”的数量当做课程评分标准,以此证明新闻教育在“与时俱进”。

除了技能培养,学生对日后新闻实践中生产关系的适应能力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劳动控制的过程中,劳动力的承诺(labor commitment)是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这种承诺体现为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对现存生产关系和工作状态的肯定,或者至少是“别无他选”的心理过程。除了依赖实际劳动过程中的管理手段之外,学校教育在劳动力承诺的培养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某位接受访问的记者曾提到:“报社里的大多数实习生虽然来自高校,初次参加工作,但是他们对行业内的操作规则都已经非常熟悉。有一次,一个新来的实习生就当面问我出去采访拿了多少钱马费。很多实习生与带他实习的老师一起出去采访,拿了红包以后也知道主动让给老师。他们也大多清楚媒体里的权力分配状况,知道怎样与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打交道,对新闻单位里的‘潜规则’非常熟悉”。在学校教育中,适应性的培养有很多途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对职业规范的渗透。为了帮助学生日后在媒介中顺利开展,对行业规则和学生身份认知的教育常常伴随正式的新闻知识一起成为教学内容。

此外,在一些实际操作性很强的课程中,学生自主发挥,制作实验性作品的创作欲望通常非常强烈,而这种创造性的发挥又常常与媒介行业面向市场的操作规范形成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教师通常会对学生的操作进行劝诫和规范,并引导学生适应媒介市场中的产品类型和制作模式。这种状况突出地体现在高年级学生的校内媒体实践中。例如,综合性大学B的电视台最重要的学生自办新闻栏目在节目立意、内容、主持人风格,甚至栏目名称上都模仿当地专业电视台的一个名牌社会新闻节目。通过邀请电视台的专业策划人和记者来学校指导和学生的主动效仿,这个校园电视台里的所有节目在创意和形式上都尽量接近真实的新闻生产,从中很难找到与商品化节目内容不同的实验性和本地性作品。而专业院校C的电视台在组织机构和规模上基本与一家小型专业电视台相同,这个校园电视台下设办公室、总编室、新闻部(组)、节目部(组)、技术部(组)等部门,自办节目达到十几个,能够给大量校内相关专业学生提供实习机会。与传媒业界的广泛联系更是这家校园电视台的特点。在开播之际,这家校园电视台竟然收到近三十家省市电视台和影视机构的祝贺和希望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电函。

通过对当代新闻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内容和形式的调查,我们发现,学校教育在劳动力储备、技能训练、适应性培养和劳动控制等方面都为商品化的新闻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个完整的新闻劳动过程在劳动力进入生产领域之前就已经开始。商品化新闻生产中加强劳动控制、稳定劳动者承诺和降低管理成本的逻辑在新闻劳动力的培训中已经得到展现。

二、新闻记者的聘用制度与劳动合同

从新闻劳动商品化和生产关系变革过程的来看,中国媒介机构内部权力分配调整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财务权、人事权和管理权的分层次下放。这其中包括报社实行的承包责任制、子报子刊的独立核算、总编辑负责制、“管办分开”、媒介经理人制度,也包括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实行的制片人负责制、“制播分离”、频道专业化和科学激励机制。这些内部管理权力的重新调整都对劳动力的征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为了解劳动力征用制度和新闻机构内部的生产关系,我们选取了全国五家媒体作为案

例进行重点调查和访问，其中包括：中央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旅游卫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京华时报社。这五个案例囊括了电视、广播和报纸三种传统媒体，并基本考虑到了媒介机构的规模、市场环境、垄断程度和地域等变量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①。调查结果显示，当前中国新闻媒介征用劳动力的方式主要包括公开竞聘、通过私人关系推荐和行业内劳动力流动等三种。但是无论通过何种方式，雇工的权力基本掌握在直接管理新闻生产的部门负责人手上。

在媒介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媒介用工又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雇工权力下放的一个显著影响是制造了大量既没有正式事业编制，也没有任何劳动合同保障的新闻劳工，从而使中国新闻业的劳工队伍构成和生产关系出现了巨大改变。以规模相对较大的中央电视台为例。从1998年到2005年，央视从8个频道的电视台拓展为16个卫星频道，12个数字付费频道和28个网络频道的大型传媒机构，而台本部正式员工（包括事业编制和台聘）的数量只增加了26人^②。在实行人事改革之前的2003年，央视近一万的人的员工队伍中，非正式员工（部聘、组聘、临时工）达到7000多人，是正式员工人数的近三倍^③。由于当时的劳动法并没有被应用到事业单位，且非正式员工多数为下属单位（如中心、部门或制片人）因自身需要而雇用，因此当时媒介机构与非正式员工之间大多没有劳动合同。电视台也很难建立一套标准统一的工资、奖励和福利体系。这样，每一个基层用工单位都要独自开发一套薪金和奖励制度。这种极端多样化的支付体系给了部门和节目主管支配非正式员工的极大权力。同时也制造了一种对利润增长来说极端灵活，对劳工来说极端不稳定的用工制度。

利用媒介机构赋予的人事权和就业市场的巨大压力，各个栏目组滥用劳动力的情况成为商品化新闻生产早期的普遍现象。不签订劳动合同、不提供基本社会保险和随意辞退员工的现象非常普遍。据两位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做过记者的受访者介绍，他们在2004年被栏目组解聘（同组中约有一半员工被解聘），理由是不符合新栏目工作要求的素质，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在工作期间，单位也没有提供过任何社会保障。失去工作后他们必须“一切从头开始”。更灵活的用工方式是以实习的名义大量使用免费学生劳力。据一位曾经在央视某栏目实习的受访者介绍，2001年，电视台新开办了一个频道，需要大量工作人员，因此，各个栏目组开始通过多种途径招收员工。当时他还是高校新闻专业的研修生，因为希望得到在电视台锻炼的机会，所以参加了某栏目的面试。面试和录用都由两名制片人组织和操作。在通过面试后，制片人告诉他，由于他是在校学生，只能以实习生身份参加三个月工作，没有报酬，期满后自动结束工作关系。为了积累实习经验，他还是选择接受这个条件。在进入栏目组之后，他发现除了制片人和几个主要编导人员以外，几乎所有的记者都是实习生，有几个还是自己的同学。为了得到锻炼机会，他们与正式员工一样完成工作，却拿不到工资。三个月实习期结束后，又有一批新“招聘”来的实习生来接替他们的工作，其中有很多是同一学校低年级的同学。

这种缺乏合同保障的用工方式虽然使得征用和支配劳动力的效率更高，劳动关系更加灵活，但是管理上的混乱也对媒介机构的社会公信力和长远发展造成限制。为解决这个矛盾，中央电视台从2003年底开始实行劳务派遣制，全台15个中心（室）所使用的5684名编外人员与这家人力资源公司签订了一年可续约合同，成为这家公司的签约员工，再由该公司以劳务派遣的方式委派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他们在台内被称为“派遣人员”或“企聘人员”，中央电视台由此而成为目前国内使用劳务派遣人员规模最大、人员种类最多的组织^④。因为这项改革，中央电视台在2005年获得了中国首届“人力资源管理大奖”。然而，对于没有电

^① 关于研究方法的更详细的论述请参见《作为劳动的传播》，第31至37页。

^② 中央电视台简介，2009年1月4日：<http://www.cctv.com/profile/intro.html>

^③ 朱文：《事业单位改革的央视样本》，《瞭望东方周刊》，2005年第48期，第52页。

^④ 杨晓民：《推行劳务派遣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2006年1月26日，第11版。

视台正式员工身份的新闻劳动者来说，这种劳务派遣的方式不但没有改变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别，反而使得这种差别更加明显。而且，对于这些员工来说，新的单位不仅使得他们在电视台中的身份更为尴尬，也由于成为另一家公司的员工而面临着更复杂的管理机制和更多的管理者^①。中央电视台继续扩大的节目生产规模并没有因为劳务改革而变化，人事管理的正规化使得很多部门在征用劳动力方面捉襟见肘，而人力资源公司由于要承担合同工的各种社会保险所以不愿意扩大正式员工的比例。结果，电视台的很多部门又需要重新雇用没有合同的非正式员工。例如，2006年，央视第四套节目的新闻部被分配了200个合同制员工的名额，而他们还需要雇用70名没有合同的临时记者^②。

2007年6月，全国人大终于审议通过了新的《劳动合同法》，并规定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新的法律不仅适用于企业机构，同时也适用于包括新闻媒介在内的事业单位。媒介机构从此无法继续以低廉的价格使用没有劳动合同和任何社会保险的非正式新闻劳工。各种签约率低和合同短期化的问题也被增加了许多限制。对于新闻业中的用工大户来说，这无疑将给商品化的内容生产增加大量成本和法律风险。就在新的劳动法开始实行之前，很多媒介机构开始大规模辞退临时工作人员。例如，中央电视台在2007年7月一次性辞退了员工1800余人^③。如果算上2004年“审计风暴”过后央视所裁剪的1600名临时员工^④，这家电视台在三年内至少清理了3400多名劳工。另据一位南方某省级电视台的记者介绍，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为了避签无固定期限合同，他所在的电视台与许多在单位工作近十年的记者、编辑终止了劳动合同。单位让有关人员全部回家，口头称三个月后再回来考试签合同。而一旦这样做，电视台又可以再签短期合同，各方面待遇就从头开始。

与职业新闻记者的劳动合同相比，近年来大量涌现的“新闻线人”和“社区记者”则创造了一种更富弹性的雇用关系。这些散兵游勇式的新闻劳工的使用和管理成本更低。媒介机构无须与他们建立正式劳动关系，无须承担他们的任何社会保障，免除了基本工资支付，完全计件取酬。这种用工方式不仅能够节约管理成本，而且可以将劳动时间无限延长。这些新闻劳工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也缺乏新闻操作经验，但是他们的分布更广、行动效率更高、劳动时间更灵活、管理成本更低。从劳动的商品交换关系和劳动控制的角度来看，大量没有“单位”，也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社会新闻“报料者”凭借采集满足城市读者猎奇心理的新闻线索而获得报酬，成为商品化新闻生产中更为纯粹的生产要素符号。

三、媒介机构内部的劳动控制

为调查媒介机构内部的劳动控制方式，我访问了两家电视台，两家都市报社和一家广播电台。无论是刚刚开始工作的清晨，还是正当用餐时间的正午，或者灯火通明的深夜，当我进入记者和编辑的工作场所时，看到的总是一片忙碌而混乱的场景。他们或者伏在编辑机房的办公桌前目不转睛地浏览着电脑屏幕，甚至有人俯身凑近讲话都毫无知觉；或者一刻不停地接打电话，联系访问对象和访问器材；或者往来奔跑于各个办公室与领导交流操作的问题；时而忽然有人接到任务马上离开，时而又有人风尘仆仆地采访归来。当我试图通过电话联系记者进行访问时，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对方不是正在新闻现场，就是在赶往新闻现场

^① Zhou Yuanzhi 对媒介的劳务派遣制进行过更为详细的研究，参见 Zhou, Yuanzhi. *Capitalizing China's Media Industry: The Installation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in the Chinese TV and Film Sectors*. [M]. Dissertation, Graduate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07, p.184.

^② 同上

^③ 程绮瑾、林怡静：《CCTV“规范用工”真相——独家专访中央电视台人事办公室主任杨晓民》，《南方周末》，2007年8月16日。

^④ 崔丽：《中央电视台大规模人事改革 清退1600名编外人员》，转自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41259/43317/3119131.html>. 2009-1-4.

的路上，不是在值守热线，就是在联系采访。对于一个外来的观察者来说，对这些工作状态的直观印象是繁忙、紧张而高效，甚至短暂的寒暄和简单的谈话都显得勉为其难。然而，如果深入到这些媒介机构的管理体系和劳动控制当中，我们将会发现比这些表面工作状态更为复杂的劳动关系。激烈的竞争、超负荷的工作量、紧张的工作环境和充满弹性的雇用关系使得媒介机构内部对劳动者的管理与控制至关重要，在劳资关系充满矛盾张力的条件下，它不仅是维持低廉劳动价格以节省新闻生产成本的重要前提，而且也是保证劳工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以吸引更多广告投入的重要前提。

通过访问我们了解到，相比职业理想的激励，记者们繁忙的工作状态更多地由收入上的压力造成，这主要来自于其工资构成的特点。在市场化改革中，为了将创收压力分解到采编一线的劳工个人，各个新闻单位都推行了新的薪酬体系，总的逻辑是缩小固定工资的比例，加大绩效工资和岗位工资的比例，使劳工从“要我多干”变为“我要多干”^①。例如，在《京华时报》记者的收入中，固定的基本工资只有1000元到2000元左右，“计件取酬”的绩效工资则至少占到记者收入的70%以上。在考评中心，记者的稿件被分为6个档次，单稿最高报酬为300元人民币，以下依次递减50元。一位受访的年轻记者在报社工作了一年，平均每月工资大概有5000左右，基本工资是1000多元。据她介绍，稿件质量评比远远比不上发稿数量对收入的影响。在商业化程度并不高的黑龙江电视台，甚至实行过“零工资制”，即取消了所有编辑、记者的基本工资，同时制定一套量化分配方案，按照记者的发稿数量和等级核发奖金。这种工资制度从1998年开始试行，至少延续到2000年^②。据几乎所有接受访问的记者介绍，在他们各自单位，都有一些“老黄牛”式的记者，每天24小时开着手机待命，一旦有突发新闻便不分昼夜地赶往现场。这些记者所报道的大多是缺少深度的消息，以数量取胜是他们的基本策略。这种“计件取酬”的方式强化了将新闻生产作为一种获利手段的观念，并创造了一种非常具有弹性的劳资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严重饱和，就业竞争压力逐渐增大的背景下，它在理论上可以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最大限度地延长。从新闻劳动的实际状况来看，新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了诸多涉及劳动者“职业道德”和工作状态的问题。一方面是“有偿新闻”、“车马费”、“软文”成为新闻行业公开的秘密；另一方面，高负荷的劳动状况使新闻记者成为一个严重的亚健康群体。

一线的新闻记者往往对自己的工资构成问题比较敏感，但对媒介管理制度对自身劳动状况的影响就不是那么清楚了。近年来，媒体内部结构调整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实行扁平化管理，将经营管理的权力逐层下放，将创收的压力直接传导到基层记者，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这种状况在大型媒介机构中尤其明显。我们在此以中央电视台的频道制改革为例，分析劳动控制的结构化过程。从2003年9月开始，中央电视台在经济频道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将原来以纵向和多层次管理为特点的中心制改为频道、栏目两级管理的“扁平化”结构。改革后的经济频道削减了原来中心制下的大量管理层级。未被削减的管理层级都必须通过“对创造价值是否有所贡献”来进行考察。提高运营效率、整合职能部门、建立资源共享是改革的核心逻辑^③。在节目内容上，则是明确“经济频道”面向城市中高收入消费者群体的市场定位。原来面向工人和农民的公共服务类节目由于市场业绩不佳纷纷被边缘化或者淘汰。

改革后，频道的最高管理者在频道内部被称为“总监”，在台里还是“中心主任”，其生产管理者和行政官员的双重身份更加明确。这些频道总监和副总监由台长聘任，他们对台里承担着收视率和创收的任务，并通过绩效工资和升迁机制得到激励。频道总监下面直属的若干位节目总监主要是中心制时期的节目部主任和副主任，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是台聘的正

^① 杨顺利、来鸣珊：《实行版块结构工资制，充分挖掘现有人力资源——长安报社工资制度改革述评》，《报刊之友》，2000年第6期，第18页。

^② 孙彩凤：《荧屏外的脚印——记黑龙江电视台新闻部》，《新闻传播》，2000年第6期。

^③ 相关信息来自：《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栏目目标管理》。

式员工。改革后，管理人员的数量并没有因为机构精简而减少，产生的变化主要是管理者对应的管理范围（栏目数量）扩大。他们的业绩考核主要取决于各自管辖节目的运营状况，同时掌握着各个栏目制片人的任命、经费划拨和绩效考核等权力。

频道中各个栏目的制片人是节目生产一线的管理者。每个栏目的具体运营基本上完全由制片人掌握。一位受访记者告诉我，在他看来，“制片人决定一切”。然而实际状况也并非如此简单，制片人虽然掌控着栏目组内劳动者的聘用关系、工作岗位设置、工资收入和奖励惩罚，却承受着频道内部各栏目收视率竞争、末位淘汰的压力。频道会定期对收视情况和广告运营情况进行总结和评比，排在末位的栏目会遭遇淘汰，此时制片人将被调至其他栏目成为副手或者一般工作人员，一般至少两年之后才能重新承担新节目的管理。

在这个以效率为宗旨的生产组织中，排在最底层的是新闻记者和编辑。这一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并不具备台聘的正式员工身份，是以劳务代理关系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的“编外”人员。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被制片人招募进入栏目组，按照工作量大小和产品质量高低获得收入中的主要部分。他们随时承担着被解聘和末位淘汰的工作风险。任何一个栏目如果被取消，制片人一般可以通过转岗被重新安置，而记者和编辑则要自谋出路。如果栏目遇到经营问题需要缩编，一个简单的借口就可以解除他们与电视台之间的劳动关系。

从实际效果来看，频道制改革在缩短单位产品劳动时间上的作用非常明显。新的组织结构不仅节省了交易成本，还通过压力传导机制大大加强了劳工的工作量。2003年改制之前，经济频道共有员工1395人，每周节目首播的时长是2155分钟，到2005年，员工总数只剩下840人，节目时长则提高到3946分钟。每一个新闻劳工的工作量平均提高了127%^①。由此可见，主要以生产绩效为标准进行层层监管、层层负责的权力分配体系不仅有利于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且在媒介机构中构成了一个内部劳动力市场。在这里，升迁的激励机制和淘汰的竞争压力同时并存，劳动者通过级别和权力的转换和岗位的流动在生产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监管和生产任务。这一方式对于稳定既有劳动关系起到了有效的作用。

类似的“现代管理机制”不仅在大型媒介机构中推行，广播电台和报社等很多中小型媒介机构也早已广泛采用，其改革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990年代市场化初期。只是近来随着“媒介融合”趋势的出现，新闻生产的结构调整更为频繁而已。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例，从1990年开始，这家电台就开始借鉴珠江经济广播频率专业化的经验，设立了第一个专业频率。到1994年，专业台的体制已经基本形成。主持这项改革的原电台总编辑认为，频率专业化改革过程中对7个专业台自主经营的放权政策是电台经营获得成功的“最为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措施^②。改革之后，各个频率的台长可以对自己所负责的频率节目自主调整，并且掌握专业台的预算划拨，工资分配和人事任用权力。与此同时，总台领导只负责专业台长这一级别官员的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和人事任免，并提供专业台所需的各种服务和操作规范。适应新的权力结构，一套优胜劣汰的人事任免机制也应运而生。从1993年开始，电台除上级任命的9位台级领导之外，其余人员一律采取逐级聘用的办法。2001年9月，北京电台又全面推行了处级干部和科级干部竞聘上岗制度。在科级干部以下的采编人员中，更灵活的聘用制度开始推行，从2005年开始，绝大部分进入电台工作的记者和编辑都实行劳务代理机制。这些员工与一家名为“五湖四海”的人力资源公司签约，以临时派遣的方式进入电台工作，不享受电台内部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

与分权和聘用制相配套，一种“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奖惩对等、风险共当、结余奖励、亏损不补”的分配原则也开始在电台内部推行。专业台台长、副台长个人收入不参与本部门分配，而由总台按照各个专业台的广告创收数额分配。他们的收入与本专业台的经济效

^① 以上数据来自中央电视台广告经济信息中心：《频道制改革总结与规划》。

^② 降巩民：《北京电台改革的成功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9年第2期，第78至79页。

益和利润率挂钩，并建立经营风险抵押制度^①。在专业台长下面，各个部门的业务主管和普通记者、编辑的收入不但与本人工作数量、工作质量挂钩，同时也与所在专业台的经济效益挂钩。在严格考核的基础上，上不封顶，下不保底。随着劳务派遣制的引入，大量年轻的新记者与电台的劳动关系更加灵活，他们的基本工资和福利待遇相比正式员工更低，绩效工资的比重在总收入中更大，因此往往在工作中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此同时，面对大量充满干劲的年轻人，电台中年龄和精力都已不占优势的正式员工则面临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劳动关系的多样性有效地分化了劳工群体的利益和认同，为加强劳动控制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总之，通过对媒介类型和市场环境各不相同的新闻生产单位的考察，我们发现，一套适应商品化新闻生产的权力分配模式、压力传导体系、量化的奖惩体系与晋升淘汰机制已经内化为当代新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特征。在新闻劳动商品化的前提下，提高运营效率、整合职能部门、建立资源共享是改革媒介内部管理的核心逻辑。改革后的媒介组织结构和权力分配状况明显加强了对实际生产过程的监控。在加强横向联合，提高管理效率和劳动者工作效率的同时，一个层层监管的权力与责任体系仍然被完整地保留。在适应商品生产的管理体系中，每一个层级，每一个管理者和普通劳动者都按照创造利润的价值大小进行考核。与此同时，权力的层层下放和不同管理层级对下层的严格监管有效地创造了一个创收压力传导体系；通过构造一个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甚至是内部节目交易市场，并利用本地化管理等手段，当代中国新闻业已经开发出一套生产效率颇高的灵活用工方式和劳动控制机制。

结语：作为劳动的传播

正如传播学者尼古拉斯·加纳姆（N. Garnham）所言，在传播与媒介研究中，对文化消费群体中的行动者的解析往往细致入微，且经常被追捧和展示；然而对文化生产领域中的行动者的关注则往往被掩盖和忽略^②。莫斯科（V. Mosco）也曾经指出，除了少数杰出的研究工作，媒介劳工及其阶级形成问题仍然是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盲点^③。而且，文化生产的问题即便被关注，注意力也往往被导向社会与文化的边缘领域，而不是“作为核心的职业的、专门化的文化生产”^④。诚如美国学者丹·席勒（D. Schiller）所言，劳动“并不仅仅是体力生产和苦力，而是人类自觉行动的独特能力与活动，它不仅包括表达与思考，同时包括行动和能量，并且将二者统一在一起”^⑤。跨越对人类实践整体性的意识形态肢解，回归传播实践的本质，重新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性劳动，将新闻工作者作为从事传播实践的劳动者进行分析成为传播与媒介研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中国新闻改革的过程中，新闻劳动者的群体构成、社会经济地位、实践范式和主体意识都随着商品交换逻辑的植入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劳动状况带来了一系列有关道德、政治与发展的悖论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商品化的新闻生产使得劳动力作为人改造世界的独特资源和能力退化为在商品市场上“自由交换”的生产要素符号。各种劳动分工和劳动控制的机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限制及其产生的各种异化效果都值得反思；从文化政治的角度来看，新闻生产中降低成本，扩大利润的资本增殖方式

^① 郑金诗：《北京电台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国记者》，2004年第4期，第69页。

^② Garnham, Nicholas. *Emancipati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rguments about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③ Mosco, Vincent.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J], i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 31: 493-497.

^④ Born, Georgia. Inside television: television studies and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J], *Screen*, 2000, 41, 4, Winter, 404-24. See, Murdock, Graham. Back to work: Cultural labor in altered times, [A], in *Cultural work: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C], ed. Andrew Beck. London: Routledge, 2003.

^⑤ Schiller, Dan. *Theorizing communication: a histor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vi.

和新闻劳动者对现有生产关系与文化霸权的不断再生产使得新闻传播几乎成为给定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功能载体，它限制了人们对另类发展模式和另类民主的想像空间；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化批评家们提出的，商业性媒介机构在全球的扩散所带来的文化同一性和单一价值观念强力介入的问题也值得我们警示。降低成本的逻辑使得使用成熟市场中的新闻生产内容、样式、风格甚至价值判断成为一种更加符合效益的发展方式，这是否将导致号称“软实力”的文化与政治构想因为缺乏独立的价值判断与多样性的政治想像而最终成为“全球好莱坞”的一个分支和附属物？

当今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都将“媒介融合”当做未来新闻生产变革的主要趋势。从技术自身的逻辑来分析这一现象，和从资本、生产关系的逻辑来分析这一现象恐怕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这一资本运营的基本目的来看，与其说技术的发展是一个脱离社会性因素的自发过程和媒介机构需要去迎合的趋势，毋宁说在现有文化政治和生产模式的条件下，资本增殖的需要规定了技术发展的方向，并借此调整生产关系，提高劳动效率以达到“做大做强”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传播学者们如果仅仅停留在鼓吹新技术的趋势，介绍国外媒介融合的“先进经验”的层面上，那么无疑忽视和遮蔽了资本、技术与作为劳动力的生产者之间难以化约的矛盾。当降低管理效率，提高媒介收益，打造大型文化传媒集团的呼声成为“大势所趋”的发展规律时，当培养“超级记者”、“不养懒人”、“淘汰冗员和庸人”获得了道德合法性，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呼声时，我们对隐藏在“技术进步”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背后的一系列与“发展”无关，却与“人”有关的问题也失去了必要的反思。

新闻传播研究

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的技术遮蔽^①

Covering of Technology in the Formation of Network Opinions

刘阳^②

中文摘要：此文致力于探求这样一个隶属于“可能性”范畴的问题：网络技术在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究竟存在何种偏向？为此，笔者对海德格尔的闲谈概念做了新的诠释，建造了“闲谈—意见”的分析框架，认为网络技术基于“开放”的“抹平”抹去了意见自由市场的“发掘者”，使闲谈与成见分别遮蔽和搅扰于市场内外，意见遭技术遮蔽而互不可见，舆论因之难以聚合，市场内外均呈喧哗之境。

关键词：闲谈，成见，喧哗，意见的自由市场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ias of network technology in the formation of network opinions, which is a topic belonging to the category of "possibility". For this reason, the author reinterprets Heidegger's concept of "idle talk", and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idle talk-authentic opinion". This paper holds that network technology covers the free market of opinions by idle talks and disturbs the market by prejudices, because the "digger" of the market is removed by network technology. Therefore, opinions can not see each other and network opinions can not be formed because of the covering of technology, and it also turns out to be blatant both in and out of the free market of opinions.

Key Words: idle talk, prejudice, blatancy, free market of opinions

^① 本文为“2009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优秀学生论文。

^② 刘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级硕士生。

第一部分：导论

本文的论题指向网络舆论，其意在讨论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网络技术究竟存在何种技术寓言，或曰技术偏向。这一关乎技术偏向的论说建筑于某种反向于“技术中性”的批判立场之上，这一立场认定“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个隐喻”^①，“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内在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派何种用场的偏向”^②。须知，这一所谓的技术偏向并非流于理论家某种故作惊人之语的说辞，乃是将技术不单视作孤立的技术，而是将之置于社会之大背景下来讨论其对人类活动与社会运行的型塑作用，故尔，这一所谓的技术之寓言并非凌空虚蹈，而是有所针对的。无疑，设若本文笼统讨论网络之技术偏向则必难免失之空泛轻浮，为人诟议指点，故尔，笔者着力缩小主题，将之框拘在网络舆论形成过程的论域之中。

“在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中，网络技术究竟存在何种技术寓言？”，此一论题所以重要在于其关涉个体公共话语权^③这一与个人自由密切相关的现实议题。此处尤须对表达权与（公共）话语权做出界分，在我看来，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表达权是表达“权利”，话语权则是话语“权力”，故尔可知，拥有表达权未必就有拥有话语权，话语权所论及的首先是人之社会性，是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非人之自然属性，故尔，它并非如表达权那般与人的生理功能相伴而生，而是有一置于社会语境之下的实现过程^④。这一实现过程的内涵是个人表达演进为公共权力。而舆论则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承接作用。

为了说明舆论在个人网络公共话语权力实现过程中的节点意义，这里首先必须提及网络技术从过程角度审视而得的一个社会维度：开放，尽管这一认定遭遇以“终端可得性”为论争起点的政治经济学派的质疑，但我须强调的是，此处的“开放”所论及的是网络时代个人表达机会相对于以往更具平等的可能性。大多数学者都观察到了网络事关“平等”的技术呈现，但其实这只是“开放”所示意的一个方面。“平等”首先是基于“开放”的一种可能，而这一可能性将由另一个动态过程兑现，那就是“抹平”，因而“开放”的完整内涵包括着两个方面：平等与抹平。而我们所隐约感知的网络的某种“坦平”状态正是由基于“开放”的这二者所共同组建的，或者，更凝练地说，是**开放致成了坦平**。

现在，我们可以展开此前关于“舆论是网络公共话语权力实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命题的论证。根据经验观察，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内，个人表达演进为公共权力有两种实现形式：一为“强烈的意见”，一为舆论。“强烈的意见”之强烈或源于“强烈的意见表达方式”，如越级上访等，或源于“意见主体的强势地位”，如高官、巨富、学者等，二者于本质上是极力制造某种“不平”，更确切地说是显示一种“奇崛”。而在“坦平”网络上，“强烈的意见”更可能被消解，即“奇崛”的“不平”更可能为技术所“抹平”，这种由开放所示意的“抹平”内含的是某种程度上对质的差别的敌视，因此量的聚合更易显示出力量，故尔，相比于“强烈的意见”，网络舆论成为网络个人表达向公共权力演进过程中的关键一

^①（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11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② 同上。

^③ 此后简称话语权，本文所论之话语权一概特指公共话语权。

^④ 汉娜·阿伦特曾说：“权力不能像武器一样贮存起来以应付紧急状况，它只存在于其实现中。在权力没有得以实现的地方，它也就不存在”。见（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原文为“power cannot be stored up and kept in reserve for emergencies, like the instruments of violence, but exists only in its actualization. Where power is not actualized, it passes away”，见Arendt, H.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200.

环，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讨论的是“可能性”，即网络上更难以存在“强烈的意见”，而非必不存在，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网络上强烈的意见要生发公共权力也大都必先聚合为网络舆论，如山西的黑煤窑事件^①。故尔，舆论是网络公共话语权力实现过程中几乎无法绕开的一环。

关于本文的议题，以往曾有少数学者零星触及，网络传播学者彭兰从社会整合的角度认为网络技术对个性与表达的鼓励可能造成舆论的过于分散，这将可能带来社会的崩溃^②。而网络研究者胡泳更是直接从话语权力的角度提出，网络技术把说话的权利抬得过高却排除了倾听的责任，这样只可能是意见越来越多却无益于问题的解决^③。虽然未有系统的论述，但两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网络舆论并非如前网络时代的舆论那样易于聚合。

事实上，以往之舆论学关于舆论形成的讨论主要着重于意见的博弈过程，故大都把意见视作舆论产生的起点而未对意见本身的发生过程做细致的探讨，如果说这在传统媒体时代因为“把关人”的存在尚不致造成分析的差错，那么，网络时代的舆论学研究则似乎须对这一形成的起点重做考量，而这一考量更具体的要求是对个人表达的成分及其功能重新审视。

第二部分：意见·闲谈·成见

在讨论个人表达如何聚合为网络舆论的过程中，尤须注意的是，表达中不仅仅有意见，还可能会有非意见的成分，这些非意见究竟是什么？会不会对意见博弈进而形成舆论的聚合过程产生干扰或其他影响？要明晰这些问题，首要地，必须对意见的发生过程进行考察。

一. 意见的发生

关于意见的发生，此前的学者们也并非全无讨论，部分舆论学者在讨论舆论形成过程时把“问题的发生”^④或者“对某种事情产生不满”^⑤作为舆论的发端，意见的发生在这些步骤之后，而国内学者刘建明更是提及了意见发生的具体过程，他认为“许多人最先感受社会问

^① 山西黑煤窑事件之所以被披露，其中的关键点是事件中一位受害者的姑姑辛艳华在大河网上发帖，进而聚合了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引发官方高层震动。

^② 彭兰认为尽管网络时代是一个尊重个体的时代，网络“更承认人们个人意见的表达与个性的发展”，但因此网络社会也将是一个舆论更为分散的社会，并根据诺埃尔“舆论是社会的皮肤”的观点认为“舆论的过于分散并不利于社会的整合，舆论的极度混乱甚至可能会带来社会的崩溃”。见彭兰：《网络传播概论》，344-34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③ 胡泳引述了约翰·斯特莱克的观点，认为“倾听是目前公共空间中缺少的要素”，网络技术“把说话的权利提的至高无上，但却排除了倾听的责任”，并直言自我表达并不一定能产生结果，他认为“对于社会而言，重要的是解决冲突，单纯鼓励表达只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不同意见”，在此，胡泳直陈了网络技术可能存在拒绝倾听或反对对话的倾向，同时更是将论述指向了“冲突的解决”。见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众讨论》，279-28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④ 国内学者韩运荣、喻国明提出了舆论形成的六阶段论：①问题的发生；②舆论领袖的发现；③意见的发生；④事实与意见信息的传播；⑤意见的互动与整合；⑥舆论的形成。见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61-81页，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⑤ 此为国外学者柯雷德·金关于舆论形成的四阶段论：①对某种事情产生不满；②产生共同需求；③通过媒介的讨论或争论，议题更加明确具体；④达成结论，做出决定。见徐向红：《现代舆论学》，177页，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题的困扰，介入‘关心领域’形成态度，在适当场合发表己见”^①，在此，刘建明实际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发生模式：“感受—关心—态度—意见”，但遗憾的是，他所做的仅是断语式的阐发，而非可能性的讨论，即他没有意识到这一模式的每一步跨越中将可能产生其他的后果。

参考刘建明的意见发生模式，我建立了如下模式：

图一：意见的发生模式（未完一）



这一模式对意见产生过程做出了这样的叙述：意见之发生肇始于“发现”，即发现“意见客体”。但发现未必导致意见，发现要引发意见，下一步要变为“关注”，但很多意见的可能主体仅仅停留于发现阶段，而不再会有关注（但即便如此，在发现阶段也仍可能会有表达的发生，例如网络新闻下那些与主题无关的回帖）。主体行至关注，也未必导致意见的发生，主体随关注而生的是两种反应：一为态度，一为情绪。这两种反应均有可能致发表达，但唯有态度在获得合适的表达机会时才能产生意见。也就是说，意见的产生首先要顺利地由“发现”转变为“关注”（这可称作意见的“渡”），接着要极力避免反应为情绪（这可称作意见的“闪”），最后获得合适的表达机会从而发出意见（这可称作意见的“现”），只有经过这一“渡”—“闪”—“现”，意见才会发生。

二. 闲谈的遮蔽

在意见“渡”和“闪”的同时，产生的不仅有意见，还有其他一些非意见的表达，它们是什么呢？我的答案是：“闲谈”^②，此处不妨直说，“闲谈—意见”正是本文的分析框架，而何谓闲谈？闲谈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将立马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1. 马丁·海德格尔的“闲谈”

闲谈一词并非笔者自造，甚至该词在本文所将获有的内涵与外延也非凭空而来。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曾在其著述中提及闲谈，认为它是熄灭“公共领域”之光的一种力量，其方式是“遮蔽事物之存在”^③。而她的思想导师马丁·海德格尔更是在其存在主义哲

^① 刘建明编著：《舆论传播》，7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② 陈嘉映与王庆节最初将德语 *Gerede* 译成“闲谈”，后又改译为“闲言”，二者词意无别。笔者认为“闲谈”一词既显“示”了这种言说自我伪装的对话形式，又“揭”露了其反对话的本质，因而更具“揭示”的力量，所以除引文外，本文皆使用闲谈一词。

^③ 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前言中写道“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那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见（美）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学中不遗余力地探讨闲谈的问题，令人兴奋的是，他的论述虽发生于八十多年前，彼时尚不知网络为何物，但他的诸多阐发和所用概念却于当今此处之分析大有裨益。以下笔者将分别从“话语”和“沉沦”两方面展开介绍海德格尔的闲谈理论。

1. 1. “领会”的阙失：“话语”的“闲谈”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的生存论存在论基础是话语”，而“话语同现身、领会在生存论上同样源始”，也就是说话语是与所涉及的存在者有本源性的在的关系的。在海氏看来，话语存在两种生存论的可能性：“听”与“沉默”。他认为，“听把话语同领会、理解与可理解性的联系摆得清清楚楚了”^①，“能听在生存论上是原初的”，并提及了“敞开之在”，他认为向某某东西听是一种“敞开之在”，“每一个此在都随身带着一个朋友；当此在听这个朋友的声音之际，这个听还构成此在对它最本己能在的和本真的敞开状态”，在此，海德格尔提及了与“敞开之在”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领会，他说“此在听，因为它领会”。论及听的领会，海德格尔说，我们听首先领会到的是“所云”，这“所云”包括“尚不得领会的语词”和“表达方式”^②等，在此，海德格尔提出了“闲听”一词，他把这种现象描述为“东听西听”，并认为闲听是“听的领会的阙失”，而“唯有所领会者能聆听”，这时，海氏根据领会的缺在对听做出了划分，领会缺者称作“聆听”，领会在者称作“闲听”，而此外，言与听是海氏在“聆听—闲听”之上提出的一对更高级的范畴，他认为“言与听皆奠基于领会”^③，因此，在海德格尔那里，无领会之言即为闲谈，无领会之听即为闲听。海德格尔在以话语的视角审视闲谈时，主要提及的是，闲谈阙失了领会。此外，在讨论“话语”时所阐发的“闲听”也与在某个侧面暗示了闲谈的另一个特性，笔者将在“‘沉沦’的‘闲谈’”一节展开论述。

1. 2. “无根”与“封闭”：“沉沦”的“闲谈”

海德格尔将此在日常存在的基本方式称作“沉沦”^④，而“闲谈”与“好奇”、“两可”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共同组建了此在的沉沦^⑤。在此，海德格尔关于闲谈的概念将在此节的最后部分亮相，而“好奇”与“两可”基于此处论述的必要却不得不先示于人。

欲知何谓“好奇”，首先须知何谓海德格尔的“视”与“看”。“视”与“看”的概念是海德格尔基于对领会的讨论而提出的，他认为“就其筹划性质而言，领会在生存论上构成我们称之为此在的视”^⑥，“此在乃是在生存论上随着此的展开一道存在着的视”，“视”所对应的是此的敞亮的境界，即此的展开状态，而他认为“‘看’不仅不意味着用肉眼来感知，而且也不意味着就现成事物的现成状态纯粹非感性地知觉这个现成事物”。但必须认识到，“视”

王凌云译，《作者序》第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①（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19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② 同上，191页。

^③ 同上，192页。

^④ 必须强调，海德格尔极力否认“沉沦”一词所带有的消极色彩，在提出“沉沦”概念之后，他立即说“这个名称并不表示任何消极的评价，而是意味着：此在首先与通过寓于它所操劳的‘世界’，这种‘消散于……’多半有消失在常人的公众意见中这一特性。此在首先总已从其自身脱落、即从本真的能自己存在脱落而沉沦于‘世界’”。

^⑤（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20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⑥ 同上，170页。

与“看”并非对立的观念，在海氏看来，“看”有一个特质可以用于“视”的生存论含义，“那就是：‘看’让那个它可以通达的存在者于其本身无所遮蔽地来照面”^①，“视见的基本建构在日常生活特有的一种向‘看’存在的倾向上显示出来”^②，即他把“看”作为“视”的日常存在样式，关于刚才所提到的那种“向‘看’存在的倾向”，正是此段大做“视”与“看”的铺陈而意欲阐发的重点：“好奇”。在海德格尔看来，好奇“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为了进入一种向着所见之物的存在，而仅止于为了看”^③，“仅止于觉知”^④。

两可被海德格尔认为是除闲谈和好奇之外，日常此在展开状态的第三种现象，他将两可认作公众解释事情的一种态度^⑤，而来自道听途说的捕踪捉迹是两可借以佯充此在之可能性的最迷人的方式^⑥，海氏认为“两可不仅涉及对那些在使用和享用中可以通达的东西的支配和调整，而且它还被固定在作为能在的领会之中，固定在对此在的可能性的筹划方式和呈现方式之中”，在两可的怂恿下，“不仅摆在那里的事情和摆在眼前的事情，人人都知道都议论；而且将要发生的事情、还未摆在眼前但‘本来’一定要弄成的事情，人人都已经大发议论了。别人料到的、觉察的事情，人人也都总先已料到了、觉察到了”^⑦，海德格尔认为“两可总是把它所寻求的东西传给好奇，并给闲言披上一种假象，仿佛在闲言中万事俱已决断好了”^⑧，并窒息了此在之可能性的力量^⑨。

在阐明了好奇与两可后，我们可以开始论述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沉沦，而在此之先，我们还必须出示海氏描述沉沦之特有的存在方式的四种现象时所对应使用的概念：引诱、安定、异化与自拘。海氏认为基于闲谈与在闲谈中得出的公众解释事情的讲^⑩法¹¹，“此在为它自己准备了要去沉沦的不断引诱。在世就其本身而言就是有引诱力的”，而闲谈与两可又仿佛意味着“一切都见过了，一切都懂得了”，从而培养出了一种“自以为是”，正是“这种自以为把一种安定带入此在”，但“非本真存在的这种安定却不是把人们诱向寂静无为，而是赶到‘畅为’无阻中去”，“多方探求的好奇与迄无宁静的一切皆知假充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此在之领会”，但这种所谓的领会“归根结底却仍然没有确定而且没有诘问：究竟要加以领会的是什么？”，这种所谓的领会并没有领会“领会本身就是一种能在，这种能在唯有在最本己的此在中才必定变成自由的”，而“在这种得到安定的、‘领会着’一切自我比较中，此在就趋向一种异化，在这种异化中，最本己的能在对此在隐而不露”¹²，接着，这种异化“把

^①（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② 同上，198页。

^③ 同上，200页。

^④ 同上，199页。

^⑤ 同上，202页。

^⑥ 同上，201-202页。

^⑦ 同上，201页。

^⑧ 同上，203页。

^⑨ 同上，202页。

^⑩ “讲”是海德格尔提出的与“说”相对的一个概念，简单地说，“说”有与“存在”源始的联系，而“讲”则没有。详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

¹¹（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20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¹² 同上，206页。

此在杜绝于其本真性及其可能性之外”^①，“把此在挤压入其非本真性之中”，因此，“沉沦的起引诱作用和安定作用的异化在它自己的动荡不定之中导致的结果是：此在自拘于它本身中了”^②，这就是此在沉沦的结果：自拘^③，而闲谈作为此在沉沦的组建者之一，自拘也必然在其规定性上所有体现。

现在让我们请出海德格尔关于闲谈的论述。在海氏看来，闲谈是这样一种言说，它“丧失了或从未获得对所谈及的存在者的首要的存在联系，所以它不是以源始地把这种存在者据为己有的方式传达自身，而是以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的方式传达自身”，它“全然失去了根基”，此外，闲谈“还不限于出声的鹦鹉学舌，它还通过笔墨之下的‘陈词滥调’传播开来”，需要注意的是，在海德格尔那里，闲谈所谓的“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主要并非基于道听途说”，而是“从不求甚解的阅读中汲取养料”^④，同时，闲谈“不以分成环节的领会来保持在世的展开状态，而是锁闭了在世，掩盖了世内存在者”，因为闲谈“本来就不费心去回溯到所谈及的东西的根基之上”，因而它“原原本本就是一种封闭”，此外，海德格尔强调闲谈并非欺骗，因为它“并无这样一种存在样式：有意识地把某种东西假充某种东西提供出来”，而闲谈之所以为闲谈是因为“所说的东西首先总被领会为‘有所说的东西’亦即有所揭示的东西”，而“无根的人云和人云亦云竟至于把开展扭曲为封闭”^⑤了，在此，海德格尔阐述了闲谈两个最为重要的规定性：封闭性与无根性。

闲谈封闭的规定性以此在的沉沦来理解是自拘，而以话语的视角审视则表现为闲听，二者的关键都在于闲谈另外一个更为深刻的规定性：无根性。无根性首先就意味着领会的阙失，而正是这种阙失导致了言说与存在的割裂，从而使日常此在展现出自拘与闲听的现象。

2. 闲谈的纷呈

无论谈及闲谈还是沉沦，海德格尔都试图以“冷眼”示人。在提出此在的沉沦时，他强调“这个名称并不表示任何消极的评价”^⑥，并且他认为“沉沦是存在论上的运动概念”，而“生存论存在论的阐释也不是关于‘人性之堕落’的任何存在者层次上的命题。这并不是因为缺少必需的证明手段，而是因为它对问题的提法发生于任何关于堕落与纯洁的命题之前”^⑦；而论及闲谈，海德格尔同样说闲谈“在这里不应用于位卑一等的含义之下。作为术语，它意味着一种正面的现象”^⑧。海德格尔一直强调生存论存在论在评价之前而试图保持“超然物外”的神之姿态，但本文的分析首先基于的是一种现世情怀，因而不得不操持一项关于“降格”的事业，即将海氏那些近乎神示的用词进行世俗化与窄化的处理，使之更为具体而富于针对性。其中，我需移用的而在此前曾有所提及的主要是这两个概念：领会与闲谈。

首先须强调，本文中所使用的一切术语都建筑在“公共事务”之上。接下来所要使用的

^①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206-2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② 同上，207页。

^③ 陈嘉映与王庆节又将之译作“拘执”。见(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2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④ 同上，196页。

^⑤ 同上，197页。

^⑥ 同上，204页。

^⑦ 同上，208页。

^⑧ 同上，195页。

“领会”首先是一种源始而不带情绪的领会^①，而此处所说的源始并非指向海氏所称的纯粹而普遍的“存在”，而是指向世俗而具体的“公共事务”^②，阙失这种领会的言说正是我所谓的闲谈。这种闲谈，首先是无根的，即丧失了或从未建立过与“公共事务”的联系；其次，它是封闭的，即它是一种“闲听”的言说，一种拒绝“聆听”的言说，它是一种无“听”的“言”，是海氏所称的讲^③，而非说。事实上，我对海氏闲谈一词的世俗化说到底也仅止于“无根性”一端。

此外，我还将使用的是海德格尔的另一个词：移情^④。在海氏看来，“移情”虽“仿佛在存在论上首次搭了一座桥，从首先被给定为载载子立的自己的主体通到首先根本封闭不露的其他主体”^⑤，但并不是“移情”组建起了共在^⑥，“倒是‘移情’要以共在为基础才可能，并且‘移情’之所以避免不开，其原因就在于统治地位的乃是共在的诸残缺样式”，因而，“‘移情’正如一般认识一样绝不是源始的生存论现象；但这并不是说，根本没有关乎移情的问题。移情特有的诠释学将不得不显示：此在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存在可能性如何把共处及其自我识认引入歧途，并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致真正的‘领会’受到压制了而此在却逃避到代用品中去了”^⑦，虽然海氏并未明言，但从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移情看作是源始的领会在认识方式上的反面，而此处，笔者将要使用的“移情”是正基于海氏的这一暗示。鉴于此前我已强调下文分析中所使用的领会特指“一种源始而不带情绪的领会”，因而下文中所使用的移情即是不同于领会的另一种认识方式。基于这一概念，我们便可对闲谈所谓的“领会的阙失”有更进一步的认识，须知，“领会的阙失”并非一无所有，而是移情乘虚而入，占领了领会的高地，因而，导致闲谈的认识方式是移情。

^① 海德格尔在讨论领会时提到了“带有情绪的领会”和“源始的领会”，他说“领会总是带有情绪的领会。既然我们把带有情绪的领会阐释为基本的生存论环节，那也就表明我们把这种现象领会为此在存在的基本样式。相反，领会如果指的是其他种种可能的认识方式中的一种，譬如说是某种与‘解说’不同的认识方式，那么，这种意义上的‘领会’就必须和‘解说’一道被阐释为那种共同构成此在的源始的‘领会’在生存论上的衍生物”。而此处我将所需使用的“领会”首先认定为“源始而不带情绪的”，这是一种“窄化”的手法，而此后将领会所涉及“存在”置换为“公共事务”则是一种世俗化的手法。海氏关于“带有情绪的领会”和“源始的领会”的划分详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1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② 海德格尔关于领会有这样一段论述：“在对世界的领会中，‘在之中’也总被一同领会到了，而对生存本身的领会也总是对世界的领会”，也就是说，在海氏看来，对此在的领会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领会，而且是不可分割的，笔者为了分析的便利，虽将“存在”替换为“公共事务”，但实际上也并非篡改海氏的这一认定，因为，公共事务本身就既然关乎个体，又涉及公众，具有“此在”与“世界”的双重规定性。

^③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④ 陈嘉映与王庆节又译作“共鸣”，见（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153~15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⑤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14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⑥ “共在”是海德格尔讨论“（日常）此在为谁”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简单地说就是此在与其他人共同存在，即所谓的“‘在之中’就是与其他人共同存在”，需要强调的是，海氏认为“本质上此在自己本来就是共同存在”，此在总是作为共在的此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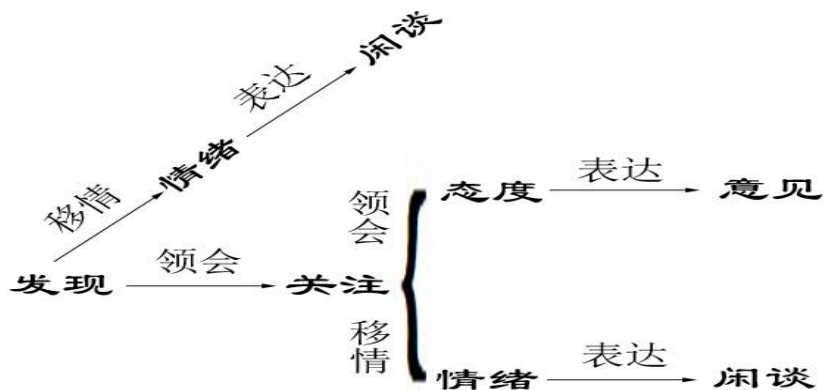
^⑦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1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 1. “移情”的魅惑：意见发生模式再分析

工具准备好后，我们先来分析此前“意见的发生”一节中我所建立的意见发生模式。

了解了海德格尔的闲谈理论，对于这一模式的首端——“发现”，我们便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发现可以是基于“好奇”的“看”，也可以是本真的“视”，而如果是看，那么就无法再导出有意义的表达，因为看是缺乏“领会”^①的，因而断裂于公共事务，也就是说这种看所看到的只是公共事务的现象，而没有意识到其公共事务的性质，故尔这种看所导出的认识只可能是移情，而移情所引发的心理现象则必是情绪而非基于领会的态度，在此之上，如果要生发出表达的话，就只会是喋喋不休或零星琐碎的絮语，即闲谈。而大量的发现仅是“看”而非“视”，因此，从“发现”步入“关注”就仿佛要涉越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一不小心，意见的火苗就会熄沉江底，实在是一个凶险至极的过程，故尔称“渡”，而非轻而易举的“过”。

图二：意见的发生模式（未完二）



而即便到了“关注”环节，也仍会遭遇“移情”的魅惑，因为到达“关注”，意见主体也并非“完全领会”，而只是“有所领会”，因而在这一环节，同样会有“移情”之于“领会”的争夺，故尔同样会有两类心理现象产生，即“移情”魅惑所致的情绪与基于“领会”而成的态度。而只有态度，才会生发出意见，情绪所致的只会是闲谈。但大量的关注总是遭遇移情的魅惑而被褫夺了获得领会的权利，因而从关注到产生态度的过程中，移情就如万道飞矢般激射而来，躲避不及，意见的火苗甚至可能被箭风所灭，故尔称“闪”，而非平淡无奇的“到”。

2. 2. 闲谈之“空”与喧哗之“无”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在意见之“渡”与“闪”的过程中，意见首先是一个“幸存者”，而非“获胜者”，在意见发生之前，在“渡”与“闪”这两个环节早已产生了大量的闲谈。以往的舆论学者大都只关注个人表达中的意见，而忽视了非意见的闲谈。

闲谈的封闭性意味着它是一种无听之言，是一种拒绝聆听、却耽于表达的言说，闲谈所造就的或是破碎的只言片语，或是喋喋不休，总之，是不知所云。

在海德格尔看来，闲谈是常人现身情态的组建者之一，他在论述“常人的独裁”中的一些语句或许于此处所讨论公共话语中的闲谈有所启示：“常人一直‘曾是’担保的人，但又可以说‘从无其人’，在此在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由我们不能不说是‘不曾有

^① 再次强调，此处及以后所使用的领会，都是降格移用后的领会，即源始而不带情绪且指向公共事务的领会。

其人’者造成的”，“常人就这样卸除每一此在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责任，不仅此也，只要在此在中有轻取与轻举的倾向，常人就用这种卸除存在之责的办法去迎合此在”^①，“每人都是他人，而没有一个人是他人本身”，“这个常人却是无此人”^②，“任何一个他人都能代表这些他人”^③，这些语句所赐予我们的灵感是：**闲谈者是空**。所谓的“闲谈者是空”意指，一则闲谈与闲谈者之间并无本真的联系，即某一具体的闲谈不必然由某一具体的闲谈者发出，据某一闲谈，也无法找到必然的某一闲谈者，甚至必然的某群闲谈者；另则，闲谈并非本真地针对某一公共事务，闲谈者并无领会，因而，此一闲谈者与彼一闲谈者并无区别。因此，**之于闲谈，闲谈者是空；之于公共事务，闲谈者亦是空**。闲谈者的这种空所暗示的还有另一个易于察觉却不易推论的空，即“闲谈是空”：以公共事务来审视闲谈，则后者永无质的规定性，闲谈是无意义的，闲谈仅在与意见的比较中才显示出其量的规定性，当然，也更显出其无意义的本质，仅就闲谈自身而言，**闲谈是不可数的**，此一闲谈与彼一闲谈并无区别，甚至根本就无法在此一闲谈与彼一闲谈间做出区分，因为二者有可能竟是完全一样的，但需注意，**空并非无，因为闲谈确有其事，闲谈者确有其人**，不过正因此，闲谈却**真实地**造就了一种喧哗之境。此外，闲谈的封闭性则又意味着闲谈是无听的，因而，闲谈者听不到闲谈与意见，因而，于闲谈者而言，“喧哗”又有另一层示意：“无声”，**相互割裂的闲谈与闲谈者共同造就了我等所见和不闻的“喧哗”**^④，亦即，**闲谈之“空”真实地致成了喧哗之“无”**。

但此外，须知闲谈与闲谈者的割裂本质源于闲谈者与公共事务的割裂，而这种割裂在认识方式上表现为非领会的“移情”，因而，我等所见和不闻的“喧哗”正是移情^⑤魅惑所致的世相。

2. 3. 网络：“发掘者”的缺场

上面提及了喧哗，喧哗之可怕不在于喧哗之所见，而在喧哗之“无声”，更明确地，喧哗是这样一寓言：意见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被隐没，因而也难见真理。世相之喧哗证实了这样一种担忧：闲谈与意见并非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当将闲谈置于喧哗的视角审视时，它又获得了一个新的规定性：遮蔽性**，即意见或混然于闲谈之中。而喧哗所寓的正是这一遮蔽所呈现的世相：**但见众生眉飞色舞，朵颐拊掌，唯不闻声**。

闲谈是具有遮蔽性的，海德格尔在讨论“两可”时认为：“闲言与好奇在其两可所操心的是：让真实的创新在来到公众意见面前之际已变得陈旧”^⑥，此外，他在讨论“沉默”^⑦时说“漫无边际的清谈^⑧起着遮盖作用，把已有所领会和理解的东西带入虚假的澄清境界”^⑨，

^①（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14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② 同上，149页。

^③ 同上，147页。

^④ “喧哗”与诺埃尔和彭兰所担忧的“舆论分散”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审视，即诺埃尔和彭兰是从社会整合的角度来看，而我则是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而此处，我的这种现象学视角最终要导向话语权力的观看，“喧哗”一词来自于胡泳著作《众声喧哗 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众讨论》。

^⑤ 陈嘉映与王庆节将移情又译作“共鸣”，或许共鸣一词更能让人在其与“喧哗”之间产生直观的联想。

^⑥（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20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⑦ 沉默是海德格尔认定的话语的另一个本质的和生存论上的可能性，他认为“缄默才揭露出‘闲言’并消除‘闲言’”。

^⑧ 此处海德格尔虽然使用的是“清谈”，但根据上下文，可理解为闲谈。

^⑨（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19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海氏的这些论说虽未直言闲谈之遮蔽性，但意即在此。

但须知，所谓闲谈之遮蔽必须是有所指的，即“向谁遮蔽”，因为遮蔽尚有另一层示意，即“不可视见^①”，或曰“不见”。诸位此前或许满腹狐疑，不知本文为何首先大谈海氏哲学，但“望断天涯”方显出做学问的“阑珊”之趣，论至“向谁遮蔽”才是探讨此次主题的时机成熟之时。本文探讨的是网络技术在个人表达向网络舆论聚变过程中的影响，其中，有一个为学者普遍涉及，却多未直接提出的概念，即“意见的自由市场”^②，之所以说这一概念为学者普遍涉及，乃是因为他们在探讨舆论形成时普遍把意见作为论述的核心概念，强调意见的博弈，而这些必都是基于“意见的自由市场”的先有认识。但须知，**自由市场这一概念所揭示的并不仅有之于市场内的“博弈”这一层含义，还有之于市场外的另一层，即“准入”，并且，还须注意，无论是“博弈”还是“准入”，之于意见的自由市场都是恒在的。而笔者提及的“向谁遮蔽”所关涉的正是这一市场的形成问题。即闲谈的遮蔽性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向彼一意见遮蔽此一意见，使意见互不可见，因而俱不得进入意见的自由市场。**

在网络时代之前，意见的自由市场更为具体而有形，“士林”和“传统媒体”正是这一市场的社会性载体。在传统时代，“士人”们“观夫民风”，发现意见并成为意见的新主体，进而在“士林”之中进行意见的博弈交锋，形成舆论，即所谓的“清流物议”。而在传统媒体时代，“媒体人”发现意见并呈诸传媒，意见在传统媒体中博弈形成舆论。在传统社会和传统媒体社会，意见的自由市场都存在一个被传播学者们称作“把关人”的角色，而如果以自由市场的视角来审视，那么，“把关人”的概念其实只描述了“禁止”的一层，即“把关”的本质是不允许某些表达进入意见的自由市场，而此处，所需要着重提出的是“令行”的那层含义：发掘。“士人”与“媒体人”“禁止”时则是“把关人”，“令行”时则是“发掘者”，因而他们有双重身份。此外，须知闲谈与意见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闲谈在某种程度上遮蔽意见的情况也并不随时代变迁，因而，笔者所谓的“发掘”又有之于闲谈与意见的双重含义：一为拨开“闲谈”，一为发现“意见”。而基于闲谈的遮蔽性和市场准入的恒在，必须承认，**“发掘者”是一种有利于意见进入市场的制度设计，其功能正是使意见互见。**

如上所说，在网络时代之前，意见的自由市场的准入程序由发掘者执行，闲谈的遮蔽性亦为发掘者所抑制，但在网络时代，自由市场却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剔除了“把关人”的同时，也丧失了“发掘者”。当然，为了论述的准确，在“剔除”和“丧失”前都应加上一个状语“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之于“把关人”，学界关于网络时代的把关强化还是弱化并无共识^③；而之于“发掘者”，网络技术所有的“开放”这一社会维度则意味每个

2006。

^① 见此前“‘沉沦’的‘闲谈’”，其中有关于海德格尔“视”与“看”之关联和差别的介绍。

^② 为了表达的间接，此后或称自由市场、市场、这一市场。

^③ 在美国从事传播研究的学者马成龙对网络的“把关”做了这样的辨析：“一方面，新闻网站所提供的内容大大增加，这就意味着需要对此有更多的筛选即‘把关’，另一方面，从全球范围看，人们可以自行选择内容的自由度大大增加，这又意味着‘把关’的减少”，传播学者彭兰将马成龙的观点解释两个层面的“把关”，“一种是微观的，即个别媒体网站对于自己站点内容的把关；另一种是宏观的，即在整个网络传播环境中的‘把关’”，她与马成龙共同认为“微观的把关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是强化了了的”，而在宏观“把关”中，她认为“在网络传播中，被削弱的主要是政府的‘把关’功能而不是专业新闻机构的‘把关’功能”，但她又认为“虽然政府的直接控制力相对减弱，为了在网络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保持自己的地位，政府就会采取其他一些策略，其中之一，应是扩大自己国家的一些主要新闻机构的影响以防止本国受众的流失，并强大大国在网络中的声音。所以，政府会在资金、政策上给予这些媒体以扶持，也就是说，最终，政府的把关仍然会以某种方式融入围观的‘把关’中”。见彭兰：《网络传播概论》，3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人表面上都可以向所有人“絮叨一句”或“喊一嗓子”^①，因而“发掘者”是缺场的，“发掘者”作为一种“奇崛”为“开放”所暗含的“抹平”所“抹去”，闲谈为“开放”所纵容而得以“纷呈”。但同时仍不得不承认，网络论坛管理者删除“水帖”等把关行为又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意识，因此，论及丧失发掘者或发掘者缺场，也须补上一个状语“在某种程度上”，但须知，这里所说的发掘者的缺场是在比较的语境中论及的，即相比传统时代和传统媒体时代，网络时代的发掘者缺场。而此外，如上所说，“准入”之于意见的自由市场是恒在的，因而发掘者的缺场并非意味着意见的自由市场没有了“准入”，并非意味着任何个人表达都能畅通无阻地进入这一市场，相反，意见的自由市场因此丧失了利于意见进入的制度设计，而使意见变得更不可见而更难引入其内了，意见的自由市场因此有内里存在空空如也的危机，而与之相应的，市场外则可能一片喧哗，这就是闲谈之于这一市场“准入”层面的遮蔽，而这种遮蔽性正植根于网络技术“开放”的社会维度之中，因此，这也是网络技术之于意见的自由市场“准入”层面的遮蔽，是一种技术的遮蔽。

三. 成见的搅扰

适才我们讨论了植根于网络技术的闲谈之于意见的自由市场“准入”层面遮蔽性，此处需要在此强调的是，闲谈的遮蔽性是一种可能性。因此，论说网络闲谈之于意见的自由市场“准入”层面的遮蔽性并非说这一市场便果真空空如也，而是说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下面我要开展对于网络之意见的自由市场内的讨论，诸君不应再觉惑然。

此处先请诸位再回到我所建立的意见发生模式，在图二中似乎我们已将这一模式补充完全，但实非如此。因为我们须发现，真实的喧哗中尚有另一种特殊的表达，它是打入意见的卧底，实为闲谈的胞弟，名曰成见。它诞生于关注之后，混杂着态度与情绪而来。

提出成见一词的李普曼曾有这样的论述，成见“会把某些客体划分为亲疏两类，突出其间的差异，这样一来，似曾相识的就会使人认为格外亲切，稍感陌生的则会使人认为格外疏远”，他认为我们运用成见时是轻信^②，“任何对成见的袭扰看来都像是对世界基本原理的攻击”^③，这些论说除认定成见是带有情绪的之外，还揭示了它的另一个同于闲谈的规定性：封闭性，即成见亦是“无听”的。

成见因是混杂着态度与情绪的，故尔可以说是领会与移情的共同产物，但须知，一旦为移情所魅惑，此处的领会便不再是真的领会，成见所谓的“领会”若要说的更明白些，那便仅仅是它看似与公共事务有关。故尔，成见本是移情的私子，领会不过是其伪装，因而，成见本质上是闲谈，由此，成见具有封闭的规定性便不需大惊小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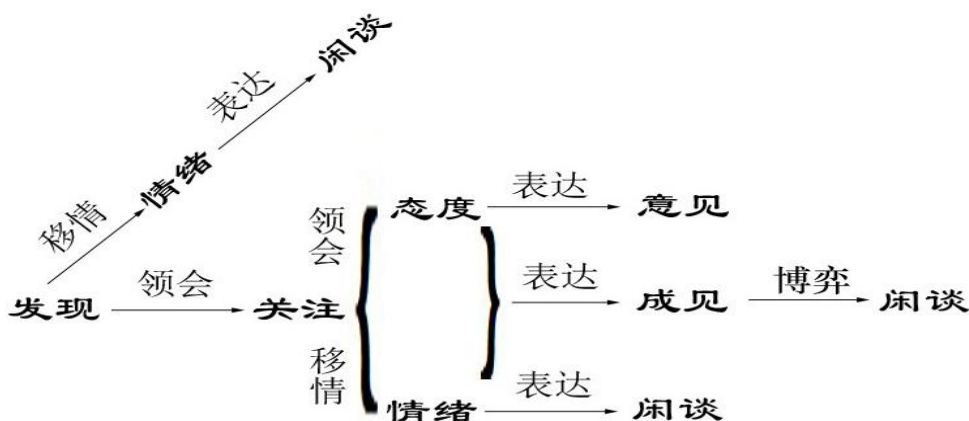
须知这一成见在网络时代之前，即发掘者在场的时代也是难以进入意见的自由市场的，因为发掘者在拨开闲谈之时，也会一并拨开成见，但在网络时代，发掘者的缺场使得乔装成意见的成见得以蒙混过关，而这时，旧有的遮蔽再次发生了。

^① 当然，喧哗告诉我们，“絮叨一句”或“喊一嗓子”的声音可能迅速石沉大海，无人闻见，或迅速忘记。

^② (美)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7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③ 同上，77页。

图三：意见的发生模式（完成）



上文已说，成见本质上是闲谈，而成见有可能卸下其伪装，蜕变为闲谈，只待它“开口说话”。“开口说话”是意见博弈的一个比喻，态度的成分使成见得以扮作意见的样子混入自由市场，而这一伪装在意见博弈的时候则会迅速褪去，因为如上所论，成见具有封闭性，故尔也是无听的，因此，成见经不起博弈，成见一旦参与博弈，则必蜕变成不知所云的“闲谈”，而这一结论才是此次市场内讨论的关键所在，即闲谈并非仅是自由市场外的言说，而完全有可能存在于这一市场之内。因此，那种怵人的可能性不得不重被考虑：遮蔽之幕再次降临，拉开又复喧哗：闲谈可能在自由市场内遮蔽意见，使其中的意见也互不可见，从而无法博弈，而这种闲谈之遮蔽又可被看作是一种指向“市场秩序”的成见之“搅扰”，因这种“搅扰”的遮蔽本质，不仅市场之外或有我等所见不闻的怵人世相，市场之内也能生发出一种同样的喧哗之境，而此次喧哗所示意的闲谈之遮蔽所针对是自由市场的另一层面：博弈。须知，这一闲谈之遮蔽也植根于网络技术，因为成见之进入自由市场同样归因于网络技术所致的“发掘者”缺场，故尔，此次遮蔽亦是网络之于自由市场“博弈”层面的遮蔽，同作为一种技术遮蔽。

第三部分：技术的遮蔽：纵容闲谈，遮蔽意见

行文至此，我们从意见的发生模式出发，降格移用海德格尔的闲谈理论，对个人表达进行了意见、成见和闲谈的区分，事实上，这种三分法在柏拉图处便早有原型，柏氏将人的认识能力分为知识、意见和无知三类，他“把关于‘有’者称作知识，将关于‘无’者称作无知”^①，认为意见介于“全然有”与“全然无”之间，是“知识和无知两者之中的东西”^②，而柏氏的知识、意见、无知若降格至此处所论的个人表达，便正好是与公共事务“有”关的意见、与公共事务看似有关实则无关的成见和与公共事务“无”关的闲谈，故诸君须知笔者之论古已有师，绝非虚妄自造之辞。

现在既然已将网络个人表达的成分讨论清楚，那便可以回到此文的主题，即在网络个人表达向网络舆论聚合过程中网络究竟有着何种技术寓言，而诸位将体会到，如果把所需概念和理论阐述清楚，最后结论的得出将如何地水到渠成，简单明晰。而在此之前，我尤须再强调的是，本文所做的仅是可能性的探讨，而非实然的论说，但正因为此，才更有说出它的必要，因为可能是尚未发生，而非永不发生，“可能”警醒于当下。

前文已经讨论了意见的自由市场，须知舆论正是意见互相说服或相互妥协而成，因而

^①（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2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② 同上，224页。

必以这一市场作为形成的平台^①，而因为网络技术“开放”之社会维度所致的“发掘者”的缺场，使得闲谈在这一个市场的“准入”层面进行遮蔽，成见在其“博弈”层面进行搅扰，以致市场内外均呈现出喧哗之境，场内场外的意见俱可能为闲谈所遮蔽而互不可见，结果可能便是网络的“舆论分散”，或曰网络的“民意溃散”，网络舆论最终无法聚合。而这正归因于网络技术“开放”的社会维度，因为这一网络精神抹平了“发掘者”，导致意见的自由市场外被遮蔽，内遭搅扰，闲谈猖獗，意见失势，内外喧哗，舆论无从聚合。这便是本文所要论及的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的技术寓言：遮蔽，而若以最简洁的词句进行最全面地表述，那**网络技术之“遮蔽”意为：纵容闲谈，遮蔽意见**。而由这一遮蔽所致的**网络之喧哗世相**亦可这般描述，即：**闲谈纷呈，意见隐没**。

参考文献

- (美)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美)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美)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 (美)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 (德)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 (古希腊)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胡泳：《众声喧哗 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众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 刘建明编著：《舆论传播》，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 彭兰：《网络传播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韩运荣、喻国明：《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 徐向红：《现代舆论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
- 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① 笔者可举一例使诸君对此论更为明晰，前文已讨论过士林，而士人观夫民风，进而在士林中辩论争议，在我国古代的制度设计中，士大夫作为民意的代表制衡皇权，因此，民意并不能笼统将就是民间的意见，而是有一个碰撞、博弈、聚合的形成过程，而这必须经过意见的自由市场。诸位若想进一步了解，请参考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

新闻传播研究

博客与个人媒体化

Bloggers and We Media

刘永^①

中文摘要：凭藉网络群居，网志所代表的效用生产方式在较常规的技术应用和用户体验方面有诸多差异化表现。但究其本质，不仅革新了互联网信息模式，使得有别于大众传媒，而且，博客所表征的媒体化现象赋予每个人以完全传播者地位，表达了一种自我性与公共性兼取的媒介理念。本文从文化视角出发联系实例试图为此佐证，并揭露博客业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弊病。

关键词：网志，博客，个人媒体化，大众传播

Abstract: In the world of Cyberspace, the communication model of internet represented by bloggers exhibits a variety of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curring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gistered users. By the nature, bloggers lead the appearance of “we media”. Bloggers not only remodel the information flow on the net, making it different from mass media, but also provides the status of absolute communicator for everyone, to express a kind of media ideal mixing selfhood and communality. This paper tries to demonstrate it in the sight of culture perspective, and disclose its defects during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blog, blogger, we media, mass communication

^① 刘永，烟台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文学学士。目前工作单位：福源涂装设备，职务为工程制图。

一、引言

互联网信息模式以实现信息流动的尽可能张力为最大宗旨，它提倡一种个人媒体化(We Media, 自媒体)的生产方式。一篇六十多页的研究报告《自媒体：新闻报导新概念》指出，“自媒体是指在与全球知识系统相联的数字技术帮助下，普通大众如何提供和参与分享他们身边的事实、各自眼中的新闻的途径。”^①这种思想后来得到延伸，著名博客丹·吉尔莫(Dan Gillmor)在《草根媒体：博客传奇》中得意地宣称，“有史以来地……只要拥有一台联网电脑你就拥有了一个出版平台，几乎每个人都能够发布消息”^②，他认为昔日的新闻消费者(consumers of news)已经动起手来自己报道新闻，并且“所谓的新闻就是我们创造的那些，通过不止于‘一种’的方式”^③，这个“一种”即是指大众传媒(文中 big media)的模式。这类观点趋于认同“积极的新闻工作者”(participatory journalism)的存在并发挥作用，所谓积极的新闻工作者依赖于 BBS、新闻组、聊天室、博客圈子以及其它传播渠道，而最主要(gain popularity)形式是网志，它凭借某种技术特质赋予每个人以传播者地位。他们认为，“网志是一种网页，通常由短小且频繁更新的正文或评注构成并按时间的反方向顺序(一般是从新到旧)排列；它的内容和用途多种多样，从个人日记到专业新闻到公司例会。”^④而且它的传播“遵循一对多(个人网志)或多对多(小组网志)的媒体范式”^⑤，又可以出于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拒绝或少量允许读者和潜在读者参与到议题中。

这种含义，也正是本文所要阐释和张扬的。它明显地排斥一种观点：博客早已有之，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如果单从提供可书写的网页(The Read-Write Web)——简单的网页生成技术——这一方面来看，网志的发明的确不算什么，邮件、论坛、新闻组和 Wiki 早在几年前就提供可书写的网页了。但是，早先的 BBS 等积分性质或形象地称之为声望积累的可编辑网页主要是建立主贴，越有价值的主贴越能招徕跟贴；一个用户发帖的数量与价值换取积分和会员等级，积分越多或等级越高在日后的论坛讨论里化学反应生成特有的声望，声望的高低则意味着权威以及被支持的可能度——这种与报纸电视等媒体利用符号学意义缔造个人神话的大众模式并没有多大改观；而网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更倾向于赋予注册用户以个人行为主体特征，它所实践的是一种趋于自我性与公共性兼取的媒介理念。

^① [美]Shayne Bowman 和 Chris Willis.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自媒体：新闻报导新概念). The Media Center at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2003.原文：We commissioned We Media as a way to begin to understand how ordinary citizens, empowered by digital technologies that connect knowledge throughout the globe, are contributing to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ir own truths, their own kind of news. 本段引自该书的“Introduction 简介”部分，由 Dale Peskin 执笔。凡在注释中提供原文的，皆为本论文作者翻译。

^② [美]Dan Gillmor.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草根媒体：博客传奇).O'Reilly.2004.原文：For the first time in history, at least in the developed world, anyone with a computer and Internet connection could own a press. Just about anyone could make the news.引自第二章，第 24 页。

^③ 同上.原文：The news is what we make of it, in more ways than one. 引自第二章，第 25 页。

^④ [美]Shayne Bowman 和 Chris Willis.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自媒体：新闻报导新概念). The Media Center at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2003.原文：A weblog is a web page made up of usually short, frequently updated text blocks or entries that are arranged in reverse chronological order (most recent to oldest). The content and purpose of weblogs vary greatly, ranging from personal diary to journalistic community news to collaborative discussion groups in a corporate setting. 引自第三章，第 23 页。

^⑤ 同上.原文：Weblogs fall into the one-to-many (individual blogs) or many-to-many (group blogs) model of media, with some allowing no or little discussion by users and others generating robust reader responses. 第三章，第 23 页。

二、博客：个人媒体化表征

对于我国而言,博客是舶来品,普遍地认为与 blog 或 weblog 相关,本文主张“博客”=“blogger”而非 blog 或 weblog;博客源于网志(blog、weblog),又寻求超越。网志应用一经兴起,便有为数众多的人口现身为博客。在现实运动中,这种基于互联网信息模式的媒介形态又体现出差异化的价值取向及媒体表征:

(一) 专业平台之专注于个人体验

他们——Blog Service Provider (BSP)——立志要为网志写作者提供最专业的服务,极力延伸博客的消费概念。充分地开放虚拟空间的源代码,允许博客自己定制网页模板、工具插件,参与共同推动视觉体验的进步;还有一些专业平台如 Blogger (blogger.com)、歪酷博客 (ycool.com)、Windows Live (live.cn) 则定位于服务的实用主义者,体现一种注册博客被抛弃在复杂缠绵的互联网中的感觉。但后者并非止于内容聚合上的碌碌无为,博客实用主义者都有关联服务,如歪酷博客与非非共享的团结,虽然 Blogger 或 Windows Live 因其后台的不同技术优势而有各自的取向,但注册了 Blogger 或 Windows Live 也就等于注册了谷歌或 MSN 的包括搜索、即时通讯、邮件、翻译、相册工具在内所有服务。总之,这些专业平台重视博客的个人体验,极力避免官方的广告派送以维持用户的视觉体验,这是较其它服务平台绝对优越之处,甚至有的如博客大巴 (blogbus.com) 允诺提供个性化域名服务,这样看来专业平台是所向无敌的,事实是,弊病与优势同在,当注册用户特别是一人多户与日俱增时候,早期的网志服务平台现已变身成门户社区的博客网、因木子美而风骚无限的博尚网(原中国博客网)、自称四不像的“博客大巴”都曾出现系统维护事件,期间无法访问网站、登录出错或暂停注册,而且不时地浏览速度被嫌慢,这方面,用户的个人体验确实不太乐观。

无论怎样,出于种种考虑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严密的敏感字过滤及人力审核的增加为网站制造意料之外的成本支出和资源虚耗,这对网站 SEO (使网站处于最佳运营状态的一种手段) 也形成相当阻碍。尽管如此小心翼翼,后起之秀牛博网 (bullog.cn, 已更名 bullock.cn 复出) 还是因为“大量登载时政类有害信息”^①而被当地政府通过其网络服务商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限制访问。

专业网志服务平台的生存机制和盈利模式迫于现实而有待创新,如果他们一味束手束脚甚或作茧自缚,在既没有门户社区的稳定后台支持也没有博客个体户的灵活性优势的情况下,似乎前途渺渺而近于坐以待毙,如果还有别的出路的话,那就是像博客大巴一样经历短暂的勃兴后必然地渐渐沦落于为了眼球乱转的“美术游戏”而麻痹趋于半死不活的植物 blogger 们了吧。

专业托管平台还存在一些变体。以饭否 (fanfou.com, 曾经被关禁闭现在放出来的一个网站) 为代表的迷你博客,它一般对日志更新的字节数以及是否支持图片上传有微妙的限制而倾向于开发多样化更新方式;和以万蝶 (pdx.cn) 为代表的移动博客,主要借助手机上网的便宜,开发的针对手机用户的博客服务及其 web 版,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当这项技术为其它博客服务商融合与运用后,移动博客的专业前景并不乐观;巴巴变 (bababian.com) 和 flickr (flickr.com) 为代表的图片博客,博客更新通常由一张图片和简要或没有文字说明组成,这种按时间序列的图片不同于相册却支持纳入相册系统而进行管理。总之这些变体都因其小巧别致而风格独具。

(二) 门户平台之专注于新闻运作

博客市场兴起后带动的 web2.0 热议,所谓 web2.0 更被理解为一种网络内容生产模式,试图解放互联网乃至更多新技术的信息张力。过分地分辨 web2.0 及其所定性 web1.0 只能造

^① 知名博客网站牛博网被关.南方都市报. 2009.01.12. A24 版.记者:谭人玮。

成相对混淆。当概念 web2.0 煊热无比势必要颠覆 web1.0 的时候,后者只是轻松地笑着,淡然宣称,“一个非常有活力自信化、个性化的传播时代悄然产生”、“我们是张开双臂欢迎这样一个新生事物”^①。概念是砸不死人的,都是里手,谁也骗不了谁。抱有这种态度的正是以新闻为主要产品的门户网站——与专业网志服务平台相比,它拥有较为宽阔的文化视角,更擅长于促成和优化博客们的互动,和网志写作与站内其它内容的整合及传播价值提升——依托为数不定但数量可观的注册用户和丰富的内容编辑经验,且不耻于取经纳粹,它们乘着博客狂潮,也纷纷兼收并蓄地跻身 web2.0 行列,在整个博客市场上反而后来居上^②——其特有的优势和手段有多方面表现:

把已有注册用户蜕变为博客用户,且引入群组(groups),鼓励博客自由创建,自主管理;当然也能够把博客们的文章接收到相关公共讨论版从而制造流量的交叉增长以满足博客的被关注希求,这是门户网站进军 web2.0 的显著优势也是首选,新浪博客的运作也堪为案例,每个博客可以自主创建五个圈子、可以最多加入一百个圈子,也就是说,博客更新的日志可以同时最多时候发布到一百零五个博主自主管理的圈子,另外,还有博文排行榜、博论坛、投稿到相关博客频道首页以及“相关博文”、“推荐博文”——为博客争取点击量和被关注的可能提供了尽可能的方便。

另外,层出不穷的加冕礼。实现加冕礼有很多方式,如搜狐网和新浪网分别举行的博客赛事,有助于宣传主办方的博客价值观,吸引新的注册用户,也在广义普及了网志理念(效用模式),2005 年的赛事直接造就博客用户的规模性增长^③。另外,名人效应,开启名人这台博客发动机的正是门户网站,搜狐博客首创“博粹”的先例,新浪博客将其阐扬为“名人堂”——与之相对的是草根博客(前身是锐博客);请名人、造明星,精英驱动大众^④是门户网站推动注册、刺激博客的通用法则。还有达人选秀,提倡草根英雄,通过树立一个或若干主题激发博客们相互间交流或竞争的心态,调动积极性从而扩大影响力。

再者,与门户网站特有的编辑能力相关。博客为网站平台带来了巨量内容,而这种巨量又是与日俱增的——如果能够管理提炼这些内容并使之成为网站门面上的花黄,这对于任何 blog 服务平台来说都是资质甚佳的信息渠道。博客中国(blogchina.com,博客网前源,早期专业服务平台)看到了这一点,这是它的聪明之处,它自诩为新世界的麦哲伦^⑤,却忘记了麦哲伦并没有完成环球之旅而中途被杀死了。当博客中国顶着麦哲伦的豪迈开启门户之旅,并热力地宣扬“第二代门户”。如前所言,web2.0 只是一种内容生产模式,谁都可以利用,结果的好或坏却是别个问题,当“第一代门户”融合了这种生产方式,所谓“第二代门户”的优势与出路又在哪里呢!“博客中国”重组出博客网(bokee.com)后以门户网站的姿态出现,渐趋地又添加了许多 SNS 特征,如空间小游戏、在线宠物等。博客网门户之失在于博客为网站供稿的不稳定性,特定时期特定话题的话语暴热或骤冷,都是理念上的“第二代门户”难以应付的——这才是考验网站编辑能力的关键所在;当然,媒介的日常生活理论^⑥又认为,对于不同网志写作者,每天都有各自的“新近发生的事实”,而绝大多数博客来所能提供的只是吃喝玩乐又毫不稀奇的花样以及情绪乃至阴私的发泄——如果把新闻内容的组织与编辑依赖于这类内容,也许除了催生更多离奇生活的木子美或以“身”作则发扬丑学的芙蓉姐姐等特殊趣味的娱乐资源之外再也发掘不出其它积极的社会功用了。

^① 李善友“搜狐公司总编辑李善友在博客大赛上致辞”<http://it.sohu.com/20060113/n241410039.shtml>。

^② 引自《CNNIC2007 中国博客市场调查报告》。

^③ 引自《CNNIC2006 中国博客市场调查报告》。

^④ 方兴东.博客发展进入第三个阶段:精英写作、大众写作到全民社区 <http://fxd.bokee.com/6761488.html>。

^⑤ 方兴东 王俊秀.中国博客宣言 <http://fxd.bokee.com/1979270.html>。

^⑥ 日常生活理论,认为每个参与媒介传播的人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关于信息内容的和对媒介品质的评价——的一种理论。引自[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这种理论在麦奎尔的著作《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 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里有更详细的涉及.第334页。

（三）社区平台之专注于兴趣参与

基于技术的便宜，网络居民对于信息传播的反馈轻松且及时——互动作为一种生产效率保障，似乎可以认为，越能够促进居民的互动，就越能解放互联网的信息生产力。因而从另一个层面，博客对于它所寄生的网络，不仅意味着生产力，也类似于优质的受众资源，一种因为被赋予相对的主动性而较于报刊书籍读者和广播电视的听众观众更乐于被调动、更积极参与的受众资源。关系型社区（SNS）的履约了这种互动性实践。关系型社区不同于其它服务平台的原因在于交互性之于后者是次要的——更热衷于追逐个人体验或商业规模，前者则无法趋之若鹜。且不问 SNS 的语源何在，我却可以发现有三释意义的三种衍义：

SNS 主张 Social Network Service，突出虚拟社会的特征。动因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现实走向虚拟（现实的扭曲），利用已有的普遍存在的人际关系进行虚拟的网络呈现，当现实社会关系的某一成员入住网络，现实社会关系中的蜂鸣效应^①就会吸引更多人入住网络，其二是营造扭曲的现实，如立足为有婚恋交友欲望的人士提供服务的社区，当一拨又一拨案例成功后就会唤起越来越多的人更多的潜在的婚恋交友欲望，当然，被唤醒的人所入住的网站与他所被告知的案例有关。而通常，这两种动因是相互作用的。

SNS 的另一种含义 Social Network Software 则指 SNS 社区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开放系统平台，基于此，SNS 也有走向花哨式空间的可能；另外，允许用户自主开发或添加“游戏”应用，这是 SNS 网站玩出新花样、乐趣无限的真理所在，倾向于提供网页游戏以辅助博客的娱乐要求，毕竟，博客们是怀着直接的动机来这里的，在动机为达成之前，博客们如何打发无聊的时间——抑或无聊消遣正是其动机——必是 SNS 站点必然考虑的问题。非竞技的养成游戏（网页游戏的一种）既有特有的社会人文色彩，又能迅速引人入胜，好看+易玩=好玩，它需要博客足够且精准地花费时间，才能致胜；养成游戏的另外特点是它会让你把消费培养成习惯，深入日常生活；并且往往地越多人参与到你的游戏布局里，对于激发个人瘾癖的可能越大。

SNS 还意味着 Social Network Site——社会亚文化群体聚集地和交流平台。较为花哨的是那些消费者网站，主要作为个人商务信息的发布，提供网络支付服务，在这里注册用户被赋予双重消费人格，既有物质利益的勾连，还有个人媒体化意义的博客自我消费。淘宝网的淘客们最终挺起了性感的“淘女郎”；而作为精神意识层次的交流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自称“没有编辑写手，没有特约文章，没有六百行的首页和跳动的最新专题”^②的豆瓣群组（douban.com）其实是积聚了各种小情调，涵盖电影、音乐、书籍这些文化工业困境中的私人阅读阵地，另外，它的“九点”始终试图发挥特别的作用。

（四）博客个体户：非依从第三方服务的江湖游侠

说白了，对于网志平台而言，所有的网志都是互联网的空间服务。当这种空间服务不经过第三方而由需要者自主选择 ISP 直接租用网络空间、独立注册域名、完全控制网志表现形态的时候就形成了博客个体户或称为独立博客——也是最传统最原始最高级的生存形态，他们是不依托第三方服务而的写作者。

网志更新与维护是博客最主要的行为，所以网志写作在博客个人媒体化体验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第三方服务通过敏感字过滤和精彩内容提取决定哪些信息更广泛传播、哪些信息被搁置、哪些信息被抵制从而实现媒介把关人^③功能，那么媒介把关理论在博客个体户这里是失效的，因为并没有为把关人的存在留有立足之地，也就是说博客个体户是作为完

^① 蜂鸣效应，Buzz marketing 一种营销理论，利用特定事件或特定人群引发产品信息在目标受众中的口碑传播的效果，从而达到产品信息在潜移默化中快速、广泛传播的目的。其英文原词中的 buzz，意指“嗡嗡声”，它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蜂鸣营销所引发的口碑效应，故称蜂鸣效应。

^② 引自相关网站的官方介绍。

^③ 把关人，审查筛选信息并仅仅传递那些将有益于他人共享其观点的信息的人。引自[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曹书乐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P135。

全传播者——因而更理想于作为网络群居里的江湖游侠。而一般地，博客尤其是个体户博客都具备相当的写作技能，他们关注时事奇谈怪论，张扬自我；文字言简蓄意，表达机趣幽默——1998年，博客个体户“德拉吉报道”就是这样率先捅出了克林顿与莱文斯基绯闻案；他们也有某些发挥技术特长的，关注新兴产品，或开发实用或饰用插件，解决电脑疑难杂症；前述并非全部，更多是那些对日常琐事的记录，今天的所见所闻、去了什么地方，谁谁来访等等。一种网上随笔，一种个人化的电子日记，一种学习与交流工具……这些都是对网志特征描述。越是能干的博客越能将自己的站点（website）变成一种反映生活的方法或艺术创作。

正如著名博客个体户毛向辉所讲：“博客的最大贡献是使互联网可写。”拥有 blog，就拥有了可写的互联网。持续的书写，就会获得同类者的关注。网志发布成了个人媒体化的最主要表现。网志（blog）并非孤军奋战，还有链接器（link）、订阅器（RSS）、标签（tag）以及数不胜数实用或饰用的插件（plug-in）^①，他们作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融合到博客的个人媒体化系统里——最完美呈现是在博客个体户那里而第三方平台的博客只能残缺地享受到的恩泽。

我们也不能忽视，认为参与博客零成本、零门槛是不切实际的。博客是有分别的。如果去 BSP 仅仅注册一个用户号码，确实，需要付出的代价忽略不计；造作的点击量或以此为基础的人气、关注稍稍撇开不谈，单从网页的再造程度，包括页面美化以及博客的网志写作，必然地付出时间和精力——一种自我消费，甚或很轻易地被纳入到 BSP 的收费项目里——QQZONE 的会员制度。当然也会滋生另一种现象，博客与网络平台联姻，实施一些商业推广计划，企图自给自足。

更何况，博客们并不停留在线上。他们自觉地倡扬积极的现实意义，“博客不是写出来的”——《南方周末》如是报道台湾博客们的 Punch party，以及组织网络下乡的“胖卡计划”^②。

三、结语

个人媒体化是人类历史的一种进程，是指凭借某种技术特质，任何人可以成为传播者。作为网志应用者他们乐于把一片荒漠建设成为可迁居的新家园——一种对更惬意的网络群居向往——而且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基于互联网信息模式，这种效用机能发挥着难以企及的细密作用。最广大的互联网用户因而不是网络游民，他们有了各自的身份，博客就是他们各自也是共同的身份。博客使人的灵魂穿越时空而最大可能地物以类聚，也使庶民的声音被传播最方便地人以群分。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变成博客，量力而行境界不同自得其乐——博客因其特有的个人主体特征也势必将引领网络群居。

同时我也更乐意跳跃一下，借助消费的观念。我们看到，鲍德里亚如是说，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③。他把这种关系解释为一种系统化操控活动，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一种身份转换）^④。那么，如是问：个人媒体化后的博客所进行的信息行为在传播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完成这种“身份转换”呢？更何况互联网信息模式的生产机制永远有一种悲哀，内容犬牙交错，其繁复，不得不称车载斗量，其冗余，人类语言难以描述。

^① 链接器是博客们强大的也是最常用的工具，可以指向其它博客、其它网站，也可以指向某一网页、某一讯息；标签对于读者来说起到导航作用，对于网志写作者类似于知识自定义管理和 SEO 功能；插件能够美化网页，通过编辑代码嵌入背景音乐或视频播放等；订阅器改变了网络阅读习惯，频繁跳页与滚动条似乎不太迎合博客的自我价值取向，博客是订阅器的频繁使用者，也把它作为与搜索引擎并列的可借助工具。

^② 南方周末. 博客不是写出来的——台湾博客新玩法. 2008.11.19.

^③ 鲍德里亚. 物体系. 林志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23~227 页。

^④ 同上。

书评

问题本身比学科归属更重要

Question Itself is more Important than Which Discipline

It Belongs To

刘宪阁^①

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 30 年 1978—200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年版

《中国传播学 30 年》是一部非常厚重（煌煌 800 多页）、颇值一读的参考书。尤其第三篇即学者自述部分颇有特色，为以往同类著作所少见。通过部分学者对个人学术道路的回顾，从一个比较细微的层面生动具体地展现了最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传播学科的发展历程。而笔者印象最深的，是黄旦和潘忠党两位教授的自述。他们不约而同地（甚至连文风也很相似）根据各自经历谈到一些研究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强调你疆我界的学科藩篱，并对此有所反思。

黄旦教授最早接触传播学是在 1983 年。1995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书《新闻传播学》，跳出了当时不少人为之苦恼的新闻学还是传播学的学科界限，并尝试将两者有所糅合。博士毕业后赴美访学，期间旁听了一次 NCA 年会，会议日程让他吃惊不小：“场次之多，论题之杂，学科来源之广，超出想象”。这让他逐渐明白，所谓学科无非是资源竞争的借口，或者个人谋生的编制所在。由此也认识到：就研究而言，不该受限制；“只要提出的问题是传播领域的，用什么理论知识去解决，完全看需要”。特别是后来读到 Peters 的 *Speaking into the air*，更让他“对传播及学科问题豁然开朗”，好比打通了任督二脉。2005 年，他出版了新作《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其中压根看不到所谓传播学和新闻学的人为痕迹和界限。没想到后来研究结项，关于该书的评审意见竟然称新闻专业主义属于新闻学，而非传播学。“言下之意，我的书还不能算是传播学研究，当即被‘雷’倒”（第 717-719 页）。

类似的尴尬，潘忠党教授也遇到过。早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他就拓展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并逐渐认识到：“学科之间的分野，更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践划分，而非认识论层面的逻辑划分，因此，学术探讨不必也不应囿于一个被标签固化了的学科”。他后来的研究也正是这样：既不很“人文”，也不够“社科”。基本上是由于兴趣的游击战，“打一枪换一

^① 刘宪阁，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个地方”，可谓五花八门，什么都有。诚如他在自述中所说：既倒腾统计数据，也解读质化观察；既操持“行政研究”的课题，也搬弄“批判理论”的语言。很多因感兴趣而考察的题目，实在不太容易进行学科归类。其中有哪些可以正经八百地属于“传播学”？他自己也搞不清，有时半开玩笑地调侃说：“我不是个传播学者，也没搞清楚‘传播学’是什么，只是个碰巧有传播学博士学位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但是这么概括依旧无助于将他自己归类，或者帮助别人将他定位。在复旦，曾经有位哥们儿很“愤愤然”地对他说：“原来以为你是做文化研究的，现在看来你很可疑！”（第727-729页）

这样的情形，大概还有不少人碰见过。比如我自己，就常被人追问：你到底研究什么呀？或者说，你读的是什么专业呢？还真不好回答。从本科到研究生，我的专业先是从政治学变成了历史学；后来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又转到新闻传播学。表面看来好像很奇怪，完全不搭界嘛；其实种种变迁，无不与自己关注的问题有关。简言之，在政治学系读研期间关注“劳动”观念在现代中国的形成及其政治影响，后遂选择历史系来读博。起初也打算围绕这方面继续深入展开，后因故改以张季鸾、《大公报》和现代中国政治为博士论文选题，由此又涉及新闻传播史，于是做博士后就来到了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正如此，我非常赞成黄旦和潘忠党两位教授的观点，即更关注问题，而无须执著于学科本位。

几年前，黄旦教授曾与潘教授等合作组织了一套《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回顾译丛在新闻传播及相关学界的影响，他发现好的成果是没有边界的；“道不同不相为谋”，并不是学科的不同，“而是学术水平、理念和理解的差异”（第719页）。仔细想来，往往也的确如此。

试举一例。同样是关于20世纪初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苏报案”，史学、法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大可见仁见智，尽情发挥。也因此，继2005年关于此案的第一本专书《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周佳荣，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之后，我们在2010年又陆续读到两本新著：《苏报案研究》（王敏，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1900-1911：以苏报案为中心》（徐中煜，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丰富了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了解和认识。

其实“苏报案”不仅是社会政治事件，同样也是新闻传播事件。所以新闻传播学，特别是新闻传播史，在这方面本来也可以有所尝试和努力；但平心论之，目前除了一些泛泛而谈的笼统介绍之外，对此尚未发现有什么深入细致的研究（按以上三本论著中，周、王为史学研究者，徐氏则为法学研究者），更不用说取得什么突破性进展。

这不仅是新闻传播史的问题。^①在整个新闻传播学领域（以及其他不少学科），都存在一些类似的问题。追根溯源，其因甚杂。而过分拘泥于学科属性，或者说对学科归属的过分执著与迷恋，无论如何似为原因之一。比如认定只有这样才是新闻史、那样才是传播学，除此之外，则“非我族类”。

循此逻辑，事事都要严格按照学科属性来划分，那么很多问题就不太容易得到适当地分类、研究和解释。比如关于1940年初香港《大公报》披露日汪密约问题的考察，既可以归入历史学，也可以归入政治学（如蒋介石的暗中操控），还可以归入新闻学（如信息的披露、社评的发表和版面的安排），甚至归入传播学（特别是事关抗战的对外宣传或者国际宣传等）。^②又如关于颇具中国特色的内参机制，特别是1980年代以前《内部参考》在当代中国政治传播与决策过程中的角色之考察，亦是如此，其间广泛涉及许多学科。

诚如潘忠党教授所言，学科分野“更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践划分”。换言之，芸芸众生、大千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并非仅由诸多简化后的学科堆砌而成。恰恰

^① 当然，目前国内的新闻传播史研究自身也确实有其问题，需另文讨论。

^② 刘宪阁：《政治操控下的新闻事件：以1940年初〈大公报〉披露日汪密约为例》，《新闻春秋》2011年第1期。

相反，你疆我界、壁垒分明的学科意识，是后来才出现的：起初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才将外面的精彩世界加以简化，再贴上政治、经济、社会、新闻以及传播等标签。

进而言之，在现代学术建制下，强调学科归属似乎也无非议。毕竟一些学科的观察视角和研究路径等还是非常独特、非常犀利的（否则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 and 认识世界。惟沉浸于某个学科既久，虽也有助于形成基于该学科的分析思路，并拿着由此炼就的那把犀利的大刀来观察甚至砍削世界，但也很容易对其产生感情。正如对学科归属不宜过分强调，对学科的感情亦不宜过分执著。否则很容易囿于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忽略乃至无视更宽广、更宏大的背景，最终遮蔽自己的学术视野。至于视某些研究为本学科的禁脔，不允许其他人染指，而对相关研究又不闻不问甚至不屑一顾，更不足取。

初学者为专业问题而纠结和困扰尚可理解；有多年研究经历者如果仍旧斤斤于学科问题，则似有些匪夷所思。其实，当下新闻传播学界有不少人原本就是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如史学、文学、社会学甚至理工类），只是后来才因缘际会，转入新闻传播学领域。而在当代中国转型的大背景下，强求研究者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纯粹是学新闻传播的，并非必要，而且也不太现实（当然年轻一代或者可行）。^①何况单一、纯粹的学科背景，虽则较为有利，但从另一方面看，也并非没有弊端。不过由于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学院体制下，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即便认识到这些复杂的情形，但可能也未必愿承认这一点，而且多少也逐渐形成某种自觉的学科意识（当然还不是更高层次的学术共同体意识），甚至是学科樊篱或者说偏见，顺便也为自己和其他人贴起了标签。即只有（像自己）这样做，才属于或者说比较符合典范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否则就不是新闻传播学——起码他认为如此。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李彬教授《中国新闻社会史》出版后，一些读者的印象会是：原来新闻史也可以这么写，或者说这也是新闻史。换言之，其背后的潜台词毋宁是：新闻史本来有某种规定的写法。

同样的情况，在其他学科也存在。而在这些壁垒森严的学科纷扰背后，往往还会有这样的情形，即新闻传播学院也有关注其他学科领域的问题的学者，而其他院系也有关注新闻传播问题的。至于出身于其他学科背景，现在新闻传播领域做得有声有色的，也有很多。这种现象比较普遍，也很正常。因为真正好的研究者，往往是超越了学科背景的，很难用传播学者、政治学者之类的学科标签来简单限定。对这些人来说，学科与其说是一种约束，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刺激思考的动力。他们不会划地为牢，约束住自己的手脚，而会以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学科问题。

在评述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知识生产的可能贡献时，吴飞教授直言：很多人并非没有宏大的理论雄心，“实则是我们学科边界限制了自己的眼光”（第569页）。吴子敏教授也有类似的观察。2000年去台湾访学时，他曾向陈世敏教授推荐孔飞力的历史著作《叫魂》，又给一位研究公共关系的学者推荐河南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这些书也许很难贴上“传播学”的标签，但是吴教授“从中看到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传播形态，是那样富于戏剧性和启发性”（第580页）。

凡此足以提醒我们：只要有好的问题，不必太纠结于学科；或者说，问题本身远比学科归属更重要（否则无异于削足适履）。这里不妨重温人称“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话。他多次强调，自己看着像是做学问，其实志不在此。他说：“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许久，我是什么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学界固应如此，业界又何尝不然？

^① 关于不同代际研究群体的一个尝试性分析，可参见张丹：《三十而立：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发展历程与时代特征》，收入本书第453-468页。

2010~2011 年度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成果 (著作)

作者	成果名称	成果形式	出版社/出版年
崔保国	2010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4
崔保国 杭敏	传媒经济与管理学导论	译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9
崔保国	2011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	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4
崔保国 李琨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五版)	译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7
范红	企业的社会责任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9
金兼斌	2009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论文集	编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2
李希光	新闻教育未来之路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1
李希光	对话西藏:神话与现实	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10.10
李希光	软实力与中国梦	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11
卢嘉	Software Copyright and Piracy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Users	英文专著	LAP Publishing 2010.5
尹鸿等主编	2010年中国电影艺术报告	论文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0
赵曙光 李 甯 倪燕	《中国健康传播研究(2009-2010):从 媒体舆论到医患沟通》	专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0

综合学术信息

1. 3月17日下午，我院成功举办了本学期首场教师学术沙龙活动。我院常务副院长尹鸿，党委书记金兼斌，副院长崔保国、陈昌凤等出席学术沙龙。本次学术沙龙的主题为“新媒体研究前沿与趋势”，由我院新媒体研究中心承办。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主持论坛，并介绍清华新媒体研究中心的历史沿革和研究情况。中心研究团队金兼斌、卢嘉和张铮3位老师分别就新媒体研究定位和发展思路、国际新媒体学科建设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新媒体理论研究的现状和热点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和阐述。与会教师就新媒体研究定位、学科方向融合和中心作用发挥等问题进行探讨。各研究中心的教师、博士、博士后等20余人参加学术沙龙。举办教师学术沙龙活动旨在为不同方向的教师之间搭建互动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学院学术研究、营造学术氛围、促进院内学术交流。学术沙龙原则上每月举办一次，本学期拟由学院各个研究中心轮流承办。

2. 5月19日下午美国德州奥斯汀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 Stephen D. Reese 教授访问我院并发表题为“全球新闻竞技场中的媒体框架”的演讲。

Stephen D. Reese 教授是美国新闻与传播学界的知名学者，曾经担任德州奥斯汀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主任，并曾到墨西哥，西班牙，德国，荷兰等国家访问和教学。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媒体效果，框架理论，国际传播等。

在清华的演讲中他主要介绍了对框架研究的最新观点以及一些相关的重要问题。探讨了媒体如何在设置公众议程的同时，如何引导公众舆论；他还介绍了以美国反恐战争为案例所做的媒体框架研究等内容。

学院师生和 Reese 教授就框架理论、中美关系、媒体表现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来自加拿大、越南等留学生也和 Reese 教授进行了愉快的互动。史安斌副院长和郭镇之教授代表学院参加了本次讲座。

3. 5月23日下午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祝建华教授应邀在学院举办了题目“为何和如何在 SSCI 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演讲。学院崔保国教授、金兼斌教授和40余名师生一起参加了整场报告会。祝教授首先对 SSCI 数据库进行了简要评析，然后分别从 SSCI 发展的历史过程、国际期刊论文的评审环节、选稿要求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讲解，并详细分析了导致作者投稿失败的一些主要原因。此外，他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投稿的经验、审稿的体会。

祝建华教授是传播学领域成就卓著的学者，曾在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舆论季刊)、新闻与传播学院科研通报 2011 年第 4 期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传播学刊) 等 SSCI 期刊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目前也担任多家高水平国际刊物的编委。他创立的“零和游戏理论”(Zero-sum Game of Agenda-Setting) 和“权衡需求理论”(Weighted Needs for New Media) 在传播学界独树一帜，具有广泛的影响。

4. 6月22日，由我院和“武林外传”系列产品出品方北京联盟传媒联合主办的“文化品牌创造价值——《武林外传》文化全产业链拓展学术研讨会”在环球资源厅举行。国内学界业界专家、学者、记者应邀与会，我院常务副院长尹鸿代表清华大学出席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武林外传”的文化创新、品牌价值和产业模式等问题展开研讨，总结其对于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经验 and 意义。《武林外传》是近年来在广大观众中最有影响的系列文化产品，以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成为当下民族创意品牌的一个标志性案例。

5. 7月2日，由我院-哈佛大学“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联合培养博士生姚遥与“软实力”理论的创始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共同在哈佛大学发起“哈佛中国软实力论坛”，姚遥主持论坛开幕演讲。约瑟夫·奈教授在论坛成立仪式上致辞时表示，哈佛大学的相关学者将进一步加强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中国高等学府在软实力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从2011年起，“哈佛中国软实力论坛”将邀请对于中国软实力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各界学者、政治家、外交家和媒体人，每月在哈佛大学举行主题演讲和学术活动，并与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进行现场对话和交流。该论坛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担任主席，姚遥担任执行秘书长。